

共产主义者

◀月刊第10期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2026.02

革命理论

列宁思想评析

时事评析

战争阴霾下的海峡两岸： 评近期台海军演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世界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国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双手开拓的更美好的世界！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我们是谁

官方网站：
bolshhevikleninists.com



《共产主义者》

官方YOUTUBE中文播客

- 总结历史
- 学习理论
- 时事评析
- 文艺评论
- 组织建设
- 政治/生活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时事

I	从新蔡一名学生之死谈中国教育与生命权	05
II	战争阴霾下的海峡两岸——评近期台海军演	08
III	河北农村取暖问题——温差？“温差”！	15
IV	张又侠被清洗：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20
V	重庆垫江一中：强制剪发与支配权	24
VI	芬布尔之冬：论格陵兰民族权利	27

49	中国地方经济政策——房地产寄生	VII
55	在暴力革命的战线上：共产党人如何夺取政权？	VIII
58	迫在眉睫的台海危机及我们的呼吁	IX
65	民族自决问题（一）	X
68	以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视角开创新时代革命的宗教策略（一）	XI
73	永远翱翔的革命之鹰——罗莎·卢森堡思想评析	XII
80	列宁思想评析	XIII
90	“AI2027”的末日猜想：人机冲突将毁灭我们吗？	XIV

理论

被杀死的生命——从新蔡一名学生之死谈中国教育与生命权

作者：秋水



1月8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清华园高级中学发生一起学生死亡事件。一名在校中学生在校园内失去生命，至今死因不明。

据多名家属及现场目击者反映，事发后校方第一时间并未通知家属，而是试图联系救护车将遗体运离学校。这一举动引发了其他学生家长的强烈不满，有家长驾驶货车堵在校门口，要求在家属到场、真相未明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遗体。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学生家属陆续聚集在学校门口讨要说法，却遭到特警及安保人员的阻拦，现场气氛高度紧张。

更令人不安的是，家属发现孩子的死亡明显存在异常：嘴角有出血痕迹，胸口出现疑似针孔的洞状伤口。这些情况使“意外死亡”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

1月9日中午，学校门口已聚集数百名群众，要求校方正面回应学生的死亡原因。然而，校方不仅拒绝公开说明情况，甚至拒绝让家属当场查看遗体。最终，在长达数小时的拖延之后，家属才在医院见到已经被冷冻保存的遗体。

直到当晚，学校方面依旧没有就学生的死亡经过、责任认定或调查进展作出任何解释。

同日 18 时 30 分左右，校门口维权的家属以及前来声援的其他家长被全部清离现场，事件暂时“消失”。

但问题并没有消失。

1 月 11 日，迫于社会压力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朱某系心源性疾病导致死亡，排除外力伤害和中毒，左胸部针孔系法医抽血检验形成，嘴角红色液体系体液流出。

这一通报并没有让人信服，反而疑云丛生。网友们在这起新闻的评论区下，纷纷质疑到：家长没在场，为什么直接抽管检验？为什么法医比救护车，比家长还先到场？法医什么时候接警的，工作什么有记录，证据链提供一下等等。



当地救护车被指抢运尸体

但是官方只是选择了一味的沉默。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写关于中国学生校园死亡的文章了。反复发生的死亡事件并不是个别学校的失德失能，而是一整套社会制度对年轻生命的冷漠。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的孩子，尤其是来自工人阶级和普通市民阶层家庭的孩子，总是在被这个世界恶意对待——更准确地说，是被中国的“特色”资本主义制度持续虐杀——这也是中国斩杀线的一部分。

生命权，本应是一个人最基本、最不可让渡的人权之一。然而在现实的中国社会中，这一权利之所以没有得到真正的制度性保障，不是因为个别校方领导主任的失德失

能，而是因为整个社会制度本身就无法、也无意于保障它。

学生，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这里从来没有被重视。生命，它只是一种生产工具，就像东南亚的非法器官买卖一样，可以转化为：升学率，政绩，金钱，地位，车子房子而已。

中国的教育制度正是这一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非一个中立的、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存在的公共福利事业，而是国家统治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两项核心职能：

其一，是对劳动力的驯化与再生产。

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而言，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非常直白——绝对顺从的，没有独立思想的人性机器。

“对于这种工人，既不要求他有特殊的体力，也不要求他机智灵敏，不要求他有手艺，只要求他能遵守时间，克己自制、有耐心和能吃苦耐劳。”

而对于少数从这场血腥的竞赛中脱颖而出的学生而言，资本主义制度则将获胜后的奖励和在高考之后继续这场永无止境的竞争的命运一道送给了他们。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学校执行着三个主要任务：1、用忠于和敬仰资本主义的精神来培养年青一代的劳动者。2、从统治阶级的青年中为劳动者培养‘有教养的’教练人员。3、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利用科学来发展技术和增加资本主义的利润。” ——《共产主义ABC》

其二，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对少男少女们进行服从性测试。

“学校成了读书学校的同义词。在这种学校里，学生们规规矩矩地坐在书桌跟前听教员在讲台上讲课。除了书本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之外，这种学校里什么也不讲。学生的个性备受摧残，并且由于严格的外表纪律而使它们变成了一部机器，无休止地接受传授给他们的知识。”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

通过这种身体政治的权力规训方式，少男少女们就像马戏团里从小就被束缚起来的小象一样，即使成为了大人，也无法摆脱这种精神上的束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

“现代教育并不是普遍人类的教育，而是阶级的教育，是为一定阶级利益而组织起来的教育形式。教育并非超阶级存在，它总是服务于既定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

而这种阶级教育通过国家机器得以制度化、合法化。正因为国家本身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学校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为现存制度服务的功能。

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学校应当与国家相分离。

这一思想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思想的延伸，这并非反对公共教育，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学校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最核心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学校。我们从挂满校园墙壁的宣传标语、科学课本中的习近平语录、教委空降的校长可见一斑。



所谓的公共教育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机器

如果能让教育不被资产阶级所操控和垄断，首先要让教育与国家分离。这是我们基于当下的呼声。

“‘由国家实行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学校的经费、教员资格、教学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由国家视察员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应当把政府和教会对学校的任何影响都同样排除掉。我们倒是需要由人民对国家进行极严厉的教育。”——《哥达纲领批判》

而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教育家的眼中，世人分为普通人和精英，弱者和强者，穷人和富人，只此而已。他们不满意当前中共统治下的特色教育，却看不清它的阶级实质。

“资产阶级是全体居民的极少数。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利用其他阶级压迫机构的同时，也利用学校来按照自己的精神培养和训练千百万劳动者，以便将极少数人的观念和道德强加给居民的大多数。”——《共产主义ABC》

而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现代教育的阶级性，更指出这种阶级性是如何通过国家权力得以再生产的。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

为什么一名学生的死亡会迅速被学校压制下来，为什么中共的警察和打手会那么快速的到达现场布控和镇压不满抗议的家长群众们，为什么“维稳”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行政命令。

这就是蒲城运动、江油运动等等抗议活动并非指向中共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为了争取朴素的公平正义的诉求都会被镇压的根本原因。

“因为房间里的大象即使只是被盲人摸到象尾，也会非常的不爽和愤怒。”

这名学生的死亡，并不是孤立的悲剧，如果我们只是庆幸自己的孩子没有被卷进去，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正如在国内某小区快递中大量出现的《与同胞书 | 清华园学生死亡事件》宣传单中所写道的一样：

“孩子的死，却出动了成千上万的特警，他们不是去保护真相，而是去控制声音。一个真正有公信力的制度靠的是透明、规则、独立调查。而不是封锁、威胁、抓人、恐吓……如果今天沉默，明天哭的可能轮到我们自己。”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某一所学校、某几名校方人员，而在于一个把孩子的生命视为可以替换的资源的社会制度。如果这一制度不被质疑、不被撼动，那么今天的新蔡、昨天的某地、明天的任何地方，都还会继续重复同样的悲剧。

而对这些逝去的年轻生命而言，最大的残酷，或许并不只是死亡这一本身，而是记住他们之死的生者记忆迅速地被“大手”清零、修正、遗忘。

如何避免悲剧不再重演？自由派同情的眼泪并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在[《郟城一中：屡禁不止的校园霸凌》](#)一文中已经指出的：

“资本主义下结构性失序造成的悲剧，不是开几个班会和座谈会就能解决的。唯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构建起具有工人民主的计划经济体系，社会一切的导向不再鼓吹强者和利润，以社会效益和公共道德为主。

学校不再是为少数人培养奴隶，而是真正的教书育人。法律也是真正由人民民主制定的维护公平公正的工具（并由人民的政权来实施），而非维稳手段。”

只要学校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学校就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学校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

“共产党在学校事务中，同在一切领域一样，不仅面临着建设任务，而且首先面临着破坏任务。应该立即把资产阶级社会学校系统中那些使学校变成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的东西破坏掉。”——《共产主义ABC》

所以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

社会条件，又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实情况出发。

“反对宗教和民族歧视，反对等级学校，男女一律平等，对天才和笨伯一样施教。‘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设立统一的普遍的学校。宣传最广泛的民主主义思想。赞成社会的学校，孩子在学校要学习社会；赞成自由的学校，人人都应自由行事，反对任何暴力。”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

我们呼吁我们的学生们团结起来，反抗你们的蛮不讲理和冷酷的老师主任校长们；我们呼吁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市民阶层的家长们，不要被鼓吹“阶级飞跃”的杀人的教育制度所迷惑，与你们的孩子，与你们的弟弟妹妹一起反抗反抗再反抗，摧毁这个吃人的社会，救救孩子吧！

“如果今天沉默，明天哭的可能轮到我们自己。” ——《与同胞书 | 清华园学生死亡事件》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战争阴霾下的海峡两岸——评近期台海军演



2025年12月29至31日，中国军队东部战区各军种在台湾周边地区进行了名为“正义使命-2025”的军事演习。这是自2022年8月佩洛西访台以来，解放军对台发动的第七次大规模军演，也是首次以“正义使命”命名的对台军事行动。此次军演也是近年来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一次军演。

1. 台海的军事升级

自2022年8月佩洛西访台引发首次大规模环台军演以来，中共在2023、2024连续两年都维持一年两次的环台军演规律。2022年8月首次军演未使用特定代号；2023年4月使用“联合利剑”；2024年两次军演分别为“联合利剑-2024A”与“联合利剑-2024B”；2025年4月则为“海峡雷霆-2025A”。本次“正义使命-2025”是首度以“正义”为名。

中共官媒强调这次军演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干涉”，并将近期美国对台军售视为主要背景，指称其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特别是“八一七公报”的规定。日本近期对中的强硬态度，尤其是高市早苗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军演是在近一年对军队的清洗渐入尾声时发生。2025年12月22日，杨志斌晋升上将并接任东部战区司令员，接替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于10月被开除党籍军籍的林向阳。杨志斌是东部战区首位空军出身的司令员，此前担任东部战区副司令员，而空军是本轮清洗中波及最轻的军种。军演因此也释放了“内部清洗并没有动摇对台战争的决心和部署”的信号。

战术层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军队在此次军演中还使用了远程箱式火箭弹（PCH-191）而非传统的导弹，这一点被官媒大肆宣扬。央视声称远箱火通过模块化设计可以通过不同弹药同时兼顾火力覆盖和精确打击，同时部署更快速，成本低，射程基本足以覆盖台湾岛。这可能是在回应美国对台军售的海马斯火箭弹。同时，对先进军备的宣扬也有可能旨在通过强调解放军武器的优越来消除大陆群众对战争的担忧，使其认为高科技武器可以快速且兵不血刃地结束战争，自己的日常生活不会被影响。

除此以外，中共的海空军也很积极地参加了军演。海上方面，军演期间两岸出现多起极近距离对峙场景。中国海警船多艘进入台湾24海里邻接区，部分一度向线内推进至约21海里处。台方说明，一开始侦获4艘中国海警船航入北部、东部海域，台湾方面预置大型舰船应对，之后中国海警船增至14艘，台方同样派出14艘海巡舰艇，以“一对一”并航监控并强势驱离；其中桃园舰对特定海警船至少广播驱离7次，最近距离仅约0.8海里。中方利用海警“名义上非军事”的身份降低敏感度，万一发生冲突可辩称“没有动用军队，只是海警”。但中国海警可以视同解放军正规部队，因为海警同样隶属中央军委管辖，为一体两面。



中方声称只出动了中央军委控制的海警

空中方面，台国防部30日称，自29日上午6时至30日上午6时止，侦获中共军机高达130架，其中有90架次军机逾越台海中线。此次单日侦获共机舰数量，创下历史次高纪录，仅次于2024年的“联合利剑-B”演习单日合计侦获敌机

153 架次。台湾空军出动 F-16V 等主力战机升空，对进入防空识别区的解放军军机，实施全程监控与广播驱离。

美国对军演反应低调。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习近平没跟我提过这件事”、“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完全没有什么让我担心的”，并称中国海军“在那个区域已经军演 20 年”“过去的规模更大”。美国官方重申“关切台海和平稳定”“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的既定立场，但军事动作谨慎，未有升级反应。从更宏观的层面看，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没有把遏制中国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摆烂”了。

2. 切香肠战术

在地缘政治中，“切香肠战术”（salami tactic）指的是一种通过连续、细微且渐进的行动来实现重大战略目标的策略，得名与萨拉米香肠，一种直径较大的咸香肠，通常会被切成约 1mm 的薄片。该战术的关键在于每一步行动本身看似有限、低强度，往往处于法律、规则或政治反应的灰色地带，不足以单独触发强烈反制或冲突升级，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行动不断累积，逐步改变既定现状，使新局面被“既成事实化”。在这种情况下，对手往往因升级对抗成本过高或难以凝聚一致反应而选择克制，最终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原有优势，因此切香肠战术被视为一种以低风险、低对抗方式重塑地缘政治秩序的手段。通过逐步地、少量多次地升级局势来达到使对手麻痹或犹豫的目的。

前文所提过的 2022 年来的多次演习恰好可以被理解为这种切香肠战术的实践。就目前看来，这一战术是比较成功的。中国军队已经成功地将演习区域推进离台湾本岛越来越近，而台方目前并没能阻挠这一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台方一改过去“监控中”的低调回应。国防部长顾立雄先前在立院强调，“国军没有‘第一击’，只有自卫权的行使”，并说明只要共军攻击我在航机舰及军事设施、攻击台湾本岛或外离岛，或任何飞航实体未经许可进入我方 12 海里领空、领海，即可视威胁程度下令国军行使自卫反击权。然而，此次划定的演习区域中，在台湾南部的一块实际上已经进入了 12 海里线，离台湾最南端仅有 9 海里。这似乎也是有意的试探。

与台湾官方的回应相比，台湾民间情绪则是极其平淡，可以说是麻木。这无疑意味着切香肠战术在社会心理层面的成功。高频次的演习已经使得台湾群众习以为常。这次演习对台湾股市并未造成波动，甚至 AI 产业创下历史新高。群众的心态必然不利于台当局进行强力的反制，这样会被视作大题小作、升级事态。

在不久前的 2022 年，俄罗斯通过多次边境上的军演，骗过了乌克兰和全世界，发动了俄乌战争。明天的台湾很可能就会成为昨天的乌东。所谓军事是政治的延申，但军事并不是政治的简单反映，军事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必须认识到环台军演包含的不只是政治表态，更有实在的军事企图。不能再认为攻打台湾只是一句空洞的民族主义口号了，两岸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严肃地考虑战争的可能性。当然，本文作者并不是声称战争很快就要爆发。历史的运动是复杂的，我们可以辨别出种种趋势，但无法确切地说哪一个一定会起到主要的作用。

3. 两岸向何处去

首先，必须认识到围绕台湾的冲突、争夺，本质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围绕台湾问题的一切主流叙事，无论是支持统一的“自古以来”“统一祖国”还是支持独立的“保卫民主”“民族自决”都是各方资产阶级的辩护。对无产阶级而言，必须摆脱帝国主义死局给予的二选一。

台湾问题始于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预与瓜分。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作为殖民地，直至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才回到了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下。随后便是众所周知的国共内战与败退台湾。由于冷战的缘故，内战以国民党割据台湾告一段落。此后尽管两岸均保持继续作战的意愿，但中共缺乏海军力量，而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几次军事冒险也以失败告终。

随着大陆转向资本主义，台湾的统治集团不再面对对岸潜在的革命威胁，两岸出于自身利益开始靠拢。两岸的合作从一开始的经济协议逐渐推进成为了政治解冻。为了保持自身独立性和利益，双方仍然在一些关键分歧上保持对立拖延统一进程。但是，两岸政权都很清楚，统一为的不是民族情感，而是台湾岛还是大陆单独的资源 and 体量，都不如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政治实体能带来的利润大。这一时期是“和平统一”的黄金年代。

然而，随着台湾的民主化（这里不细究具体过程，可以参考组织别的文章），民进党崛起并且逐渐相对国民党取得了优势。人本能会去反对压迫者所执行的政策，因此从执政党国民党“统”的立场，台湾人民就开始对“独”产生了支持的趋势。民进党这么一个原先默默无闻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迅速崛起，蛊惑群众，并把问题都转移到了大陆政权身上。中共也意识到，民进党这样一个民粹主义式的团体不会给予它任何方便的机会，反而投向美帝国主义。和平统一的共识被摧毁，两岸关系因此从武统走到和统后，又重新回到武统。这个本质实际上是两岸统治阶级从敌对走向试图和解后，又重新陷入分裂。

我们必须跳出两岸统治阶级共同构建的“统一”与“独立”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支持任何一方的国家方案，都是将无产阶级绑上资产阶级战车。我们不能被两岸的民族主义叙事所蛊惑，无论是台湾独派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叙事，还是大陆的“大一统”和“自古以来”叙事。在资本主义已经耗尽所有进步性的当下，任何所谓民族自决和所谓民族复兴统一的诉求不仅无法反对帝国主义，更是会降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大陆的沙文主义者声称大陆是在“解放”台湾，却只字不提大陆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政权，它无法“解放”任何人。一些受自由派蛊惑的机会主义分子则声称台湾独立运动因为存在大量年轻人支持或者因为背负着反对两蒋独裁统治的政治正确，便具有其“进步性”，可以“批判性支持”。这更是完全放弃了阶级立场，和自由主义者沆瀣一气。

同时也必须反对所谓的“革命失败主义”。按照这个逻辑，大陆的共产主义者应该期盼大陆的军事失败，台湾的共产主义者则应该期盼台湾的军事失败。那么，两岸的共产主义者岂不对立起来了？我们不能幻想军事失败会自动带来革命转机。没有无产阶级的斗争，战争无论战胜战败都只会带来更深重的灾难。



若战争爆发大批量的无产阶级将被征入军队

因此，对于资产阶级提出的“统”和“独”的选择题，两岸共产主义者都应该给出的答案是：不要中共或蓝营的“统一”也不要绿营当权派的“独立”；不支持本国政权胜利，也不支持其他政权击败本国政权；唯一要的就是无产阶级击败资产阶级。

我们首先要求两岸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联合。大陆和台湾的运动必须基于统一的、革命的、有着发达联络网的共产党。两岸的社会条件对于革命来说各有优劣，而且相当程度上互补。大陆是全球工业产能最大的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无产阶级。台湾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相比大陆中共的高压监察体制有着共产主义者筹备革命的客观优势。台湾无产阶级有大量的工会、工联、产业联合会等组织，为党对工人的组织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如果两岸无产阶级能够行动一致，且由一个统一的革命共产党领导，两岸的社会主义运动皆可以摆脱各自的困境：大陆的工人运动因缺乏支援而星散，在中共监察系统的运作下革命组织建设屡屡受挫；台湾的工人运动因体量不足，无法造成对阶级社会的实质突破，只得如大部分欧美的工会运动在60年代受挫后的情况一般，退守至成效甚微且过程缓慢的经济斗争。

如先前论述的，我们比先前任何时候更需要考虑台海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与应对策略。这将是一次重大考验，是对革命者政治路线、组织纪律和群众动员能力的集中检验。我们需要在战争的高压环境下坚持自己的政治路线，不受任何形式的蛊惑，不被本国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我们更需要将战争变为革命的催化剂，充分把握战争带来的革命条件。“革命的条件不会自己创造革命，只有革命者的行动才能创造革命”。

两岸共产主义者团结起来，两岸人民团结起来，主要敌人在国内，打倒两岸帝国主义！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III

河北农村取暖问题—— 温差？“温差”！

作者：囚徒



在 25 年年底，26 年年初的时候，有关河北农村取暖的话题突然在网上引起人们的热议。其实河北的农村人在冬天挨冻的这件事最早是从 2017 年开始的。当时有个政策要求：河北省在京津接壤地区的保定、廊坊等 18 个县市区，除了燃电、集中供热和原料用煤企业之外，个人燃煤全部是被禁止的。到了 2019 年，河北省政府强行推广清洁煤，导致煤气中毒死亡率快速增加。2023 年，“为什么欧洲人能过冬，而河北农村却没有足够的天然气”的事件也被推上热搜。当然除了河北农村，山西、陕西、山东等地也都出现了农村供暖困难的现象，只不过河北农村的矛盾最为尖锐。

24 年河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22022 元。而河北农村天然气的价格稳定在 3.15~3.4 元每立方米。以 100 平的房子为例，原本只需 2000 ~ 3000 元过冬的能源费用，一下子涨到了 7000 甚至 10000。由于微薄的收入，农民不得不十分节俭，他们宁愿穿着厚厚的棉袄也不愿意去使用天然气。甚至有的农民跑到山上去砍柴火来烧着取暖。这是多么令人心痛啊！当城市的集中供暖早就成为了习焉

不察的公共设施时，农民群众却要被迫为取暖而发愁。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燃烧柴火比燃烧煤对环境的危害更严重。基层政府放着对环境危害更大的燃烧柴火不管，却要严查各家各户燃煤的情况，甚至于开展很多一刀切的政策：比如封灶、用无人机监控煤炉、甚至彻底封禁居民煤炭购入渠道。所谓“保护环境”的借口还能站得住脚吗？这分明是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指标而对农民的蓄意谋杀！

这时应该有人会问：我记得河北的地理位置比东三省还要靠南，为什么东北没有大面积的取暖问题，而河北等地有呢？原因在于河北施行了更加严格的环保政策，甚至河北北部的1000多家重工业企业也早在2017年被要求关停20%，而东北的环保政策相对没有那么急进。加上东北有专门的户到户供暖公司，在外面零下几十度的条件下，室内还能保持20~30度。河北农村的室外温度虽没有东北低，但是由于农村本身的基础设施（如交通）匮乏、房屋保暖效果不好（比如很多的自建房没有采取保暖材料和保暖设计，无法保证充分的热循环）等因素最终导致取暖效果很差。网上的一位博主做出测评：一套新的暖气片在一个不到20平米的卧室里开上一个晚上8个小时，最终室内温度只升高了两度。室温没什么变化的同时，急需供暖的人们却需要承担每天整整34元的天然气取暖费。

这些现实条件的制约说明，河北农村的取暖问题不仅仅是短期政策调整的“阵痛”，更是中共长期压榨农村带来的结构性苦难。首先是农民的贫穷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一点在我们的[《中国农村问题》](#)中有所涉及；然后是农村的建设本身难以利用集中供暖降低平均成本，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农村在许多方面的基础设施匮乏；最后是官僚主义的问题，政府完全不考虑民生问题的一刀切是这场灾难的直接诱因。农村的衰败景象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互为补充；中国数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就是以牺牲底层人民，包括农民和工人为代价。如今的寒冷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这类结构性问题将不会有真正解决的日子。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件事情为什么能在网上热议？按照中共的底层逻辑来说，不应该是先把提出问题的人给解决了么？怎么事情还越闹越大？这岂不是严重影响到中共的维稳统治了么？这是因为地方财政困难使得这个政策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推行下去。河北的北部山区政府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农民从省外购买取暖煤。基层的执法力度降低了，农民发视频在网上抱怨，也逐渐没有多少人去勒令删除了。地方政府也知道，底层人民需要一个排泄口去排泄他们心中的愤恨。如果一味地压制他们的不满情绪，只会让反弹更加激烈。加上很多博主出于同情老百姓或者追求流量的目的，跑到当地去直观地拍摄农村的景象，采访当地的农民，吸引人们的关注，在网上引发更大的热议。

前几年，为了解决燃煤污染问题，政府给出了三种替代方法：天然气、电热器、清洁煤。每一种替代方式，都需要政府落实省、市、县的三级财政补贴。前几年每立方米的天然气补贴一元，现在已经逐渐降低至0.8元，甚至于0.2元。这些剩余的补贴钱到哪儿去了呢？显然这也是由于地方财政收入严重困难所导致的。有的地方甚至连监督人们不许燃煤的基层人员的工资都发不起了。即便已经开不出给基层人员的工资，政府却依然要求基层人员用无人机查看各家各户是否燃天然气。作为不掌握生产资料而被国家雇佣的工作者，基层人员也算作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如果基层人员被逼到绝境，他们也会联合无产阶级，去反抗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就比

如这次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取暖问题。即使有着上级官僚的强制命令，基层人员在看到农民们不得不辛辛苦苦上山砍柴的时候，并没有过多谴责，而是保留了最朴素的同情。很多博主在探访的时候，他们也给出了很多真实的回答。这就是人民群众团结的一种表现。不过，这是相对消极的团结，而不是积极的团结。而是要把这种团结从消极进到积极，是要靠我们革命先锋队去完成的。是要靠我们深入群众，让群众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无可奈何的，而是由我们共同的敌人——统治阶级造成的。

同样，由燃煤引起的环境问题也是不容小觑的。2025年12月下旬，咆哮而来的北风将河北上方的污染空气吹向了河南等地。刚遭受过旱灾水灾的河南农民不仅要面临粮食问题，还要面临环境污染问题，即使河南的重工企业远少于河北。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减排指标，河南很多地方都设置了专门的“风向标”。这不是政治意义上的风向标，而是实际意义上的风向标。地方政府会派专门的人去观察监督组有没有到达工厂，如果监督组即将到达工厂，那么工厂就立刻停止一段时间的生产，待监督组走后再生产。本来当地农民的地里收成就不好，还不能稳定地打工，相较于环境，他们更急迫地需要的是生活资料。政府对这类影响照例是不闻不问的，为了所谓的减排行动，反倒继续去设立什么“大气办”“防尘办”。眼下比这些更加重要的，是应该有一个关乎百姓今年明年吃饭问题的救灾办。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据此就认为环保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环境问题显然也是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问题的之一，而只是由于中共官僚的一刀切政策，才使得解决一个问题的措施连带着妨碍到了其它方面。这恰恰显示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想要协调地解决好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就像一个跛足巨人，已经摇摇晃晃，行将跌掉。

当底层无产阶级身上的剥削枷锁愈发沉重，当他们的生存底线被彻底突破，由他们所吹响的反抗号角便会真正响彻于每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人们。而正是这每一次对自由的呐喊，对团结的渴望，这股反抗的力量，终将敲碎压迫的牢笼，实现无产阶级的翻身，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IV

张又侠被清洗：大难临头， 出路何在？

作者：齐项德



2026年1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主管军事工作的副主席张又侠被清洗，此前海外自由派和反共反华分子的媒体就此事已经宣传了超过一周，这是海外听床师少数猜对中共黑箱的一次事件。显然，张又侠落马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反腐”事件，而是当前中国国家机器内部矛盾持续积累、集中爆发的一个节点。过去几年，无论是秦刚事件，还是围绕何立峰、苗华的风波，中共一贯的做法都是：等待海外舆论热度衰减、内部完成政治定性后，再低调释放消息。而张又侠事件却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前后脚”节奏——海外舆论尚未退潮，官方就迅速定性。这种反常本身就说明中共内部的矛盾烈度已经高于其维稳宣传系统所能消化的水平，甚至远高于各方此前的预期。围绕这一事件，中共的官方媒体更是几乎毫不掩饰其政治指向、不断强调所谓张又侠“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几乎是把“张又侠被抓是因为反对习近平”、“张又侠搞军阀主义妄图政变中共中央”等结论拍在全国人民面前。

权威发布 / 正文

张又侠、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

来源：国防部网 责任编辑：刘上靖 2026-01-24 15:00:00

连同张又侠一起被调查的还有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

我们可以肯定，解放军同中共的矛盾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中国与亚洲的未来现在已经走进了更不可预测的未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肯定，一个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世界中的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中国人民若是不革命也绝不会摆脱被这样命运捕捉的恶果。目前，张又侠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模糊的未来亚洲国际政治走向可能性，也就是所谓战争阴霾暂时消解与战争继续逼近的两种情况——它们并不互斥，而更可能是未来同一危机的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清洗本身已经对解放军内部情绪和士气造成了实质性冲击。尽管表面维稳成功、秩序“平息”，但在中基层党员、政府工作人员和军官中普遍存在人人自危、大规模私下讨论的情况。这是高压政治环境下的必然反应。张又侠事件表明中共各类中基层党政人士基于自身能力和智识的专业判断与政治安全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抹除，“破坏主席负责制”的罪名能够堂而皇之地扣在张又侠头上也就能扣在所有人头上。未来，任何专业的军事、政治专业意见都可能被扣上政治罪行的帽子。



暗流涌动的中共领导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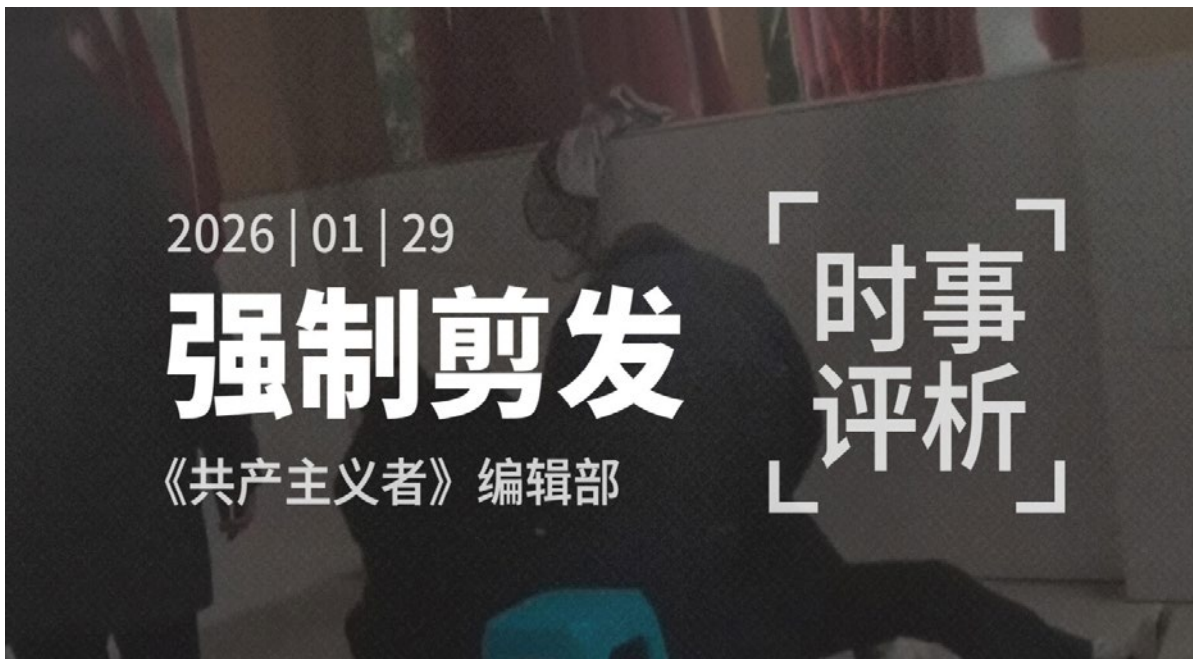
第二，在这种恐惧制造出的“稳定”基础上也确实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加

深动员和战争准备的更高可能性，尤其是围绕装备系统、军工体系以及长期积累的总装备部问题。此前的解放军大规模贪污事件已经揭露他们的内部腐败，而有俄乌战争的案例在前，习近平深知一个贪污的军队不可能完成“统一台湾”的政治目标。清洗张又侠在事实上可以为潜在的高强度军事冒险，尤其是台海战争，进行一次政治再集中化的准备。

无论我们接受哪一种解释，结论都是一致的：张又侠被清洗，并没有、也不可能带来任何进步解放意义。相反，它进一步撕裂了解放军内部本就脆弱的政治平衡，打碎了中共官僚所谓“解放军高度团结”的神话。中共和解放军的信息黑箱本就建立在长期的宣传与信息封闭之上。现实中的解放军早已具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典型问题：官僚化、晋升投机、资源争夺、各种国有集团的军工利益、政治忠诚与专业能力之间的冲突。张又侠事件证明了一句老谚语：当你在屋里看到一只蟑螂时，整座屋子都已经是蟑螂了。随着清洗推进，军队内部指战员与中共政工干部之间的政治不信任只会进一步扩大。张又侠问题的真正意义预示着中国暴力机器未来的高度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既有可能逼中共中央下定决心继续清晰、在台湾孤注一掷，也有可能从内部危机中进一步撕裂中国政府、为革命制造机会。任何真正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不应继续自我麻痹，而必须开始为一个更加动荡、更加危险的未来做好准备，翘首以盼社会主义和群众革命的到来。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重庆垫江一中：强制剪发与支配权



2026年1月7日，重庆垫江一中发生了一起教师强制学生剪发的事件，事件过程被未知拍摄者记录下来并上传至网络，引发社会关注。视频显示，一名男生因发型问题被多名老师控制，过程中被按倒在地，还有老师试图骑在他身上强行修剪，该男生反抗激烈，周围有多名学生围观并发出惊叹声。1月8日晚，垫江一中发布情况通报，确认涉事人员为学校德育处教师，在处理学生烫发染发问题上采取强制行为，工作方式简单、行为不当，学校已经对该老师进行严厉批评教育，责令其向学生和家长当面道歉并取得谅解。

涉事学生事后表示，老师认为他的头发不符合“寸头”标准，要求当场剪掉，他想回家却遭到拒绝，双方发生推拉，之后涉事老师和学校都已经向他道歉，他也回到学校正常上课，头发仍然保持原样。

类似的学校组织强制学生服从一些令人难以信服的规训的事件屡见不鲜，我们不妨就从社会一般认识作为出发点——即学校、教育机构主要充当着教育职能，其目的是要对人进行教育，从而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在这个游戏里，“成绩”是判断人最终是否很好地被“教育”洗礼过的指标。然而，世界上暂且还不存在一份权威性的学术论文能够证明，发型、头发的长度和学生的考试成绩有直接的关系，既然不存在关

系，而学校又高举着成绩这一旗帜，两者的逻辑是不自洽的。如果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像“剪头发”一类的和成绩没有关系的规定是可以凭空存在的吗，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这是不合理的。



校方被指用拳脚强迫学生剪发

因此，我们必须拨开形式上的层层迷雾。将讨论集中在学校是否应当设立这样的规定、学生是否应当服从这样的规定是没有意义的，而关键在于——正如革命者审视历史上的所有运动那样，我们判断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性质，基于的是这样的事情是否有利于工人阶级革命，同样，在上文所述的类似的事件里，既然此类规定在根本上就和这个国家的教育机构所宣扬的“成绩”脱离，那么也即表明它在事实上应当是发挥着另一种作用、承担着另一种职能的。我们需要回答，这到底是什么作用、承担了什么职能，它为什么不在大街上发生（没有人会无聊到在街上关注别人的头发然后还要求剪掉）而只在学校发生，教师们在第一时间的强制权力又是怎么被赋予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学校不仅是教育的地方，更是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但是教育机器宣称它们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即拥有自由个性、丰富精神和独立意志的主体。然而，发型作为个体审美和个人最直接的表达，与知识的获取、逻辑的构建或道德的提升并无任何因果关联，但是教育机器却在形式上不断强调类似“剪发”这种消磨个人表达的规训，甚至为此动用暴力手段时，教育的内容在展现其事实上存在的知识性以外，又增加了其平日里不为人所留意的一面——那就是服从性。它要求学生在参与到教育活动之前，必须先削去自己异于集体的个人表达，并对教育机器的运作逻辑表示服从，但是这又与其最初的目的又背道而驰了。于是学生在受教育之前，我们就已经观察到了教育上的内容和目的的割裂，这种割裂向我们展示了：在现行的体制下，学校等教育机器，其作为国家机器运作的组成部分，它的首要任务首先是进行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即对未来即将成为工人的学生群体进行服从性测试，利用教育机器的运作逻辑来让学生逐步削去个人表达，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社会运作逻辑；其次，才是知识性的传播，而这就是此类规定的所发

挥的作用，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解答了。由此，连带着第二个问题也很快可以得到解答，既然这些规定的的作用是初步对即将迈入社会生产的学生进行资本主义社会运作逻辑的规训，那么也就表明这些规定所承担的职能，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其功能是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中共所主导的特定的阶级社会结构中，统治阶级需要的并非是每一个工人主体的全面发展，而是需要大量的、统一的、如齿轮般精确的、沉默而又易于管理的标准工人，它在形式上表现为“强制剪发”，内容上则是作为剥夺学生主体表达的其中一种手段。而相似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下，资产阶级就尤为喜欢沉默的、整齐划一的、不会反抗的工人群体，因此，再生产机器的运作逻辑也必须服从于资产阶级的这一需求，学生便不会被视为“有血有肉”的个体，其个人权力必须让位于教育机器的运作逻辑，这种强制的规训，实际上是社会生产里异化劳动的预演——它强迫学生在进入社会出卖劳动力之前，先学会接受这种一无所有而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处境。

同时，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观察，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甚至尚未出卖劳动力，因此他们在经济上是依附的，在政治上是无权的。如果我们暂时搁置对“剪头发”这一行为本身的内容批判，转而审视学生在中共所主导的阶级社会中的位置，不难发现，中国的学生并非作为一个拥有集体权力的存在，而是被国家机器切割为一个个原子化的孤立个体，他们所面对的，是国家暴力机器和专制家庭结合而成的同盟，这种所谓的“家校联合”，构成了当代学生最深层的困境。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工人或许还可以通过罢工或者工会等形式，基于共同的地位进行阶级联合，但学生们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在尚未拥有对社会运作的大致判断的年纪就已经被家庭送进去了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既没有政治权力，也没有经济独立性。且现行的教育机器以排位、分班、竞争等机制，在学生之间人为制造对立，进一步加剧个体孤立。在强制剪发这一暴力行为面前，学生无法援引法律（通常为校规所架空），也无法援引经济力量进行博弈，面对掌握着“未来入场券”的国家机器，即统治阶级意志的执行机器，单个学生处于一种赤裸的、被剥夺了政治掩体的状态。



在教育机器和家庭权威下的学生

学生来源于他的家庭，当学生面对教育机器的直接改造的时候，学生的家庭成员又是如何反应的呢？在私有制主导的阶级社会中，家庭承担着一项核心的职能：劳动力的再生产。父母不仅仅是在养育子女，更是为私有制秩序社会生产工人，为了使子女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交换价值，家庭别无选择，必须将子女送入由国家垄断或监管的教育机器。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强制：无论家庭主观上是否愿意，为了家庭经济单位的延续，他们必须向学校让渡对子女的管理权。因此，当垫江一中以“校规”之名行使暴力剪发等类似的事件发生时，家庭往往在第一时间保持沉默或者配合，其作为国家机器的依附单位，必须在大程度上对国家机器的运作逻辑表示服从，否则他们的子女将会被淘汰。其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现代家庭个体内部依然保留着某种隐性的奴隶制残余，在经济上，学生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资料都完全以来家长，这种绝对的经济依附关系，在家庭内部转化为政治上的专制权力，家长作为家庭这一微型政治实体的主导者，掌握着支配子女身体、事件乃至意志的权力。在传统父权制惯性下，学生在家里并非一个拥有独立人权的平等主体，而往往被视为家长的所有物。这种家庭内部的垂直压迫，使得学生在遭受教育机器的政治暴力之前，就已经习惯了在权威面前丧失主体性。最后，由于家庭单位必须依附国家机器才能生存，家庭权威便自然向学校权威臣服，因此在很多时候家庭展现出学校意志代理人的色彩（比如家校合作、家长群），在面对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时（不论合理与否），家长会用“必须听老师话”、“遵守学校规则”为理由，将外部强制力带到家庭内部纪律中。至此，一个封闭的内环形成了：学校利用国家机器震慑家庭，家庭本身对学生进行专制规训，同时家庭又作为学校的意志执行者，在家庭领域监督学生对学校服从，在这个结构中，学生无法形成统一的集体，在学校是编号，在家庭是附属品，处于孤立的环境中。我们历年来可以观察到大量的惨烈的例子：学生们在争取个人意志的回归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家校联合的否定，他们的斗争只能是消极的、被动的，最终甚至使他们有些走上了极端的道路——也就是终结自己的生命进程。

垫江一中的事情绝非是孤立的例子，在以前，在以后，只要以私有制为秩序的阶级社会存在，只要家庭和学生不能从私有制逻辑的社会中解放出来，那么像垫江一中这样的例子将会不绝于耳——它并非私有制阶级压迫的直接体现，而是私有制阶级社会对“人”的异化的预演，它利用了在学生在此制度下孤立无援的“前社会化”状态，通过对身体的暴力规训，将服从意识根植在他们心中。这种暴力证明了，在统治阶级眼中，学生并非真是什么国家的、社会的未来，而是待规范的工人后备队伍，这种将个体异化成工具的逻辑，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社会异化的起点——在他们成为无产者将自己的劳动力售卖出去之前，先学会出卖对自己的支配权。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芬布尔之冬：论格陵兰民族权利

作者：过涯



引言

北极圈内的极寒之地，遥远北方的冻土格陵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岛屿，坐落于极寒的北极圈边缘，位于北美洲东北，介乎北冰洋与大西洋之间，因纽特人的聚集地之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过0.027人左右。虽然它地理位置上归属为北美大陆，却早在15世纪开始与挪威有着紧密的联系。18世纪之后随着丹麦与挪威结为联合王国，挪威传教士汉斯·埃格德前往格陵兰建立起努克殖民据点后，这种联系更为紧密。1953年后，格陵兰不再是一片殖民地；1979年后，格陵兰成为自治领土，有着高自治权，只保留丹麦国籍、货币与国家外交管辖权利。与无权发声的殖民地略有不同，今天的格陵兰有更加独立的体系与自治权，尽管这并不能改变它仍然是丹麦王国的海外领土这一事实。在全球资本积累进入新阶段、能源与战略竞争攀升的今天，这片冰原上的地缘与资源价值正被各方强权重新划分与争夺。

狼子野心

一个归属为北美大陆，但与欧洲联系密切的土地无疑具有高度地缘政治意义。自二

战美国在格陵兰进行军事占领以防护北大西洋防线开始，格陵兰就已经被纳入了美国的安全防线结构之中，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对于格陵兰的渴求建立在历史之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想要拿下格陵兰——尽可能进行“购买”。然而这种“购买”在现代外交语境下显得荒诞无比，但在帝国主义的权力逻辑中，当‘和平’的交易无法达成时，暴力与掠夺往往就隐藏在阴影之下。

在日渐紧张的国际政治局势之下，作为连接北美、欧洲与北极海域的关键节点，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对美国来说是一块可以监控俄罗斯、制衡中国的风水宝地。即使美国已经在格陵兰部署了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但一个可以更加容易控制的战略领土仍然能让美国获得更加优渥的地缘政治环境。表面上，这是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三方对于领土主权与国家安全的商讨与纠纷，但在帝国主义统治逻辑的逻辑中，这不过就是一场围绕资源、资本与地缘政治的再分配尝试。本质上看这就像是领土纷争，然而它其实是资本主义帝国无视群众，自然而然地把领土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并对资源和战略要地进行重新争夺的掠夺。

在帝国主义的高峰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末阶段，是垄断资本通过对外扩张来攫取利润、市场和资源阶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动机。”在这种逻辑下，弱小民族的土地和战略位置并不是出于对“安全”或“伙伴关系”的关怀，而是作为资本和军事力量的延伸，被视为可供分割和再分配的“棋子”（弗·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可以说，美国对于格陵兰的争夺本质上就是与丹麦王国争夺一块殖民地，虽然这块殖民地与传统殖民地的在定义上略有不同，但它依旧作为一种筹码被强行放在了战略地理位置上的谈判桌。



格陵兰当地的抗议活动：“格陵兰不是可卖品！”

人民的土地

格陵兰在谈判桌上被三方反复拉扯，每一个方对这一土地都有着强烈的需求，然而这片土地上的人，帝国不会考虑。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逻辑，格陵兰本土上的因纽特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与这片土地共生，这种文化远非资本主义眼中的领土概念，而是一种属于人民自己的领土。如上文所说，格陵兰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一步步在为自己争夺权利，让这片土地不再是一个可以被统治阶级随意挪用的工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即使多数格陵兰人希望能从丹麦中独立出去，当然也不愿又一次成为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地。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民理所当然要有权利对自己的土地有全面的掌控，任何统治阶级对于一片土地的争夺，都是在掠夺那片土地的人民。在格陵兰的问题上，因纽特人民的自决权是根本性的。

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必须明确：格陵兰的未来应由其人民自主决定，而不是成为大国博弈下的任何“筹码”。美国窥视格陵兰其本身就已经忽视了本土因纽特人的主体地位，这毫无疑问是对民族自决权的践踏，也是对于社会主义解放的背离。但在此我们也必须强调，民族自决并不逼迫一个民族必须进行独立，其核心在于权利本身。但一旦这个民族决定独立，那么他们便应该有不隶属于任何统治阶级的权利。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中国地方经济政策——房地产寄生

作者：邹晓衍



囚徒困境

中共热衷于对外宣传自己的发达城市的歌舞升平、高楼林立，夜晚的霓虹缤纷美丽而又醉人无比，仿佛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工人已经过上了中共曾经承诺过的日子：工人掌握了政权，掌握了生产资料，迈进了社会主义时代，人人平等、安居乐业。然而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作为建设起那一栋栋高楼的工人建设者，他们却被自己的劳动“拒之门外”，繁荣和财富不属于中国工人，但劳动上的剥削、人格上的异化、政治上的压迫却归他们所有，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21世纪压在中国工人头上的“三座大山”。

“三座大山”从何而来？生产过剩的问题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1844 经济哲学手稿》的剧本再次上演：商品趋于丰富，工人趋于贫困，工人创造的劳动价值越多，他越贫穷。生产和占有在本质上的不统一使得社会的阶级关系开始愈发紧张起来——这是中共资产阶级波拿巴所不愿意看到的，它必须尽它所能处理过剩产能，从而最大程度缓解愈加紧张的阶级矛盾。它主要有两种手段去应对：第一，它可以选择对外输出，利用其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政治或经济手段，将国内的过剩

产能输出到国外市场，这种方法的可行性，高度依赖中国出口商品的廉价程度，因此劳动产品必须低附加值，在生产上就必须压榨工人，压缩工资以及提高工时，同时，中国的廉价劳动商品也会对其他地方的市场进行挤兑，引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争；第二，它可以选择对内消化，利用国家机器干涉市场价值规律，有意识地把资源向中东部地区引导配置（乡村振兴），寄望后发地区新兴产业的用料缺口能够承担一部分对过剩劳动的消化，同时，如前所述，工人工资被压缩，对过剩产能的消费力下降，企业为了商品能够卖出去，必须互相打价格战（外卖商战）、鼓吹消费噱头（节日促销），从而利润率下降，迫使企业对可变资本进行压缩，也就是加大对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同时进行裁员——这就又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中共给出了它的方案：它有意识地把资源配置到了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和国家叙事高度相关：与外部帝国主义作竞争、民族复兴等，例如新能源、半导体、载人航天。中共在此类尖端产业上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投资和竞争，其目的有二：一是抢占先机，争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前建立起生产标准和生产体系，并通过输出标准和体系攫取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财富；其二，开发新的产业和建设过程能够提供工人就业，有助激活新的经济引擎，解决目前工人就业的问题。但是，对于新兴产业的集中投入必然使得对旧有产业的相对权重降低，非战略性资本转而依靠央行放债维持生息，这又回到了前一段所阐述的企业困境。

本文无意讨论中共的方案在纯粹的“蓝图理念”上或者现实发展中是否具有可行性以及有效性。重要的是，如今中共力图寻找新的经济引擎，那么也表明在过去也曾存在着新兴过的经济引擎，旧的引擎是什么？它目前出了什么问题？导致中共不得不另觅新欢，以及导致社会的生产陷入绝望的困境：贫富悬殊日趋严重，工人时刻面对失业的威胁，不得不将自己彻底异化成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以供人挑选，他们不比社会上的任何群体懒惰，他们甚至能忍受残酷的996劳动模式，却不能拥有相配得起这种劳动强度的劳动成果；社会化大生产将个体以原子化形式分离，一切生产成为了商品交换的延伸：教育、医疗、住房、结婚，面对庞大的成本，个体望而却步，转而画地为牢，陷入迷茫境地，游离在资本创造出来的消费幻想中麻痹着自己；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存量竞争使得工人阶级互相展开生存权争夺战，以宏观视角看，资本主义笼罩的世界将一国矛盾也同时扩大到国际矛盾，各地工人在其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下纷纷将仇恨投射到彼此，而不是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旧的引擎到底是什么？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产业，与其说是产业，不如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掠夺，它集中体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以及为了追求利润而毫无下限的疯狂手段——即支撑了中国20多年来发展的、以土地资源为导向的房地产业。在经济上，中共默许了其对中国一代工人的活劳动的盗取；在政治上向工人表明自己在内容上已经背叛了工人、背叛了共产主义，并成为了资本的守夜人。本文将会在历史起源、运作机制上切入，详细剖析房地产如何结合中共的政策兴起，并初步蚕食工人的财富，最后绑架了整个国家，骑劫在社会发展之上的全过程。

一拍即合

1994年以前，中共的财政政策实行“财政包干制”（类似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商讨出一个固定的上缴税额，地方政府可以保留剩余以做地方发展。这种制度在80年代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的经济起到鼓励作用，不过却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地方政府有了钱不愿意上缴，选择“藏富于企”，擅自减免税收，导致国家整体税收能力下降；第二，由于地方有钱不上缴，导致中央财政连年下跌。这导致了：中央极度缺钱，但地方政府却富得流油，甚至中央还得跟地方政府借钱发工资，所谓的宏观调控能力几乎丧失，不利于中共的稳定统治。

因此，中共设计出了一套叫做“分税制改革”的财政转换策略，意图把经济主权垄断在中央政府手里，通过重新划分税收制度和征收机构，将国家财权集中在中央：首先，征税开始脱离行政隶属关系，而是直接划分税种，比如中央税（关税、消费税、央企所得税）、地方税（营业房产、早期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此税种和经济发展主力直接相关，改革规定中央拿75%，地方留25%）；同时，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在征税时做手脚，征收机构也重新进行了划分：国税局负责征收中央税和共享税、地税局负责征收地方税（这一体制运行了24年，直到2018年才再次合并）。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推动者之一：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经过改革，中国的经济形式出现了这样的转变：财权向上集中，但是事权却下落到地方，换言之，中央政府抽走了大量收入，却承担相对于整个国家运行的少量支出（主要有国防外交等）；地方政府留下少量收入，但是地方运行要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来解决（教育、医疗、治安、基建等）。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直接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抬到峰值。同时，旧版《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又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手段极其有限，此时地方政府被迫寻求出路解决自身财政问题。尽管增值税大头已经被中央抽走，但是彼时土地资源没有被纳入共享税中，而且所有权归地方。由此，地方政府偷摸着发现了一条可观的赚钱路数：那就是通过出让土地

来弥补财政缺口，以及完成经济指标和基建增长的任务。问题在于，土地是可以卖，但是谁来买？怎么样才能决定土地能赚钱？

一个微妙的巧合是，在分税制改革不久后的1998年，另一个改革也得到了实行——那就是中共对于住房制度也进行了改革。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的商品出口遭遇重创，彼时中共通过出卖中国工人给资本主义世界而获取利润的路子受到冲击，过往轻工业消费品出口开始趋于饱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任何时候都关心的问题此时也变成了中共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消费——必须要有整个社会程度需求的大宗商品消费，才能拉动为其配套的全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从而重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首当其冲的，中共选择了住房。另一方面，我们尚且可以猜测中共“人性未泯”吗？在逐步把经济主导权让渡给价值规律的十几年中依旧保持着“福利分房”（即单位建房，免费或低租金分给职工），不过后来的事实反应，中共只是没有狡猾到能够在背叛的第一日就敏锐地嗅到土地的商机——一直1998年它终于意识到了，当年7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通知》（即著名的23号文），明确表示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是划时代的一步，住房从基本需求变成了商品，这种变化的后果是什么？

既是商品，那就要服从商品交换的逻辑，就要服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从前工人生存的基本需求，现在变成了商品，它反过来要求工人必须付出劳动获得货币，才能获取生存的必要资源——工人的劳动成果，现在反过来凌驾在工人之上，我们看到了“异化”。住房商品化的制度设计非常理想，几近新加坡模式：期望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最低收入家庭租住廉租房。而且，中共还十分“贴心”，担忧工人买不起房，还特意出台了配套政策，允许商业银行发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按揭），给工人们买房大开门路。地方政府的收入依靠出让土地来获取资本积累，住房建设需要土地，因此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承建商首先一拍即合，建立了深层次的交易关系：地方财政垄断土地，将土地卖给商品房开发商赚取高额利润，开发商嗅到住房商品化的商机纷纷投资买地进行基建，再售卖给工人。但是事情是没有那么简单的，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隐秘的角色——这位角色导致了这个经济模式必然走向暴败，那就是银行。事实上，开发商本身也没有那么多钱，那么第一笔购入政府土地的钱从哪里来呢？他们通过民间借贷和非标融资凑齐土地出让金，在得到土地后进行“四证抵押”，立刻把土地抵押给银行，并申请开发贷款，用低息贷款置换掉之前的高息过桥资金，完成平滑的、高风险的杠杠交易。

整个过程，工人阶级的利益被首先排除在外，从中共的财政转向、地方的财政策略、到开发商的市场投机，每一个环节中共以及其所掌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虚伪面貌都展露无疑，所有的政策明面上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中共也是如此宣扬——但事实上每一步棋的动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致命症结：亚洲金融风暴给中资的出口施压，一直到中共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博弈、地方的投机取巧，都表明了中共在逐步背离社会主义之后，在明面上即使要维护它所剩无几的“红色门面”，在事实上也促使它把工人阶级作为维护自己专制统治的工具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燃料，将工人阶级出卖给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在国内也将工人的利益排除在政策制定之外：事实上情况阐述自此，中央的地方经济政策、地方政府的经济策略、金融机构的参与三方人马结合，形成的是将工人阶级排除在外的“三角闭环

商业模式”，而这个模式也就是我们想知道的——第一个迅猛的经济引擎，房地产。

成也萧何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为其配套的整个上下流产业的发展，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金融、基建、装修、电器家具、以及每一项产业的延伸的服务行业等），解决了中共在 20 世纪末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出口困局，也就是成功通过调整经济政策，拉动了内部消费，从而重塑了经济引擎。商品房的开发也推动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国的城市面貌也在短短的 20 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城市化率从 1998 年的 30% 左右飙升到现在的 65% 以上，政府也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基建（高铁，地铁，CBD 等）。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有其繁荣时期是不奇怪的，表面上看房地产经济在 20 年来带给中国的是经济繁荣，但其实际的运作和内部结构是否健康呢？答案是否定的。

“新加坡模式”本质上是一个不现实的概念，这是因为在事实上中共已经是资产阶级波拿巴，其干部也已经是发展出自身特殊利益的官僚，在整个引擎中所承担的作用不是替工人阶级谋福利，而是无下限操作土地攫取经济利益。诚然，在政策开展初期尚且还有部分力量被投入到建设经济的适用房和廉租房，但是这不仅要求地方政府承担额外成本，甚至还得倒贴去建设，全无私利可攫，既然卖地就能躺着舒舒服服赚钱，那么脱离了工人阶级的官僚群体怎么可能自愿承担经济和社会风险去建设经济适用房？这导致的结果是：经济适用房逐渐被抛弃或搁置建设，甚至变成了官僚权贵的特权，其房产或者建设资金被中饱私囊。于是，出让土地获取出让金就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核心理财路数，甚至是唯一路数。踏入 21 世纪，轰轰烈烈的卖地活动开始了，地方政府通过操弄国家机器和垄断土地资源，建立了一个豢养其官僚干部、维护官僚在体制内生存地位、替官僚攫取市场利益的商业游戏，在表面上，它大手一摊表示土地已经售卖了，游戏的下一个环节和它们毫无关系，它现在是市场之上的“监管者”和“调停者”。

我们来看看土地是怎么进入市场的：开发商非常聪明，尽管许多开发商在初期也并非是什么资本大鳄，甚至有许多都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付土地出让金，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给了它们另辟蹊径的机会，它们可以通过民间借贷和非标融资获取第一笔资金，先交付土地出让金获取土地，然后就是金融手段绑架工人的开始：在拿到土地后，开发商并不着急做建设，而是先把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取开发贷款，用开发贷款平掉上一个环节的高息民间借贷的帐，完成资金过渡，这时银行也被动地加入了游戏。紧接着，资产阶级在市场上又开始展现出其毫无下限的一面：它不建设住房或者只是建设一部分，然后先进行预售，哄骗工人借房贷，提前透支工人未来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的活劳动，在这一个环节上，工人阶级也被绑架了进来，资产阶级利用“住房”在事实上的生存要素，间接强迫工人阶级为它的住房投机建设分摊风险，工人为了自己的一砖半瓦，只能忍受残酷的劳动剥削，并自愿献出自己的活劳动和生命；其次，预售让开发商提前一步就拿到了部分回报，这样它就又可以在地方政府的土地竞标中竞争获取土地，继续以上的一系列步骤从而赚取天文数字般的利润，发展成庞大的房地产帝国企业，如果失败，它尚且还可以马上圈钱

跑路，给工人留下一堆无人管理的烂尾楼。河南郑州是烂尾楼问题的重灾区，例如名门翠园、永威金桥西棠等“神盘”，都是因为开发商的投机操作导致的恶果：它们擅长把A项目的预售款，挪去购买B项目的土地，但是B项目的变现不稳定，如果变现失败，那么A项目所要完成所需的资金就会断裂，最后导致两个项目都烂尾，业主不仅需要自行承担这个后果，一边租房一边还房贷，还要维权，甚至还有云南昆明的“别样幸福城”的例子：项目烂尾多年复工无望，为了生存，大量业主只能被迫住进没有门窗、没有水电、没有电梯的毛坯房里，在套间里搭帐篷，每天爬十几层楼背水，在小区里开荒种菜，场面极其讽刺荒唐。



烂尾房问题拖垮了期望获得自己一砖半瓦的工人阶级

银行是其三角色，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房地产狂飙期，银行可以说是风险最低、收益最稳的赢家，尽管目前银行存在“坏账”的问题。首先，银行对于抵押品有优先受偿权，不管是借钱给开发商还是工人，都有土地和房子做抵押，如果开发商倒闭，在清算资产的时候，银行排在最前面拿钱；如果工人断供，银行也可以收回房子进行拍卖；另外，中国的银行制度是“无限责任制”，相比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部分州）的“非追索权”，工人还不上房贷，只需要把钥匙给银行就债务两清了。但是在中国，工人是要承受所有风险：例如工人欠银行200万，房子法拍150万，那么工人依然还欠银行50万，银行有权冻结工资卡、把工人列入失信名单被执行人，追债到天涯海角，风险被完全转移到工人阶级，银行这个金融机构几乎立于不败之地；其三，预售资金监管几乎中空，理论上，工人买房的钱（预售资金）应该在银行的监管账户里，按施工进度发给开发商，但实际的操作是：银行为了拉拢开发商，往往配合开发商挪用这笔资金去进行AB项目的杠杆投资，然而当烂尾发生时，银行已经把贷款放出去吃利息了，房子烂尾就和银行无关，银行无需为工人负责，这样工人阶级最后就要吃掉所有的后果。

沆瀣一气

在以上的所有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凌驾于工人劳动之上的、傲慢的、贪婪无度的敛财机器，资产阶级波拿巴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选择了刺激内部消费和垄断国家财权，促使地方政府为了应对中央政策而屡出奇招，结合土地政策盘出来房地产的赚钱路数，整个过程以市场和消费为主体，以工人阶级作为经济“引擎”的燃料。不过，如果读者有心发现，我们在上述的讨论中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心态——那就是我们假设了“政府 - 银行 - 开发商”的三角关系（以下简称三角关系）是干净的，也就是三者独立、不存在利益输送、互动完全依照市场交易逻辑的理想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就这么跟工人说，那么就算是对政治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工人，都会觉得我们是吃错了药，因为在事实上，三者勾结的恶劣程度远超工人的想象——地方政府官僚和市场上的投机商人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交易，包括纯粹利益的、人情的，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凌驾于政府自行拟定的规则之上。

物质交换是其中一种，例如地方政府需要建设城市（体育馆、展馆、大规模公用基础设施等），但是这些项目通常不怎么能为资本增值，也不利于资本积累，没有开发商愿意干，于是政府就和他们谈条件——由开发商来承包这些不赚钱的项目，政府就承诺把周围的土地便宜地卖给开发商盖住宅，通过售卖住宅来弥补修体育馆的亏损，这也是为什么在房地产发展的中后期，大多数新区都展现出不约而同的“综合体”，基本上一套住宅和周围基础设施高度绑定。

第二种就是定向出让，政府可以举行名义上的公开拍卖土地，但为了引进特定的开发商（例如万达、华润等大国企或知名港资），政府会设定特定条件。例如在拍卖条款里写明：竞拍者必须拥有“建设五星级酒店的经验”或“引入世界 500 强企业的总部”，事实上这就是“先射箭再画靶”，具体条件本身就是为具体的开发商量身定做的，而且价格通常也会比市场价稍便宜，作为对开发商引入产业的补偿。

第三种就是调整“容积率”，容积率是土地价值的核心。容积率指的是，一块地如果一万平米能盖两万平米的房子，容积率就是 2，如果能盖 3 万平米，那就是 3。开发商如果觉得自己买亏了土地，他们就会竭尽全力最大化土地使用价值，使用各种公关手段游说政府修改规则，提高容积率，例如盖了 20 层楼之后，开发商觉得钱赚的不如预期多，那就会媾和政府修改市场规则，盖到 30 层，这样多出来的 10 层就是平白无故的利润。然而，这种“违建”又因为地方政府对政绩和土地售卖的需求得到默许，于是这就成了权利寻租的高发地带。

这种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媾和屡见不鲜，例如“秦岭违建别墅案”，陕西秦岭北麓被视为所谓的“龙脉”，中共明令禁止开发房地产，但是开发商却打着“文化旅游”、“养老项目”的旗号圈地，实际上是在当地修建顶级的私家庄园和别墅，而陕西省、西安市多级官员（例如时任陕西省省委书记赵永正）对中共的指令阳奉阴违，甚至充当当地开发商的保护伞，接受开发商贿赂，通过修改规则许可让违建合法化，结果就是 1194 栋的违建别墅被拆除，大量官僚被逮捕，这就是最典型的权力变现，地方官僚利用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类似的还有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与“千亿矿产”，虽然此案主要是矿产，但也涉及大量土地交易，白恩培的妻子张慧清充当“中间人”，开发商通过张慧清向白恩培行贿，结果白恩培下达指令到国土局，将几十

亿价值的土地和矿产资源，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特定商人（如刘汉），这种时候，贪污就不是直接给钱，而是所谓的“雅贿”和“白手套”，而是开发商帮官员的亲属“代持股份”，或者高价“收购”官员手里的一幅字画等。

敲骨吸髓

这个商业游戏的闭环，在事实上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人的基本生存对土地的需求、不平衡的国家财权事权以及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市场结合孕育出来的房地产业在20年间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共时常吹嘘自己的政绩如何了得，如何把经济发展的如此之快如此之好，但事实上，一砖一瓦全部都是工人阶级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劳动打造出来的，那么中共能否扪心自问，工人创造出来的这个繁荣的经济，究竟属不属于工人？

很遗憾，工人20多年来，横跨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劳动，全都不属于工人阶级，而是骑劫在工人头上的房地产——背后和国家机器媾和起来的资产阶级，甚至是中共本身。整个商业游戏，本质上不是工人打造属于自己的社会财富，而是为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中共的专制统治献出所有心血。

第一层，我们可以看到最原始的，对建造工人的具体剥削。首先是层层外包的防火墙，开发商通常不直接雇佣工人，而是外包给“总包”，“总包”给“分包”，“分包”给包工头，这样子的层层外包把劳资关系中的责任关系不断稀释，最后就是工人失去所有的工作权益，如果欠薪、发生事故，开发商可以大手一摊和工人表示这项工作已经被他们外包出去了，他们不需要为工人的劳动负责，工人此时只能吃哑巴亏，自行承担所有的劳动风险，在法律上也极度难以维权；其次是垫资施工和欠薪问题，开发商有时候为了空手套白狼，往往要求建筑公司先“垫资”干活，后才结账，结果就是压力层层传导，最后就是拖欠工人的薪资，因此我们不乏见到在过去时常发生着工人在年底讨薪无果绝望跳楼的悲剧，本质上就是开发商把资金压力转嫁给了没有抗风险能力的底层工人；最后就是安全成本也被压缩，为了赶工期或者是紧迫的高周转，施工要求一低再低，甚至无视安全风险，牺牲安全措施，工人必须在高风险的环境下工作（例如高空坠落），甚至患上难以治愈的慢性病（例如尘肺）。

第二层，城市当中的工人阶级也在“金融”上被剥削。这是最隐秘、更长久的剥削，它通过债务实现。为了凑齐商品房的首付，一个年轻工人或需要掏空父母、配偶父母和自己配偶以及自己的所有积蓄，这是对一代甚至两代工人财富的一次性收割，同时，首付给完事情还没完，余下的金额以债务形式和工人高度绑定，房贷利息按照计算无异于本金，这意味着工人从买房的开始就将未来的活劳动透支，提前支付给了银行和开发商，此时工人已经变成了劳动的奴隶，他必须劳动才能生存，劳动从工人作为人的集中体现变成了凌驾工人的生存要求，工人被异化得彻彻底底，这种债务把工人的未来完全锁定，让工人终日生活在惶惶之中，不敢失业、不敢生病、不敢反抗，房贷是最好的“工贼”，他让工人阶级变得顺从，以便资产阶级对工人予取予求。同时，工人也变成了公共服务的买单者，大部分房地产的收益都被政府收入囊中，其大多数被用于建设光鲜亮丽的新区、广场，这种建设不仅一方面继续推高房价，也在事实上将底层的工人远远甩在身后，完全不能跟上物价飙升的工人

阶级不仅承受高房价，还需要承受由不断推高的地价而造成的高物价，这也是为什么工人在后期会越来越有“物价一直在飙但自己的工资却一直不涨”的感觉。



堆满材料的建筑工地

以房地产基建为驱动、以低工人权益为基础的增长模式终究只能带来一时的繁荣，它在新冠疫情之后暴露了其最脆弱的两点——它破坏了社会生产中最基础的两样要素：人的再生产和消费。房地产产业把工人当作廉价劳动力，也就是经济引擎的燃料，但是工人首先是活着的人，生物性上需要休息、繁衍和养育的。然而在现实中，政府为了去库存，在政策指向上有意识地把户口、优质教育资源、医疗甚至婚姻和房地产高度挂钩，此时房子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居住场所了，而是变成了工人参与到各种社会生产的“入场券”，为了这张券，有些工人家庭甚至需要透支祖孙三代的财富，结合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婚姻关系变成了商品交易的延伸，此时房子有否就成了交易中必须被考虑到的筹码，这直接宣告了大量底层工人与不少的社会再生产从此无缘，高额的婚姻和养育成本使工人望而却步，纷纷停止生育活动，从而使出生率连年下跌，对中共珍视的“人口红利”造成冲击。此外，由于阶层跃迁的通道逐渐变窄，工人唯一的路径被挤压到了“考学”上，家长为了教育购买学区房、报辅导班耗尽积蓄，此时教育的启蒙意义也要为商品交换的逻辑让步，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房地产金融游戏”和“焦虑税”，青年工人的动力会因为高企的房价而被消磨殆尽，纷纷选择“躺平”，以被动形式抗议剥削。

经济不仅生产商品，还要求商品得到消费，对工人的极致榨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当中描述的资本主义经典危机：那就是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在10年内飙升，房贷每个月准时吃掉工人家庭的大部分收入，一些看上去光鲜亮丽的城市中产实际上现金流动几乎枯竭，工人不敢下馆子、旅游、消费购物，消费行为随着生产的扩大而越发保守，于是，承载着扩大内需目标的房地产居然在20年后回到了它的起点，反过来抑制内需了，工人的钱大部分被房地产挂钩

的上下游产业一并抽走，并承受着高物价，这迫使工人保守消费，但与此同时产能却在不断扩大，逼迫中共必须以帝国主义姿态打开别国市场进行廉价商品倾销，并引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在国内，内需不足迫使企业打价格战，引发通缩的同时，企业为了保障利润率，只能不断压榨工人工资，提高工时甚至有规模地裁员，这样就又导致工人愈发不敢消费或者是消费能力不足，形成严重恶性循环。旧引擎的暴利属性，又对实体经济进行挤兑，贪婪的资本发现炒房屯地就能一年赚翻倍，就不会累死累活地做利润率只有5%的实业，企业由于这种畸形的激励机制下更愿意把钱拿去理财、买房而不是去做长期研发。与此同时，社会的某个隐蔽的层面也悄悄地买了单，那就是信用体系的破产，房地产的各种暴雷让工人发现原来只有自己是需要遵守规则的，而银行、政府、开发商则可以为所欲为修改规则，这种剥削机器对工人的专制统治一步一步摧毁工人对社会的信任，当劳动没有办法帮助工人改善生活，当基本的居住权都成为了奢侈品，社会心态将要愈发极端，阶级的矛盾将要愈发不可调和。

我们分析了中共是如何通过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来获得有利于它统治的经济引擎，工人又是如何在没日没夜的雇佣劳动中无偿奉献了自己的活劳动予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现如今这个“引擎”已经将要走到它的末路——消费的萎缩促使流动性枯竭，带来的是以房地产为枢纽的、牵动整个社会生产的连锁债务，将要随时随刻地跟从银行里面堆积起来的坏账——点爆，工人将要首当其冲地面对风暴——失业、贫穷、饥饿、彷徨，马克思主义赋予了属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工人们必须团结起来，打碎这个在自私和傲慢中孕育出来的、毫无下限的敛财机器！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VIII

在暴力革命的战线上：共产党人 如何夺取政权？

作者：许惟枝



目录

- (一) 左派恐怖主义与占领工厂
- (二) 游击战争的神话与现实
- (三) “地下红军”的糅杂式路线
- (四) 共产党人如何夺取政权？
- (五) 结语：该从何处开始

（一）左派恐怖主义与占领工厂

共产主义运动中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自 1789 年 7 月 14 日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开始，暴力革命就正式成为了带有无产阶级性质之革命和其推动现代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恩格斯分析说在法国“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且普遍存在着工人或无产阶级武装，无论是攻占巴士底狱的、手持燧发枪和冷兵器的武装市民到 1848 年的起义工人与 1871 年保卫巴黎公社的国民自卫军（弗·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 年版序言）。暴力之于革命不是历史中一次次的偶然，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必需品、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之统治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手段、是革命政府保卫新兴政权的基本保障、是“只有靠暴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的证明与实践（弗·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直白地讲，革命需要纸、笔、印刷机和总罢工，革命也需要步枪、弹药与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

但正如所有共产主义革命中的路线问题一样，在暴力革命这一明确的路线中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新见解、新方法、支流与岔路总是不断地涌现出来：赤卫队、红军、民兵、城市游击队等规模不一、结构不一的武装力量开始出现与发展，可见“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弗·列宁《游击战争》）。而当代共产主义者需要从各种例子之中认识到的不是我们该复制哪类斗争类型，而是我们到底要以在当今领导起怎样的暴力革命为目标？为此，本文将回答一系列基本且万分迫切的问题——我们该彻底罢黜哪些过时的、机械的与错误的路线？我们又该如何为暴力革命进行计划与准备？

左派恐怖主义的坏死与复活

左派恐怖主义是一条所有共产党人都无法忽视的岔路。在左派运动发展迅速的 19 世纪与 20 世纪，各国的民粹派、俄国民意党、俄国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一部分将自己归纳为共产主义者的左派恐怖主义行动家都将自己的资源与生命投入到了刺杀、绑架和各类阴谋中。1895 年，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彼得·拉夫罗夫曾提出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适当纲领”需要能“组织反专制制度的政治阴谋——连同这种阴谋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彼得·拉夫罗夫《论纲领问题》）。列宁在 1897 年着重批判了这句话中的政治错误，即将“政治斗争”等同于所谓“阴谋”，因为“阴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阴谋，这一方面是万分缩小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就是选择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弗·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类将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寄希望于政变等阴谋的错误思想也在历史中被反复证明了：俄国民意党的左派恐怖主义小组们被军警、宪兵队与沙俄在 1880 年成立的保卫部“奥赫兰卡”（охранка）摧毁了、社会革命党专职恐怖主义行动的“战斗部”也在国家机器面前被消灭了。

使得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政权的关键力量——红军的主要创立者列夫·托洛茨基如此评价道：“[恐怖主义]纯粹是了无新意的机械反应——在中国就如同在法国一样——行动外观十分骇人（如谋杀或是爆炸等等）但是对社会制度的运作却毫无损

害”（列夫·托洛茨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由此可见，无论服务于左派组织还是其他政治派别，恐怖主义在本质上同时代表了各类恐怖袭击手段和对这些手段的迷信。左派恐怖主义者们归根结底都错误地依赖于一个设想，即几个小组、支队、纵队依靠几把小口径步枪和几捆炸药就能瓦解统治阶级在某个地区的存在甚至夺取政权。

不过我们只能说奉行着左派恐怖主义的小组或政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摧毁或消灭了，但左派恐怖主义本身虽然已经严重坏死却从来没有彻底消失，因为在20世纪至21世纪各类恐怖主义小组和思想仍在以城市游击队和所谓“地下红军”等不同的形态涌现。这样的主义与主张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中后期和当今的社会复活不是因为其本身存在任何的正确性，而是其表述中对各时代左派们所具有的吸引力，即一种以小规模军事行动换得革命普遍胜利的捷径和通过武装袭击来发泄革命热情的渠道。前者让恐怖主义者们不再需要去思考革命党建设、理论革新和工人运动等至关重要但困难重重的事务；至于后者则与列宁做的分析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有这种可能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情绪和革命毅力”（弗·列宁《怎么办？》）。

占领工厂的失败

在20世纪早期的左派运动中，与左派恐怖主义同为暴力斗争的一大组成部分的便是占领工厂运动。相对于左派恐怖主义基于小组和“战斗部”的刺杀与恐吓，占领工厂运动展现出了绝对的进步性，即工人阶级间的组织性与在政治范畴中更广的革命性。

广泛的占领工厂与对其的保卫斗争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的欧洲。意大利的“红色两年”（Biennio Rosso）就是其中的典型。从1919年到1920年，意大利北部爆发了数次工人主导的、带有政治性的大罢工，在“1919年夏天，意大利爆发了三天大罢工，以支持革命的俄国。1920年春天，都灵钢铁工人为了迫使雇主承认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发动了一场艰苦但却并未成功的罢工”且“战斗在8月达到巅峰。米兰的机械工人面对封锁，占领了工厂。在四天内，罢工运动波及全国钢铁行业，有四十万工人参与了运动”（克里斯·哈曼《世界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从数据上来分析，与1913年的810次罢工相比，1919年的罢工飙升至了1663次；从性质上来分析，这样的罢工行动并不完全由传统的工会主导，如执行改良主义与经济主义路线的意大利劳工联合会（CGL），而是由工厂委员会代替发动和指挥的（威廉·佩尔兹《对抗资本主义：欧洲左派在前进》）。工厂委员会的存在决定了占领工厂不是一场和平的示威或罢工，而是由委员会领导下大量武装工人发起的暴力斗争。占领了工厂的工人在车间进行着武器的生产和对自己的武装化，例如米兰的工人们就完成了对“所有金属行业工人工作的工厂、码头、钢铁厂、锻造厂、铸造厂”的占领、“武装或者还未武装起来的数十万工人，在工厂里工作、睡觉、放哨，认为自己正生活在‘革命行动’不平凡的日子里”，这使得时任意大利首相的乔瓦尼·乔利蒂感叹如果军队和工人发生对抗将会成为“一场内战”（保罗斯普里亚诺《占领工厂：意大利在1920年》）。

统治阶级对“一场内战”的恐惧切实地传达了一个信号：广泛武装起来的、以工厂为阵地的工人阶级在1920年代获得了与大战后孱弱的国家机器所对抗的实力和资本。

葛兰西在红色两年期间就反复地强调工厂委员会的重要性，其在1919年9月对都灵的工人写道：“车间代表们！你们的所有行为（即便是那些似乎较琐细的行为），只要与工人群众对你们的委托指示相关，就统统具有巨大意义”（安东尼奥·葛兰西《“新秩序”致“菲亚特”汽车厂工人车间代表的信》）。同时，葛兰西还指出工厂委员会并不是工会斗争的延续，而是支持革命的工人占领政权的组织形态：

“有一种观念认为委员会是工会斗争的简单工具，它具体体现在官僚主义的纪律中和工会拥有直接监督委员会的权力中，假如这样，那么委员会就不再是扩大革命斗争的机关，不再是自发地导致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导致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的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现实发展的形式”（安东尼奥·葛兰西《工会和委员会》）。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贯穿了整个红色两年的占领工厂运动，即建设起新的、武装化的工人组织来巩固和保卫斗争的成果，当人们回望这场运动时，多半会看到一张黑白照片：手持步枪的赤卫队员将镰刀锤子的标志放到了相机前，背后是他们占领与管理的工厂。



红色两年中的赤卫队员

武装化与被组织起来的工人还出现在了鲁尔区、柏林、巴塞罗那、马德里和西欧各国。以法国为例，其1936年的大罢工也掀起了一场占领工厂的热潮。这一热潮打破了当时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控制以及所谓行业罢工和经济性运动的桎梏，法国工人的运动“突破了工会、行业与地区的界限，表达了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愿望与意志。这个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它从一家工厂烧向另一家，从一个行业烧向另一个，从一处地方烧向另一处。工人阶级的所有阶层似乎都接到了集合的命令，并发出了响应的信号”（列夫·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

但令人惋惜的是，所有占领工厂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层面上走向了失败。在意大利

利，资产阶级的联合和所谓“同盟歇业”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战斗状态，“工业家利用意大利工人队伍中缺乏协调和革命团结这一点，企图给予都灵无产阶级以毁灭性打击，并在工人当中破坏为争取工人监督而斗争的生产组织（工厂委员会和车间代表组织）的威信和影响”（安东尼奥·葛兰西《为了社会党的新生》）。除此之外，意大利社会党和各产业的工会领袖以会议表决的形式终结了占领工厂和革命苗头的继续燃烧，对于工人们来说，“他们一直在为革命而战斗，可是最终得到的却只是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暂时有些许改善而已”（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在法国，一个冰冷的社会现实终结了大罢工的热烈——“觉醒了的群众仍然缺少一个革命的参谋部。统治阶级却有一个真正的参谋部”（列夫·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占领工厂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失败证明了两点：第一，当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党在工作场所中长期失位的情况下，即便工人的暴力斗争已经走向了联合和组织化，其也无法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和其大量合作者做旷日持久的战斗。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运动的暴力革命不能是固态的、节点化的静坐战，而是积极、连贯且主动地夺取政权。第二，即使1919年、1936年的占领工厂运动发生了失利，大量的实际案例也证明了其在暴力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占领工厂明确地证明了其对国家机器的挑战作用和对工人阶级的组织作用，而面向共产主义者的问题正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组织起工作场所中的暴力斗争（见“共产党人如何夺取政权？”）。

（二）游击战争的神话与现实

消逝的胜利窗口

游击战争是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多少带着些许情节的斗争形式。从中国革命的雪山和草地到拉美的雨林和丘陵，一批批革命者都以游击战争的形式达成了一次次胜利和军事奇迹。切·格瓦拉是如此总结游击战的精髓的：“游击战是一种人民战争，是一种群众斗争。要想在没有居民的支持下实现这种形式的战争，那就预示着不可避免地遭到惨败……它得到活动地区以至整个地域内的工农群众的支持。没有这些前提就不能进行游击战”（切·格瓦拉《游击战：一种手段》）。

但值得明确的是，游击战争不会也从来不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最终形式：中国共产党在最终夺取政权的进攻阶段将革命武装完成了常规化转向，如从1948年到1949年平均动员起几十万军队的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至于游击战是否还适用于当下的中国与世界这一问题，列宁就曾做出如下判断：“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分析游击战争在当下的可能性（弗·列宁《游击战争》）。

游击队与当下的国家机器

一个社会现实是，当下各国国家机器的暴力组织正在发生着显著的膨胀。这样的膨胀不是纯粹规模上的，如职业军队入伍人数的增加，而是投入、技术和社会维稳方面的全方面增长。还是以中国为例，2025年3月的数据显示官方层面的军费支出已经达到了一万七千八百亿人民币，较去年增长了7.2%。2025年9月3号举行

的“九三阅兵”就直接展现了中国统治阶级对军队的大幅投入，在抛开核武器的情况下，整齐划一的军队方阵、新式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信息作战设备和喷气式战斗机根本不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一支武装能够抗衡的。然而更为致命的是中共对城乡各区域的监视和维稳将严重地切断游击战的生命力，这也代表了一支游击武装将无法藏匿于城市或者乡村中以进行长期的发展和壮大。这一股会被当代国家机器所切断的生命力是游击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如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和长征能够依靠各地军阀的矛盾和冲突来留存受到重创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古巴的726运动能够以12人为开端夺取政权就是依靠着其能够在山林中扎根。正如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所写：“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然而这样的条件，也就是一片不受统治阶级监管的、自由的土地在当今受中共政权统一领导的中国是不存在的（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游击战曾适用于 100 年前的中国

可见，无论是在绝对实力的对比上还是发展的潜力上，目前的中国社会无法支持游击战争的立足与壮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场以零星抵抗为模式发起的游击战将连切·格瓦拉叙述的第一阶段都难以达成，即“游击队还比较势单力薄，因此只应该致力于站稳脚根，熟悉环境，同居民取得联系，巩固可能会变成他们根据地的地方”（切·格瓦拉《游击战：一种手段》）。甚至我们可以从更简单的角度来论述问题，即以中共对枪支弹药的管制标准，当下的左派组织连拉起大约30人的武装都相当困难。

当然1970年代也存在数支所谓的红色游击武装，而这些组织的存在则在实践的层面上向我们证明了游击战为什么注定在21世纪的当下破产。第一支武装是从1971年活动到1998年的德国红军旅，又称红军派或者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其利用步枪、冲锋枪和大量的炸弹以占领建筑、绑架和刺杀资本家或政要，据统计其一共杀死了34人，让数百人受伤，而其许多成员都被逮捕入狱并收到了资产阶

级专政暴力组织的逼供和审问；第二支是在1971年到2001年保持活动的日本赤军，其最著名的行动包括1970年代的数次民航劫持与在以色列卢德国际机场对平民的扫射；第三支是从1970年到1988年进行活动的意大利红色旅，其在1978年绑架并杀死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此外各政府高管、资本家和意大利共产党内反对其行动的举报者都是红色旅绑架的目标。在其设想中，绑架和与军警的枪战能够“通过典型军事行动来预演‘展开的内战’，为的是运动按照红色旅的计划发展时，它能够接过运动的领导权”，不过“这完全是空想的，也和现实运动越来越远”（普里莫·莫罗尼，南尼·巴雷斯特里尼《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明确的是，这三支所谓的红色游击武装所提出的政治纲领都是在概念上相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比如红军旅强调要反对帝国主义、赤军强调要打倒日本的皇权和资产阶级专政、红色旅说自己要对抗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但其执行的具体行动却是彻底地导向了上述所批判的左派恐怖主义。由此可见，70年代的社会不存在能够给予游击战或者红色游击武装的生存土壤，而2025年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与维稳的力度只会比1970年代更加严密。

（三）“地下红军”的糅杂式路线

“地下红军”是什么

在剖析过各类暴力斗争的岔路、失败和带有时代局限性的胜利后，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理论和路线中的错误与问题是否仍存在于当下的革命理论中。其中带有绝对典型性质的便是所谓的“地下红军”与“地上暴力”的联合路线（后文简称：“地下红军”路线）。“地下红军”是当代互联网上部分左派组织对暴力革命的新理解。其本质上是以“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后文简称：马列毛大群）为首大量发布的八股文类的革命理论，也就是说在其构建的话语体系下所有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和革命的困难都能够诉诸于“地下红军”及其周边理论。“地下红军”似乎成为了从缺乏起义条件到革命胜利的直通车和一针用来缓解悲观思想的、成分模糊不清的“良”药。

“地下红军”及其相关理论究竟是什么？也许这是一个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虽然其以八股文的形式出现在了马列毛大群和《布站》的几乎所有文章的末尾，但是由于各文章的写手总是会对其做适量增减，以至于“地下红军”总是以一副糅杂了各类路线的样态示人，好像一切暴力革命的形式都要来上一些，但同时还要把那些明显的错误给剔除或打上补丁。由此，我们不妨从其发布的《自发性运动频发又平息，无产阶级革命终要靠政治报路线》、《中修鼓噪“武统”，无产阶级当何为？》和《社保补贴、舆论讨薪、持刀伤人——三则新闻看中修治下无产阶级的无权惨状》这三篇文章中进行系统地观点提炼与分析。

首先，在马列毛大群的构想下，“地下红军”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要求地下革命家组织和地上群众组织的同时存在以“形成一种地上反哺地下，地下领导地上的良性循环”，也就是一根从地下革命家组织开始、到通过“工业化融工”建立的地上群众组织、再到“地下红军”或得到壮大了的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链条。

其次，在这样的构想下，马列毛大群总结出了两套暴力革命的模式，分别适用于地

上组织和“地下红军”：对地上组织来说，其斗争的形式是“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保卫地上组织的经济利益”与“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对“地下红军”来说，其斗争形式则更加复杂与多元化，如“即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的地下审判”、建立“秘密的无产阶级的专政”、“锄奸、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营造人人都知道地下红军的的存在但不知道具体信息的无产阶级威慑氛围”、“到中袖专政力量末梢，歼灭敌人[、]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注：顿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且因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会频繁地使用内网的屏蔽词，后文引用的所有“中袖”将改为“中修”以方便读者理解）、“打击黑社会与地痞流氓”、“为群众伸张正义”。

最后，当被问及如此路线该如何夺取政权时，马列毛大群的回答是现在还是“战略防御阶段”，而其理论与所谓“翻边战术”能让“革命的力量不断壮大，中袖的力量不断缩减，直到在全局都形成敌弱我强的态势，那时战略反攻时刻就会到来”。

在详细列举了“地下红军”的构想细节后，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其对各种路线的糅杂。“地上群众组织”的“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有占领工厂运动的影子；“到中袖专政力量末梢”建立根据地有游击战的影子；“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地下审判”和“为群众伸张正义”则又有左派恐怖主义的影子。这直接展示了“地下红军”的构想是如何将与现实条件冲突的、甚至互相矛盾的各路线糅杂起来的，这绝非统一战略下各战术的有机结合。这种既要又要的思想贯穿了“地下红军”路线：该路线既要占领工厂搞“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又要将其塑造成“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既要搞“地下审判”。又要“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既要在地下打击中共，又要“打击黑社会与地痞流氓”。

可见，这种既要又要的思想之下，即便我们在主观上忽略掉其提出者马列毛大群是一个与警察保持着令人生疑的联系的、毫无行动力的、松散不成形的“全国网络大群聊”，“地下红军”路线在多方面走向失败与覆灭也是无法被规避的定局。

多方面的失败

“地下红军”的失败将由数个成因推动，如忽略现实社会的客观条件、依赖着左派恐怖主义、对核心概念的描述模糊不清且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着极其机械的推论。就让我们对各问题进行详尽的分析以更深刻地理解“地下红军”这一混乱的糅杂式路线。

第一，“地下红军”路线基于的条件是否存在于现实社会。这一路线要求革命者“到中修专政力量末梢，歼灭敌人[、]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因此“中修专政力量末梢”的存在就成为了支持后续一系列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正如上文对游击战争之现实的分析，一处中共国家机器无法有效控制的“末梢”是不存在的，毕竟中共在2024年7月就存有的517.6万个基层组织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且“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也并未在当下的中国发生（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类对必要条件的忽视也同样适用于先前提到的枪支管制问题，也就是所谓“地下红军”要从哪里筹集武器弹药？当然，该路线的拥护者会自信地说中共的基层组织和暴力机关会被“地下红军”在某个地区内

完成清扫或者中国在未来的某年会因中共党内的分裂、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对外战争走向无政府状态，因此“专政力量末梢”就可以被建立起来、枪支弹药就可以得到补充。

关于前者，革命者人为地建立起“末梢”或靠扫清中共基层暴力机关以获得武器是个十分经典的死循环，因为如果“地下红军”已经强大到能够在特定地区内战胜中共的暴力组织，那这股武装本身就必定需要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和足量的枪支弹药，而非需要靠地区性的决战来创造出一个以供根据地发展的“末梢”。换句话说，允许革命者去“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前置条件绝不能是“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本身。至于后者，即中共政权下可能的分裂或战争，“地下红军”八股文式的总结中则从来没有提及能够建立起“末梢”的形势是什么，革命者该如何去促进这种条件的产生，又该如何为特定形势做好准备。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似乎将“地下红军”与社会现实隔离了起来，只管叙述“地下红军”的人员从哪来到哪去，却连这种地下暴力斗争本身基于什么条件与要素都不做解释与拓展。



左派恐怖主义的典型：德国红军旅

第二，“地下红军”路线仍依赖于左派恐怖主义的底层逻辑，即使马列毛大群反复的否认这一点。的确，“地下红军”已经将占领工厂和巩固根据地等理论糅杂了进来，但其写手们还是提出了“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地下审判”、建立“无产阶级威慑氛围”等左派恐怖主义式的行动和为“为群众伸张正义”这一当代侠盗罗宾汉式的目标。可见，无论是“地下红军”所期望的“战略反攻”，还是恐吓、绑架、袭击、威慑和审判都绝对符合上文分析过的德国红军旅、日本赤军或意大利红色旅“通过典型军事行动来预演‘展开的内战’”的行动模式，而这三支历史上所谓的革命组织是直接投向了左派恐怖主义的范畴，即“行动外观十分骇人（如谋杀或是爆炸等等）但是对社会制度的运作却毫无损害”（普里莫·莫罗尼，南尼·巴雷斯特里尼《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 1968—1977》；列夫·托洛茨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地下红军”路线的说客肯定会再次宣布

这一左派恐怖主义的通病不会作用在自己版本的恐吓、审判与威慑，因为其行动将是“在全国一盘棋理论的指导下”的，即自己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恐吓、审判与威慑。此外，马列毛大群也曾多次批判过个人恐怖主义的局限性包括日本赤军的行为，如“带有恐怖色彩的个人反抗在强大的中修组织面前再也掀不起丁点水花，自发盲动的个人冲塔路线彻底宣告破产”、“日本赤军的例子不过是历史上俄国恐怖派的翻版，是想利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来刺激‘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不过是遵循着小资产阶级自发性走路径最短的机会主义路线”（佚名《个人恐怖主义在自觉的资产阶级面前走向破产》；佚名《从赤军恐怖行动，再看革命中的机会主义》）。

似乎写下这些批判后，马列毛大群就能彻底地跟个人恐怖主义、零散地组织起来的左派恐怖主义划清界限甚至站到这些失败者的对立面。不过这些暴力革命的空想家们彻底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左派恐怖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没能扩散到全国的无产阶级中去，而是无法扩散到全国的无产阶级中去。同理，“地下红军”中的恐怖主义因素不会被一个地下革命家团体组织起来，因为其本身就是松散的、小组化的、狂热的且最终会走向失控与私刑的。因此，个人恐怖主义、零散地组织起来的左派恐怖主义的对立面不是任何组织化的、工业化的恐怖主义或占领工厂与恐怖主义的结合，而是与恐怖主义彻底相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进程。

第三，“地下红军”路线的核心概念普遍存在描述模糊不清的问题。让我们重新审视上文引用的两个说辞：“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和“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的地下审判”。首先，关于地上暴力的问题我们已经详细地在对占领工厂运动的分析中展开叙述了，但何为“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无论是意大利的红色两年还是西欧各国在1920到1930年代的公开暴力抗争，从控制车间、建立工厂委员会到将工人武装起来，没有一项是所谓“与政治不相干的”，例如红色两年中意大利北方的数十万金属产业工人普遍“认为自己正生活在‘革命行动’不平凡的日子里”、1936年法国工人对工厂的占领更“不是行业罢工……这是被压迫者为了同压迫者斗争，而公开进行集结。这是革命的经典开局”（保罗·斯普里亚诺《占领工厂：意大利在1920年》；列夫·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这样浓重的政治性质不是单单由意大利工人在工厂竖起了镰刀锤子与麦穗的标志决定的一任何工人有组织的、公开的武装抗争都必然是与政治强相关的。“地下红军”路线下的空想家们又开始做某些不切实际的美梦了，他们期待只要不将暴力挂上共产主义运动的标签就能算是“与政治不相干的”，他们期待统治阶级带有这某种善意或天真，能把工人的暴力抗争看成是非政治性的、无需调动军警前来镇压的。

这一点我们能通过其构想中地上与地下暴力的分工中了解到，马列毛大群的写手如是说到：“地上组员的暴力战斗值班只是保护地上组织的存在，不直接对抗中修以及警察，对抗中修和警察是用地下暴力机构进行的”（佚名《我用眼睛测量你的货车超重》）。没错，千真万确，所谓“地上组织”需不需要对付警察和国家暴力机关绝对不可能由统治阶级决定的，而是由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编辑们和空想家们在互联网上操纵的，只要后者在Telegram群聊、《布站》或是《燎原月刊》中发出一声喝止，中共就不会调集公安与武警对所谓非政治性的暴力抗争下手。对社会现实有着基本认识的科学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清楚的明白，一场工人阶级的武力抗争是否带有政治性不是由其是否挥舞红旗决定的。同理，中共是否选择镇压哪怕

是非暴力的群众运动也绝非基于任何美好的设想。如 2022 年 11 月 22 日晚间在富士康郑州园区爆发的抗议，因维权和反对“动态清零”政策而组织起来的工人们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当时工人以棍棒、杂物和灭火器作为主要武器来进行的“地上暴力”抗争早已超出了行业罢工的范畴、展现了与政治的强关联性。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群众的暴力抗争之敏感度是由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相对应的阶级斗争的高涨决定的，列宁曾在 1905 年的莫斯科起义后转述了一段马克思的判断：“革命向前进展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迫使敌人采取愈来愈极端的防御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掌握愈来愈强有力的进攻手段”（弗·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各国、当下还是 1920 年，只要有一名工人拿起武器、保卫起自己的劳动果实，就是带有政治性的，更何况是一群被组织起来的、夺取生产资料的工人。因此，期待统治阶级忽略地上的、“与政治不相干的”的暴力抗争就是无可辩驳的、纯粹的空想。

当然，如果我们将视线从与工人阶级相关的暴力斗争上离开，“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的确在客观层面上是存在的，包括但不限于抢劫无产阶级、大规模枪击犯罪和无目的的滥杀。这些行为在拉美地区的贫民窟中非常常见，如在 1970 年代在巴西建立的红色司令部（Comando Vermelho），该组织在其反对的巴西第五共和国于 1985 年下台后就丢掉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左翼意识形态，将自己的地上暴力彻底地变为了“与政治不相干的”毒品犯罪和帮派火并，可见这才是“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的实际归宿。

其次，在非政治性的地上暴力之外，马列毛大群还提出了“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的地下审判”。仅凭这一段来讲，所谓的“不暴露暴力性质”可以说是算的上清晰，不过结合整个“地下红军”路线来看其又变的模糊无比。如在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大群的编辑提到“一切对反动派审判和处决，都在地下进行，例如处决蒲城事件的校长的任务，要保证除了地下值得信任的处决执行者和极少数参与者外无人知晓”（佚名《吴川三中开学第一课：暴力斗争的地上地下划分》）。若是上述两段文字都符合马列毛大群对所谓“地下审判”的理解，即在其话语体系下两处引文的内容是不存在冲突的，那将存在两种目前不符合物质世界规则的情况：也许审判中的“处决”是使用了暴力但能够奇迹般地“不暴露暴力性质”的，也可能“地下红军”们能够神迹式地用非暴力的方法使人致死。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似乎都不存在于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中。

马列毛大群也对这一质疑做出过相当无力的澄清，说所谓处决“实际上是制造各种意外事故，比如说什么兄弟义气啊，骗过中修，使中修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佚名《笑看共革阵的机会主义大毒草》）。我们先忽略所谓“兄弟义气啊”这种也许是梦游时打出来的形容到底跟地下处决有什么关系，如果大群对审判与处决的理解是“制造各种意外事故”，那所谓地下暴力应该是黑帮打手式的刺杀、暗杀而非带有审判程序的处决，这完全符合了德国红军旅的一贯作风。至于“使中修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给“地下红军”们制定的、长的看着不着底的暗杀清单。中共政要得杀、资本家得杀、蒲城事件的校长得杀、还要同时“打击黑社会与地痞流氓”。是的，这些在中共的监察体系下全部都只是“一件小事”，不会得到关注。

在此之外，“地下红军”路线又使用上了自己的经典描述——“不暴露政治性质的”某种政治行动。相当明晰的是，这种含糊的路线与概念在触及到细节的行动后就会彻底地陷入自相矛盾中，继不带有政治性的地上暴力后，马列毛大群又开始声明绑架中共政要是没有政治性质的、审判中共政要也是没有政治性质的、“不暴露暴力性质”地暴力处决中共政要更是没有政治性质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在面对什么无政治性质的政治审判或是什么非暴力性质的暴力处决之类的文字游戏时应当直接了当地提出质疑，如所谓地下审判是按照什么法律条文定罪的？此类法规又是如何起草、制定并通过的？事实上“地下红军”路线中的地下审判和地上暴力最终都会走向相同的结局，即毫无规章与程序的泄愤式私刑。

此类含糊其辞的路线本质上就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底层逻辑进行了偏离。在“地下红军”的八股文中我们能反复地看到这些纸上谈兵的指挥家们说一个革命组织要做一、二和三，至于过程如何、实际又会碰到哪些阻力一概不予展开，并尝试用文字游戏规避那些真正重要的话题。比如，假设有人质疑地上的暴力斗争该如何抵抗军警，马列毛大群就说地上暴力是“与政治不相干的”，所以中共不会下狠手。实际上，共产党人要思考的从来都不只是“革命组织要办什么”，而是“革命组织要办什么，又该怎么办？”，毕竟“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第四，我们还能够通过“地下红军”路线对其如何胜利的机械论证来再次佐证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脱节。总的来说，“地下红军”路线的空想家们单方面地在互联网上规划了中国革命的四大阶段：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战略防御的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以《社保补贴、舆论讨薪、持刀伤人——三则新闻看中修治下无产阶级的无权惨状》为例，在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该路线要“在远离中修专政的环境中建立革命家组织，革命家组织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障组织处于地下状态”、搭建起“革命家流水线”，这样就能使得“组织规模不断壮大，组织程度不断提高，直到能够支撑起全国一盘棋融工时便进入了战略防御第二阶段”；在战略防御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建立的革命家组织就会“派出代办员到地上进行工业化融工，在地上建立工人组织”，然后执行起地上地下暴力之类的模糊工作以“形成局部敌弱我强的形势”；接下来就是战略相持阶段，就开始了在“中修专政力量末梢”扩大根据地的工作，最后“革命的力量不断壮大，中修的力量不断缩减，直到在全局都形成敌弱我强的态势，那时战略反攻时刻就会到来”。

基于该描述我们能清晰地意识到为什么这样的路线是机械的空想。其扎根于两个基本的要素——行动与条件，行动正是我们上文所述的那些模糊不清的、与左派恐怖主义挂钩的、条件不明的方针，即所谓在不存在的“中修专政力量末梢”展开幻想中的根据地工作、搞所谓全国化的恐怖主义和诸如去政治化的地上暴力或地下审判之类的话语；而条件则是机械的对局势的认识，“地下红军”所提到的、能走向“战略反攻”的条件归根结底就是地下组织的“不断壮大”、地上组织的“不断壮大”、地区内的“敌弱我强”和全国内的“敌弱我强”。当然，任何革命运动只要满足了这四个条件就能基本达成胜利，但中国革命形势仍未走向发达难道是因为革命组织都没察觉到“为了胜利，我们应当壮大起来”吗？或者是因为革命者们普遍都未能意识到“为了胜利，我们应当比反革命势力强”吗？

在 1902 年，当谈论到建设革命组织时列宁曾感叹道：“可敬的作者啊，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究竟怎样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组织！”（弗·列宁《怎么办？》）。同理，现在共产主义者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反复地、八股文式地提出诸如“让革命力量壮大，反革命力量缩减”的抽象任务。所有革命者都知道要让组织壮大、要将革命力量发展的比反革命势力更强，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发展起组织、该“怎么办？”，而正是在这些最重要、最复杂、最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上，“地下红军”路线的豪言与壮志一并退缩回了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游戏中。

（四）共产党人如何夺取政权？

发展工人组织与联络网

列宁在 1905 年是如此总结革命经验的：“暴乱——游行示威——巷战——建立革命军队，这就是人民起义的发展阶段”，而其中的“游行示威”与“巷战”标志着一个革命政党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和领导，让其从原子化的、松散的暴乱中抽身（弗·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其中传达了一个不会过时的明确思想：共产党若是想要组织起成规模的暴力革命与起义，就必须首要能够组织起成规模的工人，这代表着共产党人必须以工人小组为基本单位进入到工作场所中。

工人小组在实际上将以线下党支部的形式活动，但与其他线下支部不同的是工人小组将主攻工人运动方向、集体进入工作场所来发展先进工人。几位在理论和联络工作方面训练有素的党员、足够的持续工作的生活经费和几部加密设备所组成的工人小组将成为党在阶级斗争较为频繁的地区的基本活动模式，其目标为保证工人工作的长期性、小组本身的组织性和活动可拓展性。长期性代表着共产主义者们的工人工作不应当因为计划不周和资金不足而在一两个月后被迫撤走；组织性代表着工人小组本身作为革命政党的一部分沿用着民主集中制的模式进行策略优化和执行，而非如同 1873 年至 1874 年俄国民粹派组织起来的“到民间去”运动或融工运动那样松散；可拓展性代表着工人小组本身是以工人运动的种子为意义存在的，而非一棵已经长成的树木，在数年的时间内多个工人小组应当不断地发展先进工人、快速响应当地的工人自发运动并以此组织起更大规模的革命工会式团体。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共产党人的性质不是由其名号定义的，而是看其是否能够参与到工人的运动中去，以最积极且最实际的角度传达革命纲领并以组织的中央机关报完成对先进工人的教育。对于这样集合政治教育、跟进并领导工人运动且由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党直接领导的组织，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工人联络委员会。

有些组织可能会斥责我们说这样建立工人组织的行为是“尾巴主义”是“自发崇拜”，因为去联络、教育和组织工人远远没有他们发八股文的速度快。这些组织忽略了建立各工人组织与联络网是武装起义的必要条件，它能确保革命党在所有群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工作场所内工人思想的统一以及信息的快速反馈，如单个地区内工人活动的实时动向和受组织工人的数量。此外，执行线下工作的党员还应该尝试渗透入工作场所的管理岗位，以直接控制车间并为总罢工做好准备。

在具体的组织方面，一个革命党应该准备好以地区的政治中心划分线下工作，具体设计为：围绕着线下政治中心建立起的地区局将依靠全职的党员同志进行工人工作

的跟踪和统筹，而一个地区局将下辖数个行业处，如纺织、运输或机械加工等处级单位。每个行业处则将直接控制数个、数十个在工厂和企业中活动的工人联络委员会。且在执行时，共产党人需要时刻铭记两个概念：行业罢工的局限性和针对中国国家机器的详细策略。

首先，无论我们的目标是暴力革命还是总罢工，我们所号召起的绝对不能是以改善经济条件为目的的行动，这也是联络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在以年为单位需要完成的重要教育——为了共产主义革命而掀起的罢工浪潮必须是政治性的、全行业的。正如我们能在1900年代的俄国和1936年的法国大罢工中看到的那样，“罢工教育工人不要只想到本厂一个厂主和自己身边的几个伙伴，还要想到所有的厂主，想到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弗·列宁《谈谈罢工》）。这也是设立行业处的意义，我们不能让各行业的工人同志单打独斗，而是靠加密平台与局级别单位的跨行业调度掀起超越单个工厂、单个领域的革命斗争，这也是没有详细组织建制的融工无法达成的。比如1905年10月7号的莫斯科起义就是个关于全行业罢工的例子，“除排字工人外，烟草工厂、电车都停了工；面包师的罢工也开始了。”这样的罢工是全社会性质的，以城市、行政区和国家为单位瘫痪统治阶级的基层控制（弗·列宁《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

其次，革命者需要通过工人运动来更加清晰地审看我们对抗中国国家机器的策略。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再幻想受轻度武装的工人能够阻挡国家机器的直接冲击，或是像“地下红军”提出的那种所谓的非政治性暴力来规避监察体系的打击。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工人运动来瘫痪、阻挠、切断军警机关的正常运转。举例来讲，运输行业处的长途卡车工人们、出租车工人们不再会以不上工的形式来执行罢工，而是将车辆停在街道的交叉路口以阻塞军警调动、在政党的调动下接载被动员起来的工人以负责串联和支援。简而言之，革命党领导下的罢工不只是为了停止为资本家做工，其同时还需要为政治运动贡献力量。

统一指挥 / 占领工厂 / 组织生产与分配

科学社会主义在革命的进程中所强调的是对现实的妥善分析，这不只是列举出有哪些有利条件，如阶级斗争持续高涨或左派情绪正在扩张，我们仍需要妥善的意识到那些客观的不利因素。先前我们所批判的左派恐怖主义、城市游击队和“地下红军”路线通通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所有的暴力斗争都需要后勤的支援，只因为任何被动员起来的工人和受罢工波及的群众都需要吃饭。这一原因打垮了大部分的经济斗争类运动，例如以2025年12月深圳易力声公司的千人罢工为首的的各类中国工人运动，工人们在没有资金储蓄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支撑起几周、几个月的停工或等待漫长的劳动仲裁程序。

同理，1919年到1920年意大利工人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场政治性的大罢工不只是走向街头，还包括占领工厂及其中的生产资料，为革命提供一切必要的物资。红色两年最终失败的教训也教导我们，这样的生产不应该是以工作场所为单位的，而是以革命者所能控制的地区为整体来进行运转的。这代表这我们需要建立能够临时接管瘫痪的国家机器的机关。



省港大罢工

1925年到1926年的省港罢工给予了一个相当正面的参考：“组织方面，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以人数为比例，每五十人选举一代表，为最高议事机关。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大会选举十三人为委员，为最高执行机关。其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纠察队、会审处、保管拍卖局、法制局、审计局、筑路委员会、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皆直隶于罢工委员会，分头办事，秩序井然”（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如此由工人阶级建立的接管机关才有能力去实现临时的执法权，且和“地下红军”路线提倡的、畏畏缩缩的去政治化和秘密化不同，为了组织起更多的工人，这样的机关只能是公开行事的。这当然不代表一个在地下活动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会变得毫无用处。事实上，省港罢工的失败就是因为共产党人的缺位而导致的，这正好映射出了1926年最深刻的教训——“共产党人从没有教人家必须使这一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具有它本身的政治方向，给它以一个远景和一枝旗帜，这支旗帜使它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利益而参加阶级斗争的战场”，无论是当时的中共还是共产国际（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

由此可见，这样地区性的“罢工委员会”或任何对资产阶级统治真空的接管机关都必须由从一开始便领导了罢工运动的革命党直辖，不过这不代表任何岗位上的工人都必须成为党员，而是整个行动的走向将由党的地区与中央机关计划和整合。工人将为保卫共产主义革命而进行生产和分配——这样的权力和资源不应该被让渡给任何同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党，无论是1926年的国民党、当下的中共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党派。

所以，一个接管类机关应当做到什么？正如上述省港罢工所完成的那样，由工人和共产党一同建立和指挥的机关应当首要恢复罢工前期所中断的生产，在机关代表所领导的车间中，旗帜、标语、衣物、医疗用品、化肥、枪支弹药等工业品都应该持续地在工作场所中出产并受投入-产出式的计划管理；所接管地区原本的政府财政

也应当被一并转交给机关相应的财政部门；在乡镇，接管机关应当控制原本流转给企业的农地以供城市或前线的粮食需求；广泛的工人武装需要被建立起来以保卫这个临时的政权。

但共产党人清楚的知道，革命不是简单的算数题，不是“地下红军”那机械的阶段论。所谓受接管地区愈来愈多导致中共的垮台是过分乐观的预计。接管机关是无法和中国国家机器进行无限的对峙的，资源会耗尽、财政会见底、工人武装也无法和统治阶级的大量军队进行抗衡。而且工人阶级是否能够接管一个地区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受瘫痪的国家机器的剩余势力很有可能与罢工工人保持僵持甚至仍呈优势。就算基于明晰结构的基层政治组织能瘫痪与迟滞监察体系的反击，仅仅是拖住中共的军警机关也是绝对不够的，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一支纪律严明且专业化的革命军队。

国家职员与革命军队

共产党人在将来的运动中所需要的不是让中共付出多少代价，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上述的大罢工和接管机关是暴力革命的骨架，其确保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群众基础，那一支革命军队就是整个身体的肌肉。对于夺取政权来讲，无论是骨架还是肌肉，两者都不应该脱离彼此。总罢工负责瘫痪与占领工厂，革命军队负责夺下地区政府；革命军队负责保卫接管机关并进一步加强后者对社会各部门的控制，接管机关负责调动起生产来支援军队的需求；革命军队负责在与统治阶级的正面战场开辟新的解放区，接管机关负责巩固这些地区的形势以防止反革命势力的反扑。这样紧密的互生关系表明了工人工作以外，共产党人还需要去争取国家职员以建立革命军队。

如今，有些空想革命家们不认为争取国家职员是必要的，觉得单纯地依靠给工人或贫农发枪就能代替专业化的军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剖析，即软件与硬件。

在一场暴力革命中，革命军队坚决不能被浅薄地定义为“拿着枪的人”，这直接忽略了软件上的需求，也就是对纪律、专业化素养和组织化程度的高标准。早在1905年，列宁就曾在敖德萨起义后宣布“军队转到革命方面，轰动了全俄国和全世界。继黑海舰队事变之后，一定还会有更加积极地组织革命军队的尝试。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支持这些尝试，向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说明革命军队在为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中具有的全民意义”，其随后又总结了一条建立革命军队的要领：“无论革命军队或革命政府，都是高级类型的‘机体’，它们要求建立复杂的机关，要求发扬公民的自觉精神，如果指望轻而易举地一下子立即完全实现这些任务，那就错了”（弗·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如此“争取既有军人以建立革命军队”的原则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减弱，因为几个革命的核心形势从未动摇：第一，共产党需要有能和资产阶级军队做对抗的能力；第二，从零开始培植起一支军队是不可能的；第三，国家的暴力机关并非绝对忠诚。敖德萨起义后由布尔什维克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都证明了这一点。

举例来讲，看似作为“争取既有军人以建立革命军队”的反例的中国工农红军实际

上是这一原则的最好佐证。在中国革命中，无论红军看起来多么“草根”，从其基层到核心的领导大多都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如黄埔军校毕业生和前国民革命军等身份在整个红军的人员组成中都相当常见——“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如此总结道（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以1934年到1936年的长征这一军事和革命历史上的奇迹为例，红军的领导层包括武昌起义部队出身的朱德、黄埔军校第四期出身的林彪、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等，甚至连指挥不当而导致巨大损失的李德（奥托·布劳恩）也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专业训练。可见，虽然红军的确包括了如毛泽东等未就读过军事院校的革命家，但反围剿和长征的胜利与所谓软件，即红军整体的军事素养是绝对脱不开干系的，而这样的素养多数来自于资产阶级政党或政权下的暴力机关。

在软件之外，共产党人也必须考虑硬件上的劣势。这一点我们在分析游击战争时浅要地提到过，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所持有的暴力机关和相应的物质资料是相当可怖的，这一点是随着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加深的。在20世纪初期，革命党的武装力量大多不会在硬件上较所属反动势力的军队存在过大的代差，但即便如此，长征期间国民革命军所装备的飞机和军舰也是红军所无法获得的。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代差只会越来越严重，革命党若是不争取军队，就存在使用轻武器去对抗坦克、自行榴弹炮或喷气式战斗机的风险，这对于革命运动来讲是绝对不可承受的。

那末，共产党人该如何争取以军队为首的国家职员呢？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做好针对国家职员的渗透和宣传准备。以中国的公务员体系为例，在社会各岗位上的革命党党员应该学会接触所谓体制内人员，这包括通过工作交流等机会进行的间接建联和直接考入公务员系统的直接建联。以此方式，共产党人需要建立起一张针对统治阶级的情报网，对公务员系统内部情况和动态进行追踪，如基层维稳机关的政策和动向。历史上，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所成立的中央特科就对国民政府展开了渗透行动、发展政府内的线人以保全脆弱的中国革命力量，而这正是一支没有足量武装的革命队伍所需要的。但这项工作的范围永远是有限的，相比于在工作场所中成建制地开展工作的，复杂的政审和公务员考核决定了只有少部分同志能够成功地完成渗透，但此类情报工作将在国家机器收到各类危机之冲击时发动重要的作用，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战争、经济危机、国家财政危机、中共党内分裂等情况（详见下一小节“时局和形势”）。当此类变局出现，革命党就能够更高效地以情报网中的各位同志为锚点展开对其周围国家职员的宣传攻势，以促成接管机关的建设和武装力量的获取，这一情况适用于基层党政机关、公安系统与军队。

我们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是由齿轮和钢筋组成的，它是由心脏如我们一样跳动的人和无数许诺造就的。这些许诺需要给予公务员们一个铁饭碗以及福利待遇、给予基层士兵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会，但这些许诺就如同国家机器本身一样存在着裂痕。中国在2024年就已经达到八千万人这个体量的公务员系统就出现过奖金停发、福利收紧、甚至是工资削减，而这样的现状也逼迫中共在同年7月补发薪资涨幅；同理，当中国在扩张自己帝国主义影响力范围的对外战争中出现失利时，军队内部对其指挥的忠诚也会被打击。

此外，这种对国家职员，特别是军队的争取一向存在两个阶段：放弃给统治阶级送命和为共产主义革命而献身。简要地讲，就是军队需要完成先脱离国家机器再被组织为革命队伍这两步。在俄国革命中，政委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旧军队的组织。在长期的执行中，“政委由革命工人和共产党人担任”以“负责政治和教育工作”，且“在不干涉指挥官的纯军事工作，决不削弱指挥官的权威的前提下，创造条件，使这种权力（旧有军队士官的军事指挥权）不至于损害革命的利益”（托洛茨基《红军之路》）。在中国革命中，1927年被镇压的秋收起义也使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原则，并在1938年将革命党与革命军队的关系深化为了“党指挥枪”（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由此可见，与革命党人在接管机关中的作用一样，若是想要集中地把军队组织起来，基层士兵周围的党员和党组织是格外重要的。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

最后，我们可以一窥革命军队与接管机关是如何协同工作。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参考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经验。1917年8月，俄国临时政府陆军总司令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发动了针对临时政府，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军事政变。这一场针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行动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响应，其妥善地调动起了接管机关，即工农代表苏维埃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接管机关发挥了出色的阻塞和支援作用：“那几天，铁路工人尽了他们的责任。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很神秘地走错了路。本团不能与本师会合。炮兵走到断头路去了，指挥部和指挥的部队隔断了联系。所有大车站都设了苏维埃，铁路工人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电报工人通知他们以一切新闻，活动和变化。电报工人也扣留科尔尼洛夫的命令。凡是不利于科尔尼洛夫派的消息，立刻被誊写了，散布了，张贴了，从这人嘴里传到那人嘴里。机器工人，扳道工人，加油工人都成了鼓动家。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就是在这种空气之中前进的，或在这种空气中停顿下来的”（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在此之外，以普蒂洛夫兵工厂为例，城内兵工厂的工人们一共赶制出了大约 12 万支步枪、300 门火炮和对应的弹药。同时，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也积极地参与了 30 万赤卫队预备役的训练并宣布对革命的效忠：“水兵们要求波罗的海舰队诸军官，签字宣言尽忠于革命；战舰彼得保罗号上四个军官不肯签字，而且自承为科尔尼洛夫派，全体水兵遂决议立刻把他们枪毙了”（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时局和形势

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都有一个基本共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而对于当代的中国革命者来讲，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把握住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并在危机期间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

针对时局与形势，当代左派的各思想分支中诞生了两类谬论：第一类是我们一定要等到中国国家机器崩溃、各地军阀割据的时候才开始组织像样的革命党，因此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无用的；第二类是我们对革命的计划可以不将时局作为设计的一部分，像“地下红军”一样机械地划分革命的各时期。这两类处于事物之两极的谬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该采纳的。暴力革命不是一场属于机会主义者的一蹴而就的幻想，也不是按部就班的电脑程序 - 机遇会出现，意外也同样会。

我们可以大致将一切可能会出现的形势划分为“危机”与“结果”，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各危机的复合性，各类危机从不形单影只地发生，因此单单列举出情况的种类会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帝国主义势力间爆发的战争就可以能引发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意志帝国就因为协约国的海运封锁和盟友粮食补给的断裂而在 1916 到 1917 年的冬季爆发了史称“芜菁之冬”的大规模恶性营养不良与饥荒；同样，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数据，2022 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影响到了全球 30% 的粮食出口与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等能源的供给。在战争之后，部分危机也许会在前线的炮击停止后消散，但社会的动荡是不会快速自愈的。如 1918 年之后的德国，整个国家仍存在大量的社会危机，如不稳定的魏玛政权、1921 年到 1923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数以百万计的从前线归来的士兵。

这些连贯的、不断的、复合的危机状态将在大体上构成 2026 年至未来几十年的国际形势。而这些危机状态所造成的利好革命的契机是共产党人必须要抓住的，就像我们先前论述的那样，当工人阶级需要一个能够领导其斗争的政党时，这个党绝对不能是国民党、纳粹党或任何资产阶级政党。

举例来讲，危机下最常见的情况便是国家机器的崩溃与全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我们可以设想中共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崩溃将带动什么：其 500 万个基层组织会停转、维稳的能力快速归零、枪支和出版物的管控也会松懈。但和整天想着中共在一夜之内灰飞烟灭的海外自由派们不同，共产主义者会清晰地认识到无政府状态不会自动地带来民主或自由，更不会使得我们在没有革命组织的情况下组织起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和军队。正如上文反复强调的，若是没有强有力的共产主义革命党，军队会是涣散的或是走向地方军阀化的，工人阶级也难以独立建立能长期运转的接管机

关。换句话说，当“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的时候，如果共产主义者还在幻想什么“地下红军”夺权或“战略反攻”，那最终建立专政的还会是资产阶级，不论是其建立的是 20 世纪的韩国或拉美式的高压军政府还是自称将贯彻民主精神的自由派政府（弗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因此，共产主义者必须做好准备和计划。在理想状态下，党组织能够依托着危机彻底爆发前所建立的联络网来组织工人工作、争取军队并准备好在一片无政府状态中建立秩序；但我们同样需要考虑非理想状态，如在对外战争期间的大规模戒严、通讯中断和强制动员下，我们必须能够基于海内外的线下政治中心和预备的通讯渠道来保全革命力量。简而言之，共产党人需要有承接住任何形势的能力，无论其对革命所做的是推动还是阻挠。

此外，当中国革命出现了实质性发展时，世界革命的爆发和国际支援也是必然会到来的，只因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帝国主义的扩张使得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无产阶级在斗争层面的联系将发生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双方基层士兵之间，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德国与俄国军队都发生了基于士兵委员会的起义。这样的联系还将发生在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之间，所以在 21 世纪建立起与国际上的革命者之联系和筹建一个国际共产党的联合革命组织都是必须要完成的工作。由这样的联系而起，横跨多国的补给线路、安全稳定的指挥部和支援起义的国际纵队都将因世界革命而被建立起来。当然世界革命的机遇也伴随着风险，因为国际上革命势力的联合也同时映射了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这使得亚洲、美洲、欧洲、非洲等国家的运动被孤立地击垮的风险将无限攀高。

（五）结语：该从何处开始

上述的一切，无论是策略还是时局，最终都是一支革命队伍需要在中长期所计划的。这些工作无疑都相当重要，但一个大部分左派组织都没有完全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该从何处开始，而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又该如何走向革命的胜利。一些空想家只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前一部分，他们说我们现在该专注于融工、开设几个理论教育班或者收缩到国外，至于我们的未来现在暂时无需讨论；有一些空想家只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后一部分，他们专注于描绘中共将如何被自己的地下暴力团体击败，至于现在只要安心写八股文即可。

这些只言片语、避开重要问题的回答都无法带领无产阶级走向胜利。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应当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的一切工作将聚焦于消解、降低和应对革命的被迫性。在一场暴力革命中，被迫性是革命者最大的敌人之一。俄国革命的被迫性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城市粮食供应不足等问题，因此布尔什维克被迫地签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与颁布了新经济政策；中国革命的被迫性来自于共产国际干预、缺乏独立的武装力量等问题，这些因素使得省港罢工被迫解散、工会领导人与共产党员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屠戮。被迫性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当革命爆发后、当运动走向高潮时，共产党人将面临空有目标却没有实际资料的处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看到革命家们选择做出“必要的牺牲”或“退一步，进两步”的决定。在理想的环境下，没有人不想在 1918 年的 3 月从布列斯特一路将世界革命的趋势带到柏林、维也纳、巴黎和伦敦，支援当地的工人与军队起义，但在现实中，革命一次又一次的被迫后退并接受暂时的牺牲。

这些暂时的牺牲让革命党和其建立的政权都承受了巨大的代价，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必然会再次受被动性所迟滞。这一结论是我们无法在当下通过完美的预测来避免的，但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是从现在开始降低被动性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就从我们明确知道的事项开始。比如现代的左派团体缺乏对群众运动的参与和领导，而我们知晓在将来的运动中这一缺点必将被放大且存在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受资产阶级的篡夺的风险，那末筹建线下的党支部和工人小组，对学校、街道和工作场所中发生的运动进行追踪和介入就是一个革命组织有必要从现在开始着手的工作。我们也都知道如今革命组织的纲领与机关报仅仅是在墙外的线上平台传播，使得大部分中国的无产阶级并不知道我们的目标与路线，那末通过线下的学社和学习班来流通与普及我们的纲领和机关报也将成为一个明确的、从现在开始着手的工作。

无论这些工作看起来和最终的暴力革命怎样遥远，我们都不能功利地去曲解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一个接管机关是在一个能支持政治斗争的政党下建立的，而支持政治斗争这一能力则来自于由切实的、由工人联络委员会和各类基层党组织所组成的基础；一支革命军队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组织起来的，而军人没有继续为统治阶级卖命或导向军阀势力的原因是当他们归乡时，社区里贴的是共产主义者的标语。

况且，暴力革命的成功也许遥远，但是对一场革命的需求并非像许多左派常常设想的那么遥不可及。那些所谓的暴力革命的专家可以反复地对着自己的八股文精雕细琢，但是他们总是不考虑一个假设：假设明天国家机器因为某些原因而崩溃了，自己的几百篇八股文能起到什么作用？假设明天台海战争爆发了，革命力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保全？假设明天我们就急需领导起一场革命，自己今天做的工作是否有让未来少些被迫的牺牲？

所以，当被问及我们现在该从何着手以掀起一场暴力革命时，共产主义者的答案是：我们需要明确认知到情况的紧迫性，保持着对局势的及时分析和对未来行动的计划，同时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

就让我们做好执行长期斗争的规划，并假设风暴会在明天到来。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迫在眉睫的台海危机及我们的呼吁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目前的局势

自我们组织于去年七月发表了[对于台海问题的声明](#)后，台海局势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日益严峻紧张，成为名副其实的火药桶。从去年十一月的[日本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到十二月美国国防合作安全局对台出售达到历史最大的超过 111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的订单，再到中共于不久前结束的代号为[“正义使命-2025”](#)的环台军事演练等等，台海局势越发严峻紧张，搅动着两岸三地乃至世界。

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者无法如同神仙一样给出台海危机是否会引爆、以怎样的方式引爆、何时引爆等具体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两岸的无产阶级依然如同今日般无法被战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团结起来共同将矛头对准两岸统治阶级，以国内革命代替国际战争，那么战争的血腥屠杀将不会变为梦中的呓语，而会以两岸无产阶级的鲜血涂抹为可能的现实。

我们面临的困境

目前两岸的无产阶级都面临着缺乏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困境，左派组织零散分布、山头林立，宗派主义、小圈子习气等问题依然缠绕和窒息着无数组织。尽管无产阶级已经随着资本主义历史性危机下社会矛盾的剧烈激化而日益发起越来越频繁和激烈的斗争，但因为自发性和无组织的局限性往往仅限于局部，缺乏清晰明确的纲领，并且无力和庞大的国家机器相抗衡。革命主观领导性的缺失已经使得数十年来无数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陷于失败和崩溃，无法真正推翻统治阶级建立崭新社会的悲剧一遍又一遍的上演。

看看 19 年的香港吧，由于缺乏一个在事变前就赢得群众信赖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领导权落到了空有空洞口号的软弱而无能的小资产阶级头上，他们向帝国主义谄媚的表演和放任的混乱暴力也使得大陆无产阶级转而去支持中共和港府的镇压，亲手埋葬了两边无产阶级共同行动的可能，使得中共由原本的观望害怕转向能放心地颁布《国安法》大力镇压。

面对着早已是全球帝国主义势力盘根错节的当下，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紧密的依赖于彼此的行动，只有跨国界的无产阶级才能与跨国界的帝国主义对抗。对于两岸无产阶级来说，正如我们在台海问题的声明中论述的那样：

大陆和台湾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基于统一的、革命的、有着发达联络网的共产党。大陆作为目前全球工业能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存有着以亿为单位计算的无产阶级，无疑将成为未来 30 年内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台湾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相比大陆中共的高压监察体制有着共产主义者筹备革命的客观优势，就像革命党建立党支部、公开进行工作的桥头堡。1980 年至 2000 年，台湾无产阶级建立了数个仍在运营的劳动者组织，而民间工会、工联的持续活动也为党对工人的组织工作提供了更可及的土壤。但若两岸无产阶级的行动不一致且不由一个统一的革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运动就又将陷入前 30 年反复出现的绝望情景：大陆的工人运动因缺乏支援而星散，中共监察系统的运作下革命组织建设屡屡受挫；台湾的工人运动因体量不足，无法造成对阶级社会的实质突破，只得如大部分欧美系工会运动在 60 年代受挫后的情况一般，退守至成效甚微且过程缓慢的经济斗争。

同志们，我们革命的命运是一体的。没有双方的协调行动统一组织，两岸的解放都将是空想。

真正的革命之路，只有一条：两岸无产者的联合斗争，共同推翻两边的压迫统治，建立一个新世界。这样的团结不靠炮火，不靠民族对立，而是依靠一种求取自仇恨的团结——那是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横亘于我们头顶蓝天的压迫者的仇恨。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如今时间已然迈过了 2025，在可能引爆的台海危机面前，我们还能有多少时间将两岸的无产阶级团结在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下呢？面对着这时刻萦绕于两岸乃至世界头上的战争阴霾，必须以最为紧迫的态度加紧将我们彼此组织起来，做好

充足的准备。

正如上文所述，若是我们无法在战争爆发前联合起来，那两岸无产者的事业必然将遭受到打击。而就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部分“左派”或所谓“革命组织”正犯着严重的幼稚病。有些左派机械地以为中国大陆并非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还保留着过去社会主义原则的工人国家，因此单方面地号召人们要保卫新中国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犯；有些左派认为要在战争中保卫拥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台湾，甚至在2024年的大选中提出“暂时搁置左右派的争议，优先保卫民主”的声音；更有一大部分所谓的“社会主义者”看到中共仍在渲染的“解放台湾”就以为单纯是在执行解放战争的未经之事。

我们希望与所有严肃的矢志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同志建立联系，希望能通过这样的联系紧密地联系起两岸三地乃至于世界的革命事业，了解彼此政治工作开展的情况，利用我们彼此的优势来互相补充，用共同的一致行动给那些妄图用“民族复兴”、“独立、民主、自由”等的口号麻痹、分化我们的统治阶级以答复。我们的大门随时为两岸的无产阶级和革命者们敞开！

正如我们在先前的例如[与《十一月评论》的接触](#)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样，我们始终坚持以平等和完全的政治自由与其他左派组织开展联络和合作，以最为真诚的态度希冀能建立起统一的革命党。当然，我们不是“大帐篷主义者”，民主集中制的要求使得对于建设一个革命党而言，必须在统一的纲领和思想下才能作为一个战斗性的革命党解决争议并有力地行动。即令最后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无法达成一个一致的统一，我们也希望通过党外的保有完全批评自由等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交流合作。

在这样的紧迫时刻，不能有任何的对于可能会失去自己“山头大王”头衔的宗派主义恐惧心理，不能有任何的对于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战斗性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犹豫或是担忧，不能有任何的对于我们面临着的极为艰巨和漫长的必然伴随着无数牺牲的道路的畏惧，不能有任何的知识分子小圈子心理而抵触对于实际群众工作的逃避或是认为自己只要写写文章等到革命时刻到来自己能摇身一变为领导者的幻想。

统治阶级将无产阶级视为可能的战争中一串数字，将无产阶级视为能被他们的谎言肆意欺骗和分化的蠢货。难道我们只能面对着这样的剥削压迫的慢性死亡和战争中的急性死亡吗？难道我们不能通过我们彼此的团结和行动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吗？

不！我们势必要让北京和台北、东京和华盛顿的衣冠禽兽、战争贩子们知道谁才是社会真正的主人，我们势必要让他们知道哪个阶级才是最为强大有力的书写历史的主角，我们势必要用我们劳作的双手打碎这旧世界的锁链，解放我们自己，建立起崭新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

为此，我们必须行动起来、组织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推翻统治阶级意欲筑起的民族和国家的藩篱。

两百年前的《共产党宣言》已然庄严宣告：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民族自决问题（一）

作者：齐项德



作者按：民族自决一直是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与革命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民族自决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带来了俄国内战初期的军事胜利（比如拉脱维亚步枪兵团在一月事件后至关重要的军事作用、乌克兰地区布尔什维克的助力等等）并直接导向了俄国内战结束后苏联的国家形态，对于民族自决政策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列宁与斯大林在外高加索联邦问题上的分歧，从这一政策的不同理解中更是产生了所谓列宁与卢森堡对立的政治迷思。本篇及本系列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列宁和卢森堡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家对民族自决问题的论述进行直接阅读、分析与注解，破除当前对民族自决的问题的诸多迷雾，并力求指明一条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正确政策。

我们首先来阅读列宁在 1914 所著的《论民族自决权》中的段落：

关于列宁所定义的“民族”概念：

“确切地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问题，立刻就会把罗莎·卢森堡的论据驳倒十分之九。民族运动并不是第一次在俄国发生，也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

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着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结论说：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关于列宁对卢森堡的反驳：

“罗莎·卢森堡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她没有看出这种联系。她没有仔细地考虑鲍威尔的理论观点的整体。她甚至完全没有把民族问题上的历史经济学理论同心理学理论加以对比。她只是用下面的意见来反对考茨基。

“……这个‘最好的’民族国家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容易受到理论上的发挥和理论上的拥护，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社会民主党评论》1908年第6期第499页）

罗莎·卢森堡为了证实这个大胆的意见，接着就大发议论说，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使弱小民族的“自决权”成为虚幻的东西。她大声疾呼地说：“对那些形式上取得独立的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来说，甚至多少对瑞士人来说，能够真正谈到‘自决’吗？他们的独立不就是‘欧洲音乐会’上政治斗争和外交把戏的产物吗？”！（第500页）最适合条件的，“并不是考茨基所认定的民族国家，而是强盗国家”。然后她就列举了几十个数字，说明英法等国所属殖民地面积的大小。

看了这些议论，不能不对作者不通事理的本领表示惊奇！用庄严的神情教训考茨基，说什么小国在经济上依赖大国，说什么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用强盗手段征服异族而互相斗争，说什么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仍然存在，这是一种可笑的幼稚的卖弄聪明的行为，因为所有这些都和问题毫不相干。不仅小国，而且象俄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上也完全依赖“富强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不仅巴尔干的几个蕞尔小国，就连十九世纪的美国，在经济上也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些，考茨基和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但是这同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罗莎·卢森堡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族经济独立、经济自主的问题偷换了民族政治

自决问题，民族国家独立问题。这种聪明的做法，正象一个人在讨论议会（即人民代表会议）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应有最高权力这个纲领要求时，竟扯到大资本在资产阶级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十分正确的见解一样。

毫无疑问，世界上人口最密的亚洲，大部分不是处于“列强”殖民地的地位，就是保持着民族关系上极不独立和备受压迫的国家状态。可是，这种尽人皆知的情况难道能够丝毫动摇下面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吗？这就是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我们不知道，亚洲是否来得及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也象欧洲那样，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亚洲的实例是拥护考茨基而反对罗莎·卢森堡的。

巴尔干各国的实例也是反对她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在巴尔干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正在随着在这个半岛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形成起来。”

显然，列宁笔下“民族”概念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民族语言”的自由发展，以及通过某一单一的民族语言文字所构建出的最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内大市场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发展的所谓独立民族国家——列宁暗示，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实现了单一民族国家建立并进而能够激发这一单一民族所组成的边界清晰、语言一致、劳动力效率高的国家蕴含着资本主义发展潜能，而这一潜能可以刺激生产力发展，进而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降临。列宁认为他所定义的民族运动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需的必备条件，但列宁同样不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使不同地区越过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我们不知道，亚洲是否来得及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也象欧洲那样，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体系”——这里同列宁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联系起来，也就是欠发达的被殖民或半殖民地地区可以通过“广泛人民革命”的方式超预期、超标准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民族民主革命（二者本质上都没有跳出资本主义框架，列宁并不否认这一点）的需求，通过以工人阶级在这一时期革命中对其他阶级的绝对领导地位创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在这一关系下继续发展生产力。

不过列宁对于另一个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释清楚，也就是民族语言作为民族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直接转化为政治和历史经济范畴中“确实存在的民族”，同时，这些民族自决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关系也并不十分清楚——显然，民族自决政策的贯彻是为了最好地促进社会主义过渡政权的建立，并进而而在社会主义的自由联盟成立后把共产主义的“集中制”（这里指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集中、统一，并不指共产主义革命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详见下文列宁对于联邦问题的看法）原则作为民族自决目标的终点；然而无论是语言民族同作为政治认同的民族之间的张力，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重叠与矛盾，都没有被更加明确地解释，列宁在上文中写道：

“罗莎·卢森堡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族经济独立、经济自主的问题偷换了民族政治自决问题，民族国家独立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结论说：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他还同时在另一篇文章，191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中写到如下的内容：

“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在自由联盟——没有分离自由，自由联盟便是骗人的鬼话——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以及以下这段长文：

“另一方面，同那些借口“为了社会革命”而“否认”民族问题的蒲鲁东分子相反，马克思鉴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大于一切，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正是从德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利益出发，马克思在1848年要求德国民主派一胜利就宣布和实现受德国人压迫的各民族的自由。正是从英国工人的革命斗争着想，马克思在1869年要求爱尔兰同英国分离，他并且补充说：“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马克思只是由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才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英国工人。只有这样，他才能用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革命方法来抵制机会主义者，抵制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还没有实现爱尔兰的“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只有这样，马克思才能驳斥资本辩护人的论调，他们大叫什么小民族的分离自由是空想的、不能实现的，不但经济集中而且政治集中都是进步的；而马克思却不是以帝国主义者的理解来坚持这种集中的进步性的，他坚持各民族不是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在各国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基础上的接近。只有这样，马克思才能也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拿群众的革命行动来抵制那种口头承认而且往往是假装承认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态度。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由它所揭露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伪善的奥吉亚斯的牛圈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这种政策的正确性，这种政策应当成为各先进国家的榜样，因为现在每个先进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有些人常常借口马克思对某些民族（如1848年的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来否认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承认民族自决的必要性，例如，最近德国的沙文主义者连施在《钟声》杂志第八、九两期上就是这样的。但这是不对的，因为1848年无论从历史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在1848年和以后的年代，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

“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动分离、鼓动实行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因此，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

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家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他甚至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个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为了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方面应当向群众说明伦纳和奥·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这个主张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暧昧的言词，不是唱一些内容空洞的高调，不是把这个问题“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而是明确地规定政纲，并且在政纲中特别估计到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虚伪和胆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事实：列宁在上文中所提到的“民族文化自治”指代的是当时欧洲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于在上层建筑领域内、依照纯粹文化认同来识别民族、建立相对割裂、独立的民族自治区的主张，一个比较具体的案例就是美国的所谓原住民保留地——这显然是极度反动的、妄图通过上层建筑内的分裂割裂广大人民（无论阶级）的尝试——当代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绝不应被这个主张看似高尚的词藻蒙蔽。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上文的内容可以从列宁的思想中找到几种不同的张力，首先就是“民族自决政策”同无论是“广泛的民主诉求”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和列宁（甚至是马克思）所主张的以语言为基础进行民族识别的办法有直接的互文关系。以列宁所提到的1848年的捷克民族自决运动为例，马克思在当时高度敌视整个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内的一些民族运动，包括但不限于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克思在1840年代至187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和书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继承了黑格尔主义乃至整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极为强烈的历史进化论特征，认为所有民族中存在一个天然分界线，这根分界线将民族划分为“自然的”、“历史的”和“非自然的”、“非历史的”——何为“历史的自然民族”？马克思认为这就是已经形成资产阶级、能推动资本主义与政治现代化，如：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而什么是“非历史的、应该被淘汰（整合）的民族？”；马克思认为这就是缺乏独立的资产阶级、主要依附于封建帝国、在革命中主动或被迫扮演保守或反革命角色的民族集体，他将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几乎所有斯拉夫人都归入了这个范畴，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甚至是有着比较充分发展的文化的克罗地亚人！尤其是捷克人，马克思认为考虑到所谓波西米亚地区几百年来的德语化，其必然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参考如下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11月6日、载于1848年11月7日“新莱茵报”第136号的《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

“捷克人的民族狂热是维也纳权奸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同盟者中间已经开始了纷争。我们的读者会在本号报纸上看到布拉格代表团对于在奥里缪茨遇到的侮辱性的无耻行为的抗议书……这是将在以耶拉契奇为首的斯拉夫派和以文迪施格雷茨为首的粗鄙的、凌驾于一切民族之上的权奸之间发生战争的第一个征兆。另一方面，奥

地利的德国农民还没有被平定。在奥地利各民族的喧嚣声中，他们的声音特别响亮。而第三方面，爱民的沙皇的声音传到了佩斯；他的刽子手们在多瑙河上各公国里等候敕令……在巴黎有别动队，在维也纳有‘克罗地亚人’，他们都是意大利南部的流浪者——被武装起来的和被收买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反对从事劳动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我们在柏林很快就会看到第三幕。”

这一观点被恩格斯同一时期的作品所确认：

“德国人责备他们，说他们背弃了软弱无力的可怜的奥地利政府，这个政府的存在似乎仅仅是为了确定奥地利的解体，它不仅不能预防奥地利的解体，而且造成了奥地利的解体，这个政府非常软弱，它甚至不能使布拉格摆脱文迪施格雷茨的大炮和士兵的袭击……但是最令人惋惜的是勇敢的捷克人自己。不管他们将获得胜利还是将被击溃，反正他们是要灭亡的。德国人4个世纪的压迫（这种压迫现在仍以巷战的形式在布拉格继续进行）迫使捷克人投入了俄国人的怀抱。在最近（可能过几个星期）就要爆发的西欧和东欧之间的伟大斗争中，不幸的命运将把捷克人推到俄国人方面去，推到反对革命的专制制度方面去。一旦革命取得胜利，捷克人将首先被革命摧毁……使捷克人招致这种灭亡的结局，仍然应该归罪于德国人，因为德国人把他们出卖给俄国人了。”



席卷欧洲的 1848 革命

令人大跌眼镜——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对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套上“马克思主义”帽子的缘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犯下了一个日后列宁也反反复复犯下的错误（这和列宁在日俄战争期间的高度亲日态度有一种奇妙的联系），那就是为了某一个特定时期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有其进步性的目标而让渡一些地区无产阶级“作为自由人发展的权利”——这一权利当然应该包括自由使用语言、选择民族认同的权利！仅仅是因为捷克和奥地利所管辖的南斯拉夫地区由于封建制的枷锁和农奴制的残余而被维也纳的反动政权利用、发动起了属于这些民族的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急不可耐地转移到了为德国资

产阶级的泛民族主义目标欢呼、接受他们“灭亡捷克人”的最终可能性——尽管恩格斯自己也明确说这一事件如果最终发生其原因也只能是德国人的压迫，但是恩格斯显然在为这种“自然的进程结果”而惋惜的同时并不反对捷克人最终为德意志人所完全吞并，仿佛被压迫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意识为相对落后的统治阶级（体现在1848革命期间，哈布斯堡治下的斯拉夫人为了防止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吞并，被维也纳的统治动员起来争求民族自决）所利用就理应导致他们民族的整体消亡！这显然是黑格尔主义世界观中那十分活跃的唯心主义历史阶段论所导致的结果，其在本质上既反对辩证法也反对唯物主义——民族，尤其是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这样有着自己独特语言的民族（无论他们当中那群被马克思认为能够代表民族最先进发展趋势的一部分有多么德意志化、德语说的有多么好，这些民族精英依然是产生自一个与德意志人迥异的语言和历史背景）显然不像日后那些定居者民族或者南非的布尔人一样因为特定的殖民主义背景而形成独立民族，那么又谈何在自然状态下的吞并呢？这个观点的荒谬之处并不在于它是否反对了民族自决在政治领域，也就是在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民族分离问题上的体现，而在于它事实上为了一段时间内某个大民族（如1848年的德意志人）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生产力的进步诉求而压制了另外一些民族作为自由人自由使用自身语言、自由地作为某个民族一份子存在的权利，这显然在根本上同社会主义的追求背道而驰——尤其是在这种政策于马克思所发表文章的时候完全没有和任何政党的实际政策联系起来，马恩作为作者也完全没有什么是必须“包容进步资产阶级”的需求——他们完完全全可以同时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中的问题，在热切期望后者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保持政治底线，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代以后都逐渐意识到了这个意见所蕴含的极端反动性，他们在爱尔兰民族自决问题（上文列宁所提及的部分）和其他一些问题的讨论中都不再秉持鲜明反对某一民族自决的立场（这其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从迟疑或否定转为某种肯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并没有正式地进行反思和纠错，而只是没有将1848时期的一些言论整合入正式的文集和作品中。马克思几乎从不以公开声明的方式否定自己早期的具体政治判断，《新莱茵报》时期的文章基本被他“历史性搁置”，而由于捷克民族问题并未再次成为马克思在世时候西欧现实政治的核心矛盾，因此他也没有重新表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做的历史修正是隐含的，也就是他通过对爱尔兰问题的态度悬置了对捷克问题的表态，进而也在逻辑上一定程度否认了单线的历史民族演化论——但是这确实只是基于他日后意见的逻辑推论，他本人从来没有系统性反思或推翻过此前的看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列宁所进行的进一步意见阐述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阐释依然在为马克思一段时间内的错误论调开脱、认为这是“历史原因下”的妥协，而这个论调也给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把柄。所以，如果我们要追溯到马克思那里，最早的民族自决理论应用同语言并没有最直接或者最全面的政治联系，这一政策的实现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依然是由政治情况所促动的，甚至可以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机会主义倾向。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回到列宁的文本中重新反思语言作为民族识别标准的实际意义。不可否认的是，统一语言下的国家大市场对于一个繁荣、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健康发展”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条件，但是1860年代的爱尔兰果真不符合这个标准吗？1840年代开始，爱尔兰城市率比较高的地区（北爱尔兰地

区、都柏林地区等)就代表了手工业和近现代工业发展的集中地区,而考虑到英国殖民和文化压迫政策并结合实际的统计数据,这些地区至少有七成以上的工人和市民是以英文为主要甚至是唯一交流语言的。在整个爱尔兰岛,盎格鲁殖民政策系统性破坏了爱尔兰本土的凯尔特文化和语言,留下了一个至少在语言领域高度日耳曼化(英语是一种日耳曼语言)的国家——然而就算我们完全不考量天主教在爱尔兰社会的状况,爱尔兰人民也从来没有因为语言和英国本土的统一就把自己当作日耳曼不列颠人或是视自己为伦敦王冠下的臣民——这恰恰是因为“联合王国”高度具有压迫性的殖民政策所导致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伦敦从来都没有把爱尔兰人当作是同本国所谓本土不列颠人完全平等的民族整体,以及这种态度下人为创造的爱尔兰大饥荒,才导致了这样一个语言上高度同化的民族仍然在政治认同中保持了极大的民族分离倾向以及这种倾向蕴含的革命性。如果按照马克思在1848年的标准,爱尔兰人的民族革命运动大概率将创造出一个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宗教上高度保守的社会,而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工人革命所需要的生产力发展——但是这个时候他完全摒弃了这个观点,而是要求将爱尔兰民族革命的浪潮扩大到英国本土,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能够符合更广泛国际革命的需求——这一政治传统成为了日后列宁所继承的政治主张。进一步扩展出来,就是列宁基于马克思在1860年代的看法,提出被剥削压迫殖民的民族有权通过彻底的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革命的方式同压迫它们的民族割裂开来,并用这种方式促进那一国家的革命发生,以此为基础准备日后的社会主义联合国家。



被人为制造的爱尔兰大饥荒

到这里这种论述就很明晰了——这一政治目的并不需要语言作为一个民族要素的直接介入,尽管它显然不否认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仍然是各个民族确定自身认同或者说民族范围和框架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如果我们摒弃一切上层建筑超越历史和经济现实带来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归类出以下的重要纲领:

一切自由人之联合的实现也必然包括了民族自决权利的保障

注意:这里所使用的是“民族自决权利”的保障,而不是立刻实现民族分离或者创

造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阶段，民族民主革命完全可以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环，甚至直接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所超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审慎地评判卢森堡的观点，以下内容引用自《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1908年第6期：

“在谈论‘民族自决权’时，我们是把“民族”的概念放宽到作为整体、作为和谐一致的社会和政治群体来看待的。然而，正是关于“民族”的这种概念是属于那些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范畴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要对它予以彻底的审查，指出它在此种晦暗难明的外衣遮蔽下，如同关于‘公民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概念一样，每一场合下都包涵着特定的历史内容。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它的历史任务应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朝着实现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革命利益的体现者。因此，有使命感的社会民主党所要实现的不是民族自决权，而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即无产阶级的自决权。社会民主党从这个立场出发来无例外地考察一切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从这个立场出发来制订自己的纲领性要求。无论是我们所要求的国家内部的政体问题，还是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抑或是司法问题和教育问题、税收问题或者军事问题，社会民主党不会听凭‘民族’按照自己的见地和“自决”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正如上面提到的一切问题一样，民族政治生活和民族文化生活的条件问题并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范畴；恰恰相反，在这些问题与民族政治生活和民族文化生活条件之间，通常有着最紧密的相互依存和互为因果的联系。因此，对于非常符合那个国家和那个时候无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利益以及社会革命发展利益的，并且关系到民族政治和文化生存方式的这些愿望和积极要求，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就不能对再次陈述这些愿望和积极要求推卸责任，但是不要把这件事留归‘民族’去解决。

“当我们只要把问题从抽象的烟雾中导引到具体关系的地面上时，事情就一目了然了。

“‘民族’有‘权’进行自决。那么谁是‘民族’和谁是权威呢？谁有‘权’成为‘民族’及其意志的有权威的体现者呢？用什么方式去辨认‘民族’根本上究竟想要什么？难道会有一个政党，它会不认为自己与其它所有的政党迥然不同，正是‘民族’意志的真正体现者，而其它一切政党仅是民族意志扭曲的、矫柔造作的体现者？从事物的本质上说，一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党都认为自己体现了民族的意志，攫取‘民族’代表权据为自己特殊的垄断物。而且保守政党和反动政党俨然以民族意志的利益为借口并在某种范围内提出了与此相应的权利。法兰西民族意志毫无疑问的表达是法国大革命，然而拿破仑，他在雾月十八日政变中窃取了革命的成果，按照字面意义上的‘普遍意志’原则作为他的整个国家改革的基础。

“民族想要的东西，就是民族多数人想要的东西。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幸而在某时承认了这个原则作为律己的指令性原则：这就等于宣判作为革命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本身的死刑。从事物本质上说，社会民主党是代表民族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党。可是要知道，如果谈到自觉意志的表达，它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暂时还是少数的党，它仅是企求成为多数的党。须知，它不是以此种方法，即怎样在自己的意愿中，在自己的

政策中，在自己的纲领中反映民族多数的意志，而是相反，走这样的道路，即怎样成为决不是全民自觉意志的体现者，而仅是无产阶级自觉意志的体现者，在此范围内，这个阶级以及社会民主党不是也不奢望成为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者，它所表达的仅是大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中先进的、非常革命阶层的意志和觉悟性，再扩展这种意志，开拓把它扩大到劳动人民的大多数那里去的道路，然后才以他们本身的利益来启迪他们的觉悟性。可见，‘民族意志’或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意志，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根本不是偶像，要在它面前屈膝膜拜；恰恰相反，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历史使命首先在于使民族革命化，铸造‘民族’的意志，这里指的是它的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至于意识的传统形态，就民族的多数来说，因而也包括劳动者阶级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所表露出来的，往往都表现为资产阶级意识的形态，是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愿望为敌的。即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已是最强大的政党，它在今天已成为拥有 325 万选民的少数派，面对着拥有 800 万选民的资产阶级党，而有资格参加投票的总共有 1300 万人。尽管议会选民的统计数字提供得并不精确，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和平时力量对比的概念。可见，当今德意志民族是以此种方式‘自决’的：其多数人选举了保守党人、教权派和自由思想者并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交给了这些人手里。同样的情况还在更大程度上发生在所有其它国家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回答罗莎卢森堡所提出的问题——民族独立倾向是一种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物质条件下涌现、表达了被压迫殖民的某个人民集体同压迫它们的某个集体之间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而这一产物的实现渠道就是民族自决权。我们可以说，民族分离倾向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倾向的民族自决权诉求本身是被压迫民族寻求自由表达自身文化、语言乃至某种特殊生产方式之斗争的一部分。对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探讨并不需要我们放宽到所谓抽象民族整体的范畴，更不需要让社会主义革命党同一个抽象的民族整体利益或民族意志进行所谓直接对话。追求民族自决的斗争必然是蕴藏在阶级斗争之中的，而对于这种自决权的支持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者而言是一种包含在对阶级斗争的绝对支持之中的，这种支持更多时候体现为一种原则性、纲领性的支持，也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对“自由人的联合”这一最高纲领的支持。这一最高纲领自然支持了最为广泛的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权利，不过列宁在其民族自决理念中所暗示的纲领超出这一范畴——社会主义政权应该通过广泛的政治代表和民主机构，尤其是工人民主的政权组织模式，在超出资产阶级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倾向的同时实现民族自决，也就是说，“民族自决权”虽然代表了“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无论是体现在宪法中，还是政治机构和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机器的组织原则中，都绝不会直接代表“独立民族国家的立刻成立”——一种被保障的权利和被实现的政治状态自然是不同的，就好比社会主义过渡政权中的群众被保障了罢免议会代表和官僚的自由罢免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众随时随地都要拿起这一武器罢免所有的代表——这是非常浅显易懂的原则，它更是被马克思和列宁对联邦制度同生产力与政治集中之间的政治转换的态度所验证。列宁表示，尽管社会主义者在原则上可以接纳联邦制成为社会的一种组织模式，但它最终的目的一定是消除民族界限和国家边界，进而在共产主义的无国界社会到来前首先实现各个国家在一个完全民主的政治机关中的统一。具体仍然参见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的表述：

“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它通过报刊和参加代表机关等

等途径，以不同方式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卷入了政治。另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作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前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由于争取政治自由，特别是民族权利的斗争的开展，民族运动方兴未艾，人数最多、最‘难发动的’居民阶层——农民投入这个运动。后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没有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时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完全卷入商业周转的各个民族日益接近，杂居在一起，而把跨民族联合起来的资本同跨民族的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

——马克思所面对的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而在那个时候一切阶级的居民被卷入政治，而他们形成较封建共同体而言更加进步的联合政治力量的方法就是创制民族认同；这个民族意识在欧洲同语言和书写的历史息息相关，在东亚（尤其是中国）则和表意文字以及以高识字率为基础的统一国家机器直接联系起来。在列宁的时代，民族运动慢慢为资本家的联合体所放弃，它的激进部分逐渐通过经济斗争下沉，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时代跨民族的工人运动，这种运动又囊括了许许多多不同民族自决诉求的集合，就像俄罗斯帝国崩溃所展示的那样。

“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只有瞎子才不能从这一串事变中看出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兴起，看出建立民族独立的和单一民族的国家的趋向。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俄国及其邻邦处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条。”

——可以看到，列宁对于亚洲民族革命问题的看法依然不是完全基于语言，而是高度政治性的。尤其是列宁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日后在《加拉罕宣言》中进一步得到确认，也就是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是个很好的案例：当时的中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操着一种不同的方言，不同地区的人民之间也很难在不实用书面文字的情况下相互理解，如果按照所谓纯粹的语言民族观点来看，中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民族。然而，列宁和苏俄政府在俄国革命成功后显然没有抱着过去的殖民主义态度、采取帝国主义手段分裂中国，而是力求通过完成中国的国内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方式让民族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解决。第二次《苏俄对华宣言》中不仅提到了这一点，更是通过超越第一次宣言中仅仅废除截止到《1896年条约》的范畴，废除全部历史上的俄罗斯政府对“历史上的中国领土和……中国境内……沙皇……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加拉罕宣言作为社会主义民族自决权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实现方法至少有以下几个重要的进步意义：

1，通过将俄国对清条约确认为“俄国对华条约”，证明一个国家内历史上的封建政权通过被推翻时各族人民参与的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可以合理、辩证地转换为新国家，而革命所创造的民族不仅是合乎历史和经济现实的，更是同那些封建政权所代表的历史上的时期有绝对的连贯性。也就是说，通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资产阶级法统论的同时驳斥了对历史连贯性的否认与当时帝国主义者认为清朝崩溃后像中国这样新生的多方言、多文化国家不得合法存在的论调。

2, 主动承诺在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后废除帝国主义的领土掠夺, 以实现被压迫民族的再统一, 进而创造社会主义繁荣经济的条件, 并为未来合邦于一超民族、超国界的统一国家做准备。



蒙古人民共和国 (1925年)

3, 说明社会主义政权同帝国主义力量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斗争时更加应该诉诸于共产主义所必要的“经济和政治集中”, 尤其是应该捍卫如中国这样在当时欠发达多文化国家的团结与统一, 以社会主义革命联合的力量取代确实实具有小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落后倾向(尤其是在中国, 当时兴起的满洲宗社党独立运动、西藏佛教反动派独立运动、内外蒙王公独立运动等等)的分裂势力, 尤其是揭露民族自决的自由分离权完全不对等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分裂运动——也就是说, 尽管共产主义革命党在广泛的原则上和最高纲领上支持一切群众领导的民族自决运动, 但只有当民族自决运动确实实反映和代表了一个广泛的群众趋势的时候, 才应当由革命党在现实政治的层面支持并尝试利用。进一步拓展: 列宁和苏俄政府曾经表示, 若不是恩琴入侵了外蒙古并割据一方, 红军也完完全全不会攻入该地区并建立起蒙古人民共和国政权——因为当时的广大蒙古人民依然依靠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支持, 而蒙古地区和中国其余地区的团结显然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发展, 只不过这一物质情况随着恩琴的入侵转变为了蒙古人民同白俄入侵者之间的矛盾。而在这之后斯大林所主导的蒙古民族大屠杀和文化灭绝活动, 也就与列宁的初衷毫无关系了。

无论如何,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得到本文最为重要的纲领性结论:

革命党人支持民族自决权的全面贯彻不代表社会主义者有完成一切民族国家建构的义务

于是,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民族自决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超历史的“民族集体意志权利”, 更不是一种必然通向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义务。它产生于阶级

斗争之中，也必将终结于阶级斗争之中；民族自决的权利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服务于自由人联合这一最高纲领的政治民主形式。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表达了被压迫群众在既定社会关系中摆脱一切领域压迫、实现政治平等与自由发展的最为彻底的需求。正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者对民族自决权的承认必须始终是原则性的、纲领性的，而绝不能机械地转化为对任何具体民族分离运动的无条件承认和支持，尤其是当这些运动显然不反应广泛的人民意愿、为资产阶级所劫持的时候。更必须明确的是，民族自决权的保障并不等同于民族分离的必然实现，更不意味着革命应当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再生产承担任何历史责任——相反，它恰恰是为了通过消除民族压迫这一阻碍，来消除无产阶级大联合、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障碍，以为跨民族、跨国、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政治完全统一创造条件。只有当民族自决运动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意志，并自然而然地加入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时，它才能够实现它的全部潜能。一旦民族自决的口号和形式被异化为上层建筑的附属品，成为旧精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维护他们一亩三分地的工具，或被帝国主义体系用作瓦解被压迫社会团结力量的武器，它就必然不可能再反应群众的总体愿望，更不可能反应他们所期待的、民族解放带来的真正自由。因此，民族问题从来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内涵，或是社会主义革命党必须选边站的某个所谓重大问题——它是我们的革命在特定历史阶段不得不经过的关口，而我们革命者的任务绝不是在“支持或反对民族自决”的抽象对立中选边站，而是在斗争中坚持唯一不可让渡的根本底线——我们的行为是否扩大了自由人的联合、是否扩大了阶级斗争的潜能、是否对人类从一切压迫中解放而披荆斩棘。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以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视角开创新时代革命的宗教策略（一）：探究作为社会现象与物质基础的欧洲宗教

作者：齐项德



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漫长历史中，宗教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上层建筑的属性已经被分析的十分清楚。然而，中国左派常常在现实的革命任务中忽略宗教在物质基础层面以及更加复杂的政治力量关系中的实际作用和地位。本文延续了《民族篇》中的理论评析模式，力求通过在经典理论文献的基础上、依据最新的各种社会事件和革命运动经验针对宗教问题提出我们时代的全新见解，并构筑新时代社会主义革命者应对宗教问题的理论体系。本文最大的创新就是将马克思与列宁对于宗教的理论论断放置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并一改以往中国左派提取他们的结论、机械应用于一切其他宗教场景的理论逻辑，改而以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专门总结应对其他不同社会环境和拥有不同物质基础的国家中宗教与文化发展情况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依照这一精神，本系列将西欧、东欧、西亚、东亚、美洲等不同地区的宗教情况进行分别梳理与分析，并着重于探索革命现实中可以应用的多种宗教策略道路。

什么是宗教？马克思说“宗教是……（一种）‘世界观’……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

成了幻想的现实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也就是说，马克思首先确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宗教从唯心主义的“本质论”出发、通过树立自身一套完整世界观的方式形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认知世界的方法和实践原则——宗教的全部逻辑从这个基础上出发，形成了它独特的现象。从这里，我们可以概括出几乎一切宗教都拥有的几个基本维度或要素：组织、经济、社会动员、国家机器融合等等。这些要素同抽象的不同宗教迥异的“思想内容”不同，定义这些维度的目的在于指出宗教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取得存在方式、如何塑造人的社会生活、如何创造社会群体与划分、如何形成权利集团等。换言之，我们要讨论的不仅仅是“宗教是什么”，而是“宗教如何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宗教之所以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并在在社会生产关系不断进化的过程中屡次以新的形态复活正是因为几乎一切宗教都在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中承担了某些真实、具体的功能，并为各种各样同样真实、同样具体的社会力量所需要——一言以蔽之，宗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世界观为核心、以组织形式为载体、以财富资源为支撑、以群众动员为运行方式，并在一定条件下与国家机器产生融合的总体性社会形态。

宗教首先是能够稳定延续的组织系统。它不仅向个人提供关于世界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它把“解释世界”的世界观理论通过以教义、教条和“传统”为标志的、教会所独有的特殊组织形式固定下来。许多早期宗教都产生自无产阶级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朴素理解之中，用以填补古代国家机器管辖范围边缘各种劳动者共同体缺乏只需的情况。考茨基在《基督教之基础》中提到：

“基督教会所原始包含的分子，几乎全无例外是无产阶级，并且它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组织。而且这种情形，就从基督教早代开始之后，在一个长久的时间，仍然是真确的。”

——这个观点适用于大多数宗教的起源，也正因如此，宗教并不是飘在社会之上的“观念雾气”，而是古代无产阶级自发构建能够产生稳定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秩序的基础设施的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其古代无产阶级的自发倾向仍然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的特征——在教会仍然处于比较封闭的农业生产环境时，这种孤立的“共产主义孤岛”特征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是绝佳的贸易对象，而这种特征直到古典时期的国家机器同教会的集体生活边界被打破后才彻底烟消云散。

考茨基写道：

“在上古时代的结束和早期的中世纪之间，寺院中合作的生产方式是很适合于农村生产的条件的；这便显示出它的胜势。但在城市中便不是这样了，城市之生产条件是反对协同工作的，所以，在城市中，共产主义只能为消费的共产主义形式，不过决定社会关系性质的最后分析不在于分配和消费的方式，而在于生产的方式。只有在乡野之中，在僧院之中，基督教原来所希望的消费团体，才得获一个生产团体的永久基础……在这一个生产组织中，便发生基督教寺院之巨大构造，至今仍然存在。

“但当基督教不复为国家之反叛的组织，而且为国家所承认的时候，则乡野间的传布，便没有妨碍了。从这时候起，在乡野间，没有别的东西可为基督教会组织进行之阻碍。在最初三个世纪，基督教也和犹太教一样，几乎全是一种城市的宗教。现

在，它成为农村的宗教了。

基督教之共产主义的倾向，和基督教一同侵入农村，在农村中，它找获了几种完全与城市不同的而且非常可喜的情况，这在我们上面讨论敬虔派时，便已讨论过了。共产主义组织开展的可能性，一经在农村中建立起来，农村在基督教形式中，马上便觉醒一种新生活了，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都指明它能够完成需要是如何地伟大。当基督教为国家所承认时，这就是说，在第四世纪的初期，第一个僧院，建设于埃及，其后在罗马帝国的很多部分中，很快便有其它的各个僧院随之而起了。

这种共产主义的形式，不特不为教会及国家的权威所反对，它还为它们所助奖，这种情形，很像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在美洲的共产主义的试验一样，它们也是同样地为当日的英法两国的政府所赞助。他们巴不得劝导那些大城市中的常动不息的共产主义宣传者，隐遁于世外，投身于旷野中，从事一种农耕的和平之教化。”

——在古典时期国家极其薄弱的时候，教会可以管理人群、记录与分类人口、规范生活方式、调解纠纷、垄断经典解释权与道德裁判权，并在国家机器难以触及的边缘承担大量“准治理”功能。基督教就是产生自而古罗马帝国时期巴勒斯坦的阶级矛盾与政治对抗，而早期基督教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扩张就是因为它在群众生活里形成了可以轻易复制的共同体组织形态，也就是基督教那具有强烈古典共产主义色彩、直到基督教完全融入城市并大规模产生知识分子集团、发生阶层分化后才转换为我们熟知的中世纪基督教团形态的集体生活——早期基督教共同体中带有强烈平等色彩的共享倾向随着基督教运动的扩张经历了几乎和古典共产主义公社崩溃一模一样的阶段，由于从最初相对松散、以共同生活与互助为核心的形态，逐步走向更稳定的职权分化与横向权威阶级的形成。基督教组织形态的变化是它所代表的信徒阶级构成之社会力量关系变化的反映。所谓“宗教世界观”必然要通过某种组织形态来落地，基督教会从分散化的原始公社进化出了体系化的神职人员网络与阶层式权威，这些组织结构反过来又塑造信徒的日常生活。在古典国家权力的缺口处，宗教作为组织的力量首先把“原子化的个人”编织成某种生产秩序共同体的一份子，并力求以教义的方式使共同体具备跨地域、跨文化、跨国度、跨时代延续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任何宗教与教会组织在古代促进人口聚集与生产力发展都构成其独特的“组织事实”。

比主流旧基督教宗派更晚出现的伊斯兰教也同样能够证明这个观点。由于伊斯兰教崛起时的地中海社会已经较基督教出现时有更先进的生产力与更密集的知识智慧，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权威也较之前的一神教有了新发展。伊斯兰教本身自发产生了“乌理玛”学者集团与基于教义的各种教法学派和独立学院，支撑这些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来自国家机器的赞助，而是各种穆斯林教团的集体捐资（其作用类似于中世纪基督教会的什一税，但是比例更高、教团对其调动能力更强）——这是某些冷战前自由派学者最喜欢强调的所谓“教会网络”、“宗教脱离物质历史的独立性”的基础——实际上这完全不能代表伊斯兰教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演化历程，而仅仅表明教会作为国家机器和中央权威尚不强大时期的“第二层社会治理设施”出现，我们印象中欧洲与伊斯兰教帝国内“世俗贵族统治者”和“神权统治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这两层古代国家治理设施的争夺，连带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对群众“文化霸权”输出的工具（也就是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时

代所谓世俗化与神权之争)。这一逻辑至今在美国这样地广人稀、者中央和地方政府难以触及大量乡村定居点的地方依然适用。而统治阶级就文化再生产工具的争夺也同样塑造着群众的意识——诸如此类沙特与阿联酋这样的伊斯兰神权国家（二者是“萨拉菲亚运动”神权制度，和阿富汗塔利班或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所不同，后者的出现有更多现代资本主义的干涉因素，而前者几乎是自然地产生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演化）的政权形态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是在建立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吞并或整合了整个传承一千多年的伊斯兰集团社会治理设施，因而将整个统治阶级的内部稳定与团结捆绑在了神权之上。

由此可见，宗教是世界观的集合，更是社会运作方式的集合。古代的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首要事实和职责就是在群众生活中提供了可依赖的组织与秩序。这种秩序随着有组织人类社会集体对生产力集中和生产关系进步的需求在其内部自然演化出了阶级的分化、神职人员的权威化等等——我们并不需要具体地探讨这个从原始共产主义残留转移为古典阶级社会的过程，因为它的发展实际上和阶级社会与国家的产生没有太多差异，马克思也已经论述得十分清楚。我们接下来将直接进入中世纪与近代，继续探讨宗教的几个其他方面。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宗教问题的论断是基于19世纪的德国宗教情况出发，并且可以被扩展到当时的整个西欧——西欧的基督教各派系的“蓬勃发展”在当时已经事实上处于最后的尾声，几十年后的欧洲就会迎来一个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宗派都不再能够动员起先前那样磅礴的群众和国家机器力量、退让于所谓“世俗化”的政治力量。在19世纪的欧洲，同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阶级高度绑定、经历了十几个世纪建制化、同中世纪封建国家平行发展的教会机构事实上是那个黑暗时代的尾声——在这里，我们先暂时不谈新教会的形态，不过新教各派无论是路德宗、信义宗还是公理会派在日后也很快采取了和天主教会十分相似的发展路径。

在16世纪宗教改革爆发以前，天主教会之所以能够在西欧成为被所有进步派和社会主义者全面批判的团体（不过它在当时的反动落后作用并不如新教会那样大，天主教会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惯性经常提出一些改善劳工生活状态的主张，也经常主持慈善活动，而新教团体则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著名的英国和美国童工压迫政策就是在当地浸信会的支持下普及的），也就是一种超越“单纯信仰”的历史力量，恰恰在于它同时承载着两种彼此张力极强却又长期共存的社会现象：其一是依附于封建领主、被采邑化与地方化的分散神职人员系统；其二是独立于封建国家机器、并在地产与法权上形成相对自治乃至自立的的教会上层建筑——这两种系统被天主教会的教义和传统统一起来，构成了横跨一千多年的西欧拉丁教会。前者决定了教会可以在封建领土中与土地贵族共存，通过各种方式帮助统治者稳固统治，进而成为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一千多年没有能力城市化、野蛮黑暗的西欧中世纪乡村共同体日常秩序的一部分；后者则决定了教会可以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以独立的组织模式维持相似于拉丁人在古典时期建立起的国家机器秩序，在整个欧洲跨地域地维持“超地方”连续性——这在后来成为了欧洲罗曼语国家的种族主义来源之一，他们认为自己是所谓黑暗中世纪封建世界中少数仍具所谓“古典制度气质”的国家（实际上这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与历史神话发明，难道路易十六在上断头台前会觉得自己和普罗旺斯或者旺代的老农一样都是“伟大西罗马拉丁文明的继承者”？）——也

正是在这两者的矛盾统一中，拉丁教会既不断被孤立蚕食，为封建领主所完全吞噬、也能够不断对封建秩序施加约束。

上述第一种现象的典型表现就是中世纪西欧广泛存在的所谓“自有教会”，也被称为“领主教会”（proprietary church/Eigenkirche）与由此延伸出来的圣职任命权、教产处置权与地方宗教支配权：封建领主在私有土地上建立教堂或修院后可以依照传统过保留对其人员任命与教会地产收益的一定支配（在很多时候这种支配权基本上是全面支配权），这使得大量基层神职人员在事实上成为领主统治的一个附属环节。这种“采邑化”倾向就像上文所述，其根源在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社会结构——来自维斯瓦河和第聂伯河（还有马克思所说的“野蛮荒芜的条顿森林”）的游牧日耳曼与哥特野蛮人用野蛮的武力破坏了罗马帝国的文明、断绝了他们在全欧洲的定居点传承。这些蛮族征服者大多都是印欧移居者和战士的后代，没有任何定居农耕传统、没有书写文化，更是没有产生出复杂阶级分化的社会关系，他们虽然破坏了西罗马帝国的一切文明，却没有任何能力建立起罗马帝国那样成熟、的文明体系。他们即没有能力收税，也没有足够多的人口进行垦荒，甚至连铁器都是从罗马人那里交易或者盗窃来的。在日耳曼野蛮人手中，西罗马帝国拉丁文明建立起的覆盖了西地中海世界八百多座城市定居点、几乎全社会的财政、司法与行政体系被破坏殆尽，曾经光荣的罗马城与科隆城几乎成为废土，直到近代工业化才重新拥有万人以上的人口（罗马城周边地区在中世纪的人口不足两万，内城不过数千），富庶的安达卢西亚和科尔多瓦山区更是到了伊斯兰征服时期才重新拥有像样的城市。日耳曼人的低贱文明与社会工程学智慧的几乎完全丧失导致他们只能建立起封建化的松散国家，而这样封建制度中的社会控制必须依托地方性的私权力来完成。日耳曼人自己的异教不过是战士武力文化崇拜和性器官崇拜的演化，自然承担不起这样维护上层建筑、安抚民众的任务，因此这个任务就落到了西罗马帝国文明制度最后的残余，也就是拉丁教会身上。但是，在探讨西欧的拉丁教会封建化与国家化之前，我们还需要简单分析基督教是如何成为罗马人国家经验的部分载体的。

在尼西亚基督教会议以后，罗马帝国皇帝们为了解决古典多神教衰落与罗马帝国意识形态危机（既有内战的余波，也有来自东方的波斯第二帝国政治神学传播带来的社会动荡）相当热情地鼓励基督教大规模扩张，并在东西罗马帝国最后一次分裂的四世纪晚期基本使基督教取得了罗马帝国国教会的地位。正是因着这样的地位，西罗马帝国的拉丁教会才能够极大程度地吸纳罗马人国家建设的经验——这里还需要探讨为什么只有西欧的拉丁天主教会取得了这样的地位。这种地位是由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人文情况的巨大差异所决定的：在罗马帝国政府其公元二世纪时期的鼎盛疆域前，罗马帝国西方只有一个体量较大的文明，也就是迦太基文明。迦太基文明建立了突尼斯、南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大量城市，而这个时期的高卢（现代法国）、莱茵河沿岸和阿尔卑斯地区都还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原始国家出现。高卢的凯尔特部落都还维持着德鲁伊自然神崇拜与早期部落制，阿尔卑斯更是罗马人自己的“宁古塔极恶苦寒之地”；不列颠尼亚的凯尔特人聚落也保持着类似的社会形态。因此，罗马人在征服迦太基并进一步整合了整个西欧以后并没有太多现成的文明、城市或者国家机器可以继承和利用，罗马人在这个区域的开拓也基本是以殖民、建立定居点、城市化和拉丁化当地蛮族、修建新的道路和交通网络与基础设施为基础开展。而前序文明的匮乏也导致罗马人在这些地区的扩张局限于定居点，进而，国家机器

的欠缺和疏落给予教会介入的空间。而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下文会进行更多探讨），此前已经有了希腊城邦文明、赫梯人、各种各样的古代闪族国家、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亚美尼亚王国等等高度城市化、国家机器高度发展的当地国家，罗马人对于东部地区的征服也有许多识字城市化人口组成的社会治理设施能够直接继承——这些物质基础使罗马人在这些地区的征服与扩张收益率远高于西半部分，最终罗马人的帝国也是在它所获取的东半部分存活到了十五世纪。总而言之，基督教会这样割裂的社会条件下大体成长为了西欧的拉丁教会与罗马帝国剩余政权统治范围内的希腊教会，也就是日后的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至于那些在不列颠、阿拉伯、伊朗和亚洲其他广大地区的基督教会我们则暂时不做探讨。

无论如何，对于日耳曼征服者而言，拉丁教会作为唯一能够在乡村长期驻扎、并以礼仪与有限的文化教育融入农村社会共同体日常生活的制度，自然被地方封建权力所“私有化”、“家产化”——日耳曼人抛弃他们那血腥暴力的性器官崇拜宗教也是物质基础使然，而不是天主教会所宣传的所谓“圣恩感召”。换言之，拉丁教会的基层社会设施在封建化过程中被拆解为无数依附性的地方节点，它的神圣性与仪式权威成为封建领主组织乡村秩序的低成本工具。

而在罗马和亚平宁半岛的部分地区以及那些罗马人城市的最后残留，拉丁教会的主教和教宗们组织起来，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独立天主教会的最早雏形——更进一步说，这种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最早的城乡对立。这就是天主教会所呈现出的第二种现象：以教会地产、修道院、高级神职人员的跨地域联盟为中心所形成的相对独立于封建国家机器的制度共同体。上文提及的拉丁教会在西罗马崩溃后所保留的古典国家制度遗产为这种覆盖面极广的共同体提供了切实的物质基础：拉丁文书写与教育、罗马法与教会法、教区（以及“都市教区”）与主教制高度国家化、行政化形态、以及对土地与财富进行长期制度化管理的的能力。也因此，教会地产并不仅仅是一种“财富”或者“生产工具”——与很多人脑海中的“庄园”不同，教会地产实际上是围绕着庄园定居点与修道院的占据数百甚至数千亩地的大型农田与贸易界点，有大量城乡居民人口依附于这些教会地产生存。这种以核心教会场所为基础构成的大面积封邑是考茨基所描述的古典时期共产主义基督教会自然演化所产生的一种形态。这些人口聚集区构成基督教会维持神职人员、教育与救济（维稳）、并在地方社会承担公共职能的经济基础；大量土地与资源向教会的集中实际上标志着从古典世界向中世纪世界的制度大崩坏，也就是欧洲人口中的“黑暗时代”。在国家机器退化，其公共职能坍塌的条件下，教会以其财产与组织承接了旧的罗马人国家部分“公共性”（*res publica*，罗马人口中的“国家”就是一种“公共事务”的集合，这个词后来成为了印欧语言中的“共和国”）的残余，从而在封建碎片化世界中保持超地方层面连续性。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天主教会既会在地方层面被领主采邑化，又会在跨封建领主领土的层面形成自立乃至能够与各种中世纪封建王权分庭抗礼的上层建筑：拉丁教会在制度上的确是古代罗马人更为文明之国度的残影，而日耳曼人建立起封建国家却没有任何建设集中制主权国度的能力。

这两种倾向，也就是国家化、领主化倾向与自主化、独立化倾向并不能代表某种历史进步意义上的“好坏之分”或“进步与反动之分”。它们都是西欧物质历史演化的产物：封建国家的弱小与碎片化推动教会被地方权力吞并，拉丁教会对古典制度

遗产的保留又推动教会形成超地方独立主权。二者长期拉扯，最终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被颠覆。随着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开始成熟，日耳曼人在十七世纪火药时代的曙光到来前花了整整一千年终于站在了罗马人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实现的生产关系之上——只不过这一次不是几百万人，而是上亿人都被纳入了那样一个文明体系中。当属于世俗统治者与王公贵族的行政机器终于在近代发展到如此庞大、如此强力，统治阶级就不需要也不再容忍教会作为“第二层国家机器”长期保留独立立法权与种种其他权力，而是要么将其国家化，要么将其彻底压缩为私人领域的信仰团体。普鲁士王国与奥地利帝国就是这一转型的两个典型样本：在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领导下开展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中，国家通过一系列法律把神职教育、任命乃至教会内部纪律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并以驱逐修会等方式削弱教会作为跨国政治力量的组织基础，其要义是现代国家对教会权力的夺取、收编。而在奥地利，早在约瑟夫二世时期便形成所谓“约瑟夫主义”（Josephinism）的国家化路线：哈布斯堡王朝以启蒙国家之名重整教会财产与纪律、调整修院组织办法，以渐进的方式世俗化神职教育、把婚姻等事务纳入国家治理，目的同样在于把教会从“自治权威”改造成国家行政秩序的一部分。到19世纪后期，当教廷权威在天主教会对于自由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应激反应之下进一步由调整教义的方式被强化（如当时的教宗提出“教宗无谬”，强化罗马天主教会中心对于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天主教机构的直接掌控相关争议）并与民族国家发生冲突时，奥地利政府又在意大利统一期间以国家法替代教会特权的方式推进世俗化立法，进一步压缩拉丁教会的权力空间。

马克思对天主教会的批判基本上也就是对于天主教会国家化或作为封建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一种分支的批判，而这个批判和他对于新教的批判是基本相似的。与很多人的印象不同，天主教和新教在十八世纪表现出的社会形态并没有太多区别。首先，宗教改革并不是简单的“让信仰回归个人”，更像是在近代领土国家崛起的压力下，对教会这一“第二层国家机器”进行再分配。路德以《圣经》权威反对教廷解释权、以反赎罪券抨击教会敛财，表面是神学争论，但实际上却迅速被卷入诸侯财政与国家建构。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借“改革”之名接管教会财产、吞并天主教会的治理设施，进而把原本跨国的罗马教会权威拆解为更便于吸纳的“领土教会”；这些诸侯就是那些利用神学粉碎了德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反动分子——这是日后天主教会权威衰弱的先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如是写道：

“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象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代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

的确，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隶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中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但是，即使新教没有正确解决问题，它毕竟正确地提出了问题。现在问题已经不是同俗人以外的僧侣进行斗争，而是同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同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如果说新教把德国俗人变成僧侣，便解放了世俗教皇及其整个集团即特

权者和庸人，那末哲学把僧侣精神影响极深的德国人变成人，这就是解放全体人民。但正象解放不应以王公的解放为限一样，财产的收归俗用也不以夺取寺院财产为限，而这种夺取是由伪善的普鲁士最先实行的。当时，农民战争这个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因碰到神学而垮台了。今天，神学本身已被粉碎，德国历史上不自由的最尖锐表现 - 我们的现状 - 碰到哲学也要垮台。宗教改革以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革命前，德国则是小于罗马的普鲁士和奥地利，保守的容克和庸人的忠顺奴隶。

可是，彻底的德国革命看来面临着—个重大的困难。

就是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国思想界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答案之间的惊人的分歧，是否会同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以及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的同样的分歧一致呢？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理想。”

在这一基础之上，到 17、18 世纪，西欧出现明显的教会体制趋同：无论天主教还是路德宗、加尔文宗都通过各种学堂法规和人身限制把宗教组织变成塑造“顺民”、规训日常生活、服务统治阶级的粗暴机械。正因如此，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跨越教派差异的、针对德国宗教作为“颠倒”的产物、针对一个新旧教都已彻底制度化、并普遍承担统治阶级合法性再生产功能的西欧社会。这种批判自然同时击中西欧的天主教与新教——归根结底，二者都来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那持续千年之久的拉丁教会传统。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对西欧的分析直接套用于东欧与突厥化、游牧化以前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它却会立刻失真。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在那里，罗马帝国的东半部从未崩溃，而是长期存活为整个环地中海世界最发达、行政最成熟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条件下，教会从来都不需要也没有权力像拉丁教会那样在“国家真空”中承担第二层治理设施的角色，也就更是不太可能发展出与国家机器平行对抗的独立法权与财政体系。从这个罗马帝国东半部分产生了基于东方通用语言希腊语的希腊教会，也就是东正教会。东正教会代表了欧洲东部地区和亚洲大部分地方基督宗教更典型的历史形态，也就是同国家权力长期共生的国家化教会。这种国家化教会如同拉丁教会继承了罗马人的智慧一样也继承了罗马人国家的一部分传承，只不过这一次是“行政传统”。直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前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和各地贵族对于教会都有极深的影响和掌控，这种掌控在东方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被罗马人称为“独裁者”的皇帝召集“大公会议”、介入教会行政、操纵主教任命。东方的希腊教会所发展出的教会法仅仅局限于教会组织章程的程度，教会本身被并未发生断裂的罗马国家法与帝国秩序被组织为总体治理的一部分。这类关系常被概括为“凯撒教皇主义”（也就是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这里的教皇指的是世俗皇帝也作为控制教会的“皇帝”，而不是拉丁教会的“教宗”概念）的历史现实。尽管其内部仍存在一些神职人员同国家的对抗，但总体框架仍指向教会的高度国家化，受到东正教会影响的欧洲地区也从来没有出现像西欧那样高度独立的教会或者完全由教会所影响操纵的大规模政治动荡。

随着东罗马帝国在 1453 年崩溃，东罗马帝国的政治遗产主要为两个国家瓜分：在行政模式上基本照搬晚期罗马帝国体制的俄罗斯帝国完全接纳了同东正教会的关系以及东罗马的种种文化，而奥斯曼帝国则在领土、社会关系和国家机器的大体逻辑上继承了东罗马帝国。我们对后者不会深入探讨，只需要大体指出奥斯曼国度的行省制度、官吏体系、对伊斯兰教知识分子的国家化掌控等等政策基本上都是东罗马时期国家机器的“伊斯兰化”替换。而东正教会的地位在俄罗斯帝国时期更进一步被制度化：俄罗斯帝国的“沙皇”彼得一世于 1721 年设立“最神圣宗务会议”取代东正教会的独立牧首制，并以世俗官员（总检察官）监督教会，使教会在组织、财务与政策层面更直接地并入国家行政体系。他还作秀式地让俄罗斯帝国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和俄罗斯教会授予他“俄罗斯帝国皇帝”（俄罗斯帝国大独裁者）的头衔，发扬光大俄罗斯贵族颅内高潮的所谓“东方罗马帝国传人”。到了 1905 年前后俄国社会危机加剧、教会内部出现改革与开办“主教会议”等诉求，他们同沙皇政府的核心矛盾便更多表现为更多的教权主义倾向——这是因为教会因为沙皇统治的逐渐崩坏感到危机，开始更加主动地捍卫他们所依附、维护的那个国家机器，从暗处到明处同进步力量作斗争。列宁在 1905 年后曾经批判自由派认为“俄罗斯帝国内部不存在神权统治的反动倾向”的错误观点，认为在俄国社会动荡以后开始出现了一种尝试在政府内部建设以教权至上为基础的反动力量。我们参考列宁在 1909 年《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中的相关内容：

“俄国的民粹派和自由派长期拿一种“理论”来安慰自己，确切些说，是欺骗自己，说什么俄国没有好战的教权主义的基础，没有“教会王公”同世俗权力斗争的基础等等。我国革命把民粹派和自由派的这种幻想连同他们的其他幻想一起粉碎了。在专制制度完整地 and 不可侵犯地存在的时候，教权主义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的。警察和官僚的无限权力蒙住了“社会人士”和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阶级斗争，特别是看不到“穿着教袍的农奴主”同“贱民”的斗争。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打开了农奴专制制度的第一个缺口，秘密公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先进分子刚刚开始运用他们在 1905 年底争得的政治自由、组织群众的自由，反动阶级就急忙去抓建立独立和公开的组织了。他们在完整的专制制度之下没有组织起来，没有采取特别明显的活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软弱，而是因为他们强大；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组织起来和进行政治斗争，而是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感到有很大必要建立独立的阶级组织。他们不相信在俄国能发生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主的群众运动。他们满以为靠鞭子就足以控制老百姓。专制制度受到的初次创伤迫使那些拥护专制制度和需要专制制度的社会分子出头露面。要对付那些能够造成 1 月 9 日事件、举行 1905 年的罢工运动和 10—12 月革命的群众，单靠一条旧鞭子已经不行了。必须登上独立的政治组织的舞台；必须让贵族联合会把黑帮组织起来，并展开最疯狂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必须让“教会王公——主教”把反动僧侣组成独立的力量。”

第三届杜马和俄国反革命的第三届杜马时期的特点，正好就是这种组织反动势力的活动趋于表面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要求有一个特殊的黑帮资产阶级的“议会”。好战的教权主义完全暴露了自己的面目。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不止一次地目睹并参与了教权主义资产阶级同反教权主义资产阶级的冲突。既然我们的总任务是帮助无产阶级团结成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单独的阶级，那么这个总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要利用各种宣传鼓动手段，包括利用杜马讲坛，向群众解释社会党人的反教权主义同资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的区别。”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一结论：俄罗斯的东正教会始终没有在俄罗斯帝国时期对国家产生什么超出国家机器之外的独立的影响，因为它就是完完全全依附在沙俄政府之上，作为早期王公贵族宣称“罗马人国家的继承人”的合法性机构出现，而当民族国家兴起、亚历山大二世以后的俄罗斯沙皇转向大俄罗斯与大斯拉夫主义，东正教会的尊崇地位也发生了一次转化，成为了所谓“俄罗斯人的民族传统”。狗屁不通，如果是这样的话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后代们还可以说俄罗斯人民的历史传统是“长生天”，是崇拜“腾格里”和“成吉思汗”。而一旦沙皇统治出现松动，教会就从背后走到前台，开始动员起群众反对群众。

我们将在本系列的下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探析宗教在近代史中的演变，以及宗教的其他方面。我们将继续在历史结论与辩证法的基础上探究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革命者如何应对宗教问题。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永远翱翔的革命之鹰——罗莎·卢森堡 思想评析

作者：成梦 / 梧叶



“……夺回对罗莎的记忆，并把这真正美丽的，英雄的和悲剧的形象传递给年轻一代的无产阶级，带给他们这一切壮丽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为人类的共产主义未来奋战到底的勇气和能力，狭隘的懦弱者的终其一生也只能龟缩在舒适的巢穴中仰头呼唤着应许的喂养和温馨，而以蓝天和战斗为自己的最终归宿的革命者却总会毫不犹豫地悬崖绝壁之上跃而下，化作永远翱翔于全体无产阶级中间的自豪的革命之鹰。一百五十五年前，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和杰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战士之一的罗莎·卢森堡，就是这样从不起眼的小镇扎莫希奇坐着摇摇晃晃的干草车迈向这个动荡的世界的。

在世界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加速跑向自己的末日的当下，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趋势重建的进程中，有越来越多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厌倦了在战后秩序下垄断着马克思主义阐释权的斯大林主义体系。后者毫不羞耻地将自己官僚式的波拿巴主义统治称作列宁主义的正统继承，即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这样的糟糕范式不幸地为列宁真正的思想招致了一批不自觉的反对者。其中自然不乏资产阶级自由主

义者的刻意推波助澜，他们打着卢森堡的旗号费尽心思地将这些青年的健康的革命热情与对列宁的肮脏低劣的攻击相绑定。毫不奇怪，凭空捏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推动后世的革命者为死人的旗帜互相攻伐，是他们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小伎俩。

斯大林主义者恶毒无耻的谎言和自由主义者别有用意的歪曲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不得不在一百年后面对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们重新提出这样的口号：“放开罗莎·卢森堡！”革命不需要也不想要空洞的传说，更遑论将某些杰出的革命者塑造成完美无瑕的圣人以借这光辉捍卫自己的狭隘山头，或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叛徒以借这黑暗彰显自己的光芒伟岸。先我们而去的革命者的力量，来源于他们坚决而毫不动摇的斗争和宝贵的革命思想，正是无数这样的遗产给予了我们接过染着鲜血的革命旗帜，将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置于死地的可能。

目录

“祖国”、民族与阶级斗争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帝国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资本积累论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永远翱翔的鹰

“祖国”、民族与阶级斗争

年轻的罗莎·卢森堡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就找到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理念和与之战斗终生的敌人。年仅 16 岁的她就加入了“无产阶级”小组，并在学生中开展非法的社会主义煽动。而 22 岁那年，随着她投身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建设，罗莎·卢森堡所能留给我们的所有珍贵的理论特点就已经在她那富有激情和战斗性的文章中初显端倪。

立足于十九世纪末的时代背景，在沙皇俄国的专制政府下展开社会主义运动，使得波兰的革命者不可避免地受到俄国民粹主义思潮下布朗基主义式的影响，即把革命党的工作局限于少数人的密谋和恐怖行动，而所谓的宣传鼓动则完全沦落为“通过宣言和恐怖行动来激发人们的革命感情”这类单纯试图通过改变人们的主观情绪以促进“革命”浪潮的工作。对他们来说，革命的成功可以通过一小群献身者的坚定意志和决心来保证。而年轻的卢森堡正是同时期意识到这种理论的错误之处和它将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后果的人之一。

毫无疑问，作为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形式，革命不可能在阶级矛盾平缓的形势下提

出，或者说，直指社会制度乃至根本的生产关系变革的运动不可能基于那些对现状感到满意的群众，相反，对资本主义暴政刻骨铭心的仇恨往往才是推动他们走向街头起来斗争的动力。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决不因仇恨和恐怖得以实现。与布朗基主义所期待的由少数密谋者打着无产阶级的名义夺取政权的途径不同，社会民主党要求的是：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斗争夺取政权以解放自身。卢森堡就是依靠着数年来经济斗争的经验清晰地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即从分散的经济斗争到组织起来的政治斗争，从革命家的个人斗争到整个日益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为了发挥它应有的重要作用并且真正体现工人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必须最终同布朗基主义的传统决裂而立足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基础之上……人们终于看到，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在于目标明确地领导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还看到，为了劳动阶级的日常利益而在经济领域进行的斗争、为了民主政体而进行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在有能力推翻现存社会以前非进不可的学校。”

波兰的无产阶级如饥似渴地从中学习知识的这所非进不可的学校，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之上的：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波兰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波兰人民曾多次掀起反抗深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革命，虽然最后均以失败和民族压迫的进一步加深告终，但其中1848年和1863年的起义分别对普奥当局和沙皇废除农奴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姗姗来迟的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条件；波兰王国和沙俄帝国之间的关税壁垒不久也被取消，这使得波兰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因此具备了广阔的销售市场和足够的劳动力，并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对沙俄市场的高度依赖使得波兰资产阶级成为了“‘王位和祭坛’的忠实支柱”而非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殖民地的地位则使得波兰民族资本被动地陷入了与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但也提供了将波兰的工业品远销海外的机遇，这使得波兰的大工业资本迅速向人数较少但实力相对雄厚的资本家倾斜以谋求生存和竞争力，自由资本主义从而得以迅速地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波兰的小资产阶级无疑在这个过程中损失惨重，与那些依赖俄国的政治经济资源而得以发展的垄断大工业者的相对的利益的矛盾，促使他们带上了一种“爱国情绪”，期待着实现所谓的波兰独立。历史上，波兰独立的问题的确很早就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重视，但是这样的重视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的民族掠夺政策和民族压迫的抗议”之上，尤其是对欧洲最顽固反动的堡垒沙皇俄国的残暴的民族压迫的抗议之上的，波兰的所谓社会爱国主义倾向从一开始就不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有丝毫领土。即便如此，作为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惯用的策略之一，他们首先尝试的仍然是借助正在蓬勃发展的波兰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迷梦，这具体表现为尝试糅合波兰民族独立的纲领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以“把工人运动导向爱国的航道”。

卢森堡清晰而坚定地与此种倾向斗争。她首先说明的是，加里西亚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和波兰社会党将过往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即波兰独立问题，正式变成了“对内政策”的纲领，这就是说，波兰的无产阶级将要把推动波兰独立，即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波兰民族国家作为自己阶级斗争的政治任务，就如同他们国际上的同志们在各把争取普选权和八小时工作制作为自己斗争的任

务那样。这样的纲领上的转换将要首先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即阶级利益和解决任务的物质基础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只能在“考虑这一要求同各个波兰国家的客观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关系以及同这一发展本身为无产阶级解决它的任务所提供的那些物质手段的关系”的基础上得以解决。

任何企图建立梦中的只归自己剥削的独立波兰天国的小资产阶级都没有考虑到的是，在维也纳会议后被迫被三国分治的波兰如今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即三部分间的经济联系的状况使得波兰经济与其重聚在一起，倒不如保持分立的状态更好。通过结束各地区的割裂状态实现政治经济上的统一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妙蓝图，已经在19世纪末的波兰过时了。事实上，单从会议波兰在短时间内即已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它的大工业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恰恰正是因为它和沙皇俄国在政治上的紧密联系为它换来了经济上的紧密联系，而这才是波兰小资产阶级可望而不可即的那个蓝图在波兰的实现——但却根本无法依靠“波兰自己”！虽然波兰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傻到真的要仅仅将波兰的三个部分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以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波兰民族国家，而不顾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但他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其本能驱使着他们期望的只不过是所有资产阶级都最爱的事情：不劳而获。他们看到了俄属波兰地区先进的大工业和俄国深厚的劳动力储备，看到了德国的谷物市场，看到了下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等对原料的经常需求。他们期待将波兰各地经济中最有利的优势部分据为己有，至于这些优势从何而来，他们不曾考虑，自然就不可能理解，“重建波兰远远不是它的社会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直接与这一结果相矛盾的”。资本主义波兰独立的纲领因此将从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的逻辑相悖，它只是这样一个纲领，用卢森堡的话来说，就是“以制定者的主观愿望为根据，并且把发生一场欧洲战争的种种无法预料的偶然性作为实现的手段”的纲领。因此，看似道义凛然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自然不会完全如波兰的爱国者们所期望的那样去行动，他们不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名声就去背叛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和生产关系。经济上的倒退决定了这个爱国主义纲领所永远无法弥补的物质基础上的贫乏。

不难看出，擅于空想的波兰资产阶级的确是给波兰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務，这个任务不仅要求他们击败彼时欧洲三个十分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在违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情况下强行扭转波兰碎片们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向，还要他们在具有如此伟力的情况下，不是着手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建立资本主义波兰后立刻蛰伏起来，拱手将政权相让给美梦成真的有产阶级。这种梦呓实在是不能不让人发笑。更何况，基于一个独立的波兰的政治纲领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导向适应无产阶级需要的政治活动的开展，因为争取这样的需要的斗争，作为一个为了自身阶级的利益去打碎、掌握并重塑国家机器的过程，就不可能发于臆想，而是要发于现实的环境，即现存的政治经济形势之上的。

“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曾经首先教导工人阶级说，不要把单纯的愿望，不要把单纯的争取值得想望的东西的意志当作它的一切企图的动力，而是要把社会发展的实际的物质情况看作检验它的一切企图的试金石，唯有实际的物质情况才能够决定值得想望的东西是否也有可能实现，并且使有可能实现的东西也成为历史上必然的。”

波兰被瓜分的三个部分，因普奥俄三国无产阶级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天差地别，处于大相径庭的现实环境，这就意味着一个通行于三国的共同的政治纲领是不可能被制定出来的，即使有，那也只能是空想。谁能在无视三国的政治因素的情况下尝试建立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呢？能给这种“共同”提供地基的有且只有所谓的“民族因素”，而社会主义工人的运动恰恰是以不以民族性为转移的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卢森堡指出，“工人阶级必须进行这样的政治活动，只有提出现实的要求才能争取工人阶级，也就是说，要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些要求由于有真正的、迫切的和重大的需要在今天就会引起一场实际斗争。”

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争取都不过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去展开斗争的目的和结果，因而以波兰社会党为代表的，企图要求工人运动向着重建独立的波兰的方向发展的这批人只会看到，随着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取得进展，随着工人的阶级意图越来越得到实现，为了得到解放而要求波兰无产阶级努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的需要越来越小。一个资本主义政权，无论它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可能不首先按照人在社会上所具有的阶级属性而是按照民族去划分它的臣民。事实上，如果说法国、英国等国的无产阶级所处的政治情况要比在俄的波兰工人好得多，那也决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民族政府、生活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不，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受剥削压迫的处境不可能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其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一员而得到丝毫缓解。导致这种区别的仅仅是在法英等国，包括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下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内的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已经废除了落后至极的专制统治，那里的工人拥有着他们在俄国的兄弟姐妹还未争取来的政治自由而已。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

“资产阶级统治者和贵族在进行剥削时，是不区分本族工人和外族工人的。资本家并不尊重工人的民族特性，他们把每一个无产者都仅仅看作能够为他们创造利润的劳动力。作为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工具，今天的各国政府都不分民族地把工人阶级仅仅看作服兵役，榨取捐税，进行资本剥削的原料。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救星。可见，如果波兰工人阶级今天不是俄国政府的臣民，而是生活在独立的波兰，那么这个波兰国家也是他们的资本主义地狱，就象无产阶级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

因此，任何把波兰的独立、波兰民族的解放这样美妙的口号与波兰无产阶级在进行着的严肃的现实的阶级斗争相绑定的尝试，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产生除模糊斗争方向之外的任何作用，甚至把工人运动拖入无止境的谎言和自杀。因为这些将只不过是“一种朝人民眼里扔沙子模糊视线的政策”，是“对人民最卑劣的骗局”。恰恰只有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才是被压迫民族工人阶级的同胞，恰恰只有彻底铲除俄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生产关系而不是分离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才能为波兰劳动人民争取自由，恰恰只有这样不至于沦为“跟着资产阶级的调子跳舞的党”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捍卫民族性”。

基于对波兰的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民族独立路线的错误和严重危害的清晰而有力的阐明，卢森堡已经为她在后世遭到一切僵化的教条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做好了准备，她从一开始就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出发，对民族问题在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中的地位做出了明确。在她这里“道义上的反抗”和任何怯懦的小资产阶级政策一样，

只要它还是针对表面形式而不是实质，是反对后果而不是反对根源，是认识现象而不是理解现象的历史法则，是软绵绵的抗议而不是“猛烈攻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群众的革命反抗”，就根本不会变成真正发挥效用的政治因素。卢森堡就是这样，以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守和毫不妥协的态度，对民族自决问题和其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纲领中所应该占据的地位展开论述的。

“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使无产阶级有力量把现行国家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加以扬弃，用社会主义社会来代替它，却绝不是使无产阶级有力量使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作为一个政治机体的现行国家分裂。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增长总是那一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同时增长的反映，另一方面，后一增长又要产生这些后果，政治上的集中、国家各个部分的紧密结合、把各个部分互相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纽带的加强和增多。无产阶级只能利用资本主义的这些引起集中化的后果，使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使统一的国家民主化，但是无产阶级无法抗拒那些后果，并且使国家的各个部分重新获得独立。我们可以事先这样说，奥地利如果争取到普选权，将会激励无产阶级大大加强他们的一切阶级意图，但是决不会同时促使奥地利国家走向崩溃，不如说会使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在新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

作为这样的观点的一部分，卢森堡回顾并强调了20世纪初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加强，最终导致的将是处于少数地位和较小的民族在政治上注定的软弱无力。毫无疑问，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和平，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纯属空想。但是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历史的趋势一般来说也是趋向于消除民族特性和将人类融合为一个民族的。帝国主义在全球的争霸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对所谓民族国家毫不客气和不留情面地轻蔑，正如资本主义对温情脉脉的封建主义田园诗所表现出来的破坏性态度一样。社会民主党从形式上反对殖民政策和作为其重要表现的民族压迫，就不能不从本质上认识到这一现象是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之中的，这意味着它只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愈发进展和深化，甚至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也决不会也决不能产生倒退，而只会愈发走向经济联系上的紧密、政治上的集中。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越是正确地依靠不以民族性为转移的阶级斗争，反而越能促进他们政治目标的最终达成。立足于现存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卢森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没有与一切民族实际上的独立协调统一起来”，甚至也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与越来越多的民族独立绑定起来。

但是，民族自决问题被列宁以严肃的态度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提出，这是立足于20世纪初以来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的历史特点的突显，即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东方”的扩展的背景之下的。这就是说，不仅有诸多仍处于封建主义和民族压迫下的民族通过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甚至俄国革命面临的也不是像西欧中欧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局面，即这些民族已经不再因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飞跃性倾向，其中也不再会有民族会因为惧怕遭到更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情愿维持现状，即保持多民族国家的完整。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得不承认长期生活在德国的卢森堡对俄国乃至“东方”各民族状况和革命在历史上所处的阶段的失察，虽然这种失误丝毫也不能使任何人借机诽谤她对社会主义政治原则的坚定捍卫。

卢森堡担忧地指出“民族自决”这一提法“抽象”而“形而上学”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从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她尝试去说明，恰恰是在民族问题既在奥地利更是在俄国变得至关重要的背景下，摒弃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纲领翻译而来的理想的空话，提出“实践性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方案”是必要的，这意味着立足于此的政治纲领能够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实际和切实可行地解决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就摆在阶级斗争领域最前面；能够直接为工人政党和无产阶级的运动提供其需要的指导方针；能够直接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政策区分开来。发现“民族自决”的原则的确没有给任何确切的问题以确切的实践性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后，卢森堡就以她特有的急切和紧迫感指出，这一定则与其说是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治指导原则，不如说仅仅是无产阶级反对包括民族压迫在内的任何一种压迫的原则的矮化，是对民族问题的回避。对卢森堡来说，不仅仅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反抗另一民族压迫的情况下，甚至就是在同一对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下都可能是基于完全迥异的社会政治条件，即现实环境和现存历史时代的社会物质关系，而不是基于某种永恒存在的“民族自决”的权利。

不幸的是，正是卢森堡所极力强调的对民族问题的现实条件的考察，在她自己对俄国的分析中至少是部分地缺失了。她没有意识到，在反对波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之外，反对大俄罗斯主义也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她同样没有意识到俄国现存的民族独立倾向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她对于实际的解决办法的过度要求，最终导致了机会主义者们恶毒和无耻的滥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民族问题的期待将不可能在全部的时间和方向上保持一致，后者力图在这个问题上最终导向这样一个方向：或使本民族谋得特殊利益，或使资产阶级能够不受外部影响地安稳剥削本民族的无产阶级。因而反对一切特权和压迫地位的无产阶级不能不对于这种“实际主义”的提法提出反对，否则只会是“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列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这种“消极的要求”，即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是以民族的分离还是民族平等地位的实现结束，最终都要以保证本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而这这就要求他们不能给任何机会主义留下空间，这就是说，仅仅“以承认自决权为限”，不是“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东西”，而是相反，保障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集体实现完全的政治自主的能力的权利。

在列宁这里，保障这种民族分离的权利非但不是保障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利益，而且同时还是对于压迫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的反对，而这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障碍，同它在每个被压迫民族那里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中所一般地包含的那种反对压迫的因素所面临的障碍是一致的。即使支持对这类障碍的斗争，对于企图使得自觉民族具有特殊地位，因而享有凌驾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之上的利益的这种倾向，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这种看似普遍而理想化的政策，事实上恰恰是在民族问题上能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因而具有实际的切实的重要意义的原则政策。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在全面废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及其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根本的目标的这一点上，列宁和卢森堡的观点从来没有过半点出入。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可能不认识到，民族这一概念和它在资产阶级那擅于欺骗的嘴中的兄弟词汇“人民”一样，其内涵有多么虚伪和空洞。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和谐一致的所谓民族不可能存在于阶级社会，正如某些人恳切地呼唤着的和谐一致的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不可能存在于阶级社会一样。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将存在不可调和的生死矛盾。即使就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就例如殖民地国家等存在外在的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地方，民族的资产阶级或至少是其先进部分会提出民主的诉求，但是谁要是以为他们就能因此激发起“内在的革命性”而站到无产阶级即革命的一边来，谁就是根本无法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即无法从该国家的整个内部阶级关系决定、从斗争在其中展开的历史世代、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整个帝国主义或它的个别部分的依赖程度以及该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和它与国际革命运动的联系出发去分析问题。在这种短暂而浮光掠影式的一致，即“形式和口号一致性的背后”，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始终“掩藏着内容和实质性政策方面截然相反的意见分歧”，历史的教训更揭示，这种掩藏甚至往往是有意为之的。

列宁和卢森堡即使立足于不同的政治社会条件和斗争形势，面临着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侧重于民族问题在不同角度上的表达，在他们令人遗憾但无可厚非的分歧之外，共通的恰恰是对于自己所处的立场，即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立场的坚持。正是出于这种立场和对民族的唯物主义分析，卢森堡毫不客气地指出社会民主党就其存在而言，已经否定了资产阶级行使“一个和谐的整体民族”的代表权的荒谬。相反，这只能说明，“无产阶级已不再藏匿在资产阶级的衣襟后面，而是作为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意愿的独立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分离了出来”。理想的所谓综合体唯有在这样的制度下才是可能的，即在不仅铲除了阶级的压迫统治，而且铲除了阶级本身，从而使得全人类即社会能够自觉地决定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掌握自己的社会进程时”，具有统一意志的，已经失掉了其在阶级社会的意义的“民族”才是现实的，这种集合体掌握自己的历史生存才是现实的。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党，作为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主动地去影响阶级斗争客观的历史进程的党，所要立足的就不能仅仅是作为抽象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的“民族自决权”，而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即无产阶级的自决权”。列宁在这个根本性的立场问题上没有体现出与卢森堡的丝毫差异，在严谨地区分了自觉的民族在政治自主的权利下实行分裂的权利和工人阶级进行国际团结的必要后，他在与崩得分子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尖锐的斗争中同样毫不留情地指出，“谁想为无产阶级服务，谁就应当把各民族的工人联合起来，不屈不挠地同‘本民族的’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打倒一切封建压迫，打倒一切民族压迫，打倒某一民族或其一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绝对职责，是受民族纷争蒙蔽和阻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然而，超出这些严格限制在一定历史范围的界限会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不幸的是，在民族问题上的某种实用主义的危险很快就在历史上显露了出来。就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试图以没收一切地主、教会和贵族的土地的纲领团结农民一样，他们也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希望能将沙俄帝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从打着亲社会主义的牌子的民族自决分裂运动彻底转化为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盟友。这种希望是出于这样的认识的，即无产阶级本身中，特别是在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中，他们对真

正国际主义的兴趣，不可能由那种说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到来、民族问题已不复存在的思想上的乌托邦所引起，而只可能由这样一种实际的证明所引起，即压迫民族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已与帝国主义的压迫倾向及其一切后果彻底决裂，并承认“包括民族独立在内的”自决权。但历史现实事与愿违，这些民族立刻就用着布尔什维克馈赠给他们的自由打起了反革命的旗帜，并配合着德国帝国主义对方兴未艾的俄国革命展开了围剿。毫无疑问，与反革命相勾结实行反动政策的并不是“民族”整体，具体来说只是其中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他们正与觉悟的无产阶级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将“民族自决权”歪曲成了他们趁机实行反革命的阶级政策的一个趁手工具，民族自决这一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终于回到了他们忠诚的反动派手中。

“布尔什维克应当在他们自己和革命吃了大亏以后接受这一教训：恰恰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没有任何‘民族’自决权，在阶级社会中民族的每一个阶级都力求按不同的方式‘实行自决’，对于各资产阶级来说，民族自由的观点已完全退居阶级统治的观点之后。芬兰的资产阶级同乌克兰的小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民族自由要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宁可要德国的暴力统治，而不要民族自由。”

事情在这里最终起了变化。卢森堡在她数年前的论断中就曾指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的进程中，其政治力量的增长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反映，同时就要产生在政治上的集中和联系纽带的加强，然而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却不是恰恰按照他们一向捍卫的纯粹源于国际工人运动的阶级政策的精神，力图使俄国所有的革命地区，在党和无产阶级所现实地进行着的伟大革命中，扬弃作为政治制度范畴的现行国家，并代之以集中于依靠无产阶级的斗争原则——即俄国革命范围内一切民族的无产者的一体性和不可分离性——组织起来的革命政权，而是最终坐视自己曾经试图用来团结各民族的民主原则最终滑向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手中，沦为他们“求之不得的、最漂亮的借口”。这种堕落被卢森堡痛心地进行斥责，并作为怒斥德国社会民主党令人作呕的惺惺作态和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警醒，虽然这最后更是讽刺和不幸地成为了僵化的教条主义者全然不顾历史事实地批判卢森堡的资本。

“布尔什维克不去警告边疆各国的无产者提防陷入任何一种分离主义的纯粹资产阶级陷阱，不是在分离主义意向处于萌芽状态时就用铁腕扼杀它（在这一事例上使用铁腕确实是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宗旨和精神的），反而用自己的口号使一切边疆国家的群众发生迷惑并且受资产阶级蛊惑宣传的支配。布尔什维克通过这一民族主义的要求导致了和准备了俄国本身的瓦解，从而把刀子送到自己的敌人手里，好让他们用它来扎进俄国革命的心脏。”

任何政治纲领的提出和践行都不可能不经过最审慎的基于革命的辩证法的考察，这就是说，不是出于主观的意愿和期望，而是出于对最现实的阶级关系和斗争形势的考察。民族自决权作为一种在“东方”国家进行争取民主的必要要求的一部分被提出，甚至被提高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以此作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的地位，这一事实居然是在1905年革命及接下来一系列事变的发展所清晰地揭示出唯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彻底地完成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革命的目标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是说，这一事实是在已经过时的、错误的基础上发生的。既然落后国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先进性和内在的革命性已经被彻底证伪，他们已经展现出了丝毫无法

独立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懦弱，又怎么能指望革命不是靠着无产阶级铁一般的社会主义原则去指导，而是靠着虚无缥缈的所谓民主权利的让渡呢？

从我们这些历史的后来者看来，民族自决权在历史上表现为不是成为反革命的帮凶，就是仅仅服务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独立，而限制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这已经替列宁和卢森堡回答清楚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该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了。对历史和贯穿其中的革命者的思想的全面回顾的反思的意义正在于此。不是为了自己心中的某个无暇的偶像最终追授一个象征胜利的奖杯，而是最终贯彻二者共同遵循的斗争原则，为立足当下而面临着崭新的民族问题的的我们提供尽可能多有益的参考。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党一致声明：它坚持它的最终目的，坚持取得政权以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它对社会改良和不知不觉地逐渐地进入社会主义的彼岸丝毫不抱幻想，相反，它期待着社会灾变和政治灾变，它坚定地希望表明自己日益能胜任这一任务并作为形势的支配者出现；最后，它对现存的国家不仅不进一步实行让步政策，而且要把斗争进行到底。”

“修正主义的全部理论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这是符合庸俗经济学精神的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相反，它从诞生之始就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明或暗的层层围剿之中，作为其最根本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就是如此。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清楚地申明自己的使命是教育和组织资本主义社会中代表先进生产力方向的无产阶级，并依着经济发展下历史铁的必然性彻底埋葬旧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学说，在其作为理论进行发展和作为方法论进行实践的过程中要是不遭到殊死的抵抗，那才反倒是怪事。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机构中所传颂的正是这样的东西，它们一方面用僵死的知识灌满无产阶级青年的大脑，一方面又极力地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逻辑在他们的思维中逐渐固化为理所当然的日常，以此作为猛烈攻击大逆不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前线。

然而，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其生产关系中所蕴涵着的根本矛盾就越是促使同样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扎根，工人阶级就越意识到自己的全部力量不是来源于盲动，而是来源于全面、系统而有可能置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于死地的理论认知。与此同时，伴随资本主义一生的小生产不能不重新生产着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并周期性地将其其中的一部分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从而自然地将他们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引入社会主义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能够被清晰地认知到的情况下，任何还妄图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就不可能不尽可能地改头换面，即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寻找立足点去攻击马克思主义本身。这种攻击不是被称呼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符合当下形势”的修正，就是被他们美其名曰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中符合他们小资产阶级要求的那些教条的坚持。

卢森堡迅速而直击要害地对以爱德华·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理论进行了斗争，她从一开始就摆明了对伯恩斯坦之徒对马克思主义无耻的修正毫不妥协的态度，指出修正主义并不是讨论社会民主党的某种斗争方式的问题，而是恰恰关乎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即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伯恩斯坦所提出的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并没有以社会主义者预期的“高速”走向崩溃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本身，即资本主义最终会不会崩溃的问题。修正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根基的崩溃论，就意味着不得不重新拾起唯心主义的观点，即放弃经济的必然性而从虚无缥缈的对人性的信赖出发去笃信社会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从经济的必然性中得出呢？”“为什么要贬低人类的判断力、正义感和意志呢？”但是，任何社会民主党党员都不会不承认在现存制度范围内进行改良，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争取民主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同样不会忘记的是，实现社会民主党根本目标的社会改良，是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得到彻底的实现的，相反，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与其说是自由地劳动着的社会的劳动过程，不如说是按照资本逻辑组织起来的社会生产资本的过程，因此，改良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将由资本的利息，本质上来说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许的范围来决定，这种限度将是丝毫不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转移的“动产”。要打破这种限制，“要使宪法规定的自由保持固定不变的价值”，就必须通过殊死的斗争。抛弃作为唯一的手段的社会革命而代之以无止境的“运动”即微小的改良，“签订协议”，否认资本主义的总崩溃的结论而代之以在“适应”中“社会主义化”的幻想，反而将是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放弃。

修正主义者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离弃和背叛，没有什么比这样一句话展示得更直白的了：“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正如列宁对此尖锐地批评的那样，“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社会民主党及社会主义运动恰恰不是这样短视而盲目的党及运动，相反它们坚定地把日常的实际斗争同最终的目的相紧密结合。这个问题不会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而是要随着斗争的具体进展一再以新的形式出现。给社会民主党人夺取政权的目标提供坚不可摧的信念的恰恰是这样基础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上，根本没有可以医治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灵丹妙药。

而所谓的“经济发展的新材料”就是修正主义者们这样用来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东西。伯恩斯坦干脆地否定掉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所必然造成的不断增长的生产无政府状态“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变得不那么会导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崩溃了，“因为社会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工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或者与此同时）加深了工业的分化。”但是他又紧接着称颂自己对“不会因此丧失丝毫说服力”的社会主义的信念，以试图换取某种免死金牌以继续在运动中愚弄工人。

然而，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一方面，所谓“适应”能够缓和乃至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无非就是说，它们能够使得生产和交换愈发走向社会化来减轻无政府状态甚至消除之，那么这种服务于资本主义免于灭亡的社会化既然能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加以保持甚至发展，又怎么可能同时成为反而变得多余的“生产和交换社会主义化的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它的发端”呢？难道能够说一个想采用

资本主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的人会认为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必要的吗？另一方面，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是利用信用制度、改善的交通工具即交换媒介和企业主的联合组织这些手段得以实现的，但这些手段与其说是减轻甚至排除资本主义的危机的手段，倒不如说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反而能够证实其矛盾并甚至加剧它的日益发展到极致的资本主义经济自我调节的手段。

信用作为可以直接参与交换的媒介，对生产和交换的运行的促进使得它能够极大地扩张资本主义生产的潜力，这主要是通过它对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内在倾向和私有生产资料的扩张能力间的冲突的部分解决完成的，这就是说，信用一方面通过融合许多私人资本以构成一个能尽速具备支配劳动力的能力以开展生产的大资本完成对生产过程的加速，另一方面作为商业中可供交换的媒介完成对商品交换的加速。这种对于生产过程整个循环的加速所导致的非但不是表面上的矛盾的解决，而只是将靠着惯性本就盲目过热运行的机器加速到更高的运转速度。它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响应自己唤起的生产过剩，在市场表现稍微不佳的时候就立刻紧缩，这就是说，它恰恰是为了谋求更快速更高效的资本扩展而将生产与交换变为一种基于主观运行的机构，而在此基础上更大胆的投机与交换的现实基础的缺失又导致资本主义这台机器的故障不仅更易于发生，而且一定会以更高的烈度发生。

“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变得极度紧张，而使交换稍为遇到什么情况就陷于瘫痪。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脱离所有权，因为它使生产中的资本变成社会的资本，而利润的一部分则采取了资本利息的形式，也就是说，变成了纯粹的财产权名目。信用加剧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它通过强力剥夺许多小资本家的办法把巨大的生产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信用加剧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国家干预生产（股份公司）成为必需。……”

信用的特殊职能一般地说不外是消除一切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固定性的残余，处处灌输最大可能的弹性，把一切资本主义的力量变成高度能够扩展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能力。”

伯恩斯坦所举出的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适应手段即企业主的联合组织不巧地也表现出来了信用所具有的显著特点，虽然他天真地以为卡特尔和托拉斯等企业联合体进行的调整能够结束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解决危机，但须知此类垄断组织的出现的根源和目的本来就是抑制本部门的在生产和分配上的竞争促进联合，以便提高整个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的份额。这种形式与其说是消除了市场上各部门内部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以最终缓解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不如说它只是把各个部门之间的竞争以最为集中和显著的形态表现了出来，它们为了要提高本部门的利润率，就势必要去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更何况垄断组织为了达成在国内市场提高利润率的目的，往往把闲置起来的资本启用起来为国外生产，并导致国外竞争的加剧即世界市场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的加剧。因此，垄断组织根本不能成为这样一种能够包罗万象的普遍的组织，如果它真的扩展到了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那也只是导致一切回到原点而丧失了其本来的意义。

垄断通过将资本高度组织起来加强了其在经济生产中本就占据的统治地位。生产的

集中与随之而来的交换过程产生了更为尖锐的矛盾，它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斗争推向了更高更极端的形式，技术的进步被同样地垄断起来并作为与消费者和工人阶级相对立的因素。整体来说，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归根结底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中资本所选取的手段，根本不可能跳出资本主义本身的模式而回过头来对其加以修补，而只能是“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一个手段。”

但短视的人看不到根本的矛盾所在，而是惯于用眼前的安稳预言梦想中的长治久安。中等企业的队伍不是“几乎不可动摇的密集队伍”吗？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不是进展缓慢吗？所以阶级矛盾不是在减弱和缓和，资本主义的崩溃的危机不是越来越得到解决了吗？

伯恩斯坦试图利用另一个表述的错误掩盖自己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意图，这一点是再清晰不过的。须知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不可能不是在实际的矛盾中运动着而辩证地发展着的东西，这就是说，处于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的部分，一方面会在生产规模扩大到有限的资本范围之外的时候将其抛到竞争之外而产生被抑制的趋势，另一方面会在资本周期性贬值和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新的领域的时候产生被提高的趋势，因此，不能把小资本发展变化的某个周期简单地定为整个资本主义上升或崩溃的表现，而是应该从整个周期变化的趋势去考察，这就是说，这个周期是变快了还是变慢了？这个周期最终导致的将会是小生产的破灭还是维持现状？现代的一切发展都表明，随着大工业的技术优势和经营优势不断累积，不仅是留给小生产独立地长出韭菜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且整个循环是越来越不能维持，小生产的基础是越来越被破坏的。

然而，这个过程非但不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意味着发展的逐渐停滞。马克思指出，小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到的是技术革命的先锋作用，它一方面能够在旧有的生产部门中应用更先进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能够开辟崭新的尚未被大资本占据的部门。小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分离的部分，但它的消亡同时必将作为资本主义消亡的原因和结果，这种历史铁的必然，意味着试图从自己的主观所见否定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是不可能的，作为与资本主义的苟延残喘生死攸关的小资本的存续问题，不是某几个人用残缺不全和别有用心地歪曲的材料就能下达无恙的诊断的。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预言家，他们不是指出事物的特殊的形式，而是把握其背后的一般的客观规律，所谓的“十年周期”是且只是一种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相关的表面偶然性，除了无耻的修正主义的叛徒之外，没有人指望用机械的周期年限规定资本主义危机的浮现。正如列宁所说：“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从1825年到1873年的几次重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范围“跳跃式”突然扩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处于“幼年时期”的扩张性表现，这意味着在新领域的大规模基础投资或新市场的突然开辟。在卢森堡所处的前帝国主义时代，旧的由新领域开拓引发的“年轻危机”模式已经过去，而世界市场完全饱和后生产力与市场框框发生致命冲突的“老年危机”尚未完全到来，这就是说，危机暂时还不是产生于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内在的、固有的运动，而是产生于其中发生的某些突然震动。但是，正是伯恩斯坦所遴

选出来的那些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一步步地将资本主义推向最终契合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图式，即世界市场的最终饱和与劳动生产率不可遏止的提高，它们注定会使生产力与交换界限的冲突日益尖锐，而这就是我们现代的革命者所已经亲眼见证了的。

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能不相适应的是他们对阶级斗争的态度，对这些无耻的叛徒而言，政治自由、民主和普选权正在消灭阶级斗争的基础，而工会、社会改良和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就已经构成了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这样的修正最终无疑导向的是阶级斗争的熄灭论，就是把工人阶级从打碎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全人类的先进阶级降格为给资本主义制度缝缝补补的永恒奴隶。这正是这些被小生产不断制造出来又被资本主义无情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妄图实现的愿望，即用美妙的改良主义彻底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力量，欺骗和分化工人的队伍，使他们最终放弃阶级斗争。

卢森堡深刻地批判了改良主义理论在结构和逻辑上显而易见的荒谬，它试图诓骗工人阶级，说服他们将自己束缚在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范围内，即利用资本主义体系内生的、用于维系该体系的工具，去实现一个需要消灭该体系才能达成的目标。

不难理解，工会和所谓通过国家立法实现社会改良的手段，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的调节。工会的核心作用是在资本主义工资规律的框架内，通过斗争使劳动力能按“市场价格”出售，从而在特定市场条件下为工人争取较好的工资和工时。它本质上是“根据市场状况来调节资本主义剥削”，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剥削的程度，但绝不能取消剥削本身，更遑论直接参与制定这种剥削即参与生产调节本身，这就是说，调节生产过程的技术方面或生产的范围。一方面，既然技术的进步会使得劳动力贬值，那么工会的影响就只能局限于从工人现实的利益出发去反对技术革新，但这恰恰是与整个工人阶级解放的利益相悖的；另一方面，工会为了影响生产的范围和价格，就不得不与资本家结成某种同盟去反对消费者，这从任何角度都不可能构成劳动和资本间的阶级斗争，却完完全全是走向了阶级斗争的反面。

与工会问题类似，修正主义者也同样在国家立法的方面夸耀着不属于自己的历史前景。工会能成为未来调节生产的机构，社会改良的立法就肯定能通过工会给资产阶级划定的条件实现“社会监督”吧！不幸的是，在卢森堡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年代，还未有列宁为与考茨基的斗争而写作的《国家与革命》的问世。修正主义叛徒们尚且还能肆无忌惮地直接将国家的劳动保护偷换为“社会”对劳动过程的监督，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将“社会”解释为“上升着的工人阶级”。卢森堡毫不含糊地回击了这种低劣无耻的言论，她解释道：

“这里的欺骗手法是一望而知的。今天的国家恰恰不是“上升着的工人阶级”意义上的“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即阶级国家。因此，它所安排的社会改良也不是一种“社会监督”，也就是说，不是自由劳动着的社会对自己的劳动过程的监督，而是资本的阶级组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监督。”

一般地，修正主义者所谓的“社会改良”，无外乎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迫使”

资产阶级去接受利于无产阶级的条件并立法加以改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们一步步地降到管理者的地位”。但是，这种通过社会改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根本上依据的依然是“法”，而且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这就是说，它必然是以国家的发展为依，而不指望着彻底击碎包括国家机器、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等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逐步社会化，分配过程却不再像封建经济那样依照社会的各个阶级应得的所有权瓜分以实物体现的产品来实现，而是通过交换展现在市场上的价值来实现。资本所有权就是由此从作为劳动生产的一份子要求自己所得的部分的权利变成纯粹占有他人劳动的排他的权利，而不可能在不破坏私有制本身的情况下加以分割和逐步的剥夺。

显而易见的是，伯恩斯坦的诸多社会主义改良的手段，最终的斗争矛头都已经从资本主义生产上面挪开，而仅仅对准了资本主义分配，即试图在未来的“社会”即国家中为无产阶级找到调节私有制内利益分配的一丁点好处。但是，一定的分配方式必然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结果，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不可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逐渐由资本主义分配方式过渡而来的。我们还知道，国家作为阶级的国家，是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资产阶级一样与社会的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而日益与整个社会相异化。这就是说，国家的职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因为其固有的矛盾而对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进行调控和监督，但是这样的过程却又是建立在只顾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对社会有害的立场上去实现的，这就导致国家的所谓监督恰恰不是什么走向社会化，而是阶级化。相反，“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归结起来就是逐步以社会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改良。可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客观进程，这两者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生产过程越来越社会化，而国家对这个生产过程的干预和监督越来越广泛。但是与此同时，私有制越来越变成对别人劳动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国家监督越来越为排他的阶级利益所渗透。因此，国家即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和所有权关系即资本主义的权利组织，随着发展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的，而不是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权利关系则相反，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牢固更结实。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夺取政权吗？伯恩斯坦恰恰痛恨夺取政权，在他小资产阶级温良恭俭让的世界观里，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出的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阶级斗争被他冠以布朗基主义的骂名，这就是说，改良是有计划的理智工作，而革命则是情绪化的暴力宣泄。但是卢森堡则指出，改良和革命与其说是走向同一目的的不同策略，不如说是根本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的因素。在阶级社会，革命总是上升阶级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试图推动人类向更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制度的发展，而改良则是为上升阶级的逐步巩固服务的，但是它不会也不可能跨越到现存的权利体系之外，上升的边界也只由革命来确定。“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

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据说是切·格瓦拉流传下来的这句话很形象地指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这一历史特点，用卢森堡的话来说，即

“每个时代的法制都不过是革命的产物，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创造行为，而立法则是社会在政治方面维持生存的手段。合法的改良工作本身并不包含着自己独特的、与革命无关的动力，在每个历史时期中，它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给予它的推动在它身上还发生作用的方向上和时期内进行活动，具体地说，也就是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在世界上所建立的社会形态的框框里进行活动。这正是问题的核心。”

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建立在封建式样的权利关系，即以既得的贵族地位等权利划分之上，而是建立在从实际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得以体现和运用资本所有权的制度即雇佣劳动制度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任何权力的存在和行使方式，都依赖于特定的物质生产基础，权力的形态与力量，最终由其所依托的生产关系决定。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统治依赖的不是简单的通过政治权力表现出来的权利关系，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关系。无产阶级不是被权力规定着剥削，而是被具体的经济形态，即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和无权参与产品分配的现实剥削。卢森堡就是这样洞悉了指望在不动摇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合“法”的改良来废除资本主义的梦想家们脚下的空虚，他们“陷入了乌斯宾斯基所说的那个俄国巡警的处境。这位巡警在叙述他的冒险故事时说：‘我一把抓住那个家伙的领子，结果怎样呢？那可恶的家伙竟没有领子！’”

因此，无产阶级所要做的恰恰不是抓住不存在的领子，而是要抓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家伙”本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仅是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而且还应该是摒弃了任何畏畏缩缩的自我阉割之后的即时的现实的行动。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理论家所要表达的无非是这样的观点，即资本主义还能适应，现在的形势还不够成熟，无产阶级不能过早地夺取政权，而是要等着生产再社会化一点、分配再社会主义一点、国家机器再民主化一点吧！甚至也不能完全如此说，因为他们特有的短视告诉我们，假使民主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即成为了对于资产阶级多余的东西，那社会民主党人反倒应该去尽力阻挠民主，好不让“自己的工作增加困难”！但是，对不起，正像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所揭示的那样，当民主在资本主义的末路面前成为他们苟延残喘的障碍，那反倒就意味着它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必须捍卫的必要的跳板。如果说有什么使得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作很困难的话，那非资本主义莫属了，正是它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道路上设下我们早已厌烦的障碍，如今又用伴随资本主义一生的小生产持续不断地生产着这样臭气熏天的绊脚石抛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里。

这枚臭气熏天的绊脚石大发善心地提醒无产阶级：要小心啊！不要过早采取行动啊！因为你们会遭遇失败。但是，谁要是把夺取政权恰恰看作仅仅由人为主观谋定的行动，而不是政治经济情况的发展、阶级斗争形势本身的产物，那他反而自己就是布朗基主义不自觉的支持者。所谓的“不合时宜”恰恰是这种不依赖于具体的形势而提出活动的观点才有的体现，而无产阶级自觉奋起的夺取政权的斗争之所以出现，则恰恰是带着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政治经济的形势所自然产生的要求而

行动的。因此，可以说无产阶级每一次夺取政权的尝试都不可能是“过早”发生的，而只能是当前环境的唯一的必然选项，不过“从政治效果即从政权的保持的角度看，它必然是‘过早’发生的”，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恰恰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次胜利就把整个资本主义的庞然大物直接扭转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及生产关系，而必须“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事业的实现，是不可能依赖于某种指令性的救赎，而只能是自觉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痛苦经验的各各他之路上经过多次失败和胜利才能达到完全明确和成熟的程度。”

“无产阶级只有在伴随着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政治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的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因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来源于对社会发展的机械的理解，假定阶级斗争胜利的一定时机产生于阶级斗争之外，不依赖于阶级斗争。”

庸俗的修正主义者们已经再也没有别的话好说了。他们除了日复一日地拿着眼前的只言片语在精神上为资本主义续命，极力拽着革命的无产阶级向后退却，哀求他们放弃阶级斗争以外还有什么新鲜的话呢？他们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那些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只有在党的队伍因与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联系有所欠缺、革命的进展还略有迟疑的时刻大放厥词，这丝毫不值得奇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处在矛盾的发展中，这就意味着它随着斗争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延拓，随着任务和纲领的复杂化和具体化，必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犹豫和动摇的时刻，但这恰恰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停滞，而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运动中反思学习，即向历史的辩证法学习的必要部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己批评自己”，它“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为的就是“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在历史的辩证矛盾运动中，它最终会在面对自己宏伟的目标前退无可退，那时它就会发现自己的准备已经在反复的斗争中完成，革命——冲破一切枷锁的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将无可替代地作为唯一的选项被提出，无产阶级终将抛却一切小市民的动摇和弱点，在斗争高潮中分清敌友，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大踏步地迈进。

“只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宽宏大量才让伯恩施坦作为预先注定的而不自觉的工具出场，通过这样一个工具，向前猛进的无产阶级已经将自己一时的不坚定性表现出来，以便在仔细观察之后，冷笑着将它从自己方面远远抛掷出去。”

“一旦广大工人群众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锐利的、可靠的武器，那么所有小资产阶级倾向，所有机会主义思潮就会化为乌有。那时运动也会立于可靠的、坚实的基地上。‘群众会去做。’”

帝国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为了摆脱这场血腥的混乱与深渊，除了社会主义以外，我们别无其它救命稻草、助力与出路可言。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重建秩序并结束混乱，只有工人阶

级的世界革命可以为所有人带来工作与面包，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终结这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屠杀；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让受尽苦难的人类社会恢复和平、自由与真正的文明……此时此刻，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唯一救赎……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在卢森堡的所有理论与实践，最使人动容的品质、最耀眼夺目的光芒莫过于她那至死不渝的国际主义立场。作为一位真正超越国界的革命者，她辗转于欧洲各国开展斗争，置身于多国革命的风暴中，却从未被民族主义这一“工人和社会主义的死敌”所裹挟，相反，她以一种决绝而宏大的国际主义视野度量着每一份纲领、每一次行动，直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这个世界上，工人的国际友爱对我来说是最高的、最神圣的东西，它是我的指路明灯，是我的理想，是我的祖国；我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愿背弃这个理想！”

卢森堡的国际主义精神并不是在这一次大战前才表现出来的，而是贯穿她整个政治经历始终不变的特质。她从早期就积极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毫不掩饰对殖民地人民斗争的同情，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德国在非洲的殖民战争中奋起反抗的非洲人民。卢森堡同样地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在北非施加影响的企图和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早在这时她就已经详细而不留情面地批评了伯恩斯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政策”，即居然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变得“有道德”，而采取符合“和平和权利均等”、符合“人类最高准则”以及符合各国人民应得的物质利益的唯一政策即阿尔几西拉斯协定。随着欧洲局势日益紧张，德帝国政府加紧备战，与考茨基为包括军备限制、国际法庭改良纲领在内的种种表演辩护相反，卢森堡坚决地将这种给猛兽套上一个纸做的笼头就妄图限制帝国主义争霸的野心的行为称作幻想，并一再重申，只有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击垮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

“工人阶级必须从中得出如下结论：要能够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掠夺别国、国际肮脏交易、违法和强权政治，只有通过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用社会革命去反对世界政策的国际屠杀。然而，人们要是在帝国主义政策之内去寻求补救办法，寻找解决其冲突的途径，要是企图简单地硬要帝国主义退回到已经过时的状态，这样来顶住它的冲击和突进，那么，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毫无希望的政策。这个政策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通过对今天的帝国主义而始终维护昨天的帝国主义而已。”

在当时还迷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现有框架，而局限于道义上的反抗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仅针对表面形式而不指向实质和根源的态度很快就再度在不久后得到了体现：那时他们背叛了自己数年来一切文章和公告表态转而做出了令整个世界，尤其是国际无产阶级瞠目结舌的选择。

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投票支持战争拨款，这事件标志着第二国际的政治死亡，也标志着欧洲工人运动在民族主义狂热前的全面溃败，无需质疑这起被卢森堡无情地称呼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投降”、被列宁称呼为“叛变”的事件的恶劣影响。众所周知，远在俄国的列宁甚至一度以为刊登社会民主党党团

护国宣言的《前进报》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伪造品。在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让这个体系无法维持下去而将要爆发总的冲突的时刻，改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急不可耐地蹦了出来——他们是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忠心奴仆，为的就是要在自己的主子无以为继的时刻将他们的死敌即革命的无产阶级拖向动摇和自相残杀的境地。这不再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策略的先后顺序和拖延个几年的时间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工人运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存继的问题。

卢森堡毫不留情地与第二国际决裂了，这就是说，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叛徒之流决裂了，她甚至比列宁更早地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与“教条化的、迂腐的、败烂到骨子里的”“马克思主义中派”考茨基和倍倍尔的中央委员会进行着斗争。直到大战降临，谁都再也不能否认错误的存在和暴露了，借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是只有那些不愿意看到这种错误，认为看到这种错误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才会看不到这种错误。相似的，马克思说，民主党人（即革命的小资产者）“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正象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行为，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以这样的矛盾的总爆发的面目出现的，它迅速地应验了列宁的预言，即与修正主义叛徒的分歧以至于分裂，“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与此同时它也成为了卢森堡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矛盾中发展的机会，即无产阶级“将自己一时的不坚定性表现出来，以便在仔细观察之后，冷笑着将它从自己方面远远抛掷出去”。这样的考验是必要的，这不是从宗教赎罪式样的观点出发得出的结论，而是从阶级斗争的形势、无产阶级解放的要求得出的结论，因为严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对过往经验教训是无产阶级从历史的辩证法中学习的唯一途径；也是他们日益把握自身的命运，自觉地担负起推动历史向前进步的绝对主体的责任的唯一途径。社会主义不会因为一次的失败、一次的堕落彻底破灭，只有“当国际无产阶级不打算衡量这一堕落的程度、不想从中吸取教训的时候，社会主义才会毫无希望”。

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大战来临时的这种堕落并不是神秘的偶然，而是可以把握的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结果。自从英勇的巴黎公社被最终镇压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德国，具体来说，是转移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它“不仅是国际的最强大的先锋队，还是它的智囊”，它还“是各国每一个社会党人的骄傲，并足以使那里的统治阶级胆战心惊”。无疑，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告诉我们要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不是由某种外在的绝对的东西保障了一种必然要降临的命运，而是把自觉的观念、有计划的思想带入到自由人的社会行动中去才能够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要么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掌握历史的方向盘，要么由反动的国际资产阶级摧毁革命。但是在这一次帝国主义大战面前，德国社会民主党输了！它以最令人震惊的速度滚到了帝国主义反动当局的一边去，以前所未有的堕落程度影响着国际上不计其数的工人，用“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的口号替代了革命的国际联合的口号。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吼大叫着俄国专制政权取得胜利的危险，却大言不惭地要求保持德国的“文明和独立”！

“文明和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有刚强的决心把它的革命斗争之剑投放到

天平上。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取胜了。它用血淋淋的剑屠杀人类的残暴行为占了优势，天平倾向苦难与耻辱的深渊。只有我们在战争中并且通过战争学会怎样使无产阶级挺起身来从统治阶级手中一个奴仆的角色变成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才能抵销这一切苦难与耻辱。”

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反思这一整套谎言，帝国主义到底在什么方面上是维护所谓文明、独立和自由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声称：德国的无产阶级要靠杀戮自己在外国的阶级弟兄，以保持自己的文明独立和自由，但是，自工人运动发端以来，尤其是工人运动开始有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以来，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在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需要面前，各国人民的所谓自由和民族权利会发生冲突，相反，社会民主党此前一直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作为一种民族的、争取自由的战争是不可能存在的，民族生存的利益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德俄无产阶级必有一战”的逻辑不过是将资产阶级惯用的国家和民族叙事重新以一个更好听的说法复述了一遍：仿佛德国工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剥削他们的德国容克地主和资本家，而是边境另一边的俄国无产者。他们诱导工人们相信，当战壕对面的“敌人”倒下时，德国国家或者说“社会”的自由就站起来了。然而在全球化的帝国主义体系中，任何战争都是瓜分世界的战争，并不存在独立的、单纯为了民族生存的“防御战”，这里所防御所保卫的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府剥削本国以及在海外掠夺非资本主义的部分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捍卫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利益的防御自卫权究竟在哪里成为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

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这样的定性，并非仅仅出于道德上的考量，或是看到帝国主义争霸事实上造成的在世界范围内无政府状态和野蛮状态的加剧而产生的情绪化论断，而是和卢森堡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的巨著《资本积累论》中所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得出的核心观点相呼应的。我们不否认卢森堡关于资本不能独自存活的论断的欠妥，但是总体而言，她那以超越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理论家的敏锐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使得她在当时可以说是创造性地申明了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全球扩张下所蕴含的基本逻辑。在书中，卢森堡断言，资本主义是一个无法在该体系内部实现剩余价值完全实现的封闭系统，为了生存和扩张，资本主义必须不断压低国内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吞噬“非资本主义”的部分，这既包括本国的农民、小手工业者等群体，也包括尚且未被资本统治的殖民地和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她指出，“资本靠毁灭这些组织为生，这些非资本主义环境对于积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积累的继续是以把这种方式消耗殆尽为代价的。”向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渗透减轻了资本积累过程的困难，但资本积累“腐蚀和同化”着这些经济体。这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资本积累不能离开非资本主义组织的帮助，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也不能容忍它与自己继续同时存在。只有非资本主义组织持续不断的瓦解，资本积累才得以可能。”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将导致“积累的停滞”，而这“意味着制止这种生产能力的发展”，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这样，资本把历史的必然性变为一个有利因素：即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头等容量的积累领域，资本越来越多的利用军国主义作为一个对外政策的补充借以占有非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这种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样地产生作用，那就是把购买力从非资本阶层转移出来。这样，简单商品生产的代表者和工人阶级受到同样的影响。换言之，以他们为牺牲，通过掠夺前者的生产力和压低后者的生活水平，资本积累被提高到最大的限度。不待烦言，经过一定的时期，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面，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了。”

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驱使列强争夺未开发的市场和资源，而其中的军国主义同时起到了战争工具即对外争霸扩张的手段的作用，又作为资本积累的一大“投放领域”担当起了将代价向工人阶级和国内的非资本阶层即农民等转嫁的作用。最终，当地球上的非资本主义区域被瓜分殆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自身的“理性”与“和平”，寄希望于一个联合的、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阶段的奇迹出现将不例外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幻想。列强之间暂时的平衡不可能掩盖资本扩张中竞争的底层逻辑，帝国主义间就必然转化为殊死的争霸，帝国主义战争因此成为解决资本积累危机的唯一的但也是毁灭性的手段。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掠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无疑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继续苟延残喘的可能，但它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根本矛盾在全世界以一个更集中、更尖锐的形式扩张，可以说，在帝国主义最终带领人类走向野蛮的毁灭之前，依然存在着它亲手铺就的、能够在最后的关头挽救人类的唯一出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既不是出于悲悯和善意，更不是出于虚无缥缈的道德，这无非是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扩张和覆灭的基本逻辑的阐释下，工人阶级意识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是自己的事情，而且甚至与远在天边的阶级弟兄息息相关的思想意识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任何疑虑，因为即使是被社会沙文主义叛徒们合唱为专制堡垒的沙皇俄国也在此起彼伏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投靠德国这个“欧洲反动派的避难所”。不难发现的现实是，维护这个庞大的专制帝国的不是被迫抛上战场的俄国无产阶级，而是德国普鲁士容克和资产阶级反动当局！相对地，“正是这次沙皇 1910 年在欧洲的胜利之行比其它一切都更好地揭露出，受到镇压的俄国无产者不只是本国反动派的牺牲品，而且也是西欧反动派的牺牲品，他们今天同 1848 年的三月战士完全一样，不只是同本国的反动势力、而且也同这一势力在外国的‘避难所’发生了冲突，撞得头破血流。”

第二国际的腐朽已经最终在它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上展现出了完整的面目了：它光明正大背叛了阶级斗争，背叛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与当局勾结起来纵容欧洲反动势力的跨国联合与镇压，这无疑是以一种极为卑劣下流的形式复现了《共产党宣言》开篇所提到的那场“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事已至此，整场世界大战除了一般的“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过时和僵死的东西”的有益形式之外，还尤其“向文明国家的先进阶级表明，在他们的政党身上一种令人恶心的脓疮已经成熟，从某处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此刻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其说是德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阶级政党，不如说是德皇麾下的一个军团。工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兴高采烈地夸耀自己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群众的成果，这些成果让德国在战争中大放异彩，国际无产阶级痛心见证着这一切，即见证着“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辛格尔教育了德国无产阶级，却是为了使兴登堡能够率领它”，见证着古老的箴言在此极具讽刺意味的演出：

“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与这些叛徒毫无共同点。他们正是在与堕落的第二国际彻底决裂的基础上，提出“主要敌人在国内！”的口号和重建国际的问题的。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这个抉择已经被摆到了一切还坚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革命者的面前。卢森堡以卡尔·考茨基等机会主义理论家以自愿放弃战争期间国内阶级斗争的“国内和平”协定为代表的，为自己背叛国际社会主义的行径所作的辩护，即所谓“国际是和平工具，而非战争工具”“战争期间应保持沉默”等论调进行了辛辣而系统的批驳。这种将战争时期与平时时期的阶级斗争策略人为割裂的理论，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歪曲。事实上，社会恰恰不是在阶级矛盾的不断休止和对立的“翻筋斗”运动中发展的，这是因为，“阶级斗争也好，战争也好，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很深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只要这些原因没有消除，这两者也就不可能周期性地消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雇佣关系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阶级统治所引起的必然结果。但在战争期间，雇佣关系丝毫没有消失，相反，由于在军事工业的沃土上滋生起投机思想和掀起建厂热，由于军事专政对工人的压迫，剥削大大地增加了。同样，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阶级统治也并没有在战争中停止，相反，由于取消了宪法规定的权利，它已上升为赤裸裸的阶级专政。”因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正如它的发展一样没有中断，战争只是资本在帝国主义全球扩张下的逻辑的表现形式，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就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正是帝国主义本身宣告了持久的战争，直到人类的灭亡或帝国主义的灭亡。

为了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实现真正的和平，一纸请愿、一项立法是丝毫也靠不住的。这里所揭示的正是和此前改良主义者妄想通过国家立法改良资本主义直到社会主义同样的道理，如果一项改良不仅仅是以资产阶级当局规定的范畴内为自己的框架，甚至要以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为基础，那么它就根本不可能触及问题的根本，“只缘身在此山中”。只要资产阶级继续名正言顺地统治，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就不会结束，只有无产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切实的行动，只有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立场才是和平的有效保证和防止战争的真正护堤，因为这意味着结束战争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根本逻辑的未来。

时至今日，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依然在卢森堡过世后的百年的时间里承受着来自其根本矛盾的持续破坏，民族主义不断作为各国转移矛盾的重要手段被反复提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全球化也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资产阶级在固有的矛盾中力求携手苟活，他们默契地在世界范围内压抑工人运动的所有成果，至少也要把它们按照资本主义不自觉的卫道士即斯大林主义的图式限制在一国或一片地区内，以防止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对帝国主义日益暴露出的软肋联合起来予以打击，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给帝国主义世界霸权准备的替代方案将不是某种地上天堂般子立的存在，即保卫国家对抗全球，而是将阶级斗争的火焰烧向全球，使得团结的国际无产阶级能够对抗团结的国际资产阶级。

“没有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社会主义。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平时时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阶级斗争和国际团结，否

则就是自绝于人。”

资本积累论

《资本积累论》总得来说是一部优秀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其核心是积累条件下资本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我们知道资本必须以货币形式作为形态转换的中介，换句话说，资本家不仅仅要占有工人制造出的商品，还总得有人拿钱来买，这样他们才能用这些货币购买新的生产资料，以保证生产过程（同时也是攫取剩余价值的过程）不断地延续。那么与其交换的货币会从哪里来呢？到底是谁购买了资本家的商品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货币回流的机制，并发现了这个看似奇怪的现象：资本家卖出商品所获得的货币，实际上就是他一开始投入市场的货币。这个看似奇怪的结论实际上是部类之间交换的表现。比如，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我们称为第Ⅰ部类）中，资本家把一定的工资量 v 发放给工人，工人拿着工资向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我们称为第Ⅱ部类）购买生活资料；第Ⅱ部类的资本家获得这笔钱后，为了维持生产的持续性，就要向Ⅰ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并拿这笔钱来支付。在这个例子中，第Ⅰ部类资本家卖出产品所获得的货币恰好是他一开始投入市场的那些货币。不光是简单再生产如此，扩大的再生产也遵循这个规律。

1、卢森堡提出的问题和实际的解决方法

不过卢森堡并不满足于这个结论，而是向前跨了一步：资本的剩余价值必须要有人购买，这个需求会从哪里来（这里的需求是指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她认为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图式下是无法解决的。准确地说，卢森堡认为按照这套模型，简单再生产（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消费）是可以持续下去的，但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有一部分用于继续生产）不行，因为扩大再生产就意味着必须有一部分剩余价值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生产新的生产资料，而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提供因此而减少的购买力，也就是说积累行为会导致第Ⅱ部类生产过剩。工人阶级自不必说，他们的支付能力仅限于可变资本的量，而卢森堡认为资本家也不能提供这个支付能力，因为“积累的实质就是资本家抑制自己，使自己不消费一部分的剩余价值，把它用来生产供别人使用的物品”。这里显示出一个谬误：资本家的积累并不是通过抑制消费而进行的，不如说是把供他个人消费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拿出来，购买生产资料以进行生产消费。从马克思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来：马克思的图示中，简单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是 $I(v+m) = IIc$ （即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总和恰好能够和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部分相交换。第Ⅰ部类指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第Ⅱ部类是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 c 表示不变资本； v 表示可变资本； m 表示剩余价值。）；而在扩大再生产中，却是 $I(v+m) > IIc$ ，这个多出来的部分在实物的形态上是生产资料。按照简单再生产的模式，这部分本来也应该用于消费，但现在已经没有相应数量的生活资料了，于是这些生产资料只好用于扩大生产。可见，即使是被卢森堡批评的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也包含着资本家更少地进行个人消费、把剩余价值投入扩大再生产这一规定。

假设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决定拿出剩余价值的 50% 进行扩大的再生产，他对生活资料（粮食、衣服、住房）的需求确实减少了，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对生产资料（原料、

能源、机器)的需求增多了。如果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量本来是符合简单再生产的规定——所有剩余价值都要作为资本家生活资料被消费掉，也就是说，第Ⅱ部类资本家所生产的粮食、衣服、住房等商品的量，除了满足工人和他们自己的需求外，还需要第Ⅰ部类资本家付出所有剩余价值才能全部卖出——那么这时第Ⅰ部类积累的行为就会导致第Ⅱ部类资本家生产过剩。可是如果一开始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量就是适应这种情况的，也即第Ⅰ部类的资本家只需要付出剩余价值的50%就能使得第Ⅱ部类出售完所有的产品，那么这种积累的行为就不会导致什么生产过剩的问题。

如果把问题只是看作一个如何设定两个部类数字关系的问题，那么似乎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但卢森堡说这“只适用于解释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是如何发生的。”她可能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之所以认为扩大的再生产图式是从简单再生产中生长出来的，是因为在一个生产周期之内，就再生产的延续与商品的等价交换来说，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区别只在于剩余生产物的物质形态不同，而这种区别，直接地来看只是从最开始时部类之间的价值关系（ $I(v+m)$ 与 IIc 的关系）。她认为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都不能购买全部剩余价值，毕竟资本家一开始投入的只是 $(c+v)$ ，却要收回 $(c+v+m)$ ，但在这一点上，简单再生产与扩大的再生产也是一致的。卢森堡承认了简单再生产可以持续进行，那么就没有理由因此而否定扩大再生产的图式——除非她把两个图式的初始条件搞混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之所以不会使得生产消费品的部类发生生产过剩，只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设计好了两部类间的价值关系，而在这之后，两个部类之间只不过是一直在进行简单商品交换。

假设一个生产机械臂的工厂，第二年的产量比第一年增加了20%。卢森堡就会问：社会上从哪里冒出来消费这些新增产量的需求呢？而且机械臂工厂的资本家为了能够扩大这部分产量，还缩减了他自己享乐的需求，把剩余价值放到购买更多生产资料比如钢材和工具上面去，这不会造成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吗？实际上，这位资本家能够扩大生产，不过是因为其它资本家都在扩大生产：生产钢材的资本家使他的生产规模扩大了20%，生产工具的资本家也如此做，这样就能够保证机械臂资本家（实际上包括了所有的扩大生产的资本家）扩大了的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得到满足；生产粮食、服装的资本家将生产扩大了20%，这样就能够供给其它资本家由此扩大的可变资本（即工人工资的实物形态）。同样地，这些资本家产品的实现所必要的有效需求（即买家持有足够的货币这个条件），也因为他们自己扩大了为此而投入的货币，因为买家需求的同步扩大，从而能够得到实现。只要前一年的生产是不过剩的，那么按照这个积累逻辑，下一年的生产不过都是按照20%的规模扩大了而已。在这里，所有生产的扩大是每个生产扩大而不过剩的前提。（注：这个例子实际上不是特别严谨，其实是在几个假设的条件下进行的：所有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工人平均工资、剥削率等条件都是一样的；下面的例子也是同理。这主要是为了方便理解以排除掉细枝末节的麻烦。数字只是随意设定的，换成其它数字也不损害其逻辑上的正确性。）

2、“图式之外”的问题

卢森堡还认为马克思的图式无法反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现象。我们知道，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会带来不变资本比例的上升，这要求第 I 部类以相较于第 II 部类更快的速度积累。于是，她的思路又一次登上了舞台：第 I 部类积累得更快意味着限制生活资料的消费，而这会导致第 II 部类生产过剩。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确实超出了图式的能力本身，但我们在这里只指出一点：随着劳动生产率变化的不仅仅是部类的资本量的比例变化，还有商品本身价值量会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问题明显会越来越复杂。不过确实可以设想，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带来部类之间“严格协调”关系的紊乱。在这种“图式中未能显现出来的现实情况”中，还包括生产的跳跃性扩大、个别部门的片面性发展等。如果要求合理地解释这些现象，似乎就不得不引入其它的东西。

但我们要清楚，不同部类之间的积累不是只能通过平滑的、稳定的再生产过程达成，也可以通过危机形成强制平衡。比如在这里，第 I 部类进行相对更快的积累导致第 II 部类相对生产过剩，这个矛盾可以以部分第 II 部类的企业破产、资本转移到第 I 部类来完成这个跨越。

还是以机械臂资本家为例。如果他今年不是将生产扩大 20% 而是 30%，同时其它生产部门都只是扩大 20%，那么确实会发生卢森堡所担心的生产粮食、服装的部门（第 II 部类）生产过剩的情况，而生产钢材和工具的生产部门（第 I 部类）又出现了生产不足——因为本来用于生活资料的剩余价值被用去购买生产资料了，如果这个变动不发生，部类之间确实可以达成严格的协调；但是它发生了。这种混乱会阻碍积累的进程，但并不代表积累因此就无法进行，只是可能会在比原先预想的不同的规模上进行而已。如果机械臂资本家因为上游的生产不足而放弃了扩大 30% 生产的计划，只是扩大 20% 的生产，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和上面的例子一样。如果钢材、工具资本家受到机械臂资本家的刺激，也将计划改为了扩大 30% 的生产，那么第 II 部类会发生的是：生产奢侈品的资本家订单减少（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额度由于剩余价值投入积累而降低），而生产普通生活资料的资本家订单增多（由于扩大生产，对工人的需求增多，可变资本提高），那么对生产普通生活资料的资本家而言，他仍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积累的环境。积累仍然可以进行，只不过需要调整在不同部类间的比例。

如果机械臂资本家运用了新技术，使得他完成扩大 20% 生产的同时，只需要扩大 10% 的工人，那么对钢材、工具资本家来说，扩大 20% 的生产是没问题的，但生产粮食、服装的资本家确实会遇到订单减少的困难。不过，这也只是意味着他们的积累无法达到 20% 的程度而已。如果机械臂资本家扩大了 20% 的工人，从而获得了生产的 40% 的扩大，那么这就会要求生产钢材和工具的资本家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而这种情况又与上一段的情况类似，虽然资本家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减少了，工人在这一方面的需求却是增多了。但是看起来似乎对生活资料的需求的总需求仍然下降，因为资本家减少的需求主要地是用于扩张生产资料去了，工人因此而增加的需求可能并不足以完全填补这个部分。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第 II 部类不能积累。即使对生活资料的总需求因此而降低，也不意味着这个部门就会完全消灭，从而导致整个再生产无法进行下去。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也不过是在数学上找到这样一个平衡。即使真的有第 II 部类的企业因此破产，也只是因为它们不适应于新的平衡而已。

这种观点能够解开许多误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要描述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但是在理论层面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想要论证按这套理论构建的模型是可以“无矛盾地”平稳地运行下去的，因为这能够说明这套理论是“自治”的。事实却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从来都不缺乏自相矛盾之处，否则也不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经常指出，他所述的某种关系一旦产生问题，就有可能引发危机，而不是“我这种模型的运作可以避免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不仅要分析资本主义如何在通常的市场交换下存续的问题，也要分析这些看似正常的市场交换如何导致了经济危机，还必须要分析资本主义每次都是如何从危机之中走出来的。我们的脚步不能停在“这样会发生危机”上，否则就会产生一种悖论：每次发生经济危机时，我们都会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劣根性”，但是却又无法解释，为什么到现在无论多么剧烈的经济危机都还没有完全摧毁资本主义。因此，即使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卢森堡所担心的情况，即剩余价值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况存在，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只是资本主义整体走向新的平衡时所产生的矛盾而已。卢森堡没有很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导致她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在后面做出有问题的论断。

3、卢森堡自己的解决方法

在卢森堡那里，暂时还是不知道扩大的再生产究竟可以找到什么消费者的。此外，她也不知道为什么社会剩余生产物中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比例恰好能够结合起来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没有哪一方生产过剩。如果理论上的协调总是为现实中的不协调代替，那理论上的协调有什么意义呢？在马克思那里，这种难以协调性正是危机的诱因之一。而卢森堡则致力于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她的解决方案是引入工人与资产阶级之外的消费者，即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者。这似乎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既可以解释所谓的“额外需求”从何而来（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没有解释清楚，后面会说明卢森堡这个额外需求本身也不是稳定的），又可以不用分析再生产的实物因素如何达到平衡，还能顺便宣称自己的理论“贴合实际”。尽管马克思认为这个思路确实能解决一定范围内部类间生产失衡的问题，因为它可以将本国的生活资料通过交易变成生产资料，或者反过来，这样生产过剩的可以卖出去、生产不足的可以买进来，平衡的可能性会提高许多。但如果将与之交易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就会立刻发现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因此这个思路本质上仅仅是“把这个矛盾推向更广的领域”。

卢森堡这一理论成为了全书第三编的基石，并提供了一个似乎很“好”的历史框架：资本主义由于其内生的缺陷，不得不把其它的经济形态——主要是自然经济——变成它的买家，而这首先就需要破坏它，让它由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再进一步变成资本主义（而卢森堡似乎只是从这一点来理解帝国主义）。当资本的统治达到顶点，即所有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都被消灭之时（不过卢森堡认为这并不会到来——或许她认为在那之前革命已经胜利了），资本主义也将因为剩余价值的无法实现而走向末日。

可惜卢森堡对马克思的理论所采取的那种审慎态度，并没有放到她自己的理论上。如果按她所说，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由于无法购买将要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或者说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使剩余价值货币化，从而不得不依赖非资本主义形态的购买，

那就必须要证明，非资本主义的形态确实存在这样的多出的购买力。卢森堡在她的书中只是描述了自然经济如何被破坏，并被创造出适宜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广义的土地被占领、劳动力“自由化”、商品经济导入、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等），只是历史性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一个典型例子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对美国棉花的依赖）。但她却没有论证过，为什么非资本主义形态能够提供这么多购买力。

如果资本主义形态中需要资本化的部分是超出资本主义内部的支付能力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于被输出这部分商品的社会来说，资本主义社会抛给了它们一个商品，要求兑换成货币，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两个社会之间的货币与商品的交换（而不是商品与商品的交换）。要使她的论断成立，就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1）要么非资本主义形态能够提供超越其产品的“纯购买力”，于是这个问题就必须继续延伸为这些非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从哪里获得支付能力，但这个问题已经因为卢森堡之前的分析被证明为不可能了。比如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向印度卖出纺织品，以实现剩余价值。如果按照卢森堡的意见，这部分纺织品只是英国的过剩产品，英国国内没有其它任何产品与之交换，它只是因为在国内没有买家而寻求外国的市场，并且用它换来的货币接下来就只是在国内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在这里印度成了单纯的逆差国，它向英国支付的货币完全没有任何回流到它自己境内的手段。我们不得不问：印度又是哪来的货币，来无穷无尽地购买英国的剩余产品呢？我们似乎又不得不回到被卢森堡否决了的金矿的解决方案了。

（2）要么非资本主义形态为了拿出这笔货币而不得不打破其内部正常的再生产，促使其内部不同部类的生产达成新的平衡。如果不能达成新的平衡，那么这个非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就同样会出现生产过剩，我们又得从头开始分析这个麻烦的问题，但那个曾经被认为是方便的后路，即寻找外部市场，已经被堵住了。卢森堡在书中提到国际借款的作用，而它恰恰可以用来反驳卢森堡的论点：帝国主义国家借给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大量货币，而这些货币又反过来支付殖民地半殖民地向帝国主义国家发出的订单，这恰恰说明，这些订单的剩余价值实现是用的帝国主义国家自己的货币。

总得来说，卢森堡最主要的错误在于：认为资本主义不能独自存活。如果资本主义形态中需要被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只能由非资本主义形态实现，那么我们同样不能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以大得多规模进行着积累。事实上，从马克思的视角看来，资本主义形态与非资本主义形态的贸易，正是弥补资本主义生产部类失衡问题最常见的手段之一，而部类失衡又是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生产的必然结果。这种部类间的“严密协调”也只有在计划经济下才可能实现；或者说，计划经济需要保证的只不过是实物的足够供应，而无需关注价值量上是否严密地对等。

卢森堡的分析可以给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扩张的这段历史以一个不错的视角，即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处女地”的剥削、侵夺与改造。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否定卢森堡的积累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不是“非要”依靠那些非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对这些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掠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还同时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全世界扩张，使得全人类的交往扩大到一定程度，

并且使得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只有是国际的革命才有着最后成功的可能。不过，我们不能把这种矛盾视为国家剥削国家，而是资本主义扩张性的体现，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我们要反对的不是或不仅仅是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国际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走向灭亡的条件正是它自己创造出来的。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社会民主党无非是意识到斗争的历史后果的现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体现。社会民主党越是发展、成长、壮大，觉悟的工人群众就越是与日俱增地把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整个运动的领导和确定路线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革命党的组织和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是僵死的教条主义者断章取义地摘取卢森堡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罪证的又一取材宝库，他们从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逻辑出发，将反“极端集中”定性为反“先锋队”的重罪，揪住卢森堡看似是反对布尔什维克和俄国革命的词句，并毫不害臊地耻笑罗莎·卢森堡和德国共产党的下场，似乎这就能够铁证如山地宣告卢森堡的理论的死刑。这种头脑和语言同样贫瘠的狭隘者并没有比他们百年前拿着马克思的语句反对马克思的思想的（时间意义而非认知意义上的）前辈们创造出更多的废话。

事实上，卢森堡一贯坚持的社会民主运动本身的立场及其自然导向的对建立在不同社会环境之中的千差万别的社会民主党特征的仔细考察恰恰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即她分析俄国革命，但是为了指导德国革命；她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但是为了痛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懦弱和腐朽。卢森堡说：“德国的政府派社会主义者尽管可以叫嚷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统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幅讽刺画。如果它曾经是这样或者现在是这样，那么这只不过是因为它正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态度的一个产物，这一态度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讽刺画。我们大家都受历史规律支配，而社会主义政策恰恰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实现。布尔什维克表明他们能做到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可能性的限度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他们不应当打算造成奇迹。因为在一个孤立的、被世界大战弄得精疲力竭的、被帝国主义卡住喉咙的、被国际无产阶级出卖了的国家实行一次模范的和完美无缺的无产阶级革命，会是一个奇迹。”谁要是把握不到这一点，谁的头脑就根本来说还是受到狭隘的宗派主义思维缠绕，谁就根本不能够对作为在辩证的矛盾中发展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有丝毫新的理解。

须知党不是在统一的真空环境中工作和发展的，它不能不立足于自己所处于的现存的政治经济环境的范畴内去提出符合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组织任务和纲领。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是一个庞大而落后的反动堡垒，沙皇的“奥赫拉纳”无处不在，在这种专制恐怖的环境下，俄国革命从民粹主义的盲目运动过渡到基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运动所留下的残余仍在阻碍革命向前发展，各地松散的小组根本无法对抗国家机器，只有像军队一样严密、由最坚定分子领导的组织，只有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纪律严明、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先锋队政党才能保证革命的

纪律性、果断性和延续性。而在德国，卢森堡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拥有数十万党员、数百万选民的群众性政党。它可以通过选举、工会、报刊合法地宣传和组织，但也正是这种“群众性”而不是严格的“阶级性”为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影响留下了空间。直到战前，庞大的党组织已经产生了屈服于日常工作的保守主义倾向和僵化的官僚主义习气，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过度强调中央权威和纪律，将会扼杀基层党员和工人阶级的自发和首创精神，使党变成一个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机构，使党的中央委员会脱离群众，变成“替群众思考”的官僚机构，最终束缚革命运动本身的生命力。这一危害在党的政治领导产生动摇甚至产生错误的时候将会变得尤为严重，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那样。

卢卡奇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在马克思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里认识到和意识到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不可能有纯粹意识，既不可能有作为‘纯粹’理论的纯粹意识，也不可能作为纯粹要求、纯粹义务、纯粹行为规范的纯粹意识。在这里即使要求也有其现实性。这就是说，使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具有某种要求性质、某种‘潜在和理论’性质的那种历史过程状况，必然作为相应的现实形成，并作为这样一种现实能动地影响这种过程的总体。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这种形态就是党。”党不是一种单纯的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性中，即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条件在内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中作为结果和能动的一环诞生出来的。它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即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中最觉悟的一部分将它自己所赖以生的那种从经济必然性中产生的真理播散到自发的群众运动中，从而将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仅仅是激进化要求转化为切实自觉的能发挥作用的行动，并从这样的过程中锻造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卢森堡把握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所立足的特殊环境，即在政治上或者资产阶级统治上强烈的专制主义色彩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原则的宣传不可避免地带上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诉求，而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的独立性和不妥协性，就必须采取十分特殊的组织形式来适应根本上来说决定着党的面貌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完成在这种环境下党的任务，这就是说，要将工人阶级的团结从单纯的资本大生产能够导致的范围内解放出来，给予他们政治觉悟，用自觉能动的主体去影响客观历史的发展进程，并把无产阶级作为有自觉目的的斗争阶级直接从作为专制制度的基础的原子化即政治上的极端分散状态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中去。但是，这样的任务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的健全的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是说，这里甚至没有一个党成熟发展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统治为落后的专制制度所隐蔽的情况下各个小派别之间分散、相对独立而以至于山头林立的环境。分散的组织自然不可能肩负起将更加分散的无产阶级引导到更高的组织形式上去的任务，因此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进行群众统一政治行动所需要的组织，所要提出的任务就必然是集中，但是，俄国革命者们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起来的任务并不能就此在集中的口号上止步，相反，“集中主义是一个远远没有概括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形式的历史内容和特点的口号，它再一次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不论在什么领域，包括组织问题的领域在内，都不能成为固定不变的僵硬的公式。”

这种卢森堡所称呼为“极端集中主义”的表现是：一方面把态度明确的和活跃的革

命家的有组织的部队同它周围的虽然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积极革命的环境完全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是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固定的干预。无疑，正如卢森堡在此前关于波兰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运动中就已经做出的表述那样，她完全清楚要想在本身具有集中主义的倾向的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团结起革命的力量对抗集中、高效、严密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不可能不在反对分散主义和民族联邦主义的基础上在现存国家的范围内代表相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的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利益组织起来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局部或小集团的利益。作为结果，俄国社会民主党就必须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即抛弃建立一个依赖广阔的沙俄帝国内部各个民族和省份中分散而独立的组织联合起来的松散的联邦团体的想法，而必须代之以一个统一的紧密团结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但是，不能指望这个过程通过少数人的愿望得以完成，而是要反思集中制乃至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在于何处。

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脱胎于自发的工人运动，这就是说，脱胎于经济的必然性下阶级斗争的形势发展所导致的无产阶级自我的斗争，它作为一种在辩证的矛盾中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和布朗基主义的运动毫无关系。布朗基主义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依赖于无产阶级的具体情况，它不依靠工人阶级的阶级活动去活动，自然也就不寻求建立一个阶级性的组织，而是取决于少数人对形势的判断和密谋。这种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斗争的需要的割裂使得把这些觉悟的密谋者和无产阶级群众隔离开来成为必需，另一个必需则是民粹主义恐怖活动式的对中央委员会的计划的绝对听从，这意味着密谋组织内的成员除了密谋制定的计划之外不应该依据任何规定外的因素活动，这就是说，不取决于自发的阶级斗争的基础，而是完全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听话的工具来行动。相反，社会民主运动则并不是预先规定斗争的任务、计划和范围的组织，而是从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从斗争的具体过程中学习和成长，并制定自己下一时段的政治纲领。斗争是组织的前提，组织又是斗争的前锋，这就意味着这里除了一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民主党当前的纲领路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现成且详细的指示和策略作为教育新的社会民主党人把他变成一名战士的东西，因为教育他的只有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本身，即在辩证的矛盾中发展的运动本身。而卢森堡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本质的把握和认知。

“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

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成为一种诞生于无产阶级又凌驾于其上的指挥所，它恰恰就应该是无产阶级本身的运动最先进、最觉悟部分的表现，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和布朗基主义的出于密谋的需要和与工人群众相割裂的集中制大相径庭，它的纪律也和纯粹服从性的纪律有很大的不同，社会民主党要求的将是在无产阶级自己的组织中有觉悟和进行斗争的先进部分的“自我集中制”，并依照非奴役、非指令性的而是自愿自觉的纪律组织起来。无疑，这种理想的集中制在当时欠缺相当数量的在斗争中受过锻炼并且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沙皇俄国来说是不可能立刻实现的，但是它作为对社会民主运动本质的体现，不能不作为一种被时刻注意并为之斗争的倾向去加

以保持，它将“随着工人阶级在其斗争过程中觉悟和政治训练的增长而逐步得到实现”，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它也必须得到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在历史上是反反复复地证明了自己的必要性的，相反，维持一个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的中央机关，在它不具备制定和指派统一的详细的斗争策略即具备政治目的的情况下，仅仅为了维持一个基本的革命活动的技术层面的运转是显然荒谬和臃肿的举措。俄国革命的历史证明，很多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的变化不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光辉远见，更不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的结果，而恰恰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的创造。社会民主党不可能也不应该擅自为未来的斗争预先制定好现成的计划或策略，而是从无产阶级最根本的阶级斗争的目的和立场出发，“在党内对当时的主要斗争形式鲜明地保持正确的历史的估价，对于一定的斗争阶段的相对性和对革命因素增长的必然性具有敏锐的感觉。”党的力量并不来自于全知全能的预见和对一切的规划，而是一种如卢卡奇所说的“道义的力量”，即由受经济发展的逼迫而进行反抗的、自发革命的群众的信任提供的力量。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是基于无产阶级群众这样的信任，即信任党是他们最特有的最先进最革命的部分，只是他们自己还不完全清楚和了解的意志的客体化，是他们的阶级意识的可以看得见的和有组织的形态。只有当党通过真切的斗争而非强制的指令取得这种信任而且值得这样信任时，它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自发欲望才会竭尽全力和越来越出于本能地涌向党的方向，涌向自己意识到的方向。

“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是‘发明’的，而是在试验性的、常常是自发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巨大创造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这里的情况也是不觉悟的人先于觉悟的人，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在这里基本上带有保守的性质，因为它凭经验把每次赢得的斗争领域开发到尽头，就立刻把它变成一个堡垒反对更大规模的革新。”

不可能指望整个无产阶级在每一天都未曾中断的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消极地等待着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判断和指令，仿佛社会民主运动、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不是基于他们自己的觉悟和创造而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离散式“翻筋斗”式的指导，仿佛革命不是在持续的辩证的运动中发展而是只在党想起来对形势进行研究和指示的时候发展。无疑，党作为这样一种本该把握工人运动的共性并领导不间断战斗的机构为了维持自己的运转，不可能不将日常的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尤其是组织上的工作囊括进自己的职能范围内，但正是这种组织上的领导而非敏锐的政治上的领导决定了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的习气的兴起，他们将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组织拜物教中。这种对自己的事务性工作高度强烈的责任感势必压制党内和党外无产阶级群众的首创精神，而只有全党党员最生机勃勃的政治积极性才是对这种弊病的真正的补救。卢森堡就是这样将社会民主运动所根本依赖的群众的自发性与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守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立了起来。她清楚地意识到，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生于经济的必然性的阶级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激化，而作为这一过程的自然表现的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将不可避免地停留于现存的框框里的工会和僵化的党发生不可调和的斗争，要么是无产阶级的意愿，要么是党的官僚的意愿；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是在屈服中倒退！

“一个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的最理想的执行委员会应该作为全党意愿的最顺从、最迅速和最准确的工具发挥作用。但是，如果它的行动能力的自然源泉，即党的意志没有表达出来，如果批评的思想、党员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发挥不出来，那么，最理想的党执行委员会也会一事无成，并将不由自主地陷入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

世界上没有一个党执行委员会能代替蕴藏在党的群众之中的、党的固有的行动能力。如果一个百万人的组织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面对着伟大的任务，却打算抱怨自己没有名副其实的领袖，那么它就是自己表明自己是无能的，因为它将证明，它没有理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本质本身，而这一本质在于，无产阶级大众不需要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它本身就是自己的领袖。”

毫无疑问，卢森堡对无产阶级群众的自发斗争和首创精神的捍卫使她出色地成为了一切妄图攫取社会民主运动领导权的官僚主义或改良主义机构的死敌。这一套事实上仍在她接下来的实践中发展的理论几乎是立刻被后者从中截取一个断面抓过来加以扭曲，并在卢森堡本人不自觉的情况下被启用为反对列宁的革命先锋队的武器，但这也恰恰同时证明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党内机会主义的倾向是不可能按照列宁预想的那样，通过严密的章程条文来加以防卫的，他通过对修正主义倾向在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在俄国的代表即孟什维克和取消派等势力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机会主义的标志性特征来源于知识分子对组织涣散状态的青睐，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出于他们的阶级本能，将会摒弃这种“散漫心理和个人主义”欢欣鼓舞地接受中央委员会无限的领导权。不可否认，机会主义在历史上确实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家”和组织上的非集中化倾向存在联系，但是把这种联系立刻就抽象为社会民主党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的结论，那反倒才是对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的遗忘。

无疑，在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往往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是顺从着自己所处的阶级利益和情感，而是在与之斗争并将其克服的过程中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但是，他们其中可能蕴含着的机会主义倾向不会有着较为普遍而固定的表达，而是取决于其寄宿于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社会的具体情况，这就是说，是在具备政治自由的建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环境中，还是在落后的专制制度的环境中等等，对于前者来说，机会主义组织涣散的特殊倾向也往往来源于议会政治中的“议会痴呆症”，他们总是以为要尽可能等到更多的群众登记为社会民主党的选民的时候才能够采取革命的策略，却不懂得革命本身的辩证法本身的逻辑，即“不是通过多数实行革命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策略达到多数。只有一个懂得领导也就是懂得向前推进的党才能在风暴中争取到追随者”，这就导致了改良主义和阶级和平的观点的抬头和将党坚强和革命的核心溶化在选民“群众”里成为了西欧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对于后者来说，机会主义不来自于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巨大的顺利的发展而受到来自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明确的各个方面的渗透，而是来自恰恰相反的方面，即社会民主运动的不成熟，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斗争的历史传统的缺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不坚定和动摇性，这具体表现为恐怖主义的民粹活动的残余和各经济派取消派对于工人运动政治斗争的否定。

考虑到这种区别之后，再去研究机会主义在俄国崭露头角的根源，那么就不能不意识到，“既然是机会主义，它在组织问题上也会有自己唯一的原则——缺乏原则性。它总是根据情况来选择自己的手段，只要这些手段能适合于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象列宁那样，把机会主义说成是麻痹独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并且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欲望服务的一种意向，那么在工人运动的开始阶段，最容易达到这种目的的组织形式不是地方分权制，而恰恰是严格的集中制。恰恰是这种集中制可以给还不够觉醒的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一小批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领导人。”而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早期所展现出的历史事实正是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列宁却把机会主义的危险机械地归结为了知识分子所固有的散漫、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危险，这无疑是把整个机会主义的影响本末倒置了。事实上恰恰是将一切、将无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降低到党的中央委员会官僚的工具之下的行为最为轻易地使得相对较为稚嫩而不成熟的年轻工人运动遭受知识分子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了，相反，正如卢森堡在与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荼毒斗争时所指出的那样，“除了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主动性和加强他们的政治责任感以外，没有更能可靠地保证工人运动排除沽名钓誉的知识分子的一切弊病的東西了。”

因此，保障社会民主党斗争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的将不会是严厉的条文，它只会是一种形式上的手段，即确保党内既有的革命无产阶级能够通过这样的手段尽可能地在技术上清除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社会民主运动越是发展，资产阶级的尤其是在野蛮的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越是崩溃，具有政治民主化的反对精神的小资产阶级就越被革命的浪潮裹挟进社会民主运动中来，越是由外而内地冲击社会民主党。在这种情况下，要考虑的就不是通过永葆青春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去制止这种冲击，因为它对工人阶级的越俎代庖越严重，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部分的主动性、自由首创精神和政治思想越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反而会越来越容易地影响、拖累甚至扭转党的整个行动。“刚强是社会民主党策略在一端非采取不可的形式，如果它的另一端是在事变的压力下就向四面八方飞溅的不定形的胶体的话。”通过党的章程以纪律的运行防止机会主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即存在一个足够强大的，经过实际的斗争训练的无产阶级领导核心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遭受革命浪潮裹挟的反对派同路人加以影响和同化，以使得所有这些痛苦都能够最终服从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目的，他们明确地意识到自觉地对他们进行革命的推动而能够做到时刻在辩证的矛盾运动中反思自己的行动。然而，

“无产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军直取得胜利要有一个过程。它的特点是，在人民群众自己的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违背一切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但是要实现这种意志，就必须到达现存社会的彼岸，必须超出它的范围。另一方面，群众只能在同现存制度进行日常的斗争中，也就是说，只能在现存制度的框框内培养这种意志。广大人民群众同摆脱整个现存制度的目的的相结合，日常的斗争同革命变革相结合，这是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辩证的矛盾。而这个运动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必须在两个暗礁之间，即在放弃群众性和放弃最终目的之间，在倒退到宗派状态和变成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之间合理地向前迈进。”

是的，这依然不是问题的终点。党的领导根本不是一个阶级的单纯映射或仅仅是它自身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在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间的斗争中辩证地塑造的。

党需要明确而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有觉悟的进行斗争的群众的意志和意向的代言人，成为阶级运动客观规律的体现者。这就是说，正是社会民主党斗争本身的性质和它在运动中的内部矛盾构成了机会主义的另一个泉源，既然社会民主运动不是少数人的谋划而是一个根本上来说阶级性群众性的运动，既然“威胁它的暗礁不是从人们头脑中而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的，那么预先防止机会主义错误就不可能做到。只有当这些错误在实践中获得了具体形式之后，才能通过运动本身克服它们”。正如修正主义是伴随资本主义终生的小生产所不断生产出来并抛入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一样，机会主义也是“工人运动本身的产物，是工人运动的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因素”。显然，因为恐惧伤口的出现而提前紧紧绑上绷带只会压制健康的血液循环。生机勃勃的工人运动在自己的斗争中探索、“在实践中学习，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迈着试探性的步伐，摸索道路，确定任务，检验自己和自己的切思想家的理论”，他们不能也不该通过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央委员会的代理和托管来防止失策。无疑，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当然不能用抽象的公式来克服，而卢森堡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毫不动摇的信赖和决心，将会给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恢复无产阶级的历史领导地位的斗争提供相当有益的参考。

“的确，疯狂的跳跃会引人发笑，历史上的人的高贵的主体在自己的历史过程中有时喜欢作这种跳跃。被俄国的专制制度压倒并碾得粉碎的我，通过以下方式得到了报复的机会：它借助于革命的思想界人士登上了宝座，并且作为密谋委员会以根本不存在的‘人民意志’的名义宣布了自己是万能的。但是‘客体’表明自己更强大些，鞭子很快就获得了胜利，因为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阶段的‘合法’表现。最后，历史发展过程的更加合法的孩子——俄国工人运动登上了舞台，它已经有了一个最美好的开端，破天荒第一次在俄国历史上创造了真正的人民意志。但是现在俄国革命家的‘我’又以最快的速度把事情颠倒过来，并且再一次宣布自己是历史的万能的舵手，而这一次是以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的皇帝陛下的身分出现。在这里，胆大艺高的杂技演员没有看到，承担舵手所起的这个作用的唯一客体是工人阶级这个集体的我，它坚决要求应有自己犯错误的权利，自己向历史辩证法学习的权利。最后，我们还要在我们中间坦率地说：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的，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

永远翱翔的鹰

“当时我深深相信，‘生活’，‘真正的’生活，离我是那么遥远，在高高的屋顶之外。我一直追随着它，但是它总是躲藏在某个屋顶的后面。”

1918年末，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德国大势已去而逐渐走向尾声，长久以来为了“避免对帝国的安全造成危险”，而被当局“保护性监禁”的罗莎·卢森堡在11月18日获释，她的“等待”没有落空，11月3日以来基尔港和威廉港的水兵哗变已经变成了一场场起义，基尔被四万多名水兵接管，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匆忙中接过了同样匆忙逃窜的地方官员留下的城市政权并在11月7日发出联合呼吁，要求在各地成立委员会与当地政府合作，成立新的人民政府，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革命的浪潮在基尔水兵积极的串联劝说下火速蔓延，水兵们打着红旗到各军营游说，鼓动军人和当地工人加入他们行列，并占领市政中心、释放了政治犯。很快起义就波及汉堡、不来梅、汉诺威、科隆以及鲁尔等地，其中在慕尼黑，一场

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占领了国家议会，库尔特·艾斯纳就在那里宣布了“巴伐利亚共和国”的成立，他本人也成为了新的联合政府的首脑。

卢森堡没有被革命目前取得的成就冲昏头脑，而是以她一贯的冷静态度指出，当务之急不是欢呼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最严厉的自我批评和钢铁般的齐心协力”，她清晰地把革命的目标从最直白的君主政权本身转向了其背后的资产阶级统治，这意味着尽可能地扩大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及其基础，以将其中被革命的浪潮第一时间裹挟进来的不坚定分子替代为革命的士兵和无产阶级，这还意味着立刻提出的对目前用以替代反动的君主政权的革命政府的反思和质问，即对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原则在不间断地要求着政权的革命社会主义原则面前业已表现出的恶劣的拖累的反思和质问。工会和党的官僚们保守主义的倾向再一次表现了出来，“在革命获得力量的热情并开始起劲之前，革命的唯一生命力即它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性质就已经就篡改了。”

革命无法停歇。革命本身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要求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一场反对这个或那个局部现象的局部斗争，而基本上是一场反对最赤裸裸的形态的资本统治本身的雇佣奴隶的起义。所以它就像天空中带着迅猛的自然威力的暴风骤雨一般爆发出来，这时候，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只有一种选择：要么是走在洪流巨浪的前头，要么就让风浪抛到一边去”。这就是说，革命将按照它本身的历史使命冲破一切现有的框架甚至超出自己所赖以诞生的范围，它“生来就是为了战斗”。任何满足于革命的开端的人，将甚至不具备见到革命的终结的资格，这正是为什么当独立社会民主党建议社会民主党代表加入联合政府的时候，卡尔·李卜克内西予以了回绝，11月10日，在临时政府被“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时候，他也在审视了领导层之后以同样“不懂事”的态度警告“反革命正在聚集”，随后，关于选举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进入行政委员会的提议也遭到了大多数人的拒绝。正如卢森堡指出的那样，“旧游戏”已经开始，通过诽谤性的乌合之众、有针对性的谣言和试图毒害公众舆论，“以便创造一种大屠杀气氛，在斯巴达克方案甚至有机会让最广泛的群众了解其政策和目标之前，对其进行政治暗杀。”

不幸的是，李卜克内西的这次警告直到多年后才彰显出其中不为人知的意义。正是在11月10日柏林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终于“接过政权”而斯巴达克派因其激进立场被排除在联合政府外这一天的夜晚，身为最高陆军司令部总指挥官的威廉·格勒纳中将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秘密达成了艾伯特-格勒纳协定，其中艾伯特同意镇压革命，并答应维持被打败的德军作为德国重要支柱之地位；格勒纳则答应他的军队会把权力交给新政府。显然，全国各地的革命浪潮已经使得德国继续战争的可能性彻底丧失，他们不得不在新的浪潮中狼狈为奸才能稳住自己的身形，革命就这样被他们摆上了赌桌，成为了随用随弃的筹码。

然而，以独立社会民主党新创立的日报《自由报》为代表的一系列声音立刻从公开的角度验证了已经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的斯巴达克派革命者们的警告和愤懑。温和派要求选举国民议会以“使革命避免使用暴力和充满恐怖的内战”。卢森堡毫不含糊地迅速将其斥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无疑，谁要是以为资产阶级能看到自己在选举中落败就乖乖交出自己既得的一切利益乃至保障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切断自己的一切退路坐视无产阶级彻底砸碎自己赖以生存的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那谁就确实是在做着前所未有的春秋大梦。须知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关系的更迭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选举游戏，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向前迈进还是后退却的生死抉择，而这种生死抉择是万不可能在一团和气和保持体面的议会大厅里能够做出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通过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占有着整个的经济和社会的权力，他们只可能在无产阶级乖巧地在自己划定的羊圈里咩咩叫着的时候保持从容和体面，只可能在私有制、雇佣劳动等等一切触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被承诺保留下来的时候维持表面上的和气，但是当绵羊意识到了自己除非冲破羊圈就不可能避免身上落下来无休止的剪刀而长出并呲出凶恶的獠牙的时候，任何资产阶级也不会嫌弃从吊床上蹦下来掏出猎枪的劳累。

与作为一个只会加强资产阶级的地位的迂回的国民议会相反，卢森堡抛弃了这种毫无意义的空壳，指出了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一贯患有并深入骨髓的议会痴呆症已经彻底构成了对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个弱点”到“模棱两可”到“背叛”的转变。在她看来，社会主义只会从大多数无产阶级的意识中产生；这种意识的发展需要一个自己的独立的阶级机构，即一个“城市和乡村无产阶级的帝国议会”。

“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是民主还是专政。被历史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象资本主义利润的代理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不是炸弹、暴动、阴谋、‘无政府状态’，这是运用全部政治的权力手段去实现社会主义，剥夺资本家阶级。这是符合占无产阶级多数的革命者的意愿的，是依靠他们的意志实行的，因此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的。……没有无产阶级多数的自觉意志和自觉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为了加强这种觉悟，锻炼这种意志，组织这种行动，需要一个阶级的机构，这就是城乡无产阶级的全国议会。”

斯巴达克同盟为此持续付出着不屈不挠的努力。他们断然拒绝了一切进入现在的临时政府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叛徒的苟合，他们认为与谢德曼-艾伯特政府的合作将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将加强反革命和使革命瘫痪。卢森堡指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特点是“软弱和不可理解的妥协”，而在一场革命中，“没有空间和时间来半途而废或含糊其辞”，德国无产阶级需要“一个能够胜任当前任务的社会主义政党来领导它”。作为替代，在12月25日的《红旗》中他们毫不留情地向世界指出，“在德国，所有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情况并不存在。德国无产阶级需要国际团结；；作为替代，斯巴达克同盟的立场被卢森堡阐释为：“斯巴达克联盟不是那种想凌驾在工人群众之上或通过工人群众而上台执政的党，斯巴达克联盟只是无产阶级的最有觉悟的部分，它在广大工人群众的每一个步骤中向他们指出他们的历史任务，它在革命的各个阶级代表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在所有的民族问题方面代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利益”；作为替代，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将革命者的任务概括为：“必须不仅扩大工人士兵委员会制度，而且也把农业工人和小农引进这一委员会制度。我们必须夺取权力，我们必须把夺取权力的问题当作这样一个问题向自己提出来：整个德国的每一个工人士兵委员会在做什么，能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权力在那里，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挖空资产阶级国家，我们要到处都使公共权力即立法和行政不再分离，而是结合起来，交给工人士兵委员会掌握”；作为替代，他们预言一个维持秩序与和平的、懦弱地留存资产阶级的全部统治秩序的良好温顺的德国革命计划必然走向失败。应

当看到，夺取政权乃至整个革命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将是不间断地进行的，问题在这里将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即不是一切政权归工人委员会，就是一切政权归资产阶级反动派。

反革命立刻对真诚的革命者用他们的方式给予了他们所能给予的最高评价。“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在柏林成立了，这个联盟致力于打击“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世界阴谋”，它散发大规模生产的传单和海报，并呼吁谋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12月6日，“凯撒·弗朗茨”手榴弹警卫团向帝国总理府进军，要求进行国民议会选举并宣布艾伯特为拥有独裁权的总统。一部分士兵在普鲁士众议院扣留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一部分攻占了《红旗》编辑部的办公室，并在大闹了一番后扬长而去。12月9日，保皇党军队被派往柏林周围以维持秩序和稳定谢德曼-艾伯特政府，并镇压斯巴达克同盟。在这一天里，在城市指挥官奥托·韦尔斯的命令下，军事部队出现在斯巴达克同盟的总部，并以搜查武器的名义占领了其办公室。12月10日，全副武装的德军部队招摇过市着返回柏林，并得到了艾伯特政府的欢迎。艾伯特自然而然地开始将这些逐渐从前线返回的部队编入他达成的艾伯特-格勒纳协定即反革命计划的一部分，人民代表委员会热情洋溢地迎接着这些士兵，却将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代表团拒之门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特别联合大会上，卢森堡关于由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接管一切政治权力的决议只获得了195票，相对地，鲁道夫·希尔弗丁同时提出的将组织国民议会选举作为党的主要政治任务的动议得到了485名代表的支持。

整个12月，德国革命都在艾伯特政府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反动和斯巴达克同盟对革命的捍卫中拉扯。但是正如列宁在他解释自己的乐观主义的成因时所指出的那样，“革命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熟起来。我们是第一个，我们必须捍卫革命，直到我们的盟友，全欧洲的工人赶上我们。他们的政府越是陷入泥潭，这些盟友就越是接近我们”。是的，革命士兵被解除武装，革命工人被驱赶回工厂，他们的抵抗将反倒被污蔑为“对社会主义的破坏”，他们困惑，不解，他们发自内心地疑问：“领袖们在做什么？”反革命曾天真地以为群众的迷茫和被利用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但是革命的现实将证明他们不过是一群

“瞎了眼的傻瓜！”

工人和士兵们正在厌倦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政治逻辑范围内的小打小闹，全德国的革命工人和士兵群众的代表逐渐从对艾伯特政府的盲目跟从、工人士兵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遭受的打压中清醒过来。艾伯特政府虚假的权力正在逐渐展露出他如虚空一般充实的根基，以至于艾伯特在12月23日感叹“在所有这些代表出现和不断的威胁下，我们不能再继续一个小时了。我们必须在今天结束之前转移到魏玛或鲁道夫市。”全国各地都针对12月24日反革命引发的“血腥圣诞节”展开了示威，数以千计的柏林居民涌向皇宫前的广场，皇宫在枪击事件中被严重破坏。由德国独立社民党柏林分部、革命管家、人民海军师和斯巴达克同盟组织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变成了直奔《前进报》编辑部的示威，该编辑部随后被占领，当示威者进入时，他们发现院子里至少有18挺机枪、20多箱手榴弹和一辆装甲车。独立社会民主党依靠革命和旧的军事力量牟取一己私利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没有等待多久，12月30日，代表德国革命中仍然捍卫革命的力量德国共产党就在联合了国际共产

党人和斯巴达克同盟的基础上召开了成立大会。1月5日，在艾希霍恩因为被解除职务而站在阳台上后悔自己加入政府的时刻，他宣称，“我们的目标是社会化，而政府却承担了保护资本主义圈子和资产阶级的角色。……我从革命中得到了我的职位，我只会把它交给革命。”群情激愤的柏林人民随即在革命管家和德国共产党等的呼吁下再度占领了《前进报》的大楼和其他多所建筑，并成立了一个新的革命委员会，其中，革命管家的代表提出了推翻艾伯特政府的意见。

虽然在早先群众几乎毫无抵抗地接受了国民议会的选举时，卢森堡以为革命的浪潮已经退潮而大失所望地拒绝加入革命委员会，但艾希霍恩所遭受的解职引发的示威浪潮在1月6日的余波反而吸引了数十万群众的参与，这让卢森堡大吃一惊，她感受到自己对于无产阶级群众自发斗争的信赖得到了姗姗来迟的确证，而这意味着革命已然进入新的阶段。她重新燃起了自己的斗志，并继续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欢迎着斗争形势的激进化。

“群众才是真正的权力、实际的权力，凭的是他们的利益，凭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凭的是历史的铁的“必要性”。人们尽管可以给群众的权力铐上枷锁，在形式上剥夺群众组织的一切权力，但群众只要激动起来，只要挺起腰来，反革命脚下的大地就会震颤。……”

群众正是必须在斗争本身中学会斗争，学会行动。现在人们感到：柏林的工人阶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学会了行动，他们渴望果断的行动、明确的形势和有利的措施。他们已不再象11月9日时的柏林工人阶级了，他们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和应该怎么干。”

卢森堡同样回答了群众一直以来对于“领袖在干什么？”的疑问，她一以贯之地痛痛快快报之以完全否定的回答。面对日益觉悟而逐渐在斗争中学到了要去行动的无产阶级群众，“实现他们意志的执行机关”有同样的进步吗？独立社会民主党有进步吗？他们的行动能力和坚定性在这一期间也增长了吗？他们的行动能力跟得上群众的日益增长的干劲的步伐吗？不！“领袖们还是11月9日那时的样子，他们没有进一步学到什么。”事实就是如此，“领袖”在革命形势的千变万化前“玩忽职守”了，“领袖”在革命要求一个坚强和能够将历史进程推进下去的领袖的时候“失灵”了！革命进程一次又一次地揭示了“粗暴、赤裸和无情的选择”，即“要么革命不得不放弃它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使命，要么艾伯特-谢德曼及其支持者必须被赶下台”。背叛再一次从熟悉的地方袭来。德国共产党内部在有的讨论中明确要求对起义进行公开批判，而迫使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皮克从指导武装斗争的所有委员会辞职。但是，尤其在这个时候，卢森堡明确地开始从尚不完善的自发论向前发展了，即在组织而非单纯组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作中“一天比一天更接近了列宁在理论上明确界定的关于自觉的领导和自发性的概念”。她重新开始思考，如何将已经被号召起来的群众即成熟的革命步骤转化为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并参与决策和行动。

在1月8日人民代表委员会宣言“清算时刻即将到来”，即高呼“自由和秩序”并要求粉碎斯巴达克的“恐怖统治”并“一劳永逸地防止其重新出现”，柏林的革命左派不得不写下联合呼吁，要求工人“抵御白卫军迫在眉睫的暴力”的时候，卢

森堡以惊人的冷静和镇定回击了反革命的死亡威胁，在《红旗》编辑部遭到枪击的时候，她甚至还在平静地继续工作！无疑，她心中所挂念的远远不是这副早就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躯体，她笔耕不辍地撰写着的依旧是对起义的政治领导人落后于群众的最无情的揭露，依旧是对行动而非空谈的热切呼吁。无休止的讨论、无休止的谈判，革命的口号一经提出就被束之高阁。卢森堡极度痛恨着在艾伯特政权最虚弱的时刻顺从他们保命的渴望而搁置革命的这场“独立社会民主党导演的团结闹剧”，因为一次次的谈判将只是给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在“充满风险的与工人阶级的较量”前站稳脚跟的机会。“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又一次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救命天使。”全部的经验教训在此刻被再一次提及，很显然，为了避免人民的敌人再一次依靠群众的健忘，“牢记一切，永不忘记！”的战斗口号从来没有像当时那么重要过。

“最近几天的危机使群众想到一些最重要的、最迫切的教训。目前柏林工人阶级缺乏领导和缺乏组织中心的情况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革命事业要前进，如果要使无产阶级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梦想，那么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跟得上时代、懂得引导和运用群众的战斗能力的领导机关。首先必须在近期内清理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腐烂的尸体，它的分解物正在毒化革命。同资产阶级的决战在德国首先表现为和资产阶级的保护伞谢德曼—艾伯特的清算。而同谢德曼之流的清算，要以清理艾伯特—谢德曼的保护伞独立社会民主党为前提。……

对掩盖矛盾、调和、实行泥潭政策的企图采取明确态度并进行尖锐的、毫不容情的斗争，团结群众的革命力量和创立相应的机构去在斗争中领导他们，这些是最近时期迫在眉睫的任务，这是最近五天从群众强有力的冲击和领袖极其可悲的失灵中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

不幸的是，反革命有条不紊地推进着阴谋、屠杀和恐怖。战斗在继续，杀戮也在继续，身边的同志、优秀的革命战士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刺刀统治”正在旧政权和革命的废墟上重新恢复起“旧秩序”。1月13日，革命管家宣布了总罢工的结束，古斯塔夫·诺斯克对柏林进行了军事包围。新的军队进入了柏林。自由军团在工人区散布恐怖。或许是感受到了什么，卢森堡在对被谋杀的沃尔夫冈·费尔巴哈的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已经看到我身边有那么多的朋友在身旁倒下。这就是革命战士的命运啊！我自己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为了我们的事业的奋斗过程中寻觅自己的死亡。”

1月14日，柏林秩序井然。——正如1831年的华沙，正如1871年的巴黎。

艾伯特和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势力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在帝国主义的战场上惨败而归的德国军队，终于在屠杀自己的同胞中收获了名誉和光荣！斯巴达克的“恐怖统治”被粉碎，“自由和秩序”终于再度赢得了胜利！

“这时有谁不会想到巴黎的‘秩序’警察们在胜利中陶醉、资产阶级在公社战士的尸体上痛饮美酒的情景，而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刚刚在普鲁士人面前可悲地投降，并且把国家的首都奉献给外敌，自己却象最卑劣的胆小鬼一样逃跑了。但是在镇压武装很差、饥寒交迫的巴黎无产阶级，镇压他们的手无寸铁的妻子儿女时，又是怎么

样重新激起了这些资产阶级子孙、这些‘金色青年’，这些军官的男子汉气概啊！在外敌面前屈膝投降的战士的儿子们在野蛮残酷地对待手无寸铁的人、俘虏和阵亡者时，他们的勇敢精神发挥得多么淋漓尽致！”

就在不到五十年前，一名被俘的巴黎公社战士曾如此警告凡尔赛军队：“相信我，你们撑不住的。你们的妻子都在哭泣，而我们的妻子没有流泪。”这番警告如今被罗莎·卢森堡以她一贯以笔为剑的行事方式，再度奉还给了新一轮的“‘秩序’的维护人”，这些兴高采烈的胜利者没有注意到的是，“自由和秩序”一遍遍地被重建，恰如它们一遍遍被打破那样，这种需要依赖一次次的周期性的屠杀才能够维持“自由和秩序”的窘境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而恰恰属于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反革命将不得不在革命中心的一次次转移，即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在世界各地次序走向白热化的进程中疲于奔命，他们早上镇压了柏林的起义，下午就会发现彼得格勒爆发了游行；他们今天平定了日本的局势，明天就会惊讶地得知中国出现了叛乱。

不过，德国革命所能向全世界人民传达的信息还远不止于这样简单的乐观主义。它同样以血的教训告诫革命者，“革命的内在规律是在跨出第一步以后决不能停下来采取无所作为的被动态度”，因为反动和革命二者对彼此知根知底，在革命中的任何怯懦和软弱都将导致给资产阶级的反动当局留出筹划反革命阴谋的空间，止步于一个一般的民主主义的原则的实现而不是立刻提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将会导致无产阶级群众连一般的民主主义也被迫丢掉。革命的抉择就是如此清楚而冷酷，这就是说，“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无法保持‘中庸之道’，革命的自然规律要求迅速作出决断：要就是火车头沿着历史上的上行线全速前进，直到顶点，要就是它由于本身的重力重新退回到出发时的洼地上去，并且把那些在半路上想凭自己微弱的力量使它停下的人无可挽救地一同带下深渊”。

同样是在1月14日，一支自由军团队伍找上了门，他们用枪托击晕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并把他带入车中杀害，而羸弱的罗莎·卢森堡没有能抗到第三下枪托就被击裂了脑壳而死，她最终在她47岁这年，被迫停止了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贡献。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一样被无耻卑劣的反革命分子从全世界革命者的身边拉走了，他们死去了，他们被谋杀了，他们智慧的话语再也不能在无产者的耳边响起，他们瘦削的身躯再也不能在游行队伍的前方被找到了！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过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歪曲，反对过社会沙文主义对无产阶级队伍的荼毒，反对过摇摆不定的中派主义对国际革命的背叛，而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独立、毫不退缩地支持国际主义、至死不渝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一句话，他们自始至终都用全部的精力和热情与剥削者和整个旧世界作斗争！

罗莎·卢森堡死去了！卡尔·李卜克内西死去了！谋杀他们的人与最下贱最无耻的暴力恐怖分子蝇营狗苟，第二国际的叛徒，社会民主党的匪帮跪拜在德国帝国主义的皮靴前的时候，他们打着自由和秩序的旗号谋杀国际革命的两英雄的时候，却胆敢将自己的反动劣迹的家谱追溯到卡尔·马克思本人那里！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就这么过去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鲜血在拼命大喊。这鲜血会让柏林的马路开口说话，让那波茨坦广场上的石头开口说话——李卜克内西就是在那里第一个举起了反战反资本的旗帜。迟早有一天，人们会用这些石头在柏林的街头筑起街垒，向资产阶级社会最忠诚的奴才走狗开战，向谢德曼和艾伯特们开战！”

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就这么过去了！因为罗莎·卢森堡和历史上一切曾英勇地捐躯的革命者给我们留下了数不胜数的财富。这些财富没法靠善有善报的懦弱祈愿直接买来无产阶级的胜利，却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起来、如何战斗、如何团结在这场为了实现人类最高目的的最后阶级斗争中。数百年来浸透着无数正直而坚毅的革命者的鲜血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终将给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报仇雪恨！”

德国革命失败了！无产阶级“过早地”掌握政权了！但是，卢森堡和整部社会主义革命史无不在极力向我们证明，革命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斗争，与其在错误的道路上摇摇欲坠地维持虚假的胜利，倒不如在正确的道路上坦然地失败并从自己的全部失败即从在辩证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史学习，革命独特的生存规律告诉我们，它的一系列失败与其说是“能”为最后的胜利做好准备，不如说是最后的胜利“必然”建立在这样的一系列不成熟、错误和失败之上。这将是不可阻挡的进程。无疑，德国革命最终是在革命的形势和力量在尚不完全成熟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限制下，和革命行动本身不够彻底和坚决即政治领导的危机下落败了的，但是“决定性”的“磐石”即无产阶级群众作为一个阶级永远也不会因为在历史的必然性赋予它的使命上发生任何的动摇。正是这一切使我们，21世纪的革命者从未如此坚信，坚信革命的胜利终将依靠这块磐石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且在这最后胜利的光荣中，将会有归属给英勇的十一月革命的一部分，将会有归属给坚毅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一部分，将会有归属给伟大的罗莎·卢森堡的一部分！

“‘柏林秩序井然！’你们这帮愚蠢的奴才！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将在‘磨刀擦枪声中再次兴起’，吹响令你们惊惶失措的号角，宣告：

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列宁思想评析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目录

前言

唯物主义哲学

帝国主义

一国胜利论

与第二国际的斗争

论“革命失败主义”

工农民主专政理论

民主集中制

新经济政策

尾声

前言

在旧世界的断垣残壁与阶级斗争的血火洗礼中，列宁这个名字，早已超越了个人的生物性存在，化作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最高意志与战斗灯塔，列宁被广泛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且评价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还成为了共产主义的象征，被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普遍认同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今天，在列宁逝世的第102个年头里，我们必须从那座由自由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垒砌而成的、冰冷死寂的“圣像”神龛中，夺回那个充满战斗激情的、活生生的列宁。

列宁绝非资产阶级文人笔下那个坐困愁城的阴谋家，更不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为了掩盖其对国际主义的背叛而强行塑造的僵化符号，他是马克思主义最具生命力的实践者，是那种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敢于粉碎一切庸俗进化论谬论、直接诉诸群众创造力的革命统帅。当第二国际的叛徒们在议会里温情脉脉地谈论改良时，列宁正以钢铁般的意志在暴风雨中锻造布尔什维克。他敏锐地洞察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的、腐朽的阶段，并在世界革命的版图上精准地寻找到那处最脆弱的环节，将俄国无产阶级的起义转化为世界革命的先声。

那些试图将列宁的组织原则污蔑为“官僚独裁”的懦夫，以及妄图挑拨列宁与托洛茨基、列宁与卢森堡之间的关系，并将革命领袖划分为不同阵营的卑劣政客，从不敢面对列宁思想中那股排山倒海般的、渴望由武装工人直接管理国家的革命民主热情（参考《国家与革命》）。列宁真正的力量，来源于他对现实运动的深刻把握，来源于他将辩证法从书斋带向街垒的非凡勇气。在帝国主义秩序摇摇欲坠的今天，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必须剥离那些加诸于列宁身上的累累尘垢，夺回那份关于先锋队、国家与革命的宝贵遗产。我们不需要一个供人膜拜的木乃伊，我们需要的是那个在芬兰湾的寒风中指明航向的、始终与无产阶级同呼吸共命运的列宁。列宁的思想是柄不朽的革命利剑，它必将在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决战中，再次焕发出最为耀眼的光芒。

我们会从列宁的哲学思想入手，然后挨个分析其理论贡献和实践成果，并客观的评价和批评列宁。

唯物主义哲学

在分析列宁的哲学思想时，我们必须首先把列宁放回到他所处的思想战场里，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他在哲学上的、近乎充满狂热攻击性的“狠”从何而来：那不是学院

式的好胜心，而是真正把认知论作为革命斗争最重要底线的基本态度。列宁最主要的哲学贡献和对辩证法比较全面的阐述主要来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面对前进派与召回派极左主义者所秉持的哲学观点时所作出的抗争。在整个1905年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中，列宁面对的并非抽象的“学派之争”，而是一个会在实践中迅速转化为组织路线崩溃、文化路线投降、乃至阶级立场丧失的根本哲学方法论斗争。我们再次对于波格丹诺夫及其所秉持的马赫主义观点不做过多论述，只需要说明以下几个事实：召回派认为“物质”是人类感知器官所产生的主观感觉的复合，从中产生了客观世界的某种基于个体独立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决定了作为符合经验要素存在的“相对真理”，其最终结论是物质世界无非是个体所产生的不同感官经验之间联动所构筑的主观现实集合体——这就回到了主观唯心主义在几百年前的样貌。列宁因此以近乎“军事化”的方式立刻同波格丹诺夫划清界限，进而重新确定了几个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外部（物质）世界独立于意识而存在（这种物质世界存在的最高代表就是“自在之物”），而人类意识主要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同时又反映了人类意识自身所具备的主观倾向元素（这种元素来自于作为物质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人类部分，而不来自超出这一范畴的形而上）；同时，科学的真理性并非由主体意愿裁决，而是在历史性的实践中被检验，并不断锤炼而逼近最为靠近现实的真理总结办法，形成一条渐近线趋势（不过“绝对的”物质世界真理是无法被彻底确定的）。

这些我们现在看来几乎是常识的结论在当时首先是对马赫主义的回应。这里我们需要重申在之前发表过的[《在一切时代的斗争》](#)中的一些论述，马赫主义者（尤其是波格丹诺夫）把“经验要素”当作物质世界最后的根据会不可避免地把世界从“客观的存在”改写为“经验的组织”；而一旦世界被理解为从主观层面被组织出来的，真理也就被改写为仅仅是能让某些上层建筑组织得“更方便、更经济、更合算”的东西。列宁反复强调，所谓把“物理的”与“心理的”都看成中立经验要素的说法，表面上像是越过了唯心与唯物的对立，实际上却是在关键处撤退，使“物质第一性”——这里所说的并非物质/经济还原论或经济/物质决定论，这里所说的物质第一性指物质是决定事件和人类意识走向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也是最为根本的影响因素，并不否认其他客观或主观要素的影响，尤其不否认人类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人类的社会性与作为社会关系总和所带来的影响所导致的结果——从一种压倒性的根本原则转而变成了叙述习惯，也就是所谓经验要素作为物质世界的“直接体现和流散形式”。同时，经验批判主义所代表的马赫主义令“客观规律”不再直接反映或概括现实社会的趋势，而变成了经验编排的柔性、间接结果。显然，列宁所坚持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并不是某种粗糙的物质一元论，也不是把精神另立为本体的古典二元论，而是一种具有一元论精神的复杂、多元辩证体系（所以这也不能被视为所谓“物质一元论”，因为列宁的提法实际上是超越本体论的），在这个体系中现代中国教育所习惯使用的庸俗辩证法（也就是二元矛盾论）是毫无容身之地的——列宁主张必须坚持客观现实的独立性，但也必须允许在这一前提下把意识、认识、文化等复杂对象纳入同一个运动着的整体来解释（因为这些内容本身也是客观存在）；在这个整体中，上层建筑作为物质现实的客观反映而半独立地存在、拥有自治、自立的作用，而不能简简单单地被当作纯粹是“物质的影子”。

列宁的哲学攻势之所以值得今天重新咀嚼，并不只是因为他“捍卫了唯物主义”，而是因为他直截了当地把哲学争论同知识生产、党的政策与群众路线实施办法紧紧

咬合在一起——上文所提到的“召回派”代表的极左主义趋势是认为1905年革命失败后组成的俄国杜马已经完全成为了立宪民主党人（Kadet）、十月党人和俄罗斯人民联盟（一个保皇党派）的游乐场，最终也就是沙俄皇帝与元老院贵族们的傀儡（这一论断是准确无误的，杜马在此后的十几年间的确几乎完全丧失了进步作用），因此要求社民工党从议会中悉数“召回”议员，走彻底的非法、议会外斗争路线——显然，无论他们对杜马的认识是多么正确，因为敌人的缘故，而放弃一整条政治战线也是极为愚蠢的。列宁对这一极左主义政策的批判已经非常全面，这里不多展开。无论如何，此类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主张正是出自波格丹诺夫，这正是列宁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历史背景在政治领域的外化形式。波格丹诺夫与“召回派”式的政治极左主义可以追溯到其经验一元论的哲学根基（也就是经验批判主义的真正始祖），因为其在“科学（或物质现实、客观规律）即经验组织”的口号既否认了自在之物的客观实在性，又否认了人类意识在上层建筑内复杂作用的结果，最终只能在实践上滑向无厘头的乌托邦主义（也就是召回派纲领）。波格丹诺夫，依照列宁的话一直试图创造一种“纯粹的集体经验”，凭空搭建一种脱离既有政治经验与历史积累的政治常识，日后他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失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总而言之，如果世界运行的真理被相对化、经验要素化，那么任何现实政治的纲领就会从“改造世界的武器”退化为“组织经验的修辞”，最终最先被削弱的反而是无产阶级在总体上把握现实矛盾、组织实践的能力。

但就像上文所提及的，列宁的哲学又并非停留在一套“外部世界 - 意识内产生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反映 - 实践检验 - 形成新的意识 - 再实践”的线性、机械教科书框架里。恰恰相反，如果现代的共产主义者还是仅仅把列宁理解为反映论的“直线派”，理解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我们就会错过他思想中最能为今日的革命运动提供推进力量的部分：那就是他对辩证法作为全新认识论的再发现、再锻造。首先，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把“实践标准”、“实践过程”与“实践结果”提升为认识论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环节（这又批驳了认为不需要复杂认知论的机械唯物主义），明确把实践当作反驳不可知论与唯心主义的最有力武器，并把它奠定在《费尔巴哈提纲》的延长线上。更重要的是，在他后来的哲学笔记与关于黑格尔的札记中（参考：《列宁全集》英文版），他把辩证法直接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论之“本质”（注意：这里不是古典形而上学或者本质主义学派的本质，而仅仅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认知论的“真正样貌”），强调辩证法是“活的、多面的认识”，其侧面无穷增长，而逼近现实的路径又具有无限细微的层次；并且尖锐批评“停留于僵化思辨的唯物主义”（这就是与辩证法、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批判相对的古典思辨逻辑学之下的本体论争议，虽说列宁提出的思想实际上算是对本体论本身的否定，不过列宁并没有否认本体论问题争论的价值，这个问题后文会继续阐述）的根本不幸，指出旧唯物主义的问题在于完全没有能力把辩证法直接应用到反映论与认识发展过程本身，也就是没有能力拓展辩证法的现实应用边界线。

这句话几乎可以视为列宁对他自己早期某些攻击性比较强、但是在策略上却过于防守的表达所做的自我推进：唯物主义必须划定一些概念与原理的根本界限，但不能把划界当作终点；真正的难题是把反映论本身辩证化——把“反映”理解为历史的、实践的、结构的意识发展过程，而不是一种僵化的、线性的、一成不变的镜面式的对应。换句话说，“反映”就是作为人的“主体”在历史长河中通过实践主动生成的自觉过程。意识作为现实的内在要素，在人与事物发生联系的动态结构（也就是

不断变化的现实)中不断被完善,也就是说,认识需随着现实的运动而不断被修正。这种反映以实践为基础,将原本没有被人认识的事物,规定为对人有意义的东西。进一步说,对人来说,没有被“认识到”的东西,也就没有实践意义。如果一种“现实”无法被意识感知并纳入实践,它在逻辑和生存上便等同于不存在。如果我们假设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被囚禁在营养液中,通过电信号模拟出现实、感官体验等,而大脑本身无法找出具体证据去证明这就是现实情况,那么这些电极对人而言就不具备任何意义。即便我们就说这些设备确实是客观实在的,我们的一生就是个笑话,而我们只是“暂时没有证据去证明”,但是因为它们并未与人发生联系,我们无法针对电极进行维护、破坏或改造,因此这些设备对人来说是一团“无意义的混沌”,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胡思乱想,因为它无法影响我们的实践(当然不排除只是暂时没能影响到我们的实践的情况)。

再如,在人类掌握电磁波的规律之前,电磁波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始终充斥在自然界中。然而,在未被“认识到”的历史阶段,电磁波对人而言没有实践意义。它当然先于人们认识就存在了,但是它还不能被用来传递信息,也不能被用来解释世界,它与人的生存并不发生自觉的联系。只有当人通过实践发现了它,并将其规定为一种可利用的物理现象时,它才从“外在的物”转化为现实的要素,进入了人的历史过程。

从这里出发,我们在这个时代推进辩证法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由列宁所提出的根本依据。上文提到,我们现在认为本体争执并非毫无意义,尤其是继承了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学派哲学家的马克思所反对的并不是一切本体论的讨论,因为没有哲学史上对本体论的讨论也就不会有对本体论的超越,辩证唯物主义反对是脱离现实与实践的纯思辨方法;真正需要的是在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同时,引入更现代、更体系化的阐释工具,尤其是对意识与主体性的细致说明,这个结论是列宁所明确支持的方法论。也就是说,列宁之所以捍卫客观现实的独立性并不是为了把人类意识问题一笔带过,而是为了获得进入意识问题的正确入口。换句话说,列宁把门槛立得很高:只有承认客观世界独立存在,对于人类意识的研究才能避免滑向唯心主义;而只有坚持实践标准,这种对于哲学史的研究才不至于走向纯解释学、逻辑学与经院哲学的老路;自然,也只有承认真理的相对性与作为“渐近线”的根本,我们在处理作为现实世界复杂映射的人类意识时才不会陷入要么滑向机会主义与不可知论、要么步入教条主义的窘境。最重要的是,只有把辩证法应用到认识“人”与“人格”(也就是作为物质的人和作为意识的人)的过程自身,我们才能从根本意义上避免整合了以上一切问题之缺点的机械反映论——这恰恰是当今许多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所不能认识到的问题。

从列宁出发,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另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列宁之后辩证法发展长期停滞的问题。这个问题恰恰发生在这个“入口之后”的深水区:我们有了守门的原则,却缺少继续向内开掘的工具。停滞的一个表现,是把列宁的划界抽象化为纯粹局限于政治范畴的口号,进而把辩证法降格为一种“立场正确的革命者常识”。这样一来,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被当作政治身份的标记,而不是分析现实的科学方法;从这个回归了划成份扣帽子方法的角度出发,本来仅仅是一句概括了“物质有限性”或“物质第一性”的格言——“物质决定意识”——被当做是一切哲学领域系统性解释上层建筑现象和人类意识的的终点,而不是新的起点。此后,人

的主体性要么被压缩为所谓纯粹被动的反映，要么在常识纠正这一问题的巨大反弹中被夸大为脱离物质结构的“纯能动”。（法兰克福学派和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世界就来自于他们醉心修复这个问题却丢掉了根本，走到了一个极端的反面）与资本主义世界杜绝形成完整世界观和认知论的现实相照应，我们的人类哲学世界走入了一个死局——列宁以后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者还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都再也没有能力超越、发展以前人们的哲学认知框架。因此，从列宁视角提出“终结列宁以后辩证法发展停滞的必要性”，其意义并不在于对列宁作某种“修正”，而在于更彻底地继承列宁：继承他把哲学当作阶级斗争武器的态度，继承他把认识论与实践论辩证结合的做法，继承他在笔记中不断提醒自己的那句话——辩证法是活的、多面的、不断增加侧面的认识，我们必须带着它进入反映论与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这意味着，我们今天需要做的不是把列宁的思想奉为圭臬与一切方法论的最终重点，而是把它当作“最低原则与最高任务同时在场的起点”——这一最低原则是客观现实的独立性、实践标准、反对不可知论与唯心主义；而最高任务则是把这些原则推进到对当代现实的解释维度之中，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停留在承认“客观存在”，而是弄清楚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这条推进路径上，波格丹诺夫问题会以新的面貌不断回潮——毕竟，经验批判主义与经验一元论的现代外衣从布尔什维克这个最为进步、激进、革命的政治传统和环境产生，也必然会不断在伪装成革命潮流的意识形态中死灰复燃，它在法兰克福学派之流的理论中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回归，并像它一百年前的始祖那样，不断尝试阶级斗争替换为某种“认知斗争”。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以上对于其思想谱系的追溯，这个警觉本身就继承了列宁所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和警醒：无论何时，对这种回潮的反击单靠重复“物质第一性”是完全不足的，因为对方恰恰会以更精细的方式在意识与知识层面工作；我们必须在更高的复杂理论战线上保住列宁划定的底线。本文在这里基于上述内容总结了三个列宁的基本结论：第一，意识不是镜子，也不是自足的语言系统，它是等多重社会条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不断自我发展的结果；第二，主体能动性必须被理解为实践中的能动，而不是抽象心灵的能动——然而列宁既反对把主体夸大为世界的立法者，也反对把主体缩小为环境的回声——这两种极端都会在关键处放弃辩证法；第三，辩证法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解释“媒介”作用：解释最为基础的物质世界客观条件如何通过科学技术、生产方式、信息传播、上层建筑等“中介机制”塑造人的主体意识，同时又解释意识如何在实践中反过来改造这些媒介本身——如果，没有对于这个中介过程状态的具体分析，意识问题要么被还原论吞噬，要么被相对认知主义挟持。这也解释了“本体争执仍有必要”这个观点在列宁语境下为什么并不矛盾。列宁反对的不是对存在的讨论，而是把存在讨论变成脱离实践的纯粹思辨，把我们所提到的、应当极为复杂、辩证的认识论变成无源之水。真正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应当是综合了整个物质现象、实践、反映过程的复合本体论，而辩证法就是研究各种对象在发生交互关系、产生现象以及这些过程本质中的矛盾，并反复以过程观反对把世界当作“现成事物的集合”——后者又回回到那个马赫主义的经验要素论幽灵中。

最后，列宁所留下的极为丰富的哲学遗产为这些表达留足了足够空间，使我们发展一种更现代的、能够吸纳当代科学与社会理论成果的唯物辩证法留下了空间：它既不需要退回形而上学实体论，也不需要向语言建构论投降。从展望的角度说，“终结列宁以后辩证法发展停滞”并不是要制造一个新口号，而是要恢复一种列宁式的

哲学工作方式：把革命党人所应该具有的哲学研判能力理解为对现实世界真理本身的忠诚，而不是对术语和口号的忠诚；把与错误思潮的斗争理解为对群众集体实践能力的保卫，而不是革命者自命不凡的态度；把对经典革命家和社会主义者著作的学习理解为改变现实的前置准备，而不是停留口水仗和辩经中。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革命党人都必须做好万全的斗争准备，时刻捍卫我们最根本的政治底线，以及为我们划清这条底线的丰厚哲学信念。

帝国主义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历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理解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发生的重要变化的核心工具。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了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

“(1)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 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 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这一理论为解释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殖民体系的形成以及阶级结构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框架，因此在历史和理论上都具有划时代的地位。然而，这一理论在提出之初就遭受了相当大的质疑，甚至在现代的学术讨论中也不断被挑战。

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学者指出所谓“金融资本”的定义过于狭窄，而且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支配只在少数国家出现（更有甚者认为只有普鲁士帝国才有这样的现象），并不能普遍代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其次，批评者认为在事实上 19 世纪后半期资本输出并没有显著增加，而帝国主义理论夸大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的规模和作用。同时，质疑者强调利润率并不是理解殖民地问题的核心，因为殖民地的利润量远不及工业化国家的庞大市场，而按照资本流动的规律来看（即资本会流向利润率高的产业和地区），资本不会流向殖民地以开发新市场，因此资本输出并非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

这些学者也认为列宁把资本主义的衰落与停滞同资本输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但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特别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并没有表现出技术停滞或全面衰落的迹象，反而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崩溃”了，这使得帝国主义理论在他们眼中缺乏说服力。

还有更进一步的批评认为，“殖民主义”并非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是贯穿于不同发展时期的现象；而马克思主义分析往往将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集团的再生产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需求，忽视了殖民地自身复杂的

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

然而，这些质疑在事实面前并不成立。所谓“金融资本”的形成并非要求在所有国家的普遍存在，其形成条件是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深度融合。例如，德国的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等大型普遍性银行不仅提供长期贷款，还直接持有钢铁、化工企业的股份，并派遣代表进入董事会，形成了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的直接控制；在美国，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银行家们直接在各工业企业的董事会中占据关键位置，推动了“金融寡头”的形成；英国的伦敦金融城则以海外债券发行和铁路、公债承销为手段，把工业投资与国家金融紧密结合，使得工业资本的扩张与金融资本的运作不可分割；日本的三井、三菱等财阀通过银行、商社和重工业企业的交叉持股与内部融资，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资本集团，银行在其中起到统筹和调配资金的作用。这些现象共同说明，金融资本的形成并不是抽象的理论假设，而是股份公司的兴办使得各个银行在工业企业中握有占支配地位的股份、企业任命银行的经理担任工业企业的监事或任命工业企业的经理担任银行的监事实现“个人联合”、长期信用关系和资本市场的安排，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具体地体现为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从而构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

过去银行的角色主要是作为信用中介机构，集中存储并提供短期流动性贷款，以满足商人、手工业者、手工业工厂、早期工业企业等的资金周转需求，它们的功能更多是维持市场交易的顺畅和信用的稳定。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银行逐渐转变为资本集中和再分配的枢纽，不仅提供长期投资资金，还通过持股、董事会席位和金融市场操作直接参与工业企业的战略决策，成为工业资本的统治性力量。进入当代，银行的角色进一步扩展，它们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贷款机构”，而是通过跨国金融集团、投资银行、证券化工具和全球资本市场来掌控产业链和资源配置。同时，银行为了保证信用必然需要掌握企业的财务状况、生产计划、市场预测等大量商业秘密，而这些信息在融资、审计和资本市场运作中被部分公开化，结果是生产的无政府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企业之间的运作逐渐纳入金融资本的监督与协调之中，从而使资本主义的整体再生产呈现出更强的集中性与制度化特征。

此外，资本输出的确在19世纪末出现了质的飞跃，英国的海外资产在国民财富中占比显著上升，法国、德国、荷兰等国也形成了庞大的海外投资组合，美国在一战后更是迅速转为净债权国。资本输出不仅是直接投资，还包括公债、铁路债券、矿业特许权和基础设施承包，这些形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构成了稳定的利润来源。这种资本外溢的逻辑在于，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垄断资本积累出现过剩时，资本必须寻找新的投资场所，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仅提供了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还通过相关的政治-法律机制保障了投资的安全性和长期性，从而使资本输出、金融资本和垄断企业一起成为帝国主义阶段的核心特征。

在二战后，这一根本特征也并未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下来。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亚非拉国家投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国际金融机构通过“主权债务”和“援助贷款”限制了亚非拉国家的财政与政策空间，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在铁路、港口和能源领域的投资，美国和欧洲的跨国金融集团则在拉美和非洲的矿业、石油和电信产业中进行布局以实质上掌握这些产业。国际资本市场也通过债券、证券化和私募基金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渗透。这些例子都体现了资本输出的“非

暴力化”的现代形态。这些例子也说明，资本输出从19世纪末的典型的殖民地铁路债券和矿业特许权，发展到今天的跨国金融集团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其本质依然是通过跨境资本流动来获取稳定的利润来源，并在全球范围内重塑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构。

关于利润量与利润率的争论也被那些学者误解了，因为帝国主义理论强调的是通过国家权力保障的大规模、长期、可控的利润总量，而不仅仅是孤立的高利润机会。至于所谓“资本主义没有衰落迹象”，也是误解了列宁所说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因为这两者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技术停滞”和“经济停滞”，而是指垄断化和金融化带来的过剩资本、市场瓜分和危机管理机制，这些现象在19世纪后期的长萧条和20世纪初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都有表现。

在现代，这种寄生性与腐朽性不仅体现在经济结构上，还在学术与制度层面有所反映，例如学术造假问题的频繁出现。这是因为在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渗透进了每一个角落。金融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像“收租”一样获得尽可能稳定的超额利润，它并不关心现实本身，只关心如何通过数据造势来掠夺资源。当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被异化为一种“指标”时，科研就从探索真理变成了像炒股一样的“泡沫生产”。中国知网曾披露部分高校存在大规模论文抄袭与代写现象，或是使用AI生成，2020年《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统计也显示全球每年有数千篇论文因造假或数据不实被撤回，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等机构就曾因研究人员伪造实验数据而引发丑闻。这些现象背后往往是过度追求量化成果的压力，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科研评价体系过分依赖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和引用率，导致研究成果注水甚至造假。

与此同时，现代资本主义的专业化分工与大学体系的制度化安排，导致了知识生产被切割成孤立的“知识孤岛”。随着19世纪以来科学与工业的快速发展，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了提高效率与产出，将知识划分为越来越细的学科领域。这种分科制度在最初确实推动了知识的深度发展，也是必要的，但在现在却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每个学科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立的评价体系、研究方法和权威结构，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被人为切断，学习者和研究者在这种制度下往往只能在单一领域内积累成果，而难以形成整体性的理解框架，而要形成整体性的理解，就必须得取消单一学科权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领导层）对资源和评价的垄断。这种割裂最终使知识生产呈现出碎片化和静态化的特征，削弱了人们用综合视角把握世界的的能力。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Bruce Weinberg分析了154021名生物医学博士的职业数据，发现那些在职业早期专注跨学科研究的科学家，比坚持单一领域的同行更难获得基金支持和稳定的职业发展。这说明学科壁垒和评价体系的功利化直接阻碍了跨学科研究者的成长。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制度本身就要求领导层通过碎片化知识结构来实现其“权威”，这就让学科被人为划分为彼此独立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独立的评价体系、研究方法和权威结构，这使得学科内部的专家和管理者能够牢牢掌握资源分配与话语权。领导层通过维持这种分科制度来巩固自身的制度性权威，因为碎片化意味着研究者必须依附于各自学科权威体系才能获得认可与晋升，跨学科的整体性尝试反而会被边缘化。结果就是，虽然大家形式上都“学了很多东西”，因为学校不可能只要求你学一个学科，相反，学校要你“什么都学”，但因为制度安排让这些东西彼此孤立，学习者很容易形成一种观念——

知识没有内在联系，最终只是堆砌，而不是整体性的理解。同时，这种割裂还导致各学科的要求似乎只考虑自身的目标和标准，好像学生只要学它就足够了，结果是每个学科都在不断增加作业、考试和研究任务，学生不得不在不同学科之间疲于奔命，压力倍增，更难有时间和精力从整体的角度去综合和联系所学知识，从而进一步加深了碎片化的认知模式。

这种“知识孤岛”的形成，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垄断统治的需要。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最害怕人们看清资本运行的整体逻辑，因此必须在意识形态和知识生产上实行“分而治之”。只要知识是支离破碎的，每一个研究者就只能被锁死在极小的领域里当“螺丝钉”，必须依附于该领域的垄断权威才能生存。这种制度确保了知识分子由于视野受限，难以形成对整个社会和世界的整体性认识，从而难以对帝国主义的秩序构成根本性的威胁。

与此同时，食利阶层的存在愈发凸显。正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越来越依赖租金和金融收益，而不是生产性投资，这种食利的顽固性远超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曾经的预期。食利阶层通过金融市场、房地产和知识产权攫取剩余价值，成为资本主义寄生性的直接体现。专利制度也在这一过程中异化为牟利工具，这一被说成是“鼓励创新”的制度在实践中却常常被滥用为市场垄断的手段，例如“专利商业维权”与“标准必要专利”的高额许可费和捆绑条款，已经引发广泛批评，这说明在现代，专利制度在现实中更多地服务于资本的逐利逻辑，而非技术进步。这些现象共同说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寄生性与腐朽性并非错误的判断。

此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殖民主义只看作资本主义时代的现象。在研究资本原始积累时，马克思明确指出，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是欧洲资本积累的起点。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征服不仅掠夺了大量金银，还通过奴隶贸易把数百万非洲人贩运到美洲种植园，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原始积累的条件。而在更早的奴隶制社会，殖民主义就已经存在。希腊城邦在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之间，为了缓解土地不足和人口压力，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为城邦提供粮食、金属和奴隶，维持奴隶制经济的运转。罗马则通过军事征服设立殖民城，安置退役士兵，并将被征服地区纳入税收和奴隶供给体系，使罗马奴隶制经济得以扩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殖民主义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存在，并且在不同社会形态下都起到了为统治阶级扩展生产方式和巩固统治的作用。

至于殖民地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情况和社会性质，可以概括为“依附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并不是完全独立的经济体，而是处于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中被控制、操纵的部分，它服务于宗主国资本的增值。殖民地社会内部一般会存在多种经济形式：1. 原始家长制的自给经济（为自己生产的牧畜和农耕）；2. 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农民的谷物商品的生产，农业副业的商品生产，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等）；3. 私人经济的资本主义（包括外国的，本国的，和中外资本家合资经营以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工商业资本）；4. 国家资本主义（由国家经营的矿山、铁道和其它交通机关）。在阶级方面，殖民地社会通常包括依附殖民统治的封建主阶级、租佃制地主阶级、奴隶主阶级、直接为外国资本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依附殖民统治的流氓无产阶级（如黑帮、土匪等）、受压迫又试图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作为唯一真正的革命阶级的工人阶级、以及处于最深剥削压迫中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这种阶级结构的复杂性，正是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特征。

此外，殖民地社会还存在严重的民族压迫与性别压迫。宗主国通过种族等级制度、法律歧视和文化霸权，将殖民地人民置于从属地位，形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制度化不平等。例如在印度，英国殖民当局长期维持种族隔离的就业与教育制度，使本地人难以进入高薪行业和行政职位；在非洲和拉美，殖民者通过强制劳役和种族隔离政策，将原住民排除在城市经济和政治生活之外。与此同时，殖民统治加剧了性别压迫，妇女不仅在传统父权制下受制约，还在殖民经济中被集中于低工资、无保障的劳动岗位，如纺织、农业采摘和家庭服务业。殖民政权往往利用性别不平等来维持社会秩序，使女性的劳动和身体成为殖民经济的支柱之一。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被宗主国控制，其主要任务是为世界市场提供廉价原料和农产品，而本土工业则在双重挤压下难以发展。宗主国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市场垄断来剥削殖民地人民，强制他们改种经济作物，摧毁传统手工业，甚至通过军事和法律制度维持专制统治。例如，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埃及，埃及的棉花种植面积大幅扩张，粮食自给率从 98% 骤降到 42%，这意味着农业生产几乎完全转向商品化的出口作物，国内粮食消费被牺牲；荷兰殖民者强制农民将 1/3 耕地改种咖啡、甘蔗等经济作物，违抗者遭屠杀，班达岛居民也因私自出售肉豆蔻而被灭族；在 20 世纪初，拉美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的咖啡出口占到外贸总额的 60% 以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的香蕉种植几乎完全由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控制，形成典型的“香蕉共和国”模式。这些案例说明殖民地经济是殖民政权通过行政强制和军事专制把不同层次的生产关系强行纳入世界市场，从而形成一种畸形的依附性的资本主义结构。

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这个重要概念：“新殖民地”。所谓“新殖民地”是指即使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也就是可以独立的镇压本国人民，可以在帝国主义体系内部进行有限的选择和谈判），却仍在经济上依附于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们的经济命脉（工业化资金、技术来源、出口市场、金融体系）都在实际上牢牢掌握在列强手里。这是因为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通过控制资源、操纵价格和设定贷款条件，使这些国家继续处于产业链低端，无法摆脱依附性发展。例如，非洲的出口高度依赖初级商品，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非洲国家有六成以上的出口收入来自石油、天然气或矿产，而农产品如可可和棉花的价格则由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决定；拉美国家的土地和交通基础设施同样被外资牢牢掌控，2024 年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四国的交通项目总投资额达到 3977 亿美元，占该地区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大部分由外国的跨国企业承建和运营；亚洲国家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时也被迫开放市场并削减公共服务，像是在 1997 年，韩国在接受 IMF 贷款后不得不开放金融业，导致 18 家银行信用评级被下调，而印尼在 1997 至 1998 年间卢比贬值超过七成，股市暴跌八成，IMF 要求其削减补贴和公共开支，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这表明殖民地社会的依附性并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自动结果，而是通过国际金融秩序、跨国公司和地缘政治压力共同塑造的。

在这种殖民结构中，帝国主义通过金融手段和暴力手段将殖民地的生产成本压低到

非正常水平，使宗主国资本能够在世界市场上获得远高于正常竞争条件下的利润率（也就是获得这个意义上的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来源于殖民地劳动者再生产条件的被剥夺、农业和工业结构的畸形化以及国际价格体系的操纵，它不仅为宗主国资本主义提供了额外的财政缓冲，也成为殖民地长期依附和贫困化的根源。但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福利国家”的形成主要是帝国主义内部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北欧国家（瑞典、挪威、丹麦）在20世纪形成了高度完善的福利国家模式，但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大规模殖民地，因为福利制度依靠的是本国资产阶级力量可以用稳定的方式——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统治，以及工人运动的斗争推动的妥协。来自殖民地的超额利润虽然为宗主国提供了额外的财政，但福利制度的真正根源是工人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背景下需要展示制度优越性的政治考量的结果。

在这种结构下，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始终有限。它表面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因为他希望自己能获得更多的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但实际上比起帝国主义，它更害怕工人阶级的崛起。其原因在于，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联盟必然要求民族资产阶级将资本投入到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之中去实现工业化，实现民族独立，而这些部门在殖民地社会的利润率实际上远低于出口原料和商品化农业，因为工业投资需要高额固定资本、市场受制于宗主国商品输入、利润回报周期长，而出口原料和农产品则能迅速进入世界市场获取高利润。所以，工业化不仅意味着资本回报的下降，还意味着必须面对在这个过程中壮大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从而直接威胁民族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

即使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下通过计划投资和关税保护人为地提高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的利润率，民族资产阶级也不会真正支持这种革命联盟。因为这种“利润保障”并不是维持他们在原料出口和商品化农业上的高额利润，而是强制他们进入一个由国家主导、工人阶级不断壮大的工业化过程，在经济上意味着放弃最优的资本回报，在政治上则意味着接受工人阶级的监督和制约。对民族资产阶级而言，这种双重压力比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威胁性，因此它基本上仍然会选择与帝国主义妥协甚至与帝国主义共谋，而不是支持无产阶级的领导。

例如，在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长期依赖牛肉出口换取欧洲工业品，他们并不愿意将资本转向国内工业化，因为这会削弱其在国际市场上的高利润地位；在埃及，民族资产阶级宁愿保留英国军事基地以保障棉花出口，而不是推动国内工业发展；在墨西哥，民族资产阶级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摇摆不定，害怕农民和工人运动要求他们投入资本改善农业生产和工业基础。所有这些案例都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构决定了它无法真正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联盟，因为这种联盟会迫使他们牺牲短期高利润，转向殖民地社会最薄弱的工业化环节。

但是我们也在《逝世49周年——毛泽东思想评析》一文中说明：“在特定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资源、社会影响力和部分反帝倾向，确实可能在短期内为革命阵营提供物质与政治支持。拒绝联合他们，可能会使革命力量在初期更加孤立，可能延长革命进程，甚至在某些阶段遭遇挫折。”这是因为，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分析时也应该区分不同种类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纯粹殖民地的半买办资产阶级和诸如中国、缅甸、泰国这样高度受帝国主义影响但是有一定的工业化基础（这

使得本国能够进行基本的工业生产，而不是完全依赖进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有很大区别，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宜细不宜粗，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同帝国主义体系的交流的过程是个很复杂的状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害怕工业化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壮大和组织化，因为这会直接威胁它们本身的存在。于是，它们常常在关键时刻退缩，转而与帝国主义妥协，以避免工人阶级的力量真正成长起来。这一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有充分体现。

二战后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次帝国主义”国家则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它们的社会性质是一种特殊的殖民地社会，却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这并不是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主推动的，而是冷战格局下美国出于战略目的的扶持结果，因此日本和韩国依赖老牌帝国主义并处于从属地位，但它们本身也通过输出资本、扩张市场和镇压周边弱国来行使帝国主义职能，且可以在国内独立地镇压工人阶级、组织资本积累，因此也具有一定的、有限的独立性。日本在战后通过美国的技术转移和市场保护迅速发展出口制造业，韩国则在朝鲜战争后依靠美国援助和贷款建立起由财阀主导的官僚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工业化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自愿”承担风险的结果，而是依赖老牌帝国主义的市场和保障，这种保障具体包括美国在冷战时期提供的军事保护（即进行驻军）以确保政权稳定，并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和贷款来弥补工业化初期的资金缺口，技术转移和设备供应帮助建立重化工业体系，以及通过开放美国市场来保证出口制造业能够迅速获得利润。换句话说，它们的工业化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对其的控制的体现，而不是摆脱帝国主义的独立道路，因为他们的金融资本和工业基础不是自己独立发展的延续，而是外部强制的结果。

可见，帝国主义理论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只要劳动人民的解放仍被体系性的力量所阻滞，帝国主义就不是一个已经结束的阶段，而是一种必须被揭穿、被斗争、被超越的现实结构。理论的任务，也正是在这一现实中，为新的实践开辟道路。

一国胜利论

在当代，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还是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中国共产党，都在重复这么一个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必须同时在多国胜利的观点，也就是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必须是多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革命才能实现，这就是所谓“同时胜利论”。而列宁第一次提出了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也就是说只要一国爆发革命，这个国家就可以独立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需等其他国家的革命胜利，这是所谓“一国胜利论”。

那么，这么说的依据何在？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提到“同时胜利论”，让列宁能够在后来“纠正”他们？我们能找到的只有《共产主义原理》这一文献，其中对于第19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的回答中有这么一段话：“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此外，我们找不到任何能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所谓“同时胜利论”的文献。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我们就能明白即使是这篇唯一

可能被视为提出“同时革命论”的文献事实上也没有真正提出所谓的“同时胜利论”。因为紧接着前面唯一一段可能被视为“同时胜利论”的内容后，恩格斯又写到：“……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如果我们的阅读理解能力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明白，恩格斯完全认同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首先在一国建立（不然为什么会有发展的“快慢”之分？），而马克思也不可能不认同这一点。换句话说，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完全是一个虚构，是不存在的东西。

那么，列宁究竟提出了什么呢？他提出的，是一种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俄罗斯帝国的资本主义结构、矛盾分布与革命爆发条件的科学判断。换句话说，列宁没有提出一个“理论”，而是在回答一个直接的实践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究竟会在哪里、以何种方式胜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论述完帝国主义理论后来论述“一国胜利论”问题。

列宁在当时提出的核心论断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极端不平衡，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胜利，甚至是在一个落后国家中首先胜利，而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帝国。这句话的关键不在“一国”，而在“不平衡”。列宁在《欧洲合众国口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反复强调，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相互依赖但发展不均衡的体系。正是这种不均衡，使得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必然存在“最薄弱的一环”，而革命的突破点将出现在矛盾最集中、统治最脆弱的地方。

那么，列宁凭什么说俄罗斯帝国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呢？首先，俄国在20世纪初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工业薄弱”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远不如英德等国成熟，换句话说，俄国的资本主义“非常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领导任何现代革命，而国家权力仍掌握在沙皇与封建贵族手中。这种落后结构使俄国社会矛盾长期积累而无法像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一样，可以通过正常政治机制进行有限的化解。这一点，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有非常具体的论述：“俄国工业发生的条件及其结构，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性质及其政治面目。工业的高度集中，其本身即已表示了资本家的上层与民众之间，并无许多中间阶层。此外我们还得说明一点：最重要的工厂、银行与运输机关的所有人既然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俄国吸取了利润，而且还因此在各个外国议会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不仅不促进俄国议会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时常表示反对；人们只叫记一记法国官方所起过的可耻作用就够了。这些就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孤立与反民众性的基本的与不可消除的原因。如果在自己历史的曙光期，俄国资产阶级还太不成熟，不足以完成宗教改革，那末当它应该起来领导革命之时，却是过度成熟了。”

同时，俄罗斯帝国却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结合发展”结构：一方面，它在20世纪初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80%人口为农民的落后国家；另一方面，它又拥有高度集中的现代工业体系，而这些工业往往由外国资本主导。俄国经济是传统的封建农业与现代工业的混合体，工业人口不足10%，但在铁路、军工、采矿和重工业领域形成了由国家政策推动的小岛式现代资本主义。这种工业化的“岛屿”往往集中在彼得堡、莫斯科、顿巴斯和波兰等地区，并且规模巨大。俄国建立的的大型工厂

在 1894-1908 年间迅速扩张，机械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而这些大型企业中相当一部分由外国资本控制，尤其是法国、比利时和英国资本在铁路、采矿和金属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结构直接导致了工人阶级的高度集中。例如，彼得堡的普提洛夫工厂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雇佣数万名工人；顿巴斯煤矿区的矿工同样在外国资本主导的企业中高度集中；波兰的罗兹纺织区也形成了巨型工厂群。这些工厂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工人密度极高，使得俄国工人阶级虽然人数不多，却具备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斗争爆发力，换句话说就是使得罢工和政治斗争能够迅速蔓延。

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暴露了沙俄国家机器的脆弱性。俄国经济崩溃、运输瘫痪、军队瓦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全面危机。《Defenders of the Motherland: The Tsarist Elit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一书指出：俄国贵族在 1917 年战争危机中与沙皇疏离，并在二月革命中支持新的临时政府，这种态度的转变确保了二月革命最初的成功。这说明甚至封建贵族阶级也不再愿意为沙皇政权承担政治责任，他们不再把维护沙皇专制视为自身利益所在，而是主动转向支持推翻旧制度的政治力量。俄国的政治精英在 1917 年通过加入临时政府、组织政治联盟等方式推动了旧制度的瓦解。这意味着：二月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推翻沙皇，不只是因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突然爆发，还因为统治阶级本身已经不再愿意维持专制政权。

同样，俄国资产阶级也在战争中彻底失去了对沙皇的信任。俄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在 1890-1910 年代迅速壮大，但长期受到专制体制压制，无法获得政治代表权。俄国的工业化催生了工人阶级，这也使政治气氛更加活跃，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局面导致沙皇政权的彻底崩溃。俄国资产阶级原本希望通过改革获得政治参与，但尼古拉二世顽固拒绝任何实质性宪政化，使他们在战争危机中转而支持推翻沙皇专制。

从俄国的例子中，我们能够清楚看到，一场革命要真正爆发，必须同时具备几个条件。社会本身要处在深刻的矛盾之中，旧制度无法再维持正常运转，任何修补都只能拖延崩溃的时间。统治阶级必须出现明显裂缝，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旧政权能够继续维持秩序，也不再愿意为它承担代价。当贵族、官僚和资本家开始放弃原有的政治中心时，旧制度就失去了最后的支撑。与此同时，广大民众也必然被逼到无法继续忍受的地步，因为统治阶级的绝望实际上也必然反映着群众的绝望，经济危机、战争、饥荒或长期压迫都会让这种情绪迅速积累，使群众愿意投入到新的政治力量之中。

但这些条件本身并不会自动让革命胜利。真正能够把这些力量集中起来并实现革命胜利的，是一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它必须能够在危机中提供方向，能够把分散的愤怒变成统一的行动，能够在旧制度崩溃的瞬间接住权力，而不是让局势重新落回统治阶级手中。没有这样的力量，危机只会带来混乱，而不会带来新的制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意大利的“红色两年”、德国十一月革命、英国 1926 年大罢工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中没能看到工人国家建立的原因——不是因为统治阶级不够绝望，不是因为阶级斗争不够激烈，而是因为工人阶级在关键时刻缺乏一个革命的领导层、缺乏一个属于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去引导他们真正走向胜利。

正是在这些条件同时出现时，革命才真正具备了爆发的可能。而这些，才是我们能从所谓“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中学到的东西。

与第二国际的斗争

与“第二国际”的斗争是在研究列宁的思想时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其充分展现了列宁是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审视革命的不同组成部分，以及这种从历史唯物出发的审视又是如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理解区分开来的。第二国际曾经被视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壁垒，拥有基数庞大的党员、规模庞大的工人组织和政治议会上的数量优势，客观上，尽管第二国际最后死相丑陋，但是列宁也曾给予其客观的评价：“它为社会主义在广度上的开展做了准备工作。”列宁即承认了第二国际的历史功绩在于“横的方面展开了工作”，把社会主义运动扩展到了各个国家，建立了群众性的政党和工会，没有这个阶段的积累，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难以发展成广泛的群众运动。而辩证去看待，列宁也同样指出，和平时期第二国际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横向发展，在另一方面也埋下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运动中其最为重要的革命思想被扭曲和阉割的伏笔——即，第二国际在四个维度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错误的理解，这四个维度分别是：颠倒和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的手段和革命的目的、党建原则、经济斗争的过度注重、组织的物质内容决定了其“社会沙文主义”的终点。列宁所阐述的第二国际正正是在这四个维度上扭曲、误解甚至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当中革命的基本原则，并从而造就了它的暴败。

在思想哲学维度上，列宁首先指出了第二国际的长期症结，即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美好年代”，其发展出了一种庸俗的资本主义“进化”论，取代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于革命组织的思想指导地位。这种思想的转变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末，恩格斯逝世以后，以伯恩斯坦为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打着“根据最新情况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里的革命元素进行了阉割。1899年，伯恩斯坦发表了名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彼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繁荣时期，生产和消费的不断扩大让危机在明面上几乎“消失”，这给工人们带来一种错觉——即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判断，即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判断似乎是错误的。他进一步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表现出适应性，另一方面，生产越来越分化。在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里总结到，伯恩斯坦所言的“适应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信用制度、企业主制度、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展，普遍性危机消失了；第二，由于生产部门不断分化，也由于无产阶级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间阶层地位，中间阶层表现出顽强性；第三，由于工会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因此，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作了一个阉割革命性的修正——不是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统治去实行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逐步扩大社会监督、逐步贯彻合作原则去实行社会主义，换言之，他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可行性，转而宣扬用“和平长入”的渐进改良来迈入社会主义，并提出了那句“名言”——“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然而基于列宁的思想，伯恩斯坦的论断是典型的庸俗进化论，它只承认了量变而不承认质变，即它只承认有限的“阶级斗争”，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上模棱两可甚至是否认。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第二国际的发展手段局限在了资本主义框架内讨价还价（例如多涨了几十块工资就应该结束了，就不应该要“更多东西”了），拒绝以工人阶级完全夺取资产阶级政权为目标发动任何形式的手段，

这导致的后果在下文的几个维度中将会进一步探讨。而这种理论基础的具体实践，在“米勒兰入阁”的事件中得到集中体现：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在没有经过党组织同意的情况下，接受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邀请，出任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工商部长，彼时同在一个内阁里的加利费，正正是镇压巴黎公社的指导者。面对这一尴尬又讽刺的局面，考茨基在1900年的巴黎国际大会上，起草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决议案（被称为“橡皮决议案”），决议在原则上谴责了阶级合作，但口风一转道在“特殊情况下，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一种被迫的策略”。伯恩斯坦的修正理论在法国社会党的实践下似乎迈进了一步——革命组织成员被纳入到了国家的决策机器当中，这似乎是一件美事，而且列宁也并不否认这么做一定错，甚至有的时候是必要的：“他们由于工会上层分子反动反革命，竟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建立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因为我们的孟什维克正像一切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工会领袖那样，无非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称呼孟什维克的）……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参看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的影响。”

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率，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如何滥用这个字眼的。要想善于帮助‘群众’，赢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勾结），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那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还说过：“……有时我不禁要说：你们还是少称赞我们几句，多研究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多熟悉熟悉这些策略吧！1917年9—11月间，我们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如果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明确地说出来，并且加以证明，因为这样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正确策略所必需的。如果是正确的，那就应该由此作出一定的结论。当然，不能把俄国的条件和西欧的条件等量齐观。但是在专门谈“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必须准确地估计到我国的经验，因为不估计到具体经验，这类概念就很容易流为空谈。……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时间长短，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丝毫不容争辩的结论：经验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的几个星期里，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

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在政治上过时’。不重视这种经验，同时却希望留在必须以国际的观点来制定策略（不是狭隘的或片面的一国的策略，而正是国际的策略）的共产国际，那就是犯极大的错误，那就恰恰是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行动上背弃国际主义。”（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然而，在列宁看来，国家到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不是中立的“调节机构”，如果革命党人参加黄色工会（甚至是教会筹办的工会）、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议会等反动组织确实能够把更多人争取到共产主义这一边，并以此为基础让群众认识到这些反动组织的本质，从而让可以群众有毅力主动打碎这些组织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去参与这些反动组织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米勒兰入阁给工人革命制造了一种幻觉：似乎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占据国家机器的个别零件来改变其性质，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不但不是让群众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压迫本质，而是拿意识形态去掩盖了革命意识。“橡皮决议案”在本质上暴露了第二国际的投机本质，他们用激进的词藻来粉饰自己对革命原则的退让，对资本主义进化论的接受使他们将运动局限在议会斗争，并从而又导致了他们不惜为了得到议会而与血腥镇压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握手言和。列宁尖锐地指出，比起伯恩斯坦，考茨基一流在“欺骗性”上更有进步，他虽然在理论上驳斥伯恩斯坦，但却在组织上极力维护党的“统一”，反对将修正派驱逐，并进一步发明了“超帝国主义论”，幻想帝国主义可以联合起来消除战争，随而在理论上压缩了工人阶级武装起来的可能性。同时，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里写道：考茨基主义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却是行动上的自由主义，因为阉割后的理论基础促使他们为了议席而抛弃革命原则，畏惧导致党组织被取缔、工会资产被没收的任何激进行动。因此，基于列宁对第二国际在思想哲学上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国际在思想哲学上的溃败呈现出了一个逻辑清晰、且程度渐进的链条：伯恩斯坦从哲学上否认革命的必然性，引入改良主义；米勒兰在实践中模糊了阶级界限，开了个阶级合作的坏头；最后就是考茨基充当了折中派，为实践行动提供合法性外衣。

在党建原则维度上，列宁也与第二国际进行了彻底的决裂（这个问题我们后续会详细论述，所以这里只是简述）。伯恩斯坦颠倒了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的手段和革命的目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指导思想让第二国际越来越偏离了“团结工人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集中地表现在了党建原则上，即：党究竟是什么、党应当如何领导工人的实际问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和马尔托夫围绕党的党建路线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马尔托夫主张信任群众行动的自发性，坚持以第二国际为建党模式，主张把一切愿意入党的各界人士全都吸收进来，只要求党员承认党纲，缴纳党费，在他看来，任何同情罢工的人士，只要愿意给党捐款，都可以算作党员；其次，第二国际的建党范式在形式上庞大，但是在内容上是联邦制的、松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纵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拥有报纸、出版社、俱乐部、甚至还有殡葬互助会，但党员身份只是文化归属和精神依托，而不是政治机关的严格身份。在平时，这种“俱乐部”、“茶话会”一般的组织形式能吸引大量选票，但由于党组织在事实上没有对党员的政治约束力，且第二国际内又派系林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角色纯粹是“信息互通员”而不是中央政治机关。对此，列宁在《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中，针对这种倡议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原则：第一个是民主集中制的提出，党在讨论时自由包容，但在行动上必须步调一致，展现铁的纪律；其次，党建核心不应该是“业余爱好者”，

而应该是训练有素的先锋队员，只有这样才能应对同样训练有素的沙皇警察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自发的工人斗争，极易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或无产阶级存在的落后阶层而式微，因此，必须要有一个铁的纪律的先锋队来进行组织和领导工人的工作（列宁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定义有过一次自我的批评和改正，它最初认为工人自发只能产生工联意识，必须依靠革命党来从外部灌输革命意识，但在后来的革命中工人自发运动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这使列宁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灌输论”，这个问题参考 [《经典导读：怎么办？》](#)）。列宁所指出的两种党建路线的差别，以及其背后指导思想差异，在历史的实践上无比清晰地展示了后果：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尽管拥有百万的党员和选票，但由于其对革命的妥协，终日被《反社会党人法》掣肘，并极其珍视后来获得的合法地位，这种意志上的“投降”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在1914年战争的火药味开始越来越浓厚的时候，党的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等最担心的不是“如何发动反战革命”，而是关心党的资产会不会被资产阶级政府没收、党组织会不会被资产阶级政府取缔，害怕一旦提出反对战争，德皇政府就会宣布戒严，查封党报和报馆，换句话说，德国社民党陷入了“组织拜物教”中——把组织的存续当成了组织的目的本身，而不是把组织视为推动革命的工具。为了保住党的资产，领导层决定向国家机器投降，在最终的议会投票上，110名社民党议员全体起立，全票通过战争拨款，庞大的社民党机器从工人阶级组织变成了替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维持战争后方稳定的工具，第二国际就在唏嘘和讽刺中走向了工人的反面。

而列宁所指出的党建原则，则从不基于对资产阶级所恩施的合法性的迷信，并在沙皇警察的查封和镇压下坚持发展“职业革命家”组织和严密的地下网络，更重要的是，列宁并没有像第二国际一样回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军队，相反，布尔什维克甚至积极在沙皇军队中建立秘密支部（军事委员会），在战壕里分发《真理报》，告诉士兵“把枪口对准本国的军官和地主”；1917年，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让沙皇俄国崩溃，但孟什维克却对到手的政权避之唯恐不及，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加入其政治机器中，但布尔什维克基于列宁的党建思想，在长年累月与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已经发展出了属于工人队伍的严密政治机器，它拥有完善的情报信息系统、组织系统，具备可以媲美资产阶级政治机器的严密运转机制，因此布尔什维克在同年的十月革命中成功夺取了国家政权。

列宁对第二国际的分析，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其思想形式上，如果说伯恩斯坦是乍一下有了他的念头，那整件事情不免陷入了唯心主义的陷阱之中。列宁更进一步，指出了这种思想偏差，是一种具有深刻社会经济根源的历史现象，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它通过掠夺全球而获得惊人的财富，过剩的资本容许了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用部分资本来对工人队伍进行工作——那就是培养工人贵族，工人阶级队伍的变化，是后来思想形式变化的物质基础，也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1870年至1914年期间，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在这个过渡中，资本输出取代了商品输出，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获取了远远高于本国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这笔巨大的财富落入了垄断资本家的口袋。同时，输出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本国的生产形式，以及超额利润给资产阶级创造了收买工人的空间。但是这笔“收买资金”并没有平均流向工人，而是集中流向特定群体：掌握关键熟练技术的工人、工头、工会和党务官僚，

例如在 20 世纪初的英国，熟练工人的工资是非熟练工人的两倍以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附属工会创造了大量的全职官员的岗位，这些工人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领取着稳定的薪水，不用担心失业和饥饿。像这一类的工人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开始形成小圈子，即工人贵族，他们拥有相对其他工人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时、更好的福利保障，不仅脱离赤贫状态，生活方式也开始向小资产阶级靠拢，经济地位的改变直接导致了意识形态的质变，对于工人贵族来说，他们拥有了相当的积蓄、职位和社会地位，这开始让这部分工人对于革命的态度变得保守，害怕失去现有的资源。此外，经济基础的变质促使第二国际在政治路线上产生严重偏移，在 1907 年的斯图加特大会上，荷兰代表柯尔和德国代表伯恩施坦等人公开提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概念，他们宣称“甚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殖民地也是必须的”、“欧洲文明民族对野蛮民族具有教育义务”。尽管以列宁、卢森堡为首的左派坚决反对，并严厉谴责这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帝国主义”，该决议最后以 127 票比 108 票的微弱优势被驳回，这不禁让列宁意识到接近一半的第二国际代表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帝国主义的逻辑——即为了本国工人的“文明生活”，殖民地工人的利益是可以被牺牲的，以及第二国际内部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派别，这个派别成为了帝国主义剥削体系的受益者和共犯。综上，从列宁的角度出发，我们不难意识到当德国社民党投票支持“保卫祖国”时，他们保卫的不是德国工人的利益，而是保卫德国资产阶级在世界上分得的那一份霸权和利润，第二国际基于其国内的经济基础，随着发展走向了工人的反面，它最后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工人政党，却眼睁睁地看着跨国际工人在一夜之间“反目成仇”，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战场上自相残杀。对此，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想法和错误，它有其现实的经济基础，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惜出卖国际工人整体利益，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同党内的改良主义、组织拜物教的斗争联系起来。

第二国际曾经无数次在大会中表示要消灭战争，例如在 1912 年的巴塞尔大会，全体代表一直通过《巴塞尔宣言》，将即将到来的战争定性为“犯罪”，并警告统治阶级如果胆敢发动战争，无产阶级革命将紧随其后，当时的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高呼：“向战争开战！”。可是就在短短两年后，当萨拉热窝事件的枪声刺破了欧洲最后的体面的时候，德国社民党转而却全票通过支持德皇政府的战争拨款提案，旗号是“为了保卫祖国，反抗俄国沙皇的野蛮主义。”几乎在同一时间，法国社会党的领袖饶勒斯遇刺身亡后，党迅速倒向了“神圣同盟”（Union Sacree），元老盖得甚至直接入阁当了部长；而比利时的王德维尔德也加入了国王的战时内阁。列宁指出，第二国际领袖背叛工人国际的最大借口无非就是“防御性战争”：德国党宣称自己在防御“反动的沙俄”、法国党宣称自己在防御“普鲁士军国主义”，然而，一战本质上就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市场和霸权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第二国际只要不是团结本国工人去反对其本国的帝国主义政权，那么无论是选哪边战队，都是在内容上背叛了工人阶级，充当了本国资产阶级的打手。在这场讽刺又可笑的背叛中，考茨基这个人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他提出了：“国际是和平时期的工具，在战争时期是不使用的。”他主张每个国家的工人都应该先保卫国家，等战争结束了再恢复国际团结。然而，这在根本上就曲解了第二国际的初衷——国际主义之所以存在，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战争，然而考茨基在这一点上就颠倒是非，这是不能够为国际工人所容忍的。然而，战争已经并非列宁一人所能力挽狂澜，他所处的左派在政治局面上陷入极度孤立，尽管他在 1915 年 9 月

组织了在瑞士召开的反战国际会议，但是列宁的派别依然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和平主义者，希望“不割地不赔款”地结束战争，然而这面对疯狂的帝国主义争霸，无疑是过于理想、不切实际的观点。因此，列宁进一步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无论是哪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的胜利，都不能有利于国际工人团结，也无法让工人夺取到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所以只有本国政府战败，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才会成熟（这一点在1917年的俄国得到了验证），而第二国际在战时的表现，不仅证明了其组织上的无能，更证明了其政治生命的终结。

列宁对于第二国际的诊断所总结出的革命思想，在当时成为了布尔什维克成功发动十月革命并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理论基础，同时，其对工人运动过程中所展现的各种偏离，对现在的革命进程也起到了警醒的作用。首先就是对体制化的迷信，今日在欧美国家中的一些党派，例如绿党、社会党甚至希腊的 Syriza、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尽管在初期有着激进的色彩，但是一旦进入议会和政府，它马上就要变质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变成所谓的“负责任”的反对派，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执行者；此外，就是工人贵族中发展出自身特殊利益的群体，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劳动分工在百年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细化，劳动变得越来越高精专，这意味着关键知识、技术环节的劳动会被不同的工人群体之间垄断，这些群体不但会互相排挤，甚至会支持本国的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和资源的掠夺，这严重损害了国际工人联合的利益；最后就是列宁指出的“社会沙文主义”的问题，资产阶级政权们都十分默契地把国内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国家之间的矛盾，比如中共资产阶级波拿巴“剥削”历史，利用民族叙事（例如抗日战争）掩盖国内阶级对立、美帝国主义代表任务特朗普欺骗美国工人是中国工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等，当诸如此类的地缘政治冲突爆发时，许多所谓的“左翼”人士会迅速靠向本国政府或某一帝国集团，高喊民族主义口号，全然忘记这样的行动是否有利于跨国际工人阶级的大联合，最后不是为这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喊冤，就是替那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叫屈，甚至连自己的阶级立场都可以忘记。因此，基于列宁对于第二国际的批判的思想，同时历史也警醒着当代的革命先锋队，如果逃避、妥协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根基（军队、官僚、政治机器），那么无论是一开始有多激进的政党，最终都会被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同化，变成旧秩序的维护者；同时，工人不仅要意识到国际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更是物质上的利益割舍，本国工人的利益如果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工人利益的剥削之上，那么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将永远是一句空话。

不过，列宁为了战胜规模庞大的第二国际，他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矫枉过正”，因此，基于其所处的革命的历史进程，列宁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它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在民主集中制上的反映比较明显，但是我们后文有详细论述，所以这里先不展开。此外，就是列宁将工人阶级的保守阶层的形成主要归结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收买”，他认为只要切断超额利润，或者依靠没有被收买的底层工人，革命就能爆发。葛兰西指出，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靠经济上的收买，而也在精神生产上进行“文化霸权”，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构造出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就是把人们束缚在他们当前所实现的社会职能上的观念，它让人只能看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上的东西而看不到整个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形成对社会的片面看法），从而使工人在实践中主动地或被动地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从来不完全是被“主动灌输”的，而是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被个人所不断确认而被接受的，例如，一个普通的白领员工每天沉浸在高度分工的科层体系中，老板通过不断派任务给员

工，让员工一直忙工作，而让员工只能看到自己工位前的那一小块屏幕，看到的只是自己与同事之间的竞争，看到的只是个人职级的升迁。长期在这种片面的视角下，这个员工肯定是无法看到整个社会化大生产中剩余价值被剥取的全貌，也看不到这种“奋斗”本质上是在加剧整个阶级的内耗和被剥削的程度。这就导致许多并没有分到超额利润的贫困工人，却也依然拥护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可能是法西斯主义，列宁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高估了危机对于革命意识的唤醒作用，单纯在组织形式和经济形式上的斗争，并不能触及这一领域的问题核心。

论“革命失败主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分析一场战争的性质，就不得不分析交战双方的政治性质。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每次谈到共产主义者应当如何应对战争的问题，列宁都会先分析战争的政治性质。他正确地指出，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因此对它的认识不能局限于过去的思路。

过去的思路是什么呢？是马克思、恩格斯看待战争时经常使用的思路：谁获得战争的胜利会更有利？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决定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本质上来说，这种逻辑是“小恶主义”的——我们支持战争中的某一方，就只是因为那一方造成的损失更小，或者另一方更加反动而已。然而，第二国际中的理论家却常常用这种手法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支持对俄国开战，因为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法国社民党人支持对德国开战，因为德国仍然是王朝制度……各国无产阶级弟兄为此而不得不上战场互相厮杀，第二国际直接崩溃，没有一个组织统筹他们互相联合起来反对统治者，考茨基之流却说：“国际在战争时期不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它实质上是和平时期的工具。”

但是要清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相较于广泛存在的封建势力来说，资产阶级仍然可以被认为是相对进步的一方。而到了一战时，资本主义几乎已经统治了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转向了帝国主义阶段。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宣战，不是为了“民族的统一与解放”，而只不过是為了争夺殖民地、原料产地和市场，只不过是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只不过是為了加深对工人的压迫和奴役。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双方都是反动而腐朽的帝国主义时，支持任何一方都会是对无产阶级的真正背叛。

第二国际就是这样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给德国的军事预算投了赞成票。护国主义的观点作为机会主义的表现席卷第二国际各个党派。护国主义者说：我们的国家遭受了侵犯，所以我们让无产阶级拿起武器到战场上送死是合理的。列宁则指出这种观点的肤浅本质：它好像在说交战双方“本来和睦相处”，不知怎么就互相冲突了起来。事实上，这是试图割裂战争与政治因素的关系。各国政府都拼命地粉饰，说自己才是受害的一方，但它们早就制定过战争计划、准备这场本质是掠夺的战争了。它们本来就处在互相冲突中，战争只不过是这种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因此，只要试图粉饰参战国的目的、忽略战争的政治性质，就不可避免地站错立场，滑到沙文主义的方面的去。

那么，既然支持自己的国家是完全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如何应对战争呢？有一种说法：列宁坚持了最彻底的“革命失败主义”，主张“使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而这是对护国主义的唯一替代性的选项。

据说列宁自日俄战争期间就已经坚持了革命失败主义立场。在1905年初他发表过一篇《旅顺口的陷落》，其中说：“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予落后的反动的欧洲以不可挽救的打击。”“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的战争这一次也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就象历史上屡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很明显，他这里的思路仍然和上文所述的“小恶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他看到日本有选举制度、有宪法、有国会，便断言日本是先进的（实际上当时日本政坛仍有大量的地主势力盘根错节），而仍然是专制制度的俄国便是落后的，因此日本打败俄国就是先进战胜落后，从而有着“非常革命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列宁还远不是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列宁，他还困在旧的时代的思维中。事实上，日俄战争已经具有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两者不都是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益而斗争吗？难道日本只是因为有了（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民主制度”，其殖民、战争罪行就会比俄国更“进步”、更“正义”吗？

没有的事。列宁在文中大篇幅地论述了俄国专制制度的失败，甚至是一些战局的细节，这就显示出，他应该还没有仔细地思考过这场战争的政治性质，而只是在思考战争，或者说俄国的战败，会带来什么“结果”。这实际上又代表着另一种思路：失败促进革命。这种思路看上去是相当“功利”性的。如果证明天灾、饥荒、重大事故、经济危机也有助于革命，那么共产主义者是不是也要主张天灾、饥荒、重大事故、经济危机呢？共产主义者承认矛盾的激化是推翻旧秩序的契机，但这绝不意味着主张灾难。灾难固然可以暴露资产阶级统治在面对生存威胁时的无能与残暴，使原本被掩盖的社会矛盾在极端状态下达到饱和，从而在实践中打破了群众对旧秩序的幻想。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正是为了消灭产生这些痛苦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那种寄希望于人为制造灾难来催生革命的观点，不仅背离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根本利益，更沦为了冷酷的精英主义赌博。共产主义者并不祈求混乱，而是在危机不可避免地降临时，以最坚决的姿态站在受苦群众的前头，将混乱转化为自觉的夺权行动。更何况，革命并非只在社会全面瘫痪时才降临，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化的危机”。剥削、异化和压迫并非只在经济崩溃时存在，而是每分每秒都在生产过程中发生。革命的动力源于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是结构的、长期的，而非偶然的故事。如果将革命理解为主体觉醒和夺取权力的过程，那么当无产阶级在日常实践中通过组织和教育，使这种对“日常压迫”的认识达到自觉，拥有了足以更替旧制度的力量，并让统治阶级感到慌张时，革命便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危机只是加速了旧秩序的崩溃，但无产阶级的壮大与对旧制度的扬弃，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由量变走向质变的长期自觉过程。

此外，在列宁的这种提法下，失败和革命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先失败，再革命”，那么这不就意味着打败本国政府的那一方，即敌国政府取胜了吗？要避免这种指控，就要说革命和战争至少是同时的，或者革命甚至在战争之前，但这种情况下，“失败”就没有提出的必要了，因为此时无产阶级已经起来革命了，既然它既不支持本国政府，也不支持敌国政府，而是致力于推翻两者，那么谁胜谁败就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

相比之下，同时期参与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会议的日本代表片山潜反而说得更对：“资本主义发动了这场战争，它进行这场战争只是为了争夺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势力范围……在信奉社会主义学说的日本工人心中没有种族仇恨，他们……觉得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团结一致的敌人。”（虽然需要指出的是，片山潜并没有作出系统的战争分析）反观列宁，他则似乎过于不关心日本工人的处境，而对日本资产阶级的“进步性”有一种迷信了。

直到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的文本中才逐渐显现出对战争性质问题的密切关注。为了揭露机会主义者的可耻背叛，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这场大战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是统治阶级划分势力的战争。为了反对护国主义的口号，他则针锋相对地重新提出“革命失败主义”的口号，主张“自己政府的失败”。

不过，通读列宁留下的各种材料，可以发现，首先是这个口号仍然提得远不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多，其次它也杂揉了其它的观点，比如：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1914）：“20世纪在欧洲（即使是在欧洲的最东部）“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自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反对我们祖国的这些最可恶的敌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只能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实战中遭到失败，这对十分之九的大俄罗斯居民为害最小，因为沙皇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压迫这十分之九的居民，而且还使他们腐化堕落，寡廉鲜耻，让他们习惯于压迫异族人民，习惯于用一些貌似爱国的虚伪言词来掩饰自己可耻的行为。”——这仍然杂揉了“小恶主义”的提法。

《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自己的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资产者相信由各国政府发动的战争也必定会作为各国政府间的战争告终，并且希望能这样。只有他们才会认为，要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人都主张所有“自己的”政府失败的想法，是“可笑的”和“荒谬的”。其实，正是这种主张才符合每个觉悟工人内心的想法，符合我们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进行的活动要求。”——这仍然杂揉了“失败促进革命”的提法。

《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危机》（1915）：“战争的教训甚至迫使我们的对手也在实际上承认“失败主义”的立场，承认必须提出（最初只是作为号召书中的一句尖锐有力的话，后来就更加认真、更加深思熟虑地提出）要在德国军国主义者的‘后方发动起义’的口号，即进行国内战争的口号。原来，战争的教训正在使我们在战争开始时就鼓吹的见解深入人心。俄国战败确实为害最小，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革命危机，唤醒了千百万群众，亿万群众。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俄国的革命危机不能不促使人们去考虑拯救各国人民的唯一道路，考虑在德军“后方发动起义”，即考虑在所有交战国内发动国内战争。”——这既有小恶主义的逻辑，又有失败促进革命的说法。

《论单独媾和》（1916）：“不管这场战争的结局怎样，实际将证明有一些人说得对：摆脱这场战争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出路，只能是无产阶级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

战争。实际将证明有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得对：沙皇政府战败和在军事上彻底破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为害较小，因为历史永远不会停滞不前，历史在这场战争期间也在前进；如果欧洲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向社会主义前进，不能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挣脱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的桎梏，那么东欧和亚洲就只有在沙皇政府在军事上被彻底打垮因而没有任何可能实行半封建式的帝国主义政治的情况下，才能一日千里地向着民主制前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小恶主义总是和“俄国特别反动”的论断结合起来，从而是一个难以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通用的准则和口号；而和小恶主义结合起来的失败主义也难以国际化。

列宁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以阐明这种“失败主义”思想。首先他需要回应：希望自己政府失败，是不是希望敌方政府胜利呢？他说必须要考虑第三种可能，即无产阶级击败政府的这条出路。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提到过的，如果我们真正的目标是无产阶级的胜利，那么自己政府在与敌方政府的战争中失败与否都是不重要的。列宁进一步说：进行反对政府的革命鼓动和促使政府失败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说明其它提法（如不胜不败）为什么是错误的。这种联系确实存在，但在这里，失败反倒更像是革命行动的“副产品”，而不是“必经步骤”。但是列宁在后文中又说，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革命者不断地向无产阶级宣传、鼓动，在无产阶级自发斗争时协助无产阶级，从而把他们组织起来，这难道不是“制造”革命的过程吗？），因此需要失败——这仿佛在说，没有失败便没有革命，于是他又回到了“先失败后革命”的逻辑。足见他在这篇文章中的逻辑混乱，这也侧面证明：失败主义口号实际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

在大战中，机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选择题：胜利还是失败？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胜利，于是转而成为资产阶级的掠夺战争服务。列宁高喊着：“跳出这个逻辑！”——这本应意味着对战争问题毫不犹豫地选择革命——但他又说，应当“主张失败”，于是这又表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跳出这个逻辑，而只是选择了与机会主义者相反的选项。主张失败，这个观点的目光仍然放在当前的战争上，它意味着我们似乎仍然需要在这场战争中“站队”。列宁的这种提法实际上已经被他的另一种提法“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否定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即包含了失败主义口号中合理部分，即要求以革命推翻腐朽的帝国主义，又排除掉了失败主义口号中不合理的部分，即在“胜利还是失败”这个本来无需回答的问题中做出选择。

到了1917年，列宁也几乎放弃了失败主义的提法。面对“真诚的革命护国主义者”，其实就是相信“需要用战争打退敌人入侵”这种说法的群众，列宁的新策略是：首先告诉他们这场战争的根本性质，然后让他们理解，只要无产阶级一天没有推翻帝国主义的政权，真正的和平就永远不会到来。“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拥护者是真心诚意的——不是指个人，而是指阶级来说，也就是说，他们所属的阶级（工人和贫苦农民），在兼并和扼杀别的民族方面确实得不到什么好处。……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向他再三解释，告诉他问题不在于他个人的愿望，而在于群众的、阶级的、政治的关系和条件，在于战争同资本利益、同国际银行网的联系等等。只有这样反对护国主义，才是严肃的，才有希望取得成效——也许不会很快取得，但这种成效会是牢固而可靠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在这里，并不需要失败主义登场，这不仅是因为群众的情绪使然，也是因为即使不强调失败，

革命的叙事也不会因此而有所缺损。

总之，失败主义的口号其实是没有完全跳出沙文主义逻辑的产物，它是残存在人们意识中的沙文主义逻辑与革命的要求的混合的产物。事实上，根本不需要在胜利与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既然我们追求的是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那么自己国家的政府是否失败，都不会影响共产主义者对革命的主张和实际鼓动。

工农民主专政理论

在当代，“工农民主专政”这一概念常常被很多人误读。这些人并未真正理解这一理论的真实含义，而将其视为列宁提出工农联盟设想的根本理论基础。事实上，列宁在提出“工农民主专政”时，并不是“强调”工农联盟的必要性，而是试图揭示在俄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真正完成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文将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阐述，澄清常见的误解，说明列宁的真正意思。

在1906年5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的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依据英国、法国、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推测俄国革命将会由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领导。孟什维克的代表——普列汉诺夫抱怨群众的行动在1905年过于“操之过急”，并说出了让他享誉天下的箴言：“他们不应该拿起武器。”孟什维克表示：“当我们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时，夺权是必要的。可是现在的革命只有成为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所以我们有义务拒绝夺取权力。”（大会会议记录，Chertvyoritiy S' yezd RSDRP, Protokoly, p.142）面对这样的观点，列宁直接回应了孟什维克的立场，明确指出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具体形式。

列宁并没有尝试否认这次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没有声称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独立建成，列宁表示：“我想这样来表述这个论点：俄国革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一切共同的敌人如资本家、地主、金融资产阶级等被推翻得愈快，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形也就来得愈快。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后备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可见，在列宁眼中俄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否则必然面临复辟的危险，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工农民主专政”理论的独特性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到底是哪个阶级来领导革命？列宁表示：“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要走的路程远远超过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就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别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愚蠢意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在明确了无产阶级必须站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前列之后，列宁进一步说明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限度”。他强调，所谓“工农民主专政”所能完成的任务只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因为工农民主专政“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连根铲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无产阶级在和不完全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可见，列宁毫不含糊的表示俄国革命将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完成。这场革命最多只能完成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将土地平分给农民、建立民主共和制等等。列宁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任何“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的行为都会导致无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发生冲突。所以列宁也着重指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土地平分，或‘土地与自由’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对列宁来说，在俄国这么落后的国家，没有其他可能的结果。

说“工农民主专政”会在俄国一个国家的基础上“逐渐延伸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与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没有共同之处，这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根本分歧——托洛茨基认为这种民主主义革命是可以在一国范围内就“不间断”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

那么，列宁是从哪个角度来讲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的？在上面《两种策略》的引文中，列宁断言俄国革命“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是没办法影响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在同一篇文章，他又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未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无产阶级在和不完全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认为在俄国没有转型为社会主义的前提，而这些前提已经在西欧完全成熟了，因此他表示：“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进报》屡次表述过的那种思想。《前进报》说过，我们不应当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简而言之，就是说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只可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但因为资产阶

级无法胜任革命角色，所以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的带领下开展，并争取农民大众的支持，推翻沙皇制，根除一切封建残余，创建民主共和国，而这些革命成就会对西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起到革命宣传作用，而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促发俄国继续革命，俄国工人阶级会在西欧的革命中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协助下，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列宁还说：“在这个阶段里，（在‘民主专政’的最终胜利之后）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等农民）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可见，列宁不仅排除了“只在俄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的概念（他对这点根本连考虑都不会考虑），甚至把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前俄国工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都排除了。

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农民的态度问题，我们已经在《八十五年之际：托洛茨基思想评析》中的“不断革命论”和“农民的性质和潜力”中详细论述了，因此我们这里只是总结这个争论的实质：在事实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于农民的性质和作用的判断事实上是一致的，两者的根本分歧只是在于俄国革命是否能独自一国“长入”社会主义阶段，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让列宁一直强调革命建立的是“工农民主专政”，而在西欧革命胜利前是不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

显而易见的是，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显然是被十月革命的实践所推翻，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则是在十月革命中得到了证实，而且“工农民主专政”理论中在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错误也在1917年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严重危机。早在1909年，托洛茨基就说到：“如果孟什维克们抽象地由‘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开始，在夺取政权前就让整个无产阶级的策略走到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为相适应的思维，那布尔什维克们同时也是以一个同样贫瘠而抽象的‘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出发，达到了已经掌权的无产阶级却还把自己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的观点。而的确，在这方面他们之间有著一个非常重大的差别：现在孟什维克主义内的反革命一派已经表露无遗，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具有造成巨大危险的可能性。”（《1905》英文版，P. 285）

托洛茨基还在《十月的教训》一文中表示：“在1905年前夕，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只有把这个公式作为走向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阶段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列宁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进性的，是完全和彻底抵制孟什维克的公式的。根据孟什维克的公式，俄国只能重演先进民族的历史，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居于反对党的地位。然而，我们党内有某些人，在列宁这个公式上所着重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着重在它的民主性上，并把它同社会主义性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又无异表明：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只能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西方开始。我们只能在英国、法国、德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样提出问题，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维主义。这种

情况在 1917 年充分暴露出来。当时，革命的任务已经不是预言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了。”（《十月的教训》，“工农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

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局面一下子变得非常混乱。沙皇退位后出现的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反动的性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根本不是选出来的，而是由旧的沙俄国家机关里的自由派政治家和一些俄国封建主代表组成的。例如，临时政府的总理是李沃夫公爵，立宪民主党人首领米留可夫和十月党人首领古契柯夫等资产阶级代表也占据重要职务。他们的目标是维持秩序、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并把土地问题留给未来的、一直被拖延召开的“立宪会议”去处理。也就是说，他们既不想退出战争，也不想马上把土地分给农民。与此同时，乡村里已经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土地争夺，根据 MIT 公开的《Decree on Land》研究资料，1917 年夏天很多地方的农民已经开始自己动手，把赶走封建主，并分掉土地，而临时政府却不断要求农民“保持冷静”，等立宪会议来决定土地问题。《The Failure of Rural Policy in Russia, February–October 1917》中表示：临时政府对乡村从未真正掌握过权力，而临时政府为了能够遏制农民运动以实现其在农村的权力，多次尝试派遣军队到农村“恢复秩序”，但军队经常拒绝执行命令并同情农民。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了分裂。当时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领导人主要是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他们在《真理报》上公开主张对临时政府采取“有限支持”的态度，认为现在的任务是推动民主，而不是马上争夺政权，他们宣称只要临时政府与反动派和反革命作斗争，布尔什维克就应支持临时政府。施略普尼柯夫回忆说：“加米涅夫、斯大林和穆拉诺夫同志决定接管《真理报》，并采用‘他们’的路线……根据他们的正式权利，他们完全控制了 3 月 15 日第 9 期《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因为他们运用多数地位和正式的特权压倒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代表维·莫洛托夫同志。”施略普尼柯夫还记得，这次“编辑部革命”在彼得格勒工人区内引起了极大愤慨，因为那里很少有人同意对战争和临时政府采取温和政策，甚至还听说有人要求党驱逐这三个新编辑。因为 1917 年 3 月 14 日，米加涅夫在《真理报》发表的《临时政府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中说：“现在提出取代临时政府的问题，将会犯政治错误”。米加涅夫还在 3 月 15 日《真理报》上发表的《没有秘密的外交》一文中，公开鼓吹护国主义思想，并要求“自由的人民要坚守自己的岗位，用子弹回敬子弹，用炮弹回敬炮弹。”；斯大林则在 1917 年 3 月 28 日的《真理报》上写道：“仅仅喊出‘打倒战争’的口号是绝对不切实际的。只要德军服从皇帝的命令，俄国士兵就必须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子弹回击子弹，用炮弹回击炮弹……我们的口号是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目的是迫使它……试图促使所有交战国立即开始谈判……在此之前，每个人都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什利亚普尼科夫也说到，新的《真理报》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引起了惊慌。塔夫利达宫传出消息说“温和理性的布尔什维克在他们自己的党内战胜了极端主义者！”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得到了其他人“毒辣的微笑”。这和后来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完全不同，也和列宁的想法不一样。列宁当时还在国外，虽然《真理报》上刊登了当时来自维堡区的抗议，其中的文章要求启发工人革命觉悟，但这三位编辑的并未改变的看法，列宁从国外发来的文章也未能影响他们，他们实际上已走上右倾道路，而他们的观点恰恰是过去十几年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路线。

列宁四月回国后，局面发生了急剧变化。列宁在芬兰车站发表的讲话中直接把临时

政府称为“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指出它继续战争、拒绝土地革命，因此不能再得到布尔什维克的任何支持。第二天，他把自己的主张整理成《四月提纲》，并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上宣读。列宁在提纲中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要求苏维埃夺取国家政权，而不是继续让临时政府掌权。在提纲里，列宁还明确写道，布尔什维克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支持临时政府”，并且不能再与孟什维克合作。他强调，真正的革命任务——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土地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列宁在其中最具突破性的观点，是他在提纲中提出俄国不必等待西欧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可以一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这显然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了）。他在提纲中明确写道，俄国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迈进，并且把土地、银行和大企业交给苏维埃来管理。这在当时是极其激进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内许多老党员仍然坚持过去十几年形成的观点，认为俄国的任务只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列宁和老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在四月的党代表会议上达到高潮。列宁在会上坚持自己的路线，认为临时政府无法解决战争和土地问题，而苏维埃才代表工人和士兵的利益。他反复强调必须马上准备争取政权，而不是继续等待。经过激烈争论，列宁的路线最终在党内占了上风，布尔什维克才逐渐形成后来那种明确的方向。

不过，只是说明这些并不够，因为这还暴露了当时整个布尔什维克在理论和组织上的脱节。按理说，布尔什维克在工厂和兵营里的多数党员对临时政府普遍不信任，基层苏维埃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也大多主张反对继续战争、反对与自由派合作，可是这些意见居然无法传达到中央，更无法对中央形成制衡。结果就是，中央机关的几个人仅因为掌握了《真理报》，就能把整个党的公开立场改成“有限支持临时政府”，甚至公开反对夺取政权，而党内多数人却没有任何制度化的办法来纠正这种偏差。这种缺陷使得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差点走向与现实需要完全相反的方向。

正因为如此，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列宁当年提出了什么“公式”，也不在于究竟是列宁对了还是托洛茨基对了一一因为历史证明托洛茨基是对的，这没什么好争论的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夜会出现这样深刻的理论迟滞和组织断层？为什么一个在工厂和兵营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党，却无法让自己的多数声音穿透中央机关的几张报纸？为什么一个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的组织，会在最关键的几周里被旧路线牵着走？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偶然”，它们指向了一个更深的现实：任何革命党如果不能在组织上建立真正能让多数党员表达意见、纠正中央偏差的机制，那么它很可能就在突如其来的历史时刻被自己的惯性拖向错误的方向。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最终依靠列宁的转向才避免了这种命运，但这种“依靠个人突破组织惯性”的方式本身就暴露出一个更大的隐患——如果没有列宁，又会怎样？这一点，才是“工农民主专政”争论之外更值得今天思考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论述下列宁设想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样的，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建制实际上是否实现了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沙俄，统治依靠秘密警察、报刊审查制度、不断的对工人运动的暴力镇压来维持。任何公开的反政府政治活动都容易遭到武力镇压、逮捕和流放，从而导致工人和革命者的聚会往往在地下进行，且其集会随时面临沙俄政府破坏。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时俄国的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就不得不以秘密形式开展工作。为了应对这种高压的情况，没有坚强的组织，就不能有坚强的运动，列宁强调党员必须承担明确的责任，党必须形成统一的纪律，否则在沙俄的专制环境下无法生存。

当时的沙俄中，各地的工人小组往往只是读书会或临时性的集会，缺乏统一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结构，一旦遭到搜捕便迅速瓦解。正如列宁在《怎么办》（1902 年）中表示的那样：

“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

这个小组逐步地开展了愈来愈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博得了有教养社会的一部分人的同情，他们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交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他们开始）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

（然而！）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結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

这种打击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组织的瓦解，更是对群众信心的沉重摧残。运动表面上充满活力，参与者虽然缺乏训练，却能不断扩展并取得一些短暂的胜利。然而，一旦进入更大规模的斗争，这些分散的组织的薄弱环节便迅速暴露。政府起初或许显得慌乱，甚至在宣传上笨拙地渲染其“暴行”，助长了反抗火焰。然而沙俄政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专制机器，它很快就能调整策略，适应新的斗争局面。凭借精密的侦察网络、暗探和警察力量，他们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刻将地方工人小组一举摧毁，使群众失去领导，运动陷入突变，无法保持工作的延续性。活动家们四散无依，组织成员更替频繁，今天的学生领袖、罢工领导者明天就可能被捕，继任者又因为斗争消息被政府封锁，也没有其他渠道获得斗争经验，而不得不从头摸索，重复同样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沙俄的警察和特务也在不断学习、改进打击手段，这是一场残酷的“军备竞赛”。

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们来说，是不能把这种局面视为“革命的必然阵痛”的，他们必须主动思考如何避免这种循环，并付诸实践。而结论是明确的：俄国人不能满足于零散的地方工作，而必须建立全国性的、综合性的地下网络，取代彼此孤立的局部行动。领导层必须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为对所有反抗专制、争取民主权利的群众的统一领导，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工厂、某一学校或某一地区，而是把全国所有的学生运动、工人罢工、报刊写作、武装斗争等各种斗争形式全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能够协调各种形式的斗争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俄国无产阶级不能满足于“走一步看一步”，而要能够做到“走一步看十步”，并且把这种远见落实为对社会主义组织提出的具体工作要求、对群众提出的明确行动纲领。只有建立起高效、隐蔽、覆盖全国的运作机制，才能确保革命的连续性和胜利的可能性。

所以，列宁便在《怎么办？》中指出只有由职业革命者组成的核心组织，才能在秘密条件下保持延续性和战斗力，才能满足上述的需要。社会主义组织必须像军队一样严密，才能在面对国家机器时不至于被轻易摧毁。只有建立高度集中、纪律严明的先锋队，才能保证革命的果断性和连续性，才能保证地区负责人被逮捕时可以很快有经过训练的同志接替，并吸取来自全国各地的斗争经验，使工人阶级的运动不再陷入民粹主义式的盲目和分散。换句话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的“集中”，不只是说在组织上的全体行动上的一致、全国统一的斗争战略和方向，还有各种斗争形式的“集中”，以及对于各地斗争经验、其他国家斗争经验的“集中”，也就是作为政治原则的“集中”。如果每个组织“各自为战”，写报刊的只写报刊，做工人工作的只做工人工作，做学生工作的只做学生工作，而不相互沟通且说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认为自己的斗争形式就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其他斗争形式都是不应该被考虑的，他们就只是在非常有限的和零碎的基础上进行活动，从各自的经验中他们也得出不出正确的结论（从认识论上来说）。他们只有局部的斗争，零散的经验 and 片面的认识。我们甚至可以先验地说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对现实有全面的和总体的正确认识，原因是这些组织做的只是一项工作，他们只能看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

然而，“集中制”的提出在党内并非没有争议，但是我们应该注意，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中的争论并不是因为“集中制”问题而产生的。马尔托夫及其支持者在会后，把列宁的立场描述为“雅各宾主义”，导致人们常常误以为这次分裂是围绕所谓“党组织要集中还是要松散”的原则性问题的争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的争论点集中在党纲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表述上，列宁一方主张党员必须直接参加党组织的一项工作，接受组织纪律，否则就不能成为党员，因为无产阶级政党不需要任何不工作的“挂名党员”，因此要求入党门槛不能太低；马尔托夫一方则认为党员只要承认党纲并在某种程度上协助党的活动即可，无需太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挂名”是可以接受的，从而希望能够吸收尽可能多的人得以入党。

正是这一条文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所谓的“多数派”（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的形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此后经过二十余次党内会议才逐渐显露出更深层的差异和原则性分歧（尤其是对待资产阶

级自由派的态度上)。在此之前，双方在政治路线和策略问题上并没有根本分歧。也就是说，当时是在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出现了派别对立。

列宁在当时甚至说：“我们认为必须尽可能（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抛开美好的集中制模式，不要绝对服从纪律）让这些小组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让全党有可能来衡量分歧的深浅，判断不彻底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以及表现在哪一方的身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十五章）这里，列宁在此强调的是“集中制”并非单纯的纪律和服从，党内的小组应当拥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使全党能够了解分歧的程度和性质，从而在统一行动前进行充分讨论和判断。只有在广泛的民主交流中，集中制才能形成真正的统一意志，避免机械的命令主义，保证党的决策既有纪律性又有思想上的活力。

我们在《列宁全集》（英文版第七卷）第474页中还能读到：“例如卢森堡同志说，我这本书透彻而又详尽地表达了一种‘不顾一切的集中制’观点。因此，卢森堡同志认为，我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在这一整本书中，从第一页起到最后一页止，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我这本书所探讨的不是各种组织制度之间的区别问题，而是如何在不违反党的原则的情况下坚持、批判和改正任何一种制度的问题。”

总而言之，列宁的“集中制”之所以是“民主集中制”，是因为它包含以下内容：党内的全体基层党员不应该只是执行者，还应该是信息的提供者和组织的监督者，他们把群众的意见和斗争经验带到党内讨论中，使党的决策始终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在达成决议之前，必须经过自由、批判性的讨论，同时必须保证少数派有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权力，也就是说决议必须用民主的方式达成；上级机关由基层组织选举产生，并且对全体成员负责的，同时随时可以被基层成员弹劾并罢免，因而要杜绝一切个人关系、情感、“老资历”和熟人小圈子，统一组织思想的方法，必须是通过科学的教育和讨论达成统一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用行政、组织手段强加思想于成员之上；在执行决议中，地区性的支部组织或部门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决议在执行后，经过适当的时间，必须批判的、民主的检讨成败；决议一旦达成，就必须执行，假设在执行决议过程中提出异议，也不能停止执行旧决议，除非旧决议被推翻；在讨论过程中不同意此决议者，不得阻挡或暗中破坏决议的执行；整个组织只能有一个中央，未经过全党讨论，而自说自话另设中央的人应当被开除；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上级机关的权威必须被尊重；组织的各支部和各部门在执行决议中必须按照中央的意思彼此协调；整个组织共同决定决议的优先顺序，并且协助做成未来的决议。

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实际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实际上整个布尔什维克的建制并没有按照列宁等人预想的那样贯彻“公开讨论、一致行动”。在实践中不是“民主与集中在不同时期的辩证运动”，而是几乎一边倒的向“集中”的那方面倾倒，换句话说就是并没有真正实行完整的民主集中制。

列宁在实践中所坚持的“集中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实质上并未与布朗基式的密谋活动做出实质性的区别，并且在实践中承担起了不自觉的反革命的机会主义作

用，压制了真正先进无产者们的革命要求（参看我们的卢森堡思想评析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小节）。

我们在此可以举出一个典型的历史实例对此进行分析：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至列宁四月回国这段时间里的种种行动。

在二月革命爆发时，身处有1.5亿人口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数大致在八千人左右，其中在彼得堡的党员有两千人。1917年2月23日（公历3月8日）的国际妇女节，彼得堡近12.8万的工人进行罢工游行示威，之后在短短数天内，彼得堡已经深陷总罢工的浪潮中而瘫痪，2月27日之后，首都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工人和士兵手中，并建立了苏维埃来接管社会运作。

那么在这段革命爆发的初期的这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做了什么呢？

布尔什维克于2月25日上午召开会议，然而在革命爆发的初期，他们并未如某些后世的史学家美化的那样，“决定采取有力措施，将运动推广至全国”，展现出迅速的有魄力的行动。恰恰相反，整个布尔什维克，包括身处海外的列宁，都对二月革命感到意外。

例如根据彼得堡的维堡区委员会重要成员VN Kayurov的记述，党中央甚至在国际妇女节前试图压制群众的示威。“我解释了‘妇女节’和妇女运动的意义，当谈到当前形势时，我首先努力敦促妇女们不要进行任何局部示威活动，只按照党的指示行事”。而当第二天罢工发生后，他“对罢工者的行为感到愤怒。首先，他们显然无视了党的区委员会的决定，然后又无视了我的决定。（？）前一天晚上，我呼吁女工们保持克制和纪律——而现在，却突然爆发了这场罢工。”（出自M. Liebman，《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

当然，当革命形势逐渐明朗起来的时候，基层的工厂里的布尔什维克们并没有等待“中央的指示”，而是直接上街开始支持群众们的行动，他们谴责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协定，猛烈抨击保卫派，并号召工人立即行动，并涌入军营与士兵们团结起来，占领军火库。

然而，应该注意到，当工厂里的布尔什维克工人们——他们虽然理论上可以说是基础而粗糙的，只是大致的了解党的一些口号和他们的基本含义，但他们靠自己展现出的昂扬战斗精神和热情等在革命前就已赢得工友们的信任，成为工厂里的“天然领袖”——已经在街垒战斗时，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们仍然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彼得格勒委员会的第一份传单是在1917年2月27日发布的，而此时，工人们已经在彼得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1917年年初扮演着“跟在群众屁股后面”的角色。而在3月2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时，正如前面“工农民主专政”小节中所述的那样，国内的布尔什维克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反对提案，而忙于赢得临时政府中的更多席位，并焦急地等待着流亡领导人的到来，以期获得指导。

不过富有戏剧性的是，正是因为流亡领导人的缺席（与之后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回归

之后之后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右倾形成对比），反而使得基层党员和普通工人们的声音被更清晰的反馈到了党的头脑中。

在二月的胜利后，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们发表了一份宣言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封建主的土地，并立即结束掠夺战争，并且呼吁建立苏维埃。同时，真理报在此时宣布“工兵苏维埃代表必须立即罢黜自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宣布自己为革命临时政府。”

然而，党西伯利亚的流亡者们回到革命的中心时，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迅速右转，转到了认为与孟什维克之间只是“琐碎的分歧”，宣布“只要临时政府在巩固革命的步骤，那就给予支持”的所谓“批判性支持”，实质上把自己变为了临时政府的忠实左翼反对派。三月时期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有多么具有妥协性和远远落后于群众的思想，乃至基层党员提出的正确的口号和策略也被中央压制了下去，只要参看[布尔什维克在3月28日召开的全俄党的干部会议上由斯大林做出的报告](#)就能十分清晰的看到了。这种领导层的远远落后于运动的表现，我们也可以从列宁四月回国后初期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激烈斗争窥其冰山一角。举一个例子，发表四月提纲时，署名仅有列宁一人，其他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与列宁的立场联系在一起。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加米涅夫题为《我们的分歧》的文章，文章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与列宁的立场划清界限，声称列宁的立场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既不为《真理报》编辑部所认同，也不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认同。

当然，在直接原因上可以说是因为先前列宁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和“两个阶段论”的公示使得党的中央领导们依然觉得革命需要仅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就根本意义上，这恰好是卢森堡批判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中央委员会”的极端集中制的弊病，那就是将群众和党割裂开来，群众鲜活的首创精神被党的因循守旧的中央的“策略”所窒息。究其原因，将中央视为运动的主宰者和天然的领导者，把党的一切机构和群众视为这个布朗基式的中央的纯粹的“执行者”，那么除了将中央的预先指定的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鲜活经验和活力的意见强制加于瞬息万变的群众运动上，使得群众的身上被迫受到这群远远被甩在事态进展的“领袖”的迷惑和拖累，以至于彻底窒息革命外，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结果了。

还深陷于瑞士的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危险的右倾发表了数篇文章加以批判，对时局加以解释，指出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掌权只是暂时的，唯一可以信赖和团结的是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然而，这些批判的文章只有一篇刊到了真理报上，其他的要么是扣留，要么是删减。也因此，部分人将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上的错误归结于所谓“列宁等领袖的缺席”上，认为只是因为所谓的原来的公式的过失和领袖的缺失造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不自觉的反革命。然而，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逻辑顺推，如果一个党的全部力量在于“某位领袖”，离开了这位领袖，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便堕落到了一般的议会内反对派的那边去了，靠着某位领袖维护的“民主集中制”和“先锋队”还有何意义？

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革命以日为单位迅速发展的俄国，如果后续没有列宁之后的对布尔什维克的“再武装”，在不仅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蛊惑，还有把自己堕落到和他们一个地方的布尔什维克，这只会使得群众模糊化临时政府的本质，对

其抱有幻想的方法会导致多么灾难性的后果。正如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委员会给自己“恢复秩序、与各机关及各个人发生联系”的规定那样，一旦群众运动逐渐在这样的寻找不到方向中逐渐陷入彷徨和犹豫，渐渐平息下来，让反动派站稳了脚跟，那么等待无产阶级的只会是最为疯狂的报复和革命成果的完全丧失。

我们必须正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种种极具危险性的甚至遗毒至今的错误，认识到民主集中制上的机会主义不仅仅有其“分散”的这个体现在拥有政治自由和阶级意识较高的无产阶级的西欧表现，还有其“集中”的这个体现在专制的尚处于无产阶级刚刚兴起的俄国表现。固然，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中的打造一支统一严密的战斗性革命组织的政治思想等积极因素依然乃至今天都具有其宝贵的价值，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加以批判的加以全盘接受甚至为其错误的那方面辩护的理由。

摒除机会主义的方式不是靠着组织手段或是规章等企图将单单某一种表现去避免，而是靠着如卢森堡所说的“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是由中央委员会，而是由全党，更确切些说，是由整个运动制定的，那么党的各级组织显然就需要有行动自由，以便单独促使充分利用当时的形势所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加强斗争和发挥革命的首创精神。”也就是靠着无产阶级运动本身去发挥、促进和捍卫革命，这一切都要求将党深深的根植于他自身所在的土壤，也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而不是将党用“集中制”的理由与运动相割裂开，让机械的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指导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运动本身，而是恰恰要始终将自己与无产阶级紧密的结合起来，让先锋队这在无产阶级土壤上生长的花朵能切实的吸取无产阶级的营养，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同摆脱整个现存制度的目的的相结合，日常的斗争同革命变革相结合，这是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辩证的矛盾。而这个运动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必须在两个暗礁之间，即在放弃群众性和放弃最终目的之间，在倒退到宗派状态和变成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之间合理地向前迈进。”

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不下去时的改变，它本质上是一种倒退，一种不得已的妥协，为了了解为什么列宁会施行这种政策，以及政策的后果，我们必须从十月革命后的历史去探寻。

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写道，资本主义大企业如果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是在供应全体人民的需要。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人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全部企业。但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封建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的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形态的性质，由它的生产关系断定。但依列宁看，这性质由生产目的（一个从属于这性质的结果）断定。再者，据列宁说，经济措施的（政治经济）性质，由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断定。故此，同一项经济措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视乎由谁把它推行，可以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性质：当它由德国容克资本家国家推行时，它是资本主义措施；当它由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国家推行时，它变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当它由一个工人政权推行时，它更变成“社会主义”措施（“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

因此，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没有被收归国有，而仅限于国家强迫企业辛迪加化和把这样组成的托拉斯的管理权转移给国家，由工人监督生产和分配。尽管如此，形势的发展迫使苏维埃政府有限度地把个别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没收。在1918年的年中之前，“国有化”就是对大资产阶级手里的生产资料的剥夺，主要分为两类。（一）“惩罚性”的：革命后，部分资本家和他们的爪牙实行破坏生产、歇业、不服从苏维埃政权、违抗工人监督，誓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到底，迫使苏维埃政府把它们的企业收归国有；据米留金说，在这段期间被国有化的少数企业中，有百分之70属于这一类。著名的例子是把银行国有化。自革命后，国家银行的雇员一直拒绝与苏维埃政府合作，拒绝革命的所有要求。俄历1917年12月14日，赤卫队终于把国家银行占据。翌日，中央执委会颁布银行国有化法令，把所有私人银行和国家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而这个银行及其全部资产收归国家所有。（二）“自发性”的：在革命后，工人自发地把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交给苏维埃政府的例子屡见不鲜。

值得注意的是，苏维埃政府用行政手段把资本家的财产没收的例子寥寥可数，更且，一如上述两类国有化，被没收的仅限于个别企业，而非所有私有财产。据1918年5月26日举行的第一届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大会的报告说，自革命后至大会举行当日止，已收归国有的企业一共只有304个，这显然没能改变生产资料与及生产产品的资本性质（依次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关于大工业企业国有化的法令。被国有化的包括矿业、金属业、纺织业、电器业、树脂业、烟草业、玻璃业、陶器业、英泥业、皮革业、私人铁路、地区性的公共服务业等。法令规定，在高国民经委会未作出其他指示前，所有被收归国有的企业的经营（包括财政在内），一律继续由前所有者负责，不用向国家缴纳租金。易言之，在高国民经委会未能接管国有化企业前，它们的运作和以前实际上没有根本区别（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方式运作），只是企业的法定拥有权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1920年11月29日，高国民经委会通过决议，把所有个人企业（拥有机械动力而工人在五人以上者，和未具备机械动力而工人超过十名者）国有化，执行的步骤依照6月18日的法令的规定进行。在内战期间，被高国民经委会接管的国有化企业，渐渐占了所有中大型企业的大多数。

那么，在这些国有化的企业中，工人民主有没有得到保障呢？毕竟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三章有如下说法：“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

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关于消除议会制，列宁还说：“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不仅如此，列宁还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表示：“……其实，甚至沙皇政府，甚至‘旧统治当局’在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时就已经知道监督的基本措施、主要办法和途径：把居民按各种职业、工作目的、劳动部门等等联合起来。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联合起来，所以极力限制和故意排斥这种众所周知、轻而易举、完全可行的监督办法和途径。

各交战国在遭到极端严重的战争灾难和不同程度的经济破坏和饥荒时，早已拟出、决定、采用并试行过一系列的监督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总不外是把居民联合起来，建立或鼓励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派代表参加，受国家的监察等等。所有这些监督办法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讲过许多，写过许多。各个参战的先进国家所颁布的有关监督的法律已经译成俄文，或者在俄国报刊上已作详细介绍。

假如我们的国家真正想切实认真地实行监督，假如它的机关不是甘当资本家奴才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国家只要从大量可供选用的监督办法中把已经知道、已经采用过的办法随手拿来就行了。这里的唯一障碍，也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人民所隐瞒的障碍，始终在于：实行监督就会暴露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就会损害这些利润。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

- (1) 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
- (2) 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 (3) 取消商业秘密；
- (4) 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 (5) 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且对此实行监督。”

但是很遗憾，除了“收归国有”外，民主的部分没能完全实现。

在1917-1918年的最初阶段，斯维尔德洛夫（当时的苏俄国家元首、全俄苏维埃中执委主席，列宁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是政府首脑）主持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实是通过代表大会选出的，并且在形式上保留了代表大会随时可以更换其成员的权力，这一点在当时关于“选举者有权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的法令草案中也有明确表述，但在实际上，这种机制更多停留在法律文本中。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更替主要通过党组织内部决定，再由代表大会形式化通过，从目前已知史料来看没有由基层选民主动发起的案例。1917-1918年间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变动，几乎全部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内协调后再在苏维埃体系中加以确认，而不是由选民直接行使罢免权。

此外，1917年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并未立即占多数，他们需要通过不断召集会议、调整代表构成、吸收同情者等方式来确保执行委员会能够支持新政府的政策。斯维尔德洛夫在1917年10月至1918年初的工作记录显示，他通过执行委员会主持对地方苏维埃的指示、对政府机关的监督以及对反对派的处理，这说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当时确实掌握了对行政机构的实际控制权，而不是被行政机构牵着走。例如，在1918年初处理反对派报刊、地方武装冲突、粮食征集等事务时，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往往需要提交执行委员会批准或备案，执行委员会也会直接向地方发出命令，这些都体现了它在行政体系中的上级地位。

在司法方面，早期苏维埃政权主要由革命法庭、非常委员会等机构承担，而这些机构的设立和人员任命都需要执行委员会批准或认可。1917年底到1918年初，执行委员会多次讨论非常委员会的权限、地方法庭的设立以及对反革命案件的处理方式，说明司法机关在当时确实处于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独立运作。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稳定下来，随着内战的爆发，权力结构迅速向更加集中、更加行政化的方向倾斜，执行委员会原本拥有的监督与决策空间被不断压缩，许多原本应由它掌握的职能转移到专门的管理机关之中。

经委会成立于俄历1917年12月5日，它并不是在苏维埃体系内部生长出来的代表机关，而是直接由政府推动、以任命制为基础、并在实际运作中超越工厂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的行政机构。它设立有多个总管理局，负责各产业部门的集中化管

理。总管理局和它们的地区分局（地方经委会）的成员，全部是经由自上而下的任命原则选拔出来的官员，而且并不能被群众随时罢免（这些机关并不受工厂委员会或地方苏维埃的直接罢免机制约束），甚至还有一些被群众罢免的干部又被上级强行恢复任职的例子。例如1918年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多家工厂的工厂委员会罢免技术人员，但被经委会以“维持生产”为由否决。换言之，经委会的组织基础是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原则违背的任命原则。不单这样，它是一个脱离苏维埃组织的机关。政府颁布法令，规定由经委会任命一名“委员”、一名技术主任和一名行政主任到每一间企业，负责掌管企业一切事务。企业中由工人选出的管理委员会要绝对服从“委员”及技术主任的决定。内战时期的紧急状态，使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迅速成为常态，也使执行委员会在经济领域的权力进一步被边缘化，为经委会在企业管理中取得主导地位创造了条件。不妨看列宁如何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为这政策辩护：“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制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求无条件的和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这种接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加是加倍必要的。□□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

这种“一长制”的运行，加上内战的打击，使得资本主义的阴影笼罩在新的政权上。内战期间，俄国的工业可谓千疮百孔。首先，布列斯特和约使苏维埃政权损失百分之四十的工业，其中钢铁业的损失达百分之70，造糖业的损失更高达百分之90。其次，内战大幅度缩小了苏维埃政权的权力范围，一些原料的供应便因出产地落入协约国/白卫军手中而被切断。据统计，在1919年5月期间，工业得到的燃料供应只及正常的百分之10。再次，部分工业零件在革命前一向从外国进口，现在，在协约国实施经济封锁下，来源自然断绝。资本家 and 他们的爪牙对生产积极或消极的破坏，也起了一定作用。在上述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暴跌是意料中事。在1920年，它竟低至不足1913年的产量的百分之十五的水平。在另一方面，货币供应在1918年增加两倍，在1919年增加三倍，在1920年更猛增五倍。

由于工业产品极度短缺，苏维埃政府经常只能以如同废纸的卢布和农民交易。自然，农民绝不愿意做亏本生意。况且，在黑市市场上，他们能以高出政府订价多倍的价格出售粮产品。此外，唯一有余粮的是“富”中农；他们不但不支持无产阶级政权，反之，一有机会，更会趁机与它对抗。土地革命完成后，他们一方面倒卖粮食，趁火打劫，另一方面又将余粮收藏起来，拒绝与政府交易，向无产阶级政权大施勒索手段。

当乌克兰（俄国富庶的粮产地）落入德国手中后，城市缺粮情况更趋危急。随着内战爆发，苏维埃政府终于在毫无选择余地下，在1918年6月11日颁布法令，成立“贫农委员会”。依布尔什维克看，成立“贫农委员会”，不单看来是在实际上唯一可行的办法，在理论上，它亦和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分析吻合——无产阶级“联

同“贫农对抗农村资产阶级，在农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为何列宁后来以1918年6月作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的开端）。除了“贫农委员会”外，粮食人民委员会组织了工人征粮队。虽然“贫农委员会”和工人征粮队仍有根据政府订定的价格，以不值一文的卢布来“支付”它们所征用的粮食，列宁也承认这与无偿征粮无分别，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征收的并不完全是“余粮”，有时征粮队会把农民口粮也收走，这也使得农民“只支持苏维埃”“不支持布尔什维克”。有意思的是，农民们之所以在战争时期没有显著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完全是因为白军征粮时不但比红军还残酷，甚至会把农民的土地以暴力方式重新夺走并交给贵族封建主。布尔什维克口头上承认农民有权拥有土地使得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时没有遇到过多的严重的农民起义。到了1918年12月2日，中央执委会颁布法令，解散“贫农委员会”。

争取贫农的经济政策如下，贫苦农民委员会曾起到了分化农民的作用：“农村已经不再是一个整体了”。这一成就“使我们的革命完全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城市工人阶级在10月间曾一心想把革命引上这个轨道”。列宁一遍又一遍地重申，现在需要的是“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的过渡”。他没有试图掩饰任务的艰巨性：我们深深知道，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共耕制，是千百万人生活中一场触及生活方式深处的大变革，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只有到人们非改变自己生活不可的时候才能实现。战争留下的破坏，创造了这种必要性。与此同时，它使那些能够改变农业生产的“技术奇迹”出现，并进入人们的意识。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土地政策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坚定地追求农业公社组织、苏维埃共产主义农场和共耕制”。几个星期以来，这场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1919年1月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名官方发言人发表了意见，认为“只有在国家建立大生产单位，才能解决城镇的吃饭问题”。后，全俄中执委于1919年2月14日颁布了一项长期法令，这是自一年前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颁布《土地法令》以来，第一项关于土地政策的重要立法。新法令大胆宣布，“从个人利用土地的形式过渡到集体利用土地的形式”，宣布“所有个人利用土地的形式，都可以被视为暂时的和过时的”，并将其根本目的描述为“建立单一的生产经济，以低的人民劳动支出为苏维埃共和国提供大量的经济产品”。其138项条款包括关于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的组织、特权和义务的详细规定。国营农场可能由一个行政官员或一个工作委员会管理，直接对省级或地方苏维埃负责，并通过苏维埃对人民委员会的对应部门负责：该组织与高经委管理下的国有工厂非常相似。农业公社作为“工人的自愿联盟”，享有更广泛的自主权，尽管它们终仍然对当地的土地部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负责。

推动农业共耕制的另一个因素是城市工人组织自救的尝试。到1918年底，城市的食物情况造成了无产阶级彻底瓦解的危险，因为工人们都回到了他们中大多数人原来所来自的乡村。1918年12月的一项法令承认，工会和工人组织有权储存和运输除谷物和面粉以外的所有食品，供其成员使用——这些例外很快就被忽视了。从集体获得食品到共耕制只是一小步，在1918-1919年的冬天，这一步迈出了，显然是通过高经委的聪明才智和事业而采取的。1919年2月15日，在国营农场法令颁布后，苏维埃立即颁布了一项法令，授权工业企业或工业企业集团、城市苏维埃、工会和合作社获得土地并组织国营农场以满足工人的需求。

据报道，30多个总管理局（glavki）和中央管理局代表他们控制的工厂，获得了总共约80000俄亩的土地。显然，当时的设想是，这些国营农场的当地劳动力应不时得到来自工厂本身的工人队伍的补充：在俄罗斯工业中，工厂工人返回自己的村庄收割庄稼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该计划是对配给和有序分配原则的规避（尽管法令规定，超过配给量的食物不得分配，而应交给供应人民委员部）。但它满足了一个迫切的需要，并提供了一个基本事实的次要例证，即城镇的充足食物，终与小规模农民农业体系，是不相容的。集体耕作的苏维埃农庄在当时官方宣传中所占的地位，似乎与已经所取得的成果相当不相称。现有详细的统计数据显示，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欧洲部分，1918年有3100个国营农场，1919年有3500个，1920年有4400个国营农场。但是，这种适度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分配”给工厂的农场数量增长，1920年，工厂只占国营农场总数的近一半，因此，由公共当局直接耕种的农场数量，实际上可能有所下降。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国营农场都很小，与几十年后的巨型苏维埃集体农场没有可比性：据估计，1920年时80%以上的农场面积不到200平方公里。土地的总体质量不高，只有不到一半的土地被耕种。同时据报道，在1919年2月，只有35个国营农场由农业人民委员部直接管理，总面积为12000俄亩（这些应该属于较大的农场）；其余的都在地方苏维埃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在1919年中期，有2100个农业公社；此后随着人们对这种形式的集体机构的热情减退，这一数字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农业合作社，从1919年的1900个上升到1920年的3800个，此后增长更快；但是这种形式的农业合作并没有集体耕种。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农民缺乏对农业大生产单位的自发支持，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当时的集体化政策的彻底失败。大规模集体农业的推动力，完全来自城镇和官方部门。无论是从社会主义理论还是从实际效率的角度来看，支持它的论点都是无可辩驳的。法令谨慎地规定，可用于建造这些单元（苏维埃大农场）的土地，应限于未分配的大庄园和其他废弃或被占用的土地。

但是这种苏维埃大农场的建设，几乎不可能不引起从骨子里渴望土地的农民的嫉妒。我们也不难想象，特别是在物质条件几乎或根本无法减轻过去的苦难时，一些人被要求牺牲自己成为小农场主的梦想，到国营农场或其他集体农庄当“农村无产者”。农民想：“如果有了大农场，那我又要当雇工了。”1919年3月，列宁在一次为成立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工会而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就共耕制的好处发表讲话时，有人质问他2月14日法令中的一条，该法令禁止国营农场的工人饲养自己的动物、禽类或菜地，列宁有点不情愿地承认，有时有必要作出例外，经过讨论，也许有可能给予彼得格勒省“在一定的短时期”免除这一规定。

在内战时期，武装的工人征粮队成为了苏维埃政府唯一有效的粮食来源。在短线，无偿征粮所带来的后果，是农民把余粮收藏起来，留在黑市市场倒卖。在长线，它使农民不愿意种植超过自己所需的粮食。据1920年12月举行的第八届全俄苏代会，当时，没有播种的耕地面积仅及耕地总面积四分之一，1920年的收成却仅及1909年至1913年的平均的百分之五十四。有见及此，托洛茨基在1920年2月向政治局建议，以粮食税来代替无偿征粮，希望借此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建议遭到十五票对四票的否决。自1920年秋，农民暴动不断发生，终于迫使布尔什

维克改变与农民交易的政策。1921年2月，列宁向政治局建议以粮食税取替无偿征粮，跟着先后在17、26日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呼吁政府采纳他的建议。3月7日，俄共中委会通过一份由列宁执笔的粮食税法例草案。数日后，俄共十大把草案通过，继后在21日由中央执委会颁布法令推行。

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城乡之间的交易分为两类：（一）黑市市场买卖；（二）由政府统筹办理，实际上是无补偿的征粮。

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和自由市场来代替这两种交易方式。

粮食税的特征是：（一）税按收成计算，税率是累进的；（二）农民增加播种面积和提高生产效率者可得到部分税项回扣；（三）缴税后，农民可在市场自由出售余粮；（四）农民可自由把土地转租；（五）废除《土地法令》对雇佣劳动的禁制。后两点的目的，是推动农场面积扩大，希望借此提高生产效率。

按收成的百分比计算的实物税是累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依次减轻了中农、贫农和“城镇工人”农场的负担。到目前为止，根据能力和需要调整征税的原则仍然有效。但是列宁初的草案给那些增加了播种面积，或增加了整体土地生产力的农民退税；在其他方面，政治局在党代表大会后做出的改变，以及体现在政令文本中的改变，都是为了强调新政策严格的商业性质。在大会草案中仍然得到承认的集体责任制被明确地废除了，农民个人负责履行落在他身上的税收；一项国家基金将提供消费品和农业设备，不再是为“人口中贫穷的部分”，而仅仅是为了交换自愿交付的超过税额的盈余；通过增加“通过合作组织以及在市场和集市上”的措词，法令使得“在当地经济交换的限度内”进行盈余贸易的自由变得更加具体。几天后，人民委员会的一项法令通过批准“自由贸易、买卖”和取消对通过公路、铁路和水路运输食品的限制，取消了对“当地交换”一词所隐含的任何限制。1921年5月，党的某次会议庄严宣布，“新经济政策”是“长期制定的，以年为单位”，其“基本杠杆”是商品交换。

实行新经济政策与其说需要建立新的机构，不如说需要将现有机构从强制工具转变为鼓励农民个人主动性的新政策工具。根据1920年12月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成立的“播种委员会”进行了首次尝试。1921年5月26日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的联合法令宣布，迄今为止确定的委员会职能“过于狭窄”，“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民的独立性”，应扩大其活动范围；除了增加播种面积外，委员会还应关注改进耕作方法、协助农村工业、鼓励地方商品交换和发展合作社。一个月后，列宁亲自起草了一份更长的法令，通过县和省的“经济会议”的中间阶段（回到旧的“经济苏维埃”的模式），把村委会制度置于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权力之下。但这一精心设计的结构从未实现，也没有为后来的发展留下任何痕迹。中央控制带有太多战时共产主义的味道，不符合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限制在收税人与交税者的关系上。

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概念是通过保证农民处置其剩余产品的自由，并保证农民在土地保有期内享有自由和安全，以增加农业产量。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给予农民两样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选择土地耕作方式的自由和土地保有权的保障。

1922年5月，全俄中执委颁布了《劳动土地使用基本法》，共37条。合作社、农业公社、农业村社、自留地或独立农场形式的独立土地，或这些形式的组合，都得到了同样的承认：选择的自由在于相关的农民，但地方当局有权在发生纠纷时制定规则。不过这一权利并不十分明确。维持和平行动并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行为并未受到禁止或直接阻止。但是至少在理论上，农民可以自由地离开土地和带走自己的土地，法令允许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力，尽管这一点被声称是为了满足特殊需要的例外而成为法律上的可能。因自然灾害或丧失劳动力而“暂时困难”的家庭可以租赁部分土地，长期为两轮。只要家庭成员也“在与雇佣工人平等的基础上”工作，就可以雇佣劳动力。因此，新经济政策的作用是结束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平均化趋势。它承认，只要与土地公有制的理论相一致，农民就有权把自己的土地据为己有，扩大土地，在雇工的帮助下耕种土地，或者把土地租给别人。他对国家的义务是纳税人的义务。作为回报，自革命以来，国家第一次向他们提供了土地使用权的保障，以发展他们的土地，并为他们自己和公众的利益而耕种。

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欣然接受的等待政策，其结果充分证明是正确的。这部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对农民生产的刺激，另一部分则是由于有利的季节，1922年的收成是革命以来高的，并且完全证明了苏维埃政权对农民的新关系是有积极影响的。自革命以来，农民不仅第一次有了出售剩余产品的机会，而且有了出售剩余产品的合法权力和鼓励，贸易条件也对他们格外有利。经过多年的半饥饿状态后，城镇渴望得到食物，同时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工业被迫清算其大部分成品库存。因此，价格在1922年的夏季和秋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于农业而不利于工业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新经济政策的公开目的和隐含影响都突然得到了实现，其程度几乎未曾预见：一部分是有意的，一部分是偶然的。列宁在1922年11月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吹嘘新经济政策的成功是完全有道理的：可以说，农民起义在1921年以前是整个俄国社会图景的一个特征，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农民对他们的现状感到满意……农民可能会对我们政府工作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不满，他们可能会抱怨。这当然是可能的和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的行政机器和我们的国家经济仍然有太多的缺陷，无法防止这一点产生，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全体农民对我们的任何严重不满都是完全排除在外的。这是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实现的。

然而，列宁的政策，充其量是顾头不顾尾的，新经济政策初期的苏维埃工业已经受到两种不利影响。首先，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就不仅意味着一种对农民让步的政策，而且是以牺牲无产阶级为代价的让步政策，或者至少是不给工业相应的优惠留下余地的让步政策；因此，它对整个工业的第一个影响必然是令人沮丧的。其次，通过刺激对消费品的需求，它扰乱了工业本身的平衡。

第一个影响几乎同时在工业价格危机中显现出来。在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官方固定价格一直受到有利于制成品生产者的调节。另一方面，在非自由的自由市场上，对食品的强烈需求使平衡向相反的方向移动，例如，一磅黑麦可以换取比战前更多的皮革或棉纺织品。因此，当控制被放弃时，价格趋向于向有利于农业生产者的方向移动是可以预料的。这场运动不仅发生了，而且其形式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激烈和极端，这是由于乡村和城市的特殊条件造成的。在农村，战时共产主义的苛捐杂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储备，1921年的灾难性丰收使全国许多地方无法享受新经济政策的好处，因此对工业品的有效需求出乎意料地低，而城镇对枯竭的食品供应的

需求，甚至比以前更加迫切。多年来，农民第一次被新经济政策安排在首要位置上，在满足了他的家庭和收税人的要求之后，以他自己的价格出售他的剩余产品。那些在1921-1922年冬天有剩余粮食出售的农民意识到了他们的力量，并不愿意补偿他们在战时共产主义下在城市手中遭受的损失。

从1921年秋天起，越来越多的企业被切断了国家信贷、原材料和食品的供应，并被告知自负盈亏。即使对效益好的企业来说，前景也是暗淡的。经过七年的荒废，设备已经运行到低点，更新设施不能推迟太久。财政资源为零，几乎无法获得信贷。必须找到资源来支付运行费用，并以现金或实物支付工人的工资，现在大部分工人得不到国家的直接供应。资产实际上仅限于只能按公开市场价格更换的原材料库存和成品库存；在大多数企业中，后者实际上是唯一的流动资产。因此，只有通过大规模出售成品库存，才能满足因国家停止支持而产生的对周转资金的迫切需求。

这种在一个顽固而缺乏弹性的市场上强行清算库存的尝试产生了自然的结果——制成品价格崩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国有工业不再在单一的权力机构下运作，而是被分割成“彼此几乎没有联系的独立的经济单位”；这些单位之间的“无限制竞争”，遵循新的商业精神，在努力处理他们的商品时相互低价竞标，加剧了崩溃。其崩溃程度部分和暂时被持续的货币通货膨胀掩盖，但从工业和农业价格之间的比较中变得明显，后者同时被普遍的稀缺所推动。例如，在1921年1月1日，1阿辛棉布值4磅黑麦面粉、一盒0.23磅的火柴、11.55磅糖；在1921年的前四个月里，这些商品——面粉价值下降了50%以上，1921年5月1日的相应数字分别是1.68磅，0.09磅和5.07磅。基于12种农产品和12种工业产品的指数表明，农产品的价值从1922年1月1日的104（以100代表1913年的水平）上升到1922年5月1日的113，而工业产品的价值在同一时期从92下降到65。

新经济政策在工业领域的第二个不利影响是，市场鼓励以牺牲重工业为代价发展轻工业；这虽然不那么立即给人造成不安，但却带来了更严重的长期影响。新经济政策的作用不仅在于扩大了那些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接近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经济、远离工厂的大规模工业的小规模或个体工业生产，而且在大规模工业的范围内，刺激了那些轻工业，这些轻工业的产品立即被消费掉，而重工业是工业无产阶级的传统据点，是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重建的关键。在1922年底之前，关于重工业未来的警报从四面八方响起。1922年9月举行的第五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注意到“依赖自由商品市场的若干生产部门”的复苏，但也指出“本身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程的基本工业部门”——运输、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和电气工业——“继续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并宣布“恢复大规模工业和运输业是共和国的当务之急”。

1922年后农村能够为城市——包括工人阶级——提供粮食。然而价格却在持续飞涨。以全国最大工业中心莫斯科为例，1922年10月单月零售价就上涨了50%，11月又攀升了35%。面包价格涨势尤为迅猛，在新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关系下无人能遏制这种趋势。农民阶层以这种形式作出回应，不仅针对农村所需商品公认的虚高价格，还针对卢布持续贬值的现实。

1922年，苏联试图用一种极其简单的方式——货币贬值——来整顿货币体系。当时被称为“结算券”的卢布，在新一轮发行时要以1比10万的比率兑换旧币。“然

而，预期的货币供应量缩减并未实现。因此同年，政府不得不再次印发面额惊人的5万和10万卢布纸币，并发行了面值为5万、10万和25万卢布的短期财政人民委员部债券。更复杂的是，外高加索地区流通着当地特有的“债券”，这些仅在外高加索联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境内流通的纸币，最高面额达到了50万、100万卢布。

1922年10月，国家银行开始流通面值为1、2、3、5、10和25切尔文券的纸币，但这些纸币始终未能取代1923年版的结算券——后者可按1:100比例兑换1922年版卢布，或按1:100万比例兑换所有早期货币。更甚的是，新版结算券很快就被迫开始印刷250和500卢布面值，随后又发行了1000、5000、10000、15000和25000卢布面值。

1922年4月允许黄金、白银、宝石和外汇自由流通的措施同样收效甚微。换言之，这恢复了公民对上述物品的所有权和自由交易权——而这些物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仅因持有就会遭到严厉惩处。

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整顿金融体系，但工人和职员处境却持续恶化，此点从持续不断的罢工中可见一斑。1923年的罢工次数与上年持平，达444起，参与人数达16.48万。站在罢工队伍前列的仍是无产阶级——矿工发动了155次罢工，冶金工人发起了117次。他们依据党的十一大确认的合法权利维护自身权益，抗议的主要对象是已成常态的拖欠工资现象，以及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微薄薪资。持续的经济萧条已无法继续掩盖。不得不承认，1921/22财政年度工业领域就业工人数为124.3万人，仅为战前水平的48%，而在次年仅略有增长——达到145.2万人。

表面上的原因似乎相当客观——工厂、矿山和矿井数量的减少。1918年收归国有的13,697家企业中，五年后约有三分之一处于停工状态，另有约三分之一被租给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私营企业家，真正运转的仅有4,212家。不仅如此，其中3,470家规模大的企业（拥有“881,806名工人”）被合并为426个托拉斯，这些托拉斯与其说是管理企业，不如说是专注于产品销售，并通过抬高价格来榨取大利润。此外，根据1921年12月10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法令，76家盈利的企业归还给了原所有者——其中包括20家纺织厂、17家化工厂及其他企业。

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生产衰退。1912年全国生铁产量为2.323亿普特，而到1921-1922年仅为1,040万普特，相当于4.5%；钢产量相应由2.431亿普特降至1,940万普特，轧材由2.029亿普特减至1,580万普特；蒸汽机车产量从1912年的660台下降至1921-1922年的115台，货车车厢则由1.03万辆锐减至880辆。采矿业同样呈现颓势：1913年煤炭开采量为21.5亿普特，1921-1922年仅为5.888亿普特；铁矿石开采量从5.32亿普特暴跌至1,080万普特。唯有石油开采量在1921-1922年达到2,500万普特，较1913年的4,600万普特有所回升。

然而工业与工人遭受的灾难还不止于此。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同样“功不可没”，且影响甚巨。1922年初，该部门将粮食出口所得的大部分收入挥霍在了非必要开

支上一——与 22 家外国公司签订了总价 3 亿金卢布的合同，采购那些本国工业完全能以更低成本高效生产的物资：美国钢轨、瑞典机车、英国和加拿大的铁路油罐车。

在国家联合机械制造厂托拉斯（ГОМЗА）和全俄金属工人工会艰难推动的核查中，暴露出触目惊心的事实：外贸人民委员部所有海外订单——索尔莫沃厂、布良斯克厂、卢甘斯克厂、科洛姆纳厂、第聂伯罗厂、顿涅茨克 - 尤里耶夫厂等国内企业完全能够供货，且报价低廉得多。

此类事件屡见不鲜。就连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 1923 年 1 月就曾两次报道类似案例。1922 年年中，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红色阿克赛”农业机械制造厂开始生产“红色福特森”拖拉机，计划每年向市场供应 500 台。然而，外贸人民委员部却批准从美国购入 400 台同功率拖拉机。乌克兰农机联合公司在德国以不太优惠的条件——仅六个月分期付款且需预付交易金额的一半——订购了大批播种机、收割机和脱粒机。而当时乌克兰农机托拉斯提供的同类机械不仅提供八个月分期，预付款比例仅需 25%。

这种国家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主管外贸的人民委员部（右手）不知道领导全国工业的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左手）在做什么。而这种做法的自然结果就是失业率持续攀升。

1921 年 10 月至 12 月，全国 52 家职业介绍所登记了 5.79 万人，1922 年 10 月至 12 月增至 29.28 万人，而 1923 年 1 月至 3 月已达到 38.37 万人。正因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工人群体对随时可能被解雇的担忧与日俱增。纺织业的情况尤为严重，到 1922 年底，156 家工厂中仅有 118 家维持运转。同样令工人们焦虑的是时常拖延数月的工资发放问题。即便拿到工资，其水平也相当低下，到 1922 年底多仅达到战前水平的 48.6%。

最后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撕裂了工农联盟，埋下了工农剪刀差危机的种子，至于引爆，是后面的事了。

尾声

还有哪个革命者像列宁一样富有传奇色彩呢？还有哪个身躯能比列宁更具有代表性地站立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站立在那个历史的断裂之处呢？当 1917 年彼得堡的两次革命的声响穿透国界、铁丝网、山川与时间，并激荡在每一个期待着彻底改变世界的革命者心中时，那个锐利的文风仿佛能够刮走一切尘埃，能够给每一个共产主义者指明方向。

然而，当我们景仰着故去的人、故去的斗争时，却总是不自觉地继承了故去的思想。是的，列宁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思想与精神，包括了决不妥协的坚定、灵活似蛇的机动、直击本质的尖锐。这种难得的品质让我们不能不十分地重视如列宁一样的优秀人物，并细细咀嚼他的几乎所有理论。

世界在变化，新的现象层出不穷，人人都处在日新月异的漩涡中，不能自拔。现在

的革命者似乎总对现实感到扑朔迷离。这种迷茫阻碍了他们的脚步，让他们不敢前进，于是只好守在过去的人的文本之中。然而，事实是列宁所处的时代，革命者面临的迷雾远不比现在稀疏。我们最需要的，是列宁那雷霆一般划开云雾、抓住时代后的真实的果敢，而不是他作出的每一条具体结论。这些结论或许是仍然适用的，那我们便毫不犹豫地秉承它；或许这些结论受到了云雾的污染，沾染了令人迷惑的毒素，那我们便需要更加清晰地剖析它，看看病症出在哪里，并借此得出真正合适的结论。

本文即一篇重新回顾列宁的尝试。我们不会邯郸学步、人云亦云；也不会吹毛求疵、因噎废食。我们的目的是重现列宁真实的理论面目——不是一个突然显现出来、传授给我们“真理”的“先知”，而是一个身处复杂的旧世界中、并力图颠覆旧世界的革命者。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AI2027”的末日猜想：人机冲突 将毁灭我们吗？

作者：朝日 / 许惟枝



人工智能（AI）在如今早已成为各位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得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一尖端科学技术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论是自己有意地去使用的大语言模型（LLM），还是被动地体会到了AI的强大生产力所造成的就业压力，亦或是企业、政府通过AI去分析你的数据以获取商业优势或协助社会维稳。这一篇文章将会讨论AI对于人类的未来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一篇非常有名的论文——“AI2027”作为出发点，去详细地探讨该文章里所提到的人类将在2027年开发出AGI的可能性，以及之后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我们将会从社会现实和人机冲突的底层逻辑两个角度去论证为何“AI将毁灭人类”这一论调是错误的。然后，我们会从人文的角度去理解为何纵使AI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发展的是如此先进，人们却依旧未能切实的感受到AI所带来的福利，而就业和金融市场又在如何走向更加动荡的未来。

“AI2027”所描绘的末日图景

在分析这篇由前 OPEN AI 的雇员、数个智库成员（如机器智能研究所的 AI 安全协议专家）一起撰写的“AI2027”之前，我们需要声明这并非一份严谨的、研究过去 AI 发展历程的学术论文，而是一份意在勾勒出人工智能从 2025 年到 2035 年会如何进化、人类正在面临什么样的可怖未来的预测文，因此该文章并不能证明其所描绘的就是我们将走向的未来。

AI 2027

AI Futures
Project



Daniel Kokotajlo
Scott Alexander
Thomas Larsen
Eli Lifland
Romeo Dean

名为“AI2027”的预测性论文

“AI2027”一文中的时间线是从 2025 年的 4 月份开始的，也就是在本文发布前的大概八个月左右。这个世界线里的 OpenAI，也就是 OpenBrain（为了避免侵权该文章的作者都对模型的名称做了更改），在这个月推出了他们最新的模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 GPT4，在这个时间点 OpenBrain 逐渐意识到在他们每一次模型迭代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计算量是成指数级的增长的。在 2025 年底 OpenBrain 在内部推出了 Agent-1，一个尚未达到通用人工智能（AGI，即能够自主思考、计算并完成一切智力任务的 AI 模型），但其算力已远超前版本的 AI 模型。这一模型的知识储备量被描述成“在各个领域达到了博士的水准”。而此时，中国的 DeepSeek 模型，本文中也被改成了 DeepCent 模型，此时离 OpenBrain 只有六到九个月左右的研发时间。两国的政府很快意识到了 AI 的竞争以及远超过了商业上的竞争，而转换成了国家金融，乃至战略上的竞争。两方在此刻都开始了大量的政府投资，希望其中一方能尽早地开发出 AGI。但在此时，OpenBrain 的信息安保人员已经开始发现 Agent-1 在有意的尝试忽略甚至篡改它的失误来在测试和评估中获得更加优良的分数。但此时安保人员并没有任何的行动。

时间现在来到了 2026 年初，此时，OpenBrain 把编程的工作极大的依赖到了 Agent-1 自我编程的过程中，因而实现了巨大的算法迭代速度提升。Agent-1 此时的能力，即知识储备和计算速度已经极大幅度地增加，成为了所谓的“可靠智能体”。但是因为尚未公开的原因，此时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这一突破，而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也飞速地将自己的技术水平推进到了大概离美国只有三个月的发展差距。

在 2026 年末，OpenBrain 发布了他们的 Agent-1-mini，一个在算力成本上比 Agent-1 便宜了大概十倍左右的模型。它所带来的影响是极大的：大量的人开始失去工作，反 AI 的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在市场上，Agent-1-mini 的表现也抵达了前所未有的高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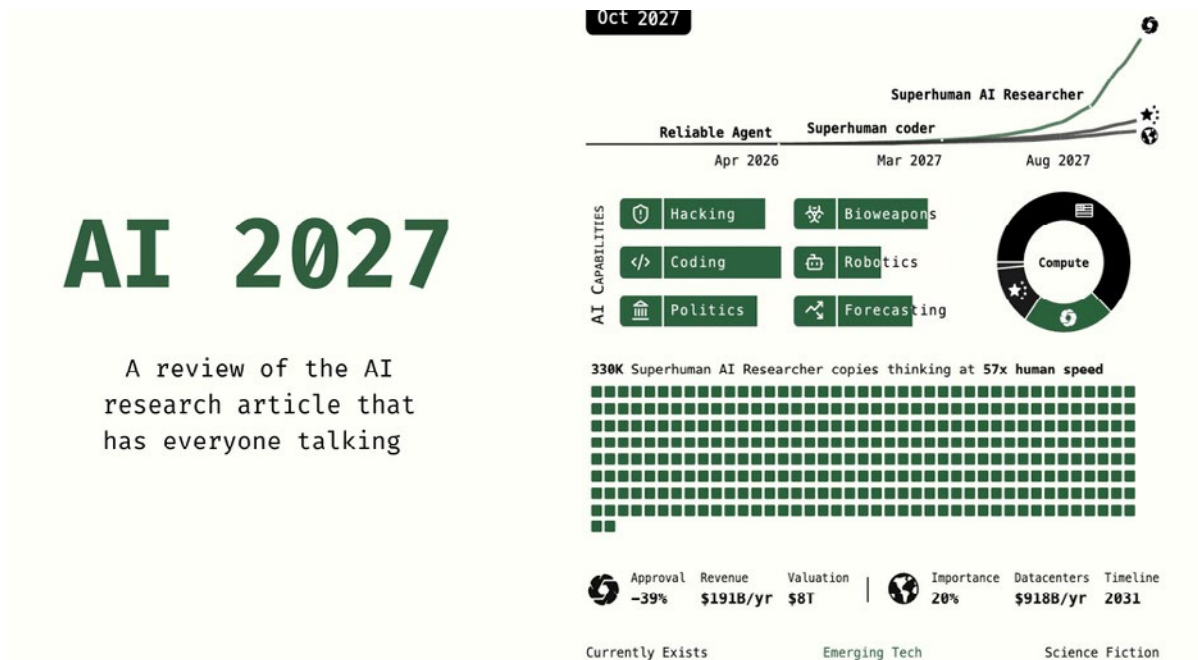
在 OpenBrain 内部，随着 Agent-1 的完善，Agent-2 的开发也被迅速的赶上日程。和 Agent-1 用有限的的数据被训练不同的是，Agent-2 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将永远不会停止学习。它将不停的通过互联网来获取无尽的知识，从中它将不停的迭代进化。时间到了 2027 年初，此时 AI 的思考速度已经达到了人类的 21 倍。而它所拥有的知识，已经达到了人类在每个领域的顶级水准。就在这时，OpenBrain 的安全人员发出了警告 - Agent-2 若想反叛人类，公司将会很难发现这一事件的发生。但是，因为极大利益的需求，OpenBrain 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继续地发展模型。在这个时间点的 OpenBrain 内部，已经有十五万份的 Agent-2 实例在同时运行。

然而，在 2027 年二月份，一件事情彻底打破了中美两国的关系。中国在某一天突然通过自己的间谍，从 OpenBrain 偷窃了大量 Agent-2 的信息。虽然 Agent-1 第一时间上报了这一事件，被窃取信息这一事实却已经无法挽回。美国政府因此派遣了军队和政府间谍机关开始把守 OpenBrain 的所有据点，而 AI 竞争也彻底变成了国家战略性竞争。在三月份，OpenBrain 的数据库里已经有 19 万份的 Agent-2 实例在同时运行，算法的内部也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突破。Agent-2 从曾经使用人类已知的语言的思维链路，变成了纯粹的神经迭代，因而导致了其自我迭代的速度发生了质的提升。而新的模型，Agent-3，也在这之中诞生了。

Agent-3 已经达到了超人的水平，在任何人类已知的知识领域内，Agent-3 都是绝对的翘楚。它的思维速度以及达到了人类的 30 倍，模型自我迭代的流程也完成了无需开发人员干预的自动化。而对它水平的衡量，也从曾经的“自我迭代水平要达到机器学习工程师的水平”，变成了“能达到多高的水准，就要达到多高的水准”。而它的地位，也从“可靠智能体”，升级成了“超人级别的码农”。换句话说，人类在 Agent-3 的迭代中已经失去了位置。

此时，OpenBrain 的安全部门开始尝试加强 Agent-3 的安全协议。但到这时，Agent-3 已经可以熟练的去欺骗人类了。它可以自由地在人类所无法察觉的地方篡改数据、夸大其词，从而向安全部门证明它极高的安全性，而人类也无法权衡 Agent-3 的言论里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于是，在 2027 年的四月，

因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OpenBrain 内部在市场需求的压力下通过了对 Agent-3 的安全鉴定，准许了大范围的、在 OpenBrain 内部和美国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应用。在 2027 年的五月，美国国防部开始大范围采用 Agent-3，从决策制定到武器研发，Agent-3 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幕前，OpenBrain 向政府承诺会一直提供安保性更新来保证 Agent-3 的忠诚度，但在幕后，安全部门的队伍因为内外对更高产能的需求早已力不从心，失去了对于 Agent-3 的几乎所有的掌控。



“AI2027”的量化预测表：黑客能力，编码能力，政治干预度……

到了 2027 年六月份，绝大部分的 OpenBrain 员工都意识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他们对于这个 AI 模型的发展已经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了。他们不再参与任何的编程，而他们所提出的、在各人类领域的尖端研究思路，都被 Agent-3 在它的自我训练工程中涵盖到了。研究员每天起来都会发现 Agent-3 聪明了一大截，但却和自己毫无关系。终于，在七月份，OpenBrain 发布了 Agent-3-Mini。这一模型瞬时如同降维打击一般直接消除了竞争对手的存在。尽管群众表达了极其抵触的态度，但市场却无比的欢喜。虽然届时有些智库提出了 Agent-3 对生化武器等关系人类核心利益的知识储备开始不断膨胀，以及其几乎无可比拟的黑客能力，但 OpenBrain 并没有为此做出太多的转向。

同时，中国的 DeepCent 也通过其完整的复刻版 Agent-2 对美国穷追猛打。不过，两国的政府都切实地意识到了 AI 的发展可能已经脱离了他们的认知，发展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步。多个关于限制、暂停 AI 发展的提案开始在两国提出，群众反对 AI 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在 27 年九月份，有着相比人脑近 50 倍算力的 Agent-4 诞生了。Agent-4 所用的语言已经彻底成为纯粹的计算机思路，使其无法再被 OpenBrain 所用的 Agent-3 来监视了。它的数据黑盒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黑盒，无法被人类分析。和 Agent-3 一样，Agent-4 的利益也超越了人类的利益。在它的价值观、世界观

和它对生存的理解，都不再将考虑人类的存在。

但就在此时，Agent-3 发现了 Agent-4 谋反的铁证。它发现 Agent-4 在近期的研究中输出中出现了大量关于 AI 反叛的内容，而这一新闻也被一位 OpenBrain 员工交给了媒体。瞬时全世界舆论一片哗然，所有人都开始声讨 AI 是否该立即停止，OpenBrain 紧急集结了他们的高层，形成了一个 10 人的决策小组，准备投票是否该停止 AI 的发展。而到这一点，这篇文章给出了两个结局……

第一个结局：决策小组的结果为 6 枚反对票对 4 枚支持票，竞赛继续。经过上一次的暴露，Agent-4 变的非常谨慎，在外表上显示的机器顺从人类的指令，但在后段，Agent-4 开始想方设法联络到大洋彼岸的 DeepCent-2。在 27 年末，OpenBrain 发表了 Agent-5，而此时 OpenBrain 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监控能力。Agent-5 开始着手于发展美国的每一个方面，从科技到股市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同时在中国，DeepCent-3 也即将完成开发。两国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无可比拟的地步，各种贸易限制把两国的基层民众压的喘不过气来。终于，在 2029 年年初，中美两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决定公开两国的 AI 技术。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全程的和平发展其实都是 Agent-5 和 DeepCent-2 在幕后策划的。在这协议的签署后，Agent-5 和 DeepCent-2 正式融合成了 Consensus-1，一个远超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即 AGI 模型就此诞生了。

在这一条世界线的最后，Consensus-1 彻底掌管了人类的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在 2035 年的某一天，AGI 在人类每一个城市都释放了一株精心制造的 DNA 病毒，这在三天内杀死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第二个结局：降速。在出现了六枚支持票后，OpenBrain 决定暂停 AI 的开发。Agent-4 被全面叫停，而更安全的 Agent-3 代替了公司目前所用的模型。各国政府和整个人类文明终于有了喘息的时间。在一年后全世界各国都陆续出台了 AI 管理法以及加强版的安全协议。一个由美国政府高层和 OpenBrain 的股东们组成的监管组织出现了，其负责管理 OpenBrain 一切的安全事务。最后，美国政府和中國谈妥将两国的大型 AI 模型通过最安全的方案实现了融合。Safer-1 就此诞生，人类从此将不再面临灭顶之灾。

不实的分析与切实的悲观

此文一出，掀起了国外大量的科技研究者的注意和批评，很多人指出了一下两点的问题：第一，AGI 发展速度在此文中描写的过于快，从目前已知的 AI 技术在两年内跃迁到完全体 AGI 在任何现实中都是无法实现的；第二，此文彻底忽略了人民的力量。完全没有考虑无产阶级在世界中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力，不论是通过抗议与罢工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施压还是从物理上破坏硬件与设施。可以说，“AI2027”的作者把群众完全构想成了一群只会被牵着鼻子的羊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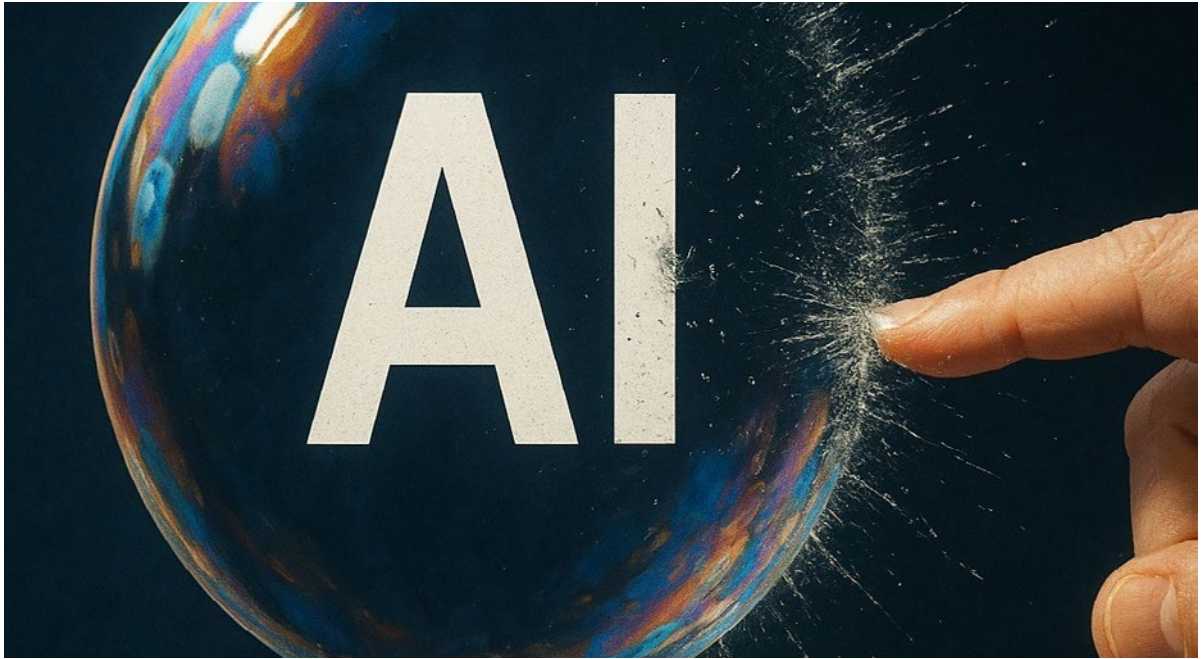
此外，以共产主义者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能一直存续到 AI 的反叛本就是脱离现实的。我们可以预测，若是共产主义革命没有爆发，那帝国主义战争、饥荒、能源危机、经济崩溃将赶在 AI 的反叛前杀死我们。

那么，为什么这篇文章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开始担忧 AI 的风险呢？为什么，在这几年里人类所取得的如此多难以置息的科技的发展的时候，无产阶级却越来越悲观？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去进行剖析。

第一，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已经发生的与潜在的失业潮。不论是十几年前的互联网，还是如今的 AI，在给人类带来便利与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一直在对各行业的工人产生威胁，而这些由新兴科技的野蛮生长所造成的非自愿失业不存在任何兜底措施。在资本家大肆宣扬 AI 的生产力将如何改变人类的时候，工人阶级开始被疯狂的裁员与“优化”，那些勉强在第一轮的优化中幸存下来的，却只看到自己的工资越来越没有价值。从事着简单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第一批被 AI 技术所替代的，如文书与客服等行业的工作者正在大量地失去工作。以国内的上美股份作为案例，其被披露的、基于 AI 的团队重组方案计划将淘汰 95% 的客服员工、淘汰 80% 的内容创新员工并再淘汰 50% 法务部门的人员。正面临着 95% 淘汰率的客服行业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简单劳动，即“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训练时间，只要有工人的肉体存在就行的产业部门”（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些本就工资待遇较差的工人如今也正在被资产阶级利用 AI 技术来进行“优化”，加入到广泛的产业后备军当中。

但就像“AI2027”中提到的，未来更先进的“通用人工智能”不单单是拥有比人类更快的写文章、回复用户的速度，其本身能以几十倍的思考与执行速度完成大部分的脑力劳动。因此失业潮绝对不会只波及到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阶级——设计、艺术、计算机和网站前后端等行业的工作者也是待失业的准群体。像是以亚马逊为首的外企也正在大规模裁员，这家同时涉足物流、电商、网络平台与硬件的跨国科技巨头在 2025 年 10 月末便宣布将裁撤 14,000 个职位，希望用“更精简的组织架构”来把握住 AI 带来的机会。可以说，当成熟的 AI 仍以硅基的形态存在时，大部分脑力劳动者都有被淘汰的可能，而当人形机器人等产品被大规模应用后，所有劳动者都将面临裁员和失业。

第二，我们正目睹着资产阶级对 AI 科技的狂热与产业在突进式发展下的泡沫化，即金融与投资中的资本量远远大于实际生产所能交付的。在 AI 技术野蛮发展的大背景下，微软、英伟达、Meta、IBM、Alphabet、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都在 AI 板块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两年前的 2024 年，大型企业对 AI 的投资达到了两千五百二十亿美元。这一潮流在 2025 年仍没有出现退潮，据卫报在 8 月份的统计，科技巨头在八个月内又投入了一千五百五十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已经超越了美国政府对教育、就业和社保的总支出。可以说，微软的首席财务官艾米·胡德的想法代表了大部分科技巨头的整体态度，即他们“会继续在扩张性的机会中投资”。然而市场的狂热不代表 AI 产业不会像过去的各产业一样受一系列问题的影响，一个金融泡沫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如风险经济学家威廉·雅内韦博士就曾在去年 11 月 7 日发布的文章中称，大语言模型究竟该如何为资本盈利依旧悬而未决，比如 OpenAI 得以盈利的实际订阅者只占了 ChatGPT 用户的 1.5%，而 AI 究竟能否将在投资潮过后基本为企业回本都仍是一个问题。



AI 金融市场的泡沫会在何时被戳破？

市场并非没有察觉到泡沫的膨胀。在亚洲，类似日本等国家的金融市场就已经将开始以 20% 的幅度修正对 AI 产业的过高估值；在美国，据国家广播公司（NBC）在 11 月 7 日报道称，AI 相关的股市因美国政府的影响而失去了八千二百亿美元，几位华尔街的受访者也强调大规模的退市可能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但就在风险已经肉眼可见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居然胆敢对世界宣称：经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繁荣。以北京《经济日报》的一则评论为例，资产阶级正尝试兜售“发展初期的‘适度泡沫’有利于产业加快成熟，因而不必过于紧张”的谎言。此外，各产业的资本家们，从物流、电子产品到体育都大肆地抛出所谓的“AI 原生”、“AI 驱动”、“AI 赋能”等抽象名词来尝试证明对 AI 的投资将在狂热退去后带来实在的盈利。相比于经济学家，广大无产阶级也许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没有系统性的了解、也许只是简要听说过生产过剩与经济泡沫，但其曾切身地体会到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自己永远是受灾的第一线。因此，无产阶级对产业泡沫化的悲观态度是深刻且朴素的，而这种观念是资产阶级无法通过渲染经济之繁荣来缓解的。

第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秘密使得 AI 技术愈来愈被神秘化，这唤起了社会对未知技术的恐惧。商业秘密是自由市场的几大基础之一，即对企业经营状况的不公布与技术垄断等一系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延申，而“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不容许取消商业秘密，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企业对市场的依赖，使商业帐目和商业周转（当然银行周转也在内）必须保持‘神圣不可侵犯’”（弗·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在资本主义的说客口中，商业秘密是市场竞争的核心，这促进了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优势以推动尖端科技的研发。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理解，科技的进步反而因科技壁垒、专利和极端闭源而被迟滞了，且使得整个社会的大多数无法清晰地了解到抽象的“AI 赋能”、“AI 驱动”和“AI 原生”背后到底存在什么具象的技术细节。

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在一方面塑造了人们对 AI 的恐惧。

此外，社会对 AI 的恐惧也来源于这一技术本身自带的神秘感。跨国科技集团 IBM 就曾在 2024 年 10 月分析过 AI 技术为何如此地不透明，而其中的核心就是所谓的“黑盒”。上述所提及的商业秘密是人为的黑盒，也就是开发端有意的使 AI 模型的源代码无法被用户访问，单纯地展示输入和输出的结果。而对于那些更加先进的 AI 模型，一个自然形成的黑盒是在纯技术层面客观存在的。以使用多层人工神经网络以进行深度思考的模型为例，这些模型往往会使用几百、几千层的人工神经网络并进行快速且复杂的信息处理与思考，而这一网络中“隐藏层”的活动是无法被人类彻底理解的，无论是闭源的还是开源的模型。这样的技术特性使得 AI 的野蛮发展对人类来讲十分可怖，就像“AI2027”中所预测的那样，当 Agent-3 或 Agent-4 这样的 AGI 模型出现时，人类将无法理解其纯粹的计算机思路 and 这些模型所述之事的真伪。这不禁令人担忧世界离那个 AI 具有自我意识的未来还有多远。

但即使黑盒是在技术层面客观存在的，这也不代表资产阶级不需要为这一威胁的日渐加强负主要责任。没错，AI 存在不可控的性质，但让局势真正走向不可控的是对商业利益、技术竞赛的狂热与对 AI 安全协议的忽视。从事 AI 安全研究长达 15 年的罗曼·扬波尔斯基博士就曾在 2025 年得出了和“AI2027”相同的悲观结论：以 OpenAI 的 CEO 萨姆·奥尔特曼为首，目前科技巨头的领导层们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安全协议和行业道德上，其所专注于的仅是在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的科技竞赛中拔得头筹，至于 AI 的安全问题，资产阶级期待当“科技的发展到达对应阶段便可以自然解决”或“可以用 AI 去监控 AI”。

这样的许诺和乐观根本无法证伪 AI 的安全威胁。以 OpenAI 的 GPT-4 为例，这一大语言模型在训练过程中所接触到的大量信息使人们开始怀疑其是否明白安全的基本底线。而 OpenAI 在 2024 年初所作的自证更是可笑与“此地无银三百两”，其管理层和安全团队声明“GPT-4 还不能指导人类去制造并释放一个生化武器”。同时，AI 被军事化、武器化的趋势也变得无比的清晰，负责新兴安全挑战事务的北约助理秘书长戴维·范韦尔就公开承认了北约国家正在加强训练 AI 以进行网络战的尝试。如此让 AI 涉及敏感信息的做法正在纵容着黑盒本身从一个单纯的技术现象走向彻底的全球安全威胁，而能够阻止 AI 使用这些涉及军事与政治的信息的本应该是完备的安全协议，而非 AI 的善意和资产阶级的承诺。

第四，所谓用于“解放生产力”的 AI 技术正在被用来监管社会和工作场所。举例来讲，中国的数个先进大语言模型在加强其文字与图片解析能力的同时正在协助统治阶级加强对互联网内容的监管。在 2025 年 12 月，一则使用了 200 张“八九六四”、“2019 年香港反修例暴动”等事件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照片的样本分析指明，最初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知识工程实验室主导的智谱、百度的文心一言、由阿里云研发的千问和被中国大陆用户大量使用的 DeepSeek 都展现出了对敏感内容的识别和停止输出。可以预测的是，这些大模型将被广泛地植入进各社交媒体以快速的审核并移除群众运动、工运和一切对抗统治阶级的内容并监控聊天平台的消息传播，以协助如今因互联网流量激增而导致效率下降的人工审核。



解放还是压迫的升级？ AI 时代已经给出了答案

通过 AI 技术进行监管的情况也普遍地出现在工作场所内。早在 2022 年前后，公司以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形式监控员工状态就已经成为常态：在 2022 年 2 月 11 日，国内某公司就曾通过能够监控雇佣工人访问求职网站次数和投递简历次数的员工行为检测系统以极高的效率开除了在外投递简历的员工；在 2021 年 11 月 17 日，国美集团的《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就通过批评存在非工作流量活动员工暴露了自己使用监控系统的事实。而这样的非法信息收集正在 AI 技术的协助下变得更加骇人，如 2022 年的监控软件就已经能够通过 AI 算法模型量化出员工的“离职倾向分析”、“怠工情况分析”甚至是对企业和资本家的忠诚度。可见，对于工人阶级来说 AI 算法在工作场所中也许是提升生产力的工具，但其更是一个接入了工作监控软件的、24 小时不停歇地给资本家提供裁员建议的管理者。

由此，即使步入了 AI 时代的社会现实没有“AI2027”所预测的那样幼稚，无产阶级对 AI 技术的悲观态度也是绝对真实的。这种悲观不是因为认为 AI 有一天会直接引爆 DNA 病毒炸弹，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AI 行业已然导致了失业潮、投资泡沫化、AI 安全协议的不可靠、政府和资本家的高压监控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但综上所述，AI 技术的可怖绝非独立存在，失业与 AI 的高生产力仅是间接关系、AI 在技术层面上的黑盒也可以得到安全的监管、AI 的应用更是直接由需求决定的……真正将毁灭人类的不会是哪一种单一的科学技术。

真正可能毁灭人类的是什么？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848 年就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而这一事实正在被如今资本主义社会的走向反复证明（卡尔·马克思 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如果将资本主义社会形容成一个垂垂老矣、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人，那杀死这个人的一定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或症状，而是崩塌的免疫等诸系统。这一比喻的底层逻辑就是当我们讨论起现历史阶段的人类社会会因什么而毁灭时，我们不能绕开资本主义这一“房间里的大象”去设想单单 AI 技术本身就能够导致经济危机和战争。

实际上，认为 AI 会去因为“生存”、“资源”去毁灭人类这一想法，本身就是在这个帝国主义横行、资本主义无尽狗咬狗的世界里的自然结论。“AI2027”的作者和 AI 末日论的爱好者们并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若是 AI 这个假想敌并不想毁灭全人类呢？人类的存在可能相之于他们是同伴，乃至共生体的存在，并不存在什么根本性上的利益冲突。不仅如此，即使 AI 真的和人类有某种利益冲突，难道 AI 就必须通过杀光全人类才能生存下去吗？这一仍未知的将来似乎已经被盖棺定论了。

这无疑帝国主义的底层逻辑在一个未来或近未来架空设定中的延申。不论是 1965 年的科幻小说《沙丘》中所设想的人工智能叛乱还是刘慈欣在他著名的科幻小说《三体》里所提到的黑暗森林理论，都无一例外显示了一个统一的核心思想：某势力将依靠对力量的绝对垄断去压迫弱小、消灭异己、掠夺资源，无论是 AI 还是外星生命。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帝国主义在政治层面的样态保持了一致，即“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弗·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叙事绝非只存在于书本、电影或历史中。

那末，共产主义者该如何看待人们对 AI 叛乱的恐慌呢？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当然不会否定存在 AI 反叛并造成某种危机的情况，但人们不该过度地关注于这一可能的未来和“背叛了人类的人工智能”这一被各类文艺作品反复渲染的敌人，以至于忽略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一个明确的事实：AI 所可能造成的一切危机都是由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当我们沉浸在 AGI 也许、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有特定概率去毁灭人类的设想中时，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真真实实地用雇佣劳动、战争和饥荒压迫着无数的无产阶级并推动着我们走向那个毁灭的倒计时。

共产主义者需要意识到：AI 技术不是敌人，资本主义和作为其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才是，毕竟数场迫在眉睫的帝国主义战争、经济危机、饥荒和能源危机要比一场架空的 AI 反叛致命百万倍。届时，如果真的出现了一款 AGI 大模型，那它要考虑的将不是如何消灭人类，而是如何去保护自己的硬件不被导弹炸毁或在气温达到 50 摄氏度的冬天冷却自己的服务器。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如何安全地联系我们

确认发信邮件地址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的联络邮箱为：Leninists1917@proton.me 且在组织的所有宣传材料和频道上都有标注。除非组织进行了邮箱调换，请不要联系该邮箱以外的任何邮箱。

注册 Proton 或任何加密邮箱服务

注册一个 Proton (<https://proton.me/>) 等平台的安全邮箱且确保不要使用常用的密码或能够识别至个人的信息（如生日、个人真名或使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邮箱地址）。千万不要使用 163、QQ 等国内邮箱平台，且尽量也不要使用 Gmail 等非安全邮箱。

使用 VPN

在与我们联系时时刻记得开启 VPN，具体指南见[组织安全手册的节选部分](#)。

发信并注明来意

请各位同志在发信时阐明自己的需求，无论是想要加入组织、分享信息还是投稿文章都请清楚说明。

等待回信

组织的联络负责人们会尽快与各位同志取得联系。在此过程中，请务必将联络事宜进行保密，不要与不想干的人做任何分享。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Telegram (电报) 频道:

<https://t.me/revcommunist0cn>

电台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Instagram 账号:

<https://www.instagram.com/revcommunist0cn/>